

笑别人生

千年历史存公道



万众人心有是非

敬祭李锐

李南央自制电子版

谨以此书祭奠父亲
李锐辞世五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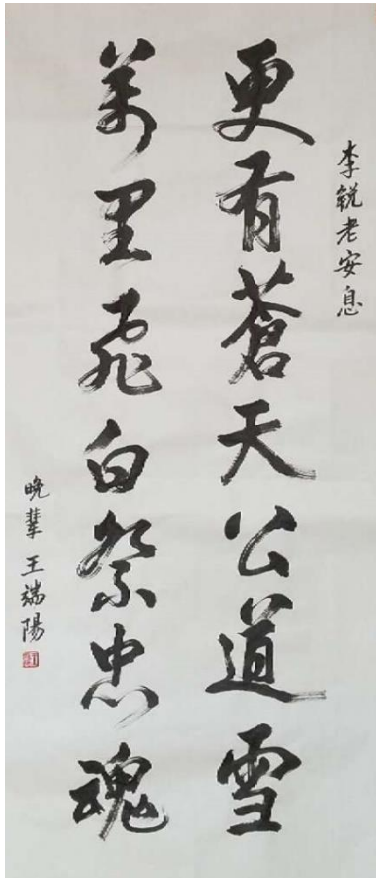
女儿南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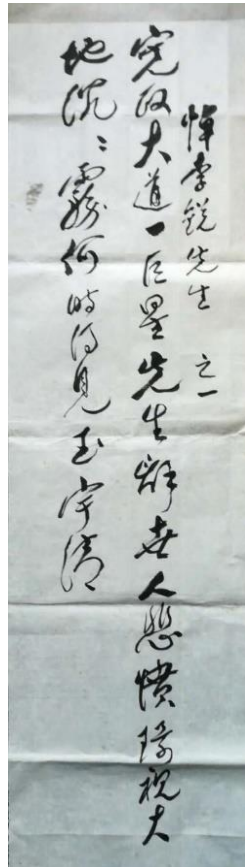
参加李锐告别仪式的一老一少



一位退休工人手举大字：李锐老名垂千古，老百姓眼亮心明



北京王端陽送字



重慶石琮生送字



吳明送字



清晨六点南央的一位朋友在李锐告别大厅外拍下的照片，这个签到牌很快被人拿走，重新摆上的只有“签到处”三个字



南央原三线工厂同事在李锐告别厅外现场拍照片



2019年2月20日李锐告别大厅外

目录

电子版说明

敬寄李锐（初版）

前言/代序		1
一 敬联		
钟叔河（生挽）		2
李冰封、朱正、朱晓		3
韩三洲		4
李玉、万润南、云南《炎黄春秋》读者		5
李良玉、 陈忠介		6
黄学章、牟广丰		7
凌铭、许绍吉、郭振乾		8
卢明明、黄一龙		9
金家兄妹		10
二 文章		
刘道玉	忆李锐老反对极左思想的轶事	12
杨继绳	留得丹心豪气在 高擎铁笔写春秋	17
陈四益	歌一曲 为君寿	30
丁 东	我眼中的李老	33
吴 思	李锐是谁	36
附：	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	39
韩 钢	李锐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43
附：	“周惠谈话”辨伪	44
刘小磊	关于汪澍白先生的文章	61
黄一龙	李锐二题	63
胡 平	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	66
李大同	李锐老与《冰点周刊》	69

目录

蔡霞	一生说真话的人	74
韦弦佩	述往思来寻史迹	75
闫淮	李锐的“四个一”	88
崔武年	李锐和“第三梯队”建设	94
陈楚三	一封信和“两头真”	105
周孜仁	神往锐老（云南）	110
戴晴	李锐与三峡工程	112
陆茂竹	我心目中的李局长	118
张博庭	探访新中国水电的奠基人	124
王作高	中国水力发电奠基人—李锐	128
程真	劈山斩水此生缘	131
于善浦	李锐二三事	133
张光渝	与李老的一次通信	136
盛禹九	李锐病中探望记	140
韩磊	李锐与周有光的道义之交	142
郭于华	记一次研讨会	148
王晓林	李老为我题书名	149
李飞飞	请李锐老为《知天命》题书名记	153
滕叙尧	李锐老鼓励我研究彭德怀历史	156
林蕴晖	就高岗问题请教李锐	157
梁国雄	好花须映好楼台	158
蔡文彬	三访锐老	162
一哲土方	回忆与李锐老的一面之缘	164
程绍国	请李锐先生吃饭	169
尹曙生	我是李锐忠实粉丝	173
周成启	我喜欢李锐钦佩李锐	175
王智仁	您就是千年的胡杨	176
周七月	写给李锐叔叔的一封信	179
陈巧巧	写给李叔叔的信	181
吴萍	我敬仰的李锐伯父	183

王承鹤	三辈猛士	186
朱健国	从共产走向共生的李锐	187
皮公亮	我和李锐	193
金常政	一株高贵的野草	195
胡显中	千人之诺诺 不如一士之谔谔	198
董国和	李锐情注毛泽东	202

三 || 字

王 普	205
林 海	206
陈国阶、李连斌、刘 海、大众一员、韦 石	207
陈建源、陈长久、越 峰	208
张欣生、张曙光	209
一个在“祖国怀抱”瑟瑟发抖的人、马昌海	210
林梅梅、唐 怡、杜厚勤	211
顾晓渔、许有为、汪葆明	212
邹 平、罗京生等	213
钱振选	214
祁 雪、陈祖堃、华伟范	215
荐志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78 级部分同学、邵晟东	216

四 || 诗

谢小玲 诗/吕文崇 书	218
周实	219
附：字	
牟广丰	221
赵亚山 诗/许强 书	222
王毅、毛新华	223
云卷云舒、南 浦、张 楠	225
王克斌、月明风清	226
沈汇丰	227

目录

张宝林、曲乙家	228
郭绍华、陈昕舟、黄学章	229
李包罗	230
王强山、王庭恺	231
冯崇义	232
杜鹏飞代黄肖路拟、马杰	233
李乾	234
张琳璋、车天启、马育中、王昌民	235
后记 — 李南央	236
附录：约字 — 李南央	237
编后感：追求单纯的快乐 — 蒙宪（责编）	238

敬祭李锐（增订版）

增订版前言—李南央	241
增订版前缀：记送《敬寄李锐》初版—安锦珊	242

五 || 海外媒体报导

美国《纽约时报》	245
日本《朝日新闻》	250
英国 BBC	252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	258
美国《世界日报》	261
德国之声中文网	263
法国《费加罗报》	266
英国《卫报》	270
美联社	273
英国《电讯报》、《经济学人》杂志	275

六 || 挽联

钟叔河（祭挽）	280
武宜三、曹谦、陈 坡、程建学、邓步峰、郭业大、胡荣华	281
郭世佑、廖国华、刘道玉	282
马君骅、马育忠、任小彬、沙 达、沈汇丰、史宗伟、汪廷奎	283
吴雁程、徐 成、杨启宇、夏 楠	284
杨小凯、张 钰、张宝林、张遵宏、张以林	285

七 || 文章

章立凡	告别李锐——中共民主派的谢幕	287
王申生	忘年交	295
丁 东	李锐的意义	297
邢小群	和李锐的最后一次交谈	305
玄 武	李公列传	307
邓伍文	李锐有日记	311
吕 月	习近平与李锐	312
老 鬼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士	315
何清涟	百年风雨天地人——送别李锐先生	319
薛 原	骨头如故作铜声	326
碧琼子	锐老的光辉	332
李工真	李锐老先生去世了	335
祝华新	李锐病逝，频揩老眼不分明	336
李欲晓	领悟前辈的结论	338
王东成	名字写于流水，事业化为心碑	340
王德禄	李锐和中国的希望	345
赵健民	送别李锐老人	348
黎一青	两个对历史负责任的人	350
黎安泰	我认识的李锐叔叔	353
唐仲远	您是青松，永不老！	358
赵倚平	李锐老签名赠书	361

目录

王炯华	祝福李锐老!	366
江 汉	我与李锐一次聊天谈话	368
范 建	李锐老走完风雨坎坷人生路	370
薛开震	我与李锐老的交往	372
陈宝成	李锐先生之辩	374

八 || 外国友人送字

泰瑞·布兰斯泰（美国驻华大使）	376
毕成（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	377
卡罗尔·肯迪	378
黑川真一	379

九 || 字

范明强、郭冬成、刘嘉波	381
徐 跃、严家祺	383
张曙光、 郑仲兵	380
石 楼	381
宋 霖、岳建一、张 丁	385
赵 诚 、百家出版社、杨志洪	386

十 || 诗

丁柏生、池堂春草、邓世广	388
冯青堂、蒯高毅、管谨武、胡 鸿	389
霍亚新、金道华、苏 俊	390
老 桂、王中陵、向明月、张琳璋	391
赵 哲、车天启、贺兰吹雪、李仲兰、刘海	392
刘 琼、南 浦、吴 江、车兆基	393
陈达志、陈少平、陈世群、高 雷	391
高知贤、何雨淮、胡三贴、胡晓明	395
嵇发根、冷阳春、李 刚、李润勉	396

林 垦、刘 强、刘星明、马育忠、牟广丰	397
欧铁辉、欧阳国金、沈秀东、唐冬戈、王 康	398
王明全、王云生、汪廷奎、杨子怡	399
徐中秋、袁培根、袁文庆、张红果、张庆辉、张维引	400
郑轰轰、众 人、廖国华、沈汇丰	401
杨新跃、丁建国、杨启宇	402
向喜英、胡静怡、朱 刚	40
王晓林	404
王庆彦（电子版增）	405
李锐绝唱（增订版代后记）— 李南央	406

电子版说明

李南央

今年的 2 月 16 日，父亲李锐离开这个世界整整五年了。与他有关的两个法律诉讼至今悬在半空：1. 李南央在中国大陆诉北京首都机场海关非法扣留《李锐口述往事》案；2. 美国斯坦福大学在美国提诉澄清李锐资料归属权/张玉珍反诉李南央与斯坦福大学合谋盗窃李锐资料案。

第一起诉案，受案的北京第三中级法院迄今发出了 27 次“延审通知”，我的“跟进”报导写到了 114 期。这个案件的起因是中国海关判定李锐回顾自己追随共产党一生的“口述”为违法禁书；第二个诉案的起因是张玉珍在中国发起诉讼，认定李锐资料的继承权全部归她所有，斯坦福大学即在美国提出归属权诉讼；张玉珍聘请美国律师反诉，称李锐生前捐赠给胡佛的资料属于“国宝”，应归还于她，由她决定捐赠对象。张玉珍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聘请的美国律师因利益冲突，被法官裁定取消代理资格，她另聘律师继续缠诉。世人当然知道，躲在张玉珍背后掷金百万的除了那个“伟光正”不会另有他人。对内的嘴说“李锐口述”是违法禁书，对外的嘴说“李锐资料”是国宝，两张嘴一个逻辑：“伟光正”的形象是必须誓死维护，且维护到死的。

李锐何许人也，“千年历史存公道，万众人心有是非”。只可惜这本众人追忆李锐的文集在香港印出后难以进入中国大陆。承蒙香港工房出版社同意可自制电子版传播。我在父亲去逝五年之际完成了制作，排版格式是按可以印成纸书做的，内容除增加了王庆彦先生送来的词及附字，及对纸版书的误植做了更正而外，与出版工坊的纸质书内容完全相同。封面设计和书首的彩色插图略有不同。请朋友们帮助传播，或制成纸书留存，本人不保留版权。

在香港出版纸质书时我曾允诺所有送字的朋友，我会设法将书送到每一位的手中。我低估了情势的严峻。如今送字人中有几位已经作古，希望他们的后人可以得到这个电子版，谨以表达我对他们父辈的感念。

李南央
2024 年 2 月 16 日
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敬寄李锐

(初版)

前言/代序

李南央

下面这些文字是6月10日发出《敬寄李锐》第一个电子版时所写的前言。现在承蒙香港出版工房有限公司出版此书，即以这个前言作为这本书的代序吧。此书增录了电子一版之后截止于7月4日陆续收到的“新字”。

* * * * *

父亲被流放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时，夏季潮热的气候令他哮喘病发作十分严重，却得不到有效治疗。整夜靠墙而坐，需服大量安眠药和注射氨茶碱方可入睡。他为自己写了一幅挽联：

人间何处求公道，世上无人问是非；死不瞑目。

刚刚过去的四月，我在医院陪伴父亲时他对我说：“你把这些日子听到的大家对我的评价收集一下，记下来。我这个人还是喜欢被人吹捧的。”我知道，他这是在托付我日后为他出一本“纪念集”。

我原本计划在他身后再着手此事的。但是父亲的那幅自挽联却开始嗡嗡于耳，缠绕于心。才华横溢、思辨敏锐、善于用人、尽心为国、为民的父亲，40岁到60岁的人生最佳年华在流放、软禁和监狱中渡过；本可为这个国家和人民作出卓越贡献的一个人、一粒金子，却被淘洗出去，眼睁睁看着那些留下的泥沙祸国殃民。1979年在近62岁的年龄方得平反复职，不久又被打入另册，终至被划入“敏感作家”名单，著作不能在大陆出版。唯一能够发表他文章的《炎黄春秋》最后也遭剿灭。他“死不瞑目”的心结是一直梗在心头的。如果我能够让他活着的时候知道民间怎样看他，让他听到那些相知相识的朋友怎样评价他，对他将会是怎样的安慰呵！

所以，我发出了那封“约字”短笺；结果，也就约到了收入在这本书中的这些字。这本书，是所有送字的人，还有我和先生悌忠、女儿忙忙送给他的一幅挽联：

千年历史存公道 万众人心有是非 笑别人生。

2018年6月10日

— | 敬联



同鄉晚生鍾叔河敬輓	死	民	立	生		老
	去	憲	言	于		社
	大	總	俱	嶽		長
	願	能	不	雲		李
	仁	行	朽	汨		銳
	心			水		先
	仍			之		生
	在			間		千
	興			惟		古
	華			楚		
可			有			
望			材			
民			立			
權			德			

勸業



立德、立功、立言，科学同民主飞翔，创锦绣
中华美好开端；
不淫、不移、不屈，古训与新规并存，教后代
子孙永记不忘。

李冰封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厚生吾师千古

直笔一支写他真史文章不朽
教泽广被惠我偏多遗爱难忘

福寿全归阅尽荣枯世变
英灵不远行看宪政开张

受业朱正敬挽

二零一八年五月廿二日

李锐伯伯千古

秀才遇到党
说理传南央

愚侄朱晓敬挽

2018年5月22日



1991年8月朱正(左)、李锐(中)、李冰封(右)在大連棒棰島合影

痛挽李锐老三联

一、

天不生李公 庐山会议难得有珍贵实录
人若无锐思 三峡争端谁人来重新梳理

二、

伴君如伴虎 几经劫难始反思专制荼毒
人生已满百 阅尽沧桑终选择宪政道路

三、

八年囚秦城 选集里夹注有存世龙胆紫
卅载居木樨 笔端中流淌着普世新启蒙

李大姐：您好！

我是工人日报的韩三洲，也是工人出版社已故编辑王建勋的老友。二十年来，我多次见过李锐老人，感谢他亲自为我的岳父《何家栋纪念集》撰写七绝一首。上次惊闻李老病重入院，并有去世的讹传，我不揣浅陋，当即写下三个挽联，今天在微信群看到您的“约字”信，就连同我刚找出的三张与李老相关的照片，一并呈上！

韩三洲

2018年5月22日



李锐和韩三洲

李锐叔叔，我们永远怀念您

百岁悠悠难得君一生浩浩正气
千夫诺诺岂及公半句諤諤诤言

李玉 万润南 敬挽

李南央：你好！

我们是李锐叔叔生前好友李昌的女儿（李玉）和女婿（万润南），深知老一代人的信念及他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是1989年以来的这一阶段。到2010年老爸在世时候，常陪同这些老朋友聚会，故此给我（李玉）留下很多难忘的记忆。



1997年4月李昌与李锐在文采阁李锐八十寿宴

两个月来，是从朋友的微信得知李锐叔叔病情，我们因为远在巴黎，不敢电话告知北京家里98岁高龄的妈妈，就此发出此联。

致

礼！

李玉 万润南

2018年5月23日

生祭李锐 日月千古

曾入十八层地狱九死一生受遍党国考验无私无畏何必盖棺
更携三五名同志千回百折诉尽民众疮痍有胆有识已经定论

几个《炎黄春秋》云南老读者 敬呈

一片忠心成坎坷 百代青史叹庐山

我和李锐老有一面之缘。1999年江苏学界纪念五四，我参与主持，建议省社联邀请李锐老来做报告。我曾去南京西康路省委招待所和李锐老有过长谈，内容至今记忆犹新。李锐老当年4月27日在江苏学界大会有报告，振聋发聩，并因此而起波折。因此报章无一字提及。个中情况，我将有长文记录。我崇敬李锐老，他是一个大写的人，巍巍然正气贯天地。现在谨写下两句，寄与李南央女士。

——南京 李良玉
2018年5月23日

附：李锐日记摘录

1999年4月28日（星期三）晴

晚宴由社科联主席送行。陶森、李劲祥六点从上海来接我们，一起参加。晚上南大历史系教授李良玉来谈近一小时。原想请我去开座谈会。他已著民国史，正在写当代史，写文革。与我意见相和，彻底弄清楚毛泽东也。留文革一篇。

铁肩担道义 心系国家百姓 直言建言 两次牢狱 铮铮震惊朝野
妙手著文章 呐喊民主自由 实录谈录 经世传世 谆谆启示后生

陈忠介

敬李锐先生

苍天秉正百岁洪福赋铮士
厚土慈怀世纪巨变护忠骨

上海 黄学章

2018年6月4日

回光返照顾盼中华苦难同胞，
大义弥留萦怀华夏宪政伟业。

闻南央女士6月18日讯，102岁弥留之际的李锐先生，竟能起坐，写字了。惊喜之余，赋联一副。

上海 黄学章

2018年6月21日

赠李锐先生

中国卢梭伏尔泰
当今海瑞梁启超

牟广丰

2008年11月5日

五十年前 庐山风雨 敢义胆侠肝担道义
九十岁后 京华烟云 仍铁肩妙手著文章

牟广丰

2009年1月26日

弘揚憲政還公道
表露真相定是非
閃亮人間

浙江 凌銘

2018年6月23日

千載悠悠，李公相隨廬山。
百年熠熠，銳志成就實錄。

美國 許紹吉敬獻

2018年6月24日

活得明白 牛鬼蛇神怕你 恨你
死得偉大 老百姓們愛你 敬你
中華偉人

郭振乾敬上

2018年6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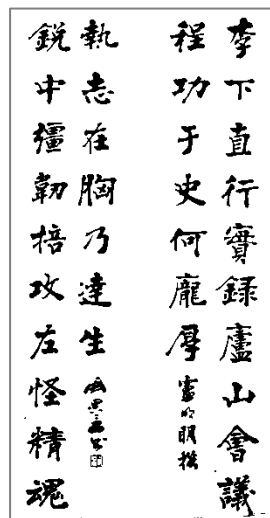
李南央同志：我这可不是随便叫的，志同道合者、可以简称为“同志”。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资格？李老的身体欠佳、住了医院，亏你受累。我送给李老一幅对联，我不会写诗，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我爱李锐，我崇敬李锐。谎言政治就像是小孩手里玩得一只破灯笼，快完蛋了。

李锐老（原名厚生）嵌名联

李下直行 实录庐山会议 程功于史何庞厚？
锐中强韧 培攻左怪精魂 执志在胸乃达生！

卢明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年6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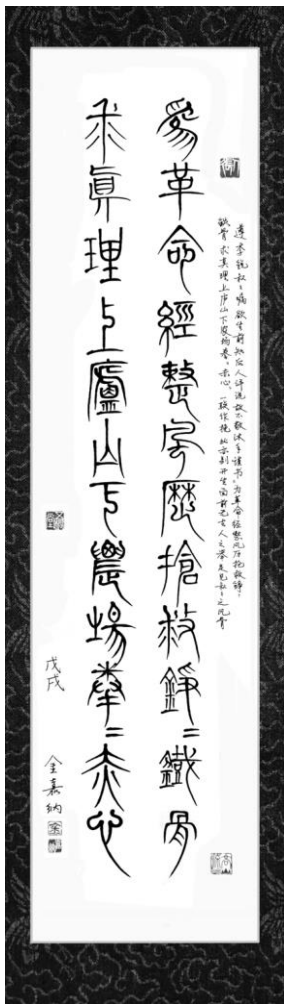
恭送锐老胜利西行

追求百年难觅伟光正
奋斗一生专拆假大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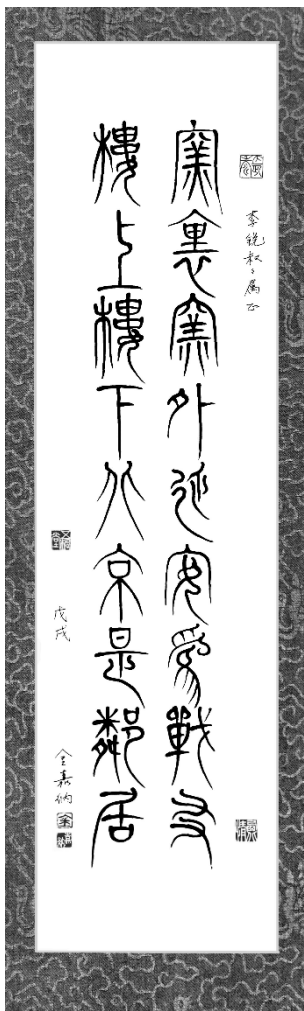
晚生 黄一龙预挽

2018年6月22日

遵李叔叔嘱 欲生前知后人评说 故不敬沐手谨书『为革命经
整风历抢救铮铮铁骨 求真理上庐山下农场拳拳赤心』一联
作挽 此亦别开生面 前无古人之举 足见叔叔之风骨



窑里窑外延安为战友 楼上楼下北京是邻居



此二联是父亲所居公寓楼上邻居金树望伯伯的长子金嘉纳代表金家四兄妹（妹：金嘉燕、金嘉楠、金嘉满）所书。我们和金家同于1979年7月搬入复外大街22楼。此楼原为归国华侨所建，但那一年大批平反复出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或出狱或从外地返京，居无定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此楼改由这些干部居住。一时间，22号楼被称为“黑帮楼”。第一次轮到我家收单元水电费，敲开金伯伯家门，他们方知楼下住的是李锐。金伯伯夫人王遵仪阿姨脱口而出：“我们和你爸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是一起关在保安处的啊！”从此两家来往频繁，我和金家四兄妹成为挚友。金伯伯后来还参与了父亲主持的“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

—李南央注

二 | 文章

忆李锐老反对极左思想的轶事

刘道玉

李锐老先生是武汉大学第三届杰出校友，他是迄今为止 68 名杰出校友之一，母校以这些杰出校友为自豪。他于 1934 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37 年辍学投笔从戎，解放前后在多个地区和单位从事革命活动，担任过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他既做过诸多的革命贡献，也几次跌宕受到过打击，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他是一位意志极为坚强的人，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已经走过了 102 岁的大寿，是集学高和寿高为一身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我与李锐副部长是校友，但他是我的学长和师辈，是我敬仰的一位学者化的革命家。我与李锐副部长相识于 1983 年，那一年我校将举行 70 周年校庆活动，为此我们在全中国率先成立了北京校友会。大约是 1983 年 5 月，我专程赴京探望早年在武汉大学学习和工作过的老前辈，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郭述申，国家建材委员会副主任杨作材，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杨纯，北京大学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著名文学家叶圣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辅弼等。李锐副部长当然是我率先拜见的老领导，他那时已经平反恢复了工作，时任中共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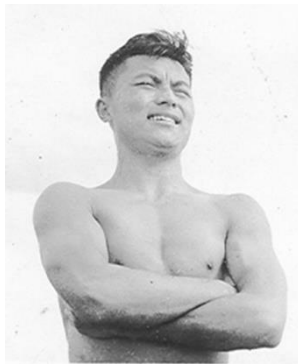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工学院老照

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面对改革开放的形势，他公务自然是非常繁忙的。

大约 5 月初，我如约来到北京木樨地 22 号楼李锐副部长的家，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那一阵子，他正好要到多地出差，他说母校 70 周年校庆时，不可

能回去参加校庆活动了。但是，他对母校的建设和发展极为关心，对我个人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语重心长地说：“道玉同志，你现在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年轻的优势就是敢想敢干，希望你拿出魄力来，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改革就是破旧立新。阻碍我们改革的就是极左思想，过去湖北省一贯都是左倾，因此清除极左思想的流毒必须下大功夫，否则教育改革是寸步难行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也是武汉大学历史的见证人，正因为解放后连连受到极左路线的破坏，才使得武汉大学的学术地位一落千丈。我在就任校长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发出了誓言：“卧薪尝胆，十年深居，十年教训，十年雪耻”。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支持我的想法，并表示只有清除极左的流毒，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我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议。

1984年6月8日到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其他大学都是党委书记参加，而我是作为学校党委副书记兼校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在6月9日上午的开幕式上，教育部邀请了时任中宣部部长、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作报告，讲完之后他离京去福建省三明市参加精神文明建设会议。第二天，参加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分组讨论邓力群的报告。我是被编排在中南地区小组，召集人是湖北省科教部副部长任心廉。他在作了开场白的发言之后，其他学校的代表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表示，完全赞同邓力群同志的讲话精神。这是毫不为奇的，因为历来开会都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少有人敢于说真话，更鲜有敢于发表反对的声音。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于是我就作了激情的发言，敞开思想谈了对邓力群同志报告的看法。



1935年李锐就学武大在东湖游泳

我首先表示不同意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指出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如果青年学生是不可信任的一代，那我国还有什么希望？如果广大知识分子是不可信任的，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依靠什么样的人？诚然，当代大学生有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不是他们的主流，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教育好的，不做这样的基本估计，我们就失去教育好广大青年们的信心。

紧接着，我集中地反驳了他对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三面向”的指示的解读。北京景山学校是于 1960 年创办的，由当时中宣部具体指导的一所改革实验学校，在文革以前办得很有特色。1983 年 9 月，该校请邓小平同志题词，于是他就题写了“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当时，这款题词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推动教育改革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邓力群同志在大会上的解读是：面向现代化，不仅仅是要抓生产力，而且更要重视抓生产关系，决不能放松抓阶级斗争。面向世界，就是要看到帝国主义还存在，他们亡我之心不死，必须提高警惕。面向未来，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本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作了结论，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停止使用阶级斗争的口号，将全国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的建设上来。然而，邓力群同志的讲话，完全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解读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从而完全篡改了“三个面向”的核心精神。

我一口气讲了 30 分钟，会场上鸦雀无声，在座的代表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于附和我的看法。我不仅批驳了邓力群的错误观点，也谈了自己对“三个面向”的理解。《人民日报》记者庄永龄作了详细的记录，鉴于我发言的内容比较重要，他整理出了一份《动态清样》，据他告诉我只印了 5 份呈报政治局常委。他私下对我说：“道玉校长，你的发言很大胆，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讨论问题就应该这样，要敢于说真话。”这份清样送上去以后，究竟有什么反响，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使中央主要负责人了解到邓力群的思想倾向。坦率地说，我发言时并没有思想顾虑，反倒是发言以后我有一种一吐为快的轻松感觉。可是，在有些人看来，我的发言是攻击中央领导，按照 1957 年反右派的标准，给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右派分子，而批评中央书记处书记，那岂不是要划为极大右派分子了。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现在是开明的胡耀邦总书记领导，刚刚为全国 300 多万冤假错案平了反，他是绝不会再重蹈历史覆辙的。

全国高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结束后，我第一时间就到李锐副部长的家，向他汇报会议的情况，特别是我反驳邓力群篡改邓小平的“三个面向”的讲话情况。他听完我的汇报后说：“你的发言是实事求是的，反驳邓力群的讲话也是得当的，应当提倡说真话，不能让错误的思想广泛流传。”接着，他谈了对邓力群的系统看法，他说这个人一贯坚持极左路线，从延安开始一贯如此。解放初在新疆工作时，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被中央撤销职务。他作为中宣部部长，从来就不宣传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反而从意识形态出发，对改革开放进行指责，设置各种障碍阻扰改革。邓力群认为现在搞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作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表示，我要向中央建议，邓力群不能再领导和主管中央的宣传工作，否则给党的事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我插话说，学校的知识分子称邓力群是“左王”，大家都不喜欢他。后来，从媒体上知道，1985年7月朱厚泽同志由贵州省委书记调到北京，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部部长，这显然是中央对邓力群极左路线的不满。1986年5月18日，我邀请朱厚泽部长到武汉大学参加教师座谈会，与会的有老中青教师代表100多人。他在会上说：“大学就是应当允许议论的地方，要有充满创造的活力，应当成为新思想、新知识的发源地。‘双百方针’提出30年了，但就文科而言，一天也没有鸣过，一言也没有放过。只有实行‘三宽’（宽松、宽容、宽厚）的方针，才会迎来社会科学真正的春天。”前后两任宣传部部长，他们的思想有若天壤之别，一个被人们称为“党内的大好人”，而另一个则称为“左王”。

1986年9月，我率武汉大学代表团赴美国，参加耶鲁大学第20任校长班诺·施密特的就职典礼，并顺访了美国和加拿大多所大学，并与这些大学签订校际友好交流协议。在美国访问期间，多地的留学生告诉我，那时国内派出了政治宣传家李燕杰、曲啸等到美国大学演讲，动员留学生学成回国，如果不按期回国，国家将采取限制措施。此举引起了广大留学生的强烈反感，并遭到了留学生们的驱赶，弄得灰溜溜地回国。我回到北京后，曾经到北京医院探视因病正在住院的李锐

副部长，我向他汇报了国内政治宣传员在美国遭到留学生驱赶的情况。他听后直截了当地说：“我也听说了这个情况，他们的作法是错误的，是不相信广大留学生的表现，这是区别真开放还是假开放的分水岭。我们利用美国高水平的导师、先进的设备和充足的资金，为我国培养优秀的人才，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这些政治宣传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李锐副部长解释说：“他们本身就是左倾路线下培养出来的，有的人甚至还遭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但又充当左倾路线的宣传员，实在是可悲啊。”

在以后的 20 多年里，我每次到北京开会或是联系工作，都会抽空去探视李锐副部长，他都会把自己新出版的著作赠送给我，而且我们每次都会谈论到左倾思想的危害性。有一次他对我说：“左倾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假，也可以说假是左派人物最大的特点。其实，他们并不懂马列主义，只不过是搬来几句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吓唬人而已，邓力群就是这样的人。”我完全同意李锐副部长的看法，我在学校也经常宣传一个观点：“以改革开放的观点看，到处都是人才；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到处都是敌人”。在反对极左这个问题上，我与李锐副部长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解放以后，我国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左倾思想的政治基础非常深厚，为了深入进行各个领域的改革，必须继续肃清极左思想流毒，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2018年6月3日

留得丹心豪气在，高擎铁笔写春秋

杨继绳

我记得一位古人说的一句话：“文章草草传千古，士宦忽忽仅十年。”李锐当过的高官，权倾一时，对此我并不在意。我关注的是他的著作，记述当代历史的著作。他对中国当代史有着突出的贡献。



2017年4月杨继绳探访李锐赠其新作《天底翻覆》

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

李锐早年学习机械，却成为一位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他说：“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如何看待毛泽东》，2003年12月）

李锐在《八十自寿》中写道：“欲唤人间归正道，学操董笔度余年。”董笔，董狐之笔。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他坚持如实记载事实，是一位不阿权贵的正直史家。李锐操董狐之笔是为了寻找人间正道。

什么是人间的正道？当一个国家需要重新选择道路时，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对的道路，像一面纵横交织的网络。在有限视野之内，人们不可能对复杂的道路网络作出鸟瞰式的判断，他们只能沿着目所能及的一条路走下去，他们可能由此走入历史歧途。作为政治家，他可能有着美好的宏图大略，也可能有着菩萨般的慈爱心肠，但是，他一旦不自觉地进入了历史歧途，就可能把众多的人推向奴役，引入灾难。如果政治家的品质不佳，老百姓遭受灾难就更深重了。20世纪的历史在这方面留下了很多教训。

历史这门学科就可以给人们以广阔的视野。当我们选择一条新的道路时，如果研究一下历史的座标，看一看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就有可能避免进入历史误区。

可惜的是，中国人读的历史教科书大多是由统治者编写的。统治者编写史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歪曲真相，是中国官史的通病。这样的教科书只是教人们如何当奴隶，从它这里是看不到历史方位的。统治者最怕老百姓知道历史真相，所以，私撰国史，灭九族。

时代进步了，现在“私撰国史”没有灭族之罪，但也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然而，敢冒风险也不一定给历史以真实。历史的价值在于真实，在于为后人提供真实的情况；历史的价值在于真知灼见，而不掌握大量的真实史料，没有相当的学识水平，不可能有真知灼见。如果写当代史，就更要秉笔直书的胆识，写已经过去的历史，就需要有鉴别事实真假的能力。

李锐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向社会奉献了一系列历史著作：《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早年毛泽东》、《毛泽东晚年悲剧》、《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李锐口述往事》、《李锐文集》、《李锐日记》、《李锐期颐集》等等……这些，既有极为珍贵的真实史料，又有令人醍醐灌顶的真知灼见。李锐的这些著作，是后人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必读之作，是可以传世的。

李锐能够对历史学有着如此卓越的贡献，除了有“留得丹心豪气在，高擎铁笔写春秋”的壮志以外，他还有其他人不具备的特殊条件。他曾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和毛泽东以及其他老一代革命家有过直接的接触；他身处高层，亲身经历过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他既独立思考，遇事不盲从；他十分勤奋，坚持作详细的记录；他寿命长而且体魄健壮，年逾八十而思维敏捷、视力不减。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生大起大落，毛泽东说过“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除了头颅尚在，其它四项他都经历过。他既处过庙堂之高，深知高层内幕；也处过江湖之远，痛感民间疾苦。一个学识广博又勤于思考的人，有着这样的跌宕起伏的奇特经历，他看问题的眼光和深度，当然就有过人之处。

他对毛泽东的研究

当代中国历史和毛泽东的名字是分不开的。研究中国当代史首先

要研究毛泽东。然而，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有关毛泽东史料的披露，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

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过和形象；

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它关系到邓小平时代以及后邓时代的指导思想。

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重大，所以邓小平格外重视。从 1979 年 11 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 10 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后来又交党内 4000 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 7 次修改才定稿。1981 年 6 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

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主要是指搞文化大革命以后。晚年的毛泽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组织和策划写这个《决议》是为了统一当代人的思想，以便开辟新的时代。既然这个《决议》是为当代人写的，就不可能跳出当代人的利益局限，也就是说，不可能真正具备历史的客观性。所以，这个《决议》一公布，李锐就说，这“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李锐参加了这个决议的讨论，他这么说是根据的。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李锐就撰写了国内第一本研究早年毛泽东的专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还发表了一些其它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决议》公布以后，李锐主要致力于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官方要求，对毛泽东的研究必须按照 1981 年《历史决议》的口径。禁区挡不住李锐对真相的探求，他用现代民主思想，用史家的勇气，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出了事实的揭露和批判。1992 年出版了《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后改编为《毛泽东晚年悲剧》），以后又发表了其它有关文论。

李锐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他同毛泽东有过多次数直接交谈，又是湖南人，同毛泽东的早年朋友都有交往。尤其是他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是好朋友，同毛泽东的近臣胡乔木也是多年相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性格、爱好，文化偏好，有着深切的了解，还对毛泽东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路也洞若观火。他是在毛泽东的身边写毛泽东的，如画家写生。作为有着独立人格的史家，他虽然在巨人的身边写生，但他的视野不会被巨人的身影所遮挡。他笔下的毛泽东既不同于一般的毛泽东研究者的作品，缺乏血肉和生机；又不同于毛泽东身边服务人员的作品，摆脱不了仆役的眼光和仆役的思维。他是用历史学家的严峻眼光来审视毛泽东的。

早些年，李锐认为毛泽东很左，排斥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还说毛泽东反复无常，无法无天：“为云为雨时反复，无法无天。”他后来的研究更深刻、结论更尖锐了。

关于毛泽东一生功罪，李锐说过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革命有功是指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有功。李锐在1979年平反复职后，同家乡老友聚谈时，曾用八个字评价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当然后者只是口头上的随意之说。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但都是很笼统的说法。读李锐的著作以后，这些笼统的说法就变得清晰具体。通过对毛泽东的研究，李锐明确指出：“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这一论断深刻，切中要害！李锐说过：“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暴君。他超过秦始皇，超过蒋介石，超过斯大林，超过希特勒。”这一说法令人振聋发聩。李锐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农民党，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在中国这块充满农民意识的土壤上，才会出现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地位来看会有不同的结论，对李锐的结论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几乎都同毛泽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光荣与耻辱，欢乐与痛苦，都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所以，对毛泽东的研究与评价，会触动每一个人的感情。对同一个研究结

论，有人怒不可遏，有人拍手叫好。李锐对毛泽东的研究成果既给他带来荣誉，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他对大跃进的研究

“大跃进”这一段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结”。因为有了大跃进，才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才有党内斗争的加剧，才有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问题推向极端，从而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又是大跃进的一个“结”。李锐在这两个“结”上，提供了充分的、可信的史料，揭开了很多历史的迷团，作出了深刻的历史评论。

李锐关于大跃进的研究成果中有《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上、下）以及多篇文章。由于我近年致力于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发生的大饥荒，李锐这方面的著作我不止读过一遍。

《庐山会议实录》是研究大跃进最为珍贵的一部奇书。1958 年夏秋涌起的“大跃进”狂澜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混乱。1958 年冬天不少农村就开始断粮，1959 年春天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饥荒，不少地方饿死了人。从 1958 年秋天开始，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上，全党努力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偏差（尽管这种纠正是表面的，不是根本的），开始反左。1959 年春天，中共中央一连发出了四个文件，放宽了农村政策。庐山会议本来是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反左的。如果真是这样，大饥荒就有可能在 1959 年秋天终止。但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没有料到，开到后来，不仅在会上反右倾、把说真话的彭德怀送上了祭坛，还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样一来，不仅 1959 年春天发下的那四个反左文件被一风吹，还变本加厉，把农民推向了更深的灾难。用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据《当代中国人口》各省卷），从 1958 年冬到 1962 年春，全国饿死 2132 万人，其中，1958 年和 1959 年只饿死 665 万人。如果庐山会议不是反右，按各省官方数字计算，就会少饿死 1467 万人。当然，官方的数据是缩小了的。但也可以算出一个比例：庐山会议以后饿死的人相当于庐山会议前的 2.2 倍。庐山会议这一事先没有料到的突变，像庐山本身一样，一直被

浓雾笼罩。《庐山会议实录》驱散了浓雾，把庐山会议的奥秘，展现在世人面前。

《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亲身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还应毛泽东之召，进行了三次面谈；他不仅是一般的参加者，还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批判彭德怀的小型会议。他自始至终作了详细的笔记，这本书就是用当时亲历的笔记写成的。其可信程度之高，是任何史书无法相比的。

说《庐山会议实录》是一部奇书，还在于李锐这个珍贵的黑皮笔记本的奇特经历。自庐山会议以后，李锐成了阶下囚，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入秦城监狱，黑皮笔记本的主人历尽坎坷，它也杳无踪影。原来是陈伯达拿走了。曾经是学者的陈伯达，当然知道这个黑皮本的价值。他如获至宝，想据为己有。谁也不会料到，把李锐送进秦城监狱的陈伯达，自己也进了秦城。这个珍贵的黑皮本从陈伯达的收藏中找到了，终于回到了李锐手里。如果找不到这个黑皮本，也就没有《庐山会议实录》。

《庐山会议实录》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从1959年6月30日写到8月16日。我初读时当然会从头到尾读一遍。后来，我又以重要事件为主线读，以重要人物为主线读。譬如，《庐山会议实录》中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一些高官政要的言谈表现，每一位的言行都分散在全书之中。我把每一个重要人物从上山前到下山前的言行集中起来，这样，原来罩在这些高官身上的华丽的服饰一一剥净，他们的真实面目呈现在我的面前：有的人在会前主张反左，毛泽东7月23日话音一落，他就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还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有的人本来主张积极解决大跃进造成的经济问题，毛泽东态度一变，他不仅自己跟着变，还“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连“阶下囚”彭德怀也说他“老奸巨滑”；有的人四方串联，八方打听，搜集彭德怀的材料，欲置彭于死地……这样读了以后，我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

了。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在革命年代，他们中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在严刑拷打中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难道“大局”和“团结”就可以不顾事实、不要良心吗？其实，他们这样做，是个人利害的选择。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今日的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专制制度的必然。

《大跃进亲历记》（上、下）洋洋洒洒 130 万字，从 1958 年 1 月的南宁会议写到 1959 年 6 月庐山会议之前。这部书也是用当时的笔记写成的信史。它既有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也有基层群众的实际情况；既有纵览全局的总体介绍，也有生动的细部描述。我把这部书和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同时读，相互对照，受益良多。但总觉得薄一波的书有着浓厚的官方味道，而李锐的书更具独立性。当然，研究中国现代史，薄一波的书也是不可缺少的。

李锐曾多次对我说过，人生最难受的事情是挨饿。说他在北大荒劳改时差一点饿死。这大概是他十分关注大跃进这段历史的原因之一。在他的多次鼓励下，我写完了记录 20 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的一书，题为《墓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多次为我提供资料，多次对我进行指导。没有李锐的支持和鼓励，没有李锐的著作为基础，我不可能完成这部 80 多万字的著作。

有一次，在李锐家里，他扳着指头自言自语地说：“地、富、反、坏、右、资、敏”。他见我不解，就说：“敏，就是‘敏感作家’，我

是，你也是。”他的研究和写作触及政治敏感，常常受到有关部门的打压，从而被称为“敏感作家”。他把“敏感作家”和地、富、反、坏右并列，表达出他的愤懑之情。他有一句诗：“‘敏感作家’奇怪名，《庐山实录》眼中钉。”

李锐不畏惧政治打压，继续不停顿地研究和写作。他写道：“劫波渡尽溯源流，风雨峥嵘岁月稠。留得丹心豪气在，高擎铁笔写春秋。”

他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

李锐多次说过：我们要着力研究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共产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玩意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什么玩意儿。2006年3月，他就这些问题在李普家里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李普、何方、曾彦修、许良英等人，我也被叫去参加。李锐说：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出版了一本《列宁主义批判》，我们也应当编写一本有影响的书，把共产党执政以后在中国出现的问题以及前因后果说清楚。

1959—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这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束手待毙。

毛泽东时代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把苏联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

尽管毛建立的专制制度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

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我用“极权制度”这个词是对中国当时现状上述描述的概括，而不是照抄西方学者的“totalitarian system”。

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有一次，李锐在饭桌上和我们谈起一件延安往事。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秘书师哲：总统、皇帝和主席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李锐还讲过一件事，1981年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朱德的秘书谈到，1950年，在建国后第一个五一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清样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李锐常说，毛泽东比斯大林厉害，他不但控制人的行为，还把人的思想也控制起来。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迅速主动自觉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制造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利。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大，因为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处境落差更大。官员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

奴化民众。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献媚；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的地位的威胁，他就接连不断地发动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地“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

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总是被极权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多么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不改变极权制度，任何荒唐的事都可能发生。

李锐亲身经历了这个制度。他看透了这个制度对中国的危害。他的历史著作，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极权制度的弊端，发出了呼唤宪政民主的强音。

用史家的智慧推进中国民主

李锐家中墙壁上挂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关怀莫过朝中事”，下联是：“袖手难为壁上观”。这是李锐怀念他的老友田家英写的两句诗。实际也是李锐自身的写照。历史学家李锐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他对社会现实不袖手旁观。他对毛泽东的研究，对大跃进的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改变“马克思加秦如皇”的极权制度。历经磨难和深思熟虑的李锐，深知改变极权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希望中

国能尽早进入现代民主制度这条“正道”。如果说，在上世纪，李锐的努力还局限在“反左”，那么，进入新世纪，他着力于反对专制制度。

1997年他列席十五大时，在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中谈到，在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左”，他从马恩列斯的理论与实践到中国自古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分析了“左”及其难改的根源，建议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解开思想禁锢。

2002年11月，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李锐向中央上书，题为《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并在小组会上宣读。他说：“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在这个“上书”中，李锐对党的民主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应从十六大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二、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三、“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应改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四、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五、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李锐也有几点建议：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应摆正党同人大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

大。人大本身需要改革，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二、现在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要制定《监督法》，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五、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

《炎黄春秋》杂志 2003 年第一期，除了删去为“六四”平反的内容以外，全文发表了李锐这个上书，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李锐的生命力极其顽强，91 岁那年，做心脏手术时半麻醉，他老伴张玉珍在旁边吓得手发抖，李锐却在手术台上说：快，快，我有一首诗，快帮我记下来。这首诗是：“虽安起搏器回生，依旧心中不太平；妙手又将支架搭，仍旧老骥续争鸣。”

“老骥”继续以史家的智慧发出高亢的嘶鸣。2012 年中共十八大，95 岁的李锐提交书面发言，要求大力推进党内民主，提出了几条建议：一、完善选举制度：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中央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产生。二、实行党政分开。这是邓小平 1980 年提出来的政改目标，要尽快提出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发表，党员有权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五、党的领导人离职以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

李锐的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权力中心“为民作主”仍然替代着“人民作主”。他忧心重重地发问：“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李锐年近期颐时，他估计自己看不到宪政民主的实现，但他没有放弃期待：“难免将投炉火中，为民作主未宽松。何时宪政施行了，

让我灵魂有笑容。”从这里我联到陆游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辛弃疾关心的是王家的版图，忠于君王；李锐期待的是宪政制度，忠于人民。两个人的情怀不是一个层次，这是时代的差别，也是东西文明的差别。

2018年5月26日

歌一曲 为君寿

陈四益

李锐叔叔已经安然跨过了100岁。我一直叫他叔叔，也是习惯，因为我的几位长辈同他一样在“一二·九运动”后，从不同地方、不同学校，奔向延安。在他们心目中，那是奔向光明。后来，他们又一道在《解放日报》工作，一道经历了延安整风。再后来，虽然工作不同，时处异地，但青年时代结下的友情，虽不说历久弥新，却也未曾断绝。中学时代，我在北京，见到长辈们当年的这些朋友，一律都以叔叔、阿姨称呼，至于谁是做什么的，人小，不清楚，所以从来不问。

认识李锐这位叔叔，却已是文革之后。那时我在新华社《瞭望》周刊工作。为了加强刊物的评论工作，约请几位刚刚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加盟，开辟了一个专栏，叫《枥下谈》。“枥下”取义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与“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历下”谐音。约请的作者多为因年高，刚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文章高手，如胡绳、李锐、曾彦修、李普、吴江、廖沫沙等等。为了约稿，我渐渐同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叔叔”们有了较多的接触。

李锐叔叔那里，我跑得勤，一来他住地离工作单位较近，二来他总有许多新鲜的想法，笔头又健，一两千字的短文，常常一挥而就，赶得上周刊的出版周期。他没有架子，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在他们眼里，我这样的中年人依旧是小青年），也一见如故，有时事先没打招呼，直闯他家，也不以为忤，放下手中工作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这好像是他们那一代“叔叔”们共同的特点。

他七十古稀时，写了一首“丁卯古稀自寿”诗寄我：“三月春风犹带寒，小楼今日故人欢。书生议论曾何补，世事沧桑佐乱谈。士气峥嵘焉可侮，民心向背最相关。词章莫怕违时尚，结习难除况退闲。”后书“四益老弟两正”。



2008年陈四益与李锐
在一次聚会上合影

“两正”是指诗、书二者。李锐叔叔古稀，是在 1987 年。我那年五十尚不足，四十颇有余。称我“老弟”已感折杀，“两正”更如何敢当？但前辈的谦和由此可见。

又过了十八年，是他“米寿”之期。这十八年间，又经历了许多事件。在各种历史的重要关头，李锐叔叔的敢言、担当，不计个人利害，俱为世人称道。那一年，我也为他的寿诞写了一套曲辞，题为《为君寿——贺李锐老八八寿诞》：

【双调夜行船】百岁人生一霎迁，重回首往事非烟。曾驾风云，偏遭冰霰，经多少暗枪明箭。

【银汉浮槎】抗倭何论远，投陕雄心展。热血男儿甘奉遣。追风轻骑疾，俊才初显。

【庆宣和】不意流光乍转天，饱受熬煎。“抢救”谁分艾和兰。敌焉？友焉？

【落梅风】银瓶破，在井边。怎当他鞠躬如也轻施歉，“无非夜间白刃战”——顾全局无尤无怨。

【风入松】欢歌唱彻月儿圆，花盛几经年。东君异想齐天远，“一天等于二十年”。不道热风倒卷，哪儿寻救火清泉。

【续断弦】为苍生，仗直言，书生拼得头颅贱。到头来作“反党集团”一网圈，冷风吹彻凌霄殿。正所谓时穷节见。

【离亭宴带歌指煞】八八岁看透尊和贱，人世间重在真知见，乌纱帽不值生死恋。笑他闹嚷嚷抢官迁，悲切切空啼怨，恶狠狠施诡变，蝇营狗苟生，筋软骨头面。争似守丹心不移，愤吟龙胆诗，坦陈三峡电，著史藏针砭，继青春五四风，申民主科学愿。只为你这浩然气坚，琥珀盏、夜光杯，为君寿、莫教浅。

套曲我不曾写过，但在他米寿之期，绝句、律诗似难尽意，冒昧写下这一组曲辞，是想表达我对这位前辈的钦佩与敬仰。八十八是“米寿”，因为“米”字拆开是八十八，就像一百零八是“茶寿”一样。我期待到“茶寿”之时再为他写一组套曲，因为“米寿”之际他

的身体状况极佳。一个经历了那么多艰苦、磨难的老人，能那样矍铄，实在难得。

“追风轻骑急”是说他们这些初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年轻人办了一个墙报，名为“轻骑兵”，很有风骨，连毛泽东也亲去观看，从中发现人才。但过了几年，到整风时，许多奔向延安的热血男儿却几乎都经历了一场炼狱式的折磨。我听前辈们讲过所谓“抢救运动”：无中生有，昼夜逼供。只要受不了折磨，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马上就可吃到“优待饭”，如果不肯自诬，则就要忍受昼夜轮班车轮战式的逼供。那时，简直好似延安特务如毛，国统区来的热血青年俱是“嫌犯”。但后来国民党特务头子唐纵的日记表明，那时他们正感叹在延安没有一个可为他们传送情报的人。对这场无中生有的“抢救”，毛泽东后来道歉说：这是黑夜里的白刃战，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就此一笔带过。不过那些吃不住折磨而自诬的人，到了“文革”，他们当年无奈承认的“罪行”，又一次成了被“整肃”“批斗”的“材料”。

后面的“风入松”“续断弦”说的都是建国以后的事情，都已耳熟能详。只最后一段曲辞，是写我对李锐叔叔风骨的钦敬和他米寿的祝贺。一个人，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保持高尚的气节，不为权势所折，不为利禄所诱，丹心不移，浩然气坚，即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最值得钦仰的品格啊。

2018年5月26日

我眼中的李老

丁东

李老说，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是他家客厅中挂的一幅对联，也是他人生态度的写照。他不是颐养天年，再不问政；也不是颐养为主，偶尔发言。他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想方设法启动政治改革，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中国官场普遍失去信仰，追逐私利，日趋腐败；中国知识界主流精神矮化，畏于关怀公共事务的今天，李老尤其显得可贵。他的晚年，参与政治生活有三种方式。

一是写文章和诗词，包括为别人的书籍写序。他的新作，几乎每月都有。然而，公开发表并不顺利。国内党报、党刊很少向他开门。一些言论比较开放的杂志，为了自身的存在，发表李锐文章的时候，不免也要有所删节，钝化其锋芒。

二是开会发言。中顾委解散以后，李锐感到在体制内发言的机会很少。一些民间的、学院的理论学术或文化艺术方面会议，就成为他发言的基本舞台，每次发言他都很认真。

三是向中央领导递奏折。在他的一生中，有过奏折起到正面作用的经验。五十年代，他的奏折曾经影响过毛泽东的决策，使大跃进时代的毛泽东听到了一些真话，没有让三峡工程在 1950 年代仓促上马；十三大前夕，他给邓小平的奏折也曾影响过高层的人事安排，当时赵紫阳说他立了一大功。但那都是由各种机缘凑在一起造成的。虽然，他直接参加了第三梯队的选拔，直接考察过后来登上高位的领导人，这些人对李锐的折子，不论是否赞同他的意见，接还是要接的。但采纳的情况就不乐观了。比如，李老接触了李昌平，和他有了交流，看了他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章，便郑重其事地向中组部推荐李昌平，希望能够安排他当县委书记。像李昌平这样既有从政经验，又有理论水平



2017年10月李锐为丁东签赠刚刚再版的《李锐墨迹选》

和群众威望的中青年干部，在中国官员队伍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他得到的答复是，县委书记这一级干部不归中组部管，所以推荐李昌平的事没办法。

2004年夏天，蒋彦永医生失去自由已经一月有余。在那些日子里，李老也十分焦虑。于是，他决定给中央负责人写信，坦然说明蒋医生的信在发出前自己是看过的，并为之代转中央领导。他希望，尽快让蒋医生恢复正常生活。李老上书一周后，蒋医生终于回家。8月，他又上书中央领导人，要求改变赵紫阳的处境，允许他和亲朋好友正常交往。

有人说，递奏折本身并不符合民主宪政的规则。在民主政体中，公民有不同政见，可以诉诸传媒，直接表达，而不必递折子。但中国现在不是民主宪政，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也不是开放的大众传媒，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虽然写在宪法上，但在实际生活中大大地打了折扣。李锐和普通知识分子一样缺少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他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名誉会长。该会组织了一套诗集共八本，结果出版了七本，只有他的一本通不过。他不会电脑，不会上网，在缺少公开表达渠道的情况下，递折子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李老递奏折，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历史存照。李老是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有些意见，即使一时不能被决策者接受，他自信能够为历史证明。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历史人物。他曾对我说，《龙胆紫集》和《庐山会议实录》是能够传下去的。写耀邦那篇文章的价值和《庐山会议实录》是一样的。钟叔河送他一联“诗赋龙胆紫，文章太史公”。他很满意，笑着对我说，我做的官比司马迁还是大一些。的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庐山会议实录》不可不读。胡耀邦说李锐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他无意中让李锐见证了自己的遗言。赵紫阳也看中了李锐的史识和史德，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他也选择李锐作证。

李老一生饱经风霜，很难概括他是什么“家”。可以说他是史学家，他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 and 晚年》等力作；可以说他是水力学家，在三峡问题上他自成一派，写了许多文章，集成《论

三峡工程》；可以说他是诗人，他在秦城监狱中用紫药水写的《龙胆紫集》曾传诵一时，连胡耀邦晚年都把自己的诗拿给他修改；可以说他是杂文家，从延安到五十年代，都是杂文圈闻名的高手。李老则说：“我是一个杂家。”

我把他看作一位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他先后担任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和胡耀邦、赵紫阳都有较深的接触。他有诗云：“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前一句可以说是他的切身体验，他就在延安“抢救运动”和文革中两次坐牢；后一句则是他的毕生追求。

我和李老熟悉以后，对他的勤奋感触很深。他每天不是阅读，就是写作。日记从不间断。他读书之快令人吃惊。2004年7月5日，在和敬府宾馆参加《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首发式。吃晚饭时他说起，要弄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我说，张钦楠的《读史札记》对美国、法国、俄国、中国的革命谈得不错，不知您是否看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让秘书找出版社联系，要买10套书，送中央领导和老朋友们。我不禁惊叹：他吃完晚饭回家已经天黑，第二天早上已经读完此书，而且决定郑重推荐。

李老对我最重要的启发，是有一次邢小群和他说起我六四以后的遭遇，他只说了三个字：“要做事”。这三个字太重要了。人在一生中，遇到各种坎坷是难免的。怨天尤人不行，等待顺境再做事也不行。只有抓紧做事，才能在社会中站起来。李老这么大年纪，每天笔耕不辍，写的比我们后生晚辈还多。这对我永远是人生的鞭策。

2018年5月22日

李锐是谁

吴思



2017年10月李锐签赠吴思刚刚再版的《李锐墨迹选》

一、李锐不是谁？

在李锐先生追问“何时宪政大开张”的时候，他已经跳出了马列主义的圈子。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真理在胸笔在手，掌握了历史规律，代表了美好的未来，怎能被“宪政”捆住手脚？

二、历史K线图

从偏离宪政的角度看历史，似乎可以像股市K线图一样，以权力的一元化程度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在中国的一个半世纪内数出六大浪。

第一浪向上：洋务运动。

一百四五十年前，以中体西用之道，我官僚帝国开始应对西方新文明的冲击。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儒家的三纲五常，西学为用就是引进西方科技、造船造炮。这是官家集团奋发向上的第一浪。

第二浪向下：辛亥革命。

洋务运动失败，帝制衰落，君主立宪没有守住，进入民国。这段时间，民虽弱，官家集团也不强，四分五裂，跌跌撞撞走向宪政，这是官家权力衰落向下的第二浪。

第三浪向上：党国威权。

国民党引进苏俄的党国体制，西征北伐，统一中国，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官家集团再度奋发，这是上行第三浪。

第四浪向下：国共合作。

奈何外遭强寇，内逢强敌，党国有意走向联合政府，结束训政，

这是下行第四浪。

第五浪向上：党国极权。

国共中途换手，以马列主义武装的具有更高组织水平的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建立了极权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革，这是上行第五浪。

走到文革，一元化大一统也走到了人世间的最高峰。为人类探寻新路、开辟新纪元的努力达到极致，结果却内外交困，一塌糊涂。官家集团试验新知识、新主义、新体制失败了，被迫掉头，放权让利，改革开放开始。

第六浪向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开启了六浪下行之路，这是回归人类文明主流之路——经济方面是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政治方面是多元化的权力制衡。我们部分接受了经济多元化，拒绝了政治思想多元化。官家集团坚持政权垄断，视其为根本原则。在这方面，第六浪本身也是起起伏伏，一波三折。

三、官家之道

折腾了一百多年，我们才看明白：原来，中体西用的那个“体”，并不是儒学，也不是三民主义，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体”，就是我们老大帝国两千多年不变的体制，官家主义体制。官家主导，官家本位，官家取舍，官家说了算。

中体西用之道，就是官家集团坚持政权垄断并学习赶超之道，这就是官家集团应对西方新文明即现代化冲击之道。一百多年来，在官家的领导下，我们始终走在这条路上。

四、李锐这一辈子

在李锐先生生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坐了一趟过山车。先是凭借深厚的官家主义文化传统，凭借官家精英的优势和雄心，在偏离宪政的一元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到顶了，走不动了，才一步三回头地走向多元化。

李锐属于“一二·九运动”那一代。他是在下行第四浪中加入中

共的。许多被称为“两头真”的中共老人，加入中共的时段和初衷，都和李锐先生近似。中共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在外人看来，就是独立自由和宪政民主的旗帜。当时，中共确实一再催促国民党结束训政走向宪政。

在上行第五浪的半途，1959年庐山会议，李锐批评毛泽东。毛泽东继续攀登高峰，李锐进了秦城监狱。

改革开放第六浪，李锐热情参与。第六浪途中有两次比较大的反弹，重新走向一元化，他都是反对者和受害者。在官家集团认为自己还能凭借垄断权力和大国家底开辟新天地的时候，李锐一再呼吁脱胎换骨，实施宪政，回归人类文明主流。

2004年，李锐先生过88岁生日那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的大意是，李锐们资格老，地位高，讲道理，敢说话，又不患得患失，官方拿他们没办法，于是他们就享有了某种“贵族自由”，在大一统格局中为平民撑出了自由的缺口。这些体制内的老先生，两头真，他们自身就是走向宪政的力量，他们也支持民间走向宪政的努力。

2004年至今，14年过去，李老先生和中国有什么变化？

在生命的尽头，李老仍旧追求民主宪政，仍旧不肯附和当权者，也仍旧享受高干待遇。同时，中国的宪政仍旧没有开张，民主仍旧没有进展，党国体制仍旧。

在这个体制下，李锐仍旧可以直言不讳，但李锐们越来越少。他的声音的传播空间也被压缩了。他本人成了敏感作家，他兼任顾问和作者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名存实亡。管理的网眼越来越细密，他在网络上的存在感也不如当年了。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又上了几个台阶。民营企业和民间活力大大增强，国家富强和民众小康已经不在话下。但宪政民主仍显得遥遥无期。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李锐的一生，大体是失败的一生。他想要的宪政民主始终得不到。不过，历史学家通常不会简单地把政治目标是否达到作为评价尺度。

五、李锐是谁

在历史学家看来，任何时代的到来，都有先驱和准备者。李锐就是党国体制下的宪政民主的准备者和先驱之一。

历史上各国的宪政转型，大体有三条道路，执政党主导的叫改良，体制外力量主导的叫革命，第三条路是体制内外协商谈判。

各种转型，官方和民间都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双方的温和派互动，就有改良，有协商谈判。这是双赢的顺利转型之路。强硬对强硬，只能单赢，单赢的后果其实对双方都不好。

在这个意义上，李锐们就是通往双赢转型之路的备用车。时机未到，李锐就是作家，就是鼓吹者。时机合适，李锐们就是现实转型的载重车。

德先生连绵百余年的道统，作为备用车存在的辛亥革命连绵百余年的法统，李锐就是这两种传统在当代体制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存在，就是这两种传统在体制内尚未彻底消失的证明。他的兴衰荣辱，也是这两种传统在体制内强弱起伏的象征。

李锐先生不死！

2018年6月9日

附：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

作为一个不肯附和当权者的政治人物，李锐先生在当代政坛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很有时效性。在此之前，在毛泽东时代，李锐这样的人不能存在，他也确实被淘汰出局，进了秦城监狱。在此之后，倘若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民主制度确立，李锐这样的人自然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为问题。

其实，像李锐这样享受高干待遇、资格颇老、官场辈分甚高，又追求民主、努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先生还有许多，李锐先生至少在两位数的老朋友们几乎都可以算入，其中包括去年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与当局的意图相距甚远。他们时常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当局不喜欢听的话。这一批人在当代中国政坛的

存在，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广泛影响，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分量和意义。

这个问题至少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为什么能出现李锐及其同道。第二重意思，为什么能容忍李锐及其同道。

为什么能出现李锐及其同道？应该说，不同的声音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力度不同，自信的程度不同，传播的广度不同。1959年，李锐在庐山会议跟彭德怀一起挨整，就表明了不同声音的存在。但是，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强大，并不坚定，拥护者并不多，打压下去并不困难。

我想过一个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表现得那么不堪？周恩来、刘少奇以至朱德、林彪等打天下的英豪，难道真是贪禄保位之辈吗？考虑到许多人放弃荣华富贵而投身革命的历史，我觉得这种解释的说服力不够。那么，如何解释他们对谬误的屈服呢？周恩来劝彭德怀做检查，他给出的理由是：要顾全大局。这句话说服了彭德怀，也点醒了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政党，一种主张，正在向想象中的理想社会高歌猛进，这支队伍的旗手向来有英明伟大之誉。他手中的旗帜，被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全世界最辉煌的旗帜，寄托着全人类希望的旗帜。如果这就是那些英豪眼中大局，他们是否应该屈己从人，甚至舍己从人呢？恐怕这就是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的最终选择。

如果说，在人民公社体制之类的具体问题上，谁是谁非当时尚不分明，数年后则不言自明了。进一步说，在祖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等更大更宏观的问题上，当时旗手的自信，20年后已经荡然无存。谁是谁非，大局已定，历史给出了明白的答案。于是，旧旗落地，前途和大势的代表者也换了位置。这种改变，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有痛切的陈述。这种转变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上发生的，在中国的特殊经验中，包含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经验。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属于这个转变过程初始而沉重的一步：在维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

总之，为什么有李锐？因为一场巨大的社会试验失败了，不得不改弦更张，不得不探索新路，不得不向成功者学习。

在这个背景上，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当局容忍李锐及其同道。当局拿不出说服他们的像样理由，手里没有一面人们心悦诚服、甘愿舍身追随的旗帜，这类旗帜如今在李锐及其同道手里。公开打压他们，理不直，气不壮，不仅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反而会大失人心。

更难办的是，李锐这样的离休老干部不求升迁，不怕处分，对党政体制内的利益无所求，对体制内的威胁亦无所惧。这些官场手段本来很适于解决那些不宜公开的问题，一旦失去效用，官家武库顿显简陋。

当然还可以考虑其他手段。不过，李锐他们的动静太大，任何暗箱都装不下。李锐他们又不贪图物质享受，暮年心魂所系，正是年轻时冒死追求的民主，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靠细软并不能收买。至于不讲道理的蛮干硬干，既影响国际国内形象，又吓不住坐牢老手，最后算下账来，恐怕得不偿失。更何况都是政界中人，下手太狠，开了先例，会不会一报还一报？会不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谁敢保证自己在政坛上永不失势呢？

总之，明的不行，暗的也不行；软的不行，硬的还不行；横竖都不行，便拿李锐们没办法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近似“贵族民主”或曰“等级制民主”的格局。一部分人先“公民”起来，有了比平民百姓更大的自由空间，比较多地享受了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这种格局是在双方斗智斗勇、用尽各自的招数之后形成的，是双方选定了最佳策略之后形成的。这是一种自发内生的格局，谁也不欠谁，谁也无奈谁，无须任何一方的恩典或谦让，就这样维持着稳定和均势。这种有等级制色彩的民主和自由的存在，也可以算作当代政治领域的潜规则。

李锐先生身上集中了诸多优势，自然是很难得的。实际上，这些优势不同程度地分布在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的人们身上。只要占据了一两种优势，尤其占住不在乎仕途得失、对体制内的利害无求无惧这一条，当事人享有的公民自由权利就可能大出一圈。失去这些权利，一部分原因是被强行剥夺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主动出售了。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背景，即互联网无法阻拦的普及，放大了李

锐先生及其同道的影响力。此外，被推上市场的各种媒体，无论是出于良知，还是出于生存的压力，都需要用顺民意得人心的东西为自己招财添誉。这是无所不在的名利的诱惑，伴随着随时可能袭来的良心的骚动，李锐及其同道就生长在这片沃土上。

李锐先生及其同道的存在，实为中国之幸。

实际上，他们说话，发表意见，不过是表达他们对对中国前途的真实看法，表达他们认为正确的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都是有根据的。不让他们作声，并不能消灭这些主张所依据的现实力量。形势仍在发展，危机继续酝酿，只是不出声地发展和酝酿而已。譬如庐山会议，假如没有“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独大格局，假如可以商量，可以讨论，可以反对，那么，不必付出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代价，就可能建立 1962 年退守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更乐观地说，甚至不用绕将近 30 年的大圈子，就可以建立 1983 年尽收失地的大包干制度。不让彭德怀说话，不容邓子恢分辩，撤他们的职，并不意味着真能跳进共产主义，只是要绕一个大圈子，平白死掉数千万人，然后再回到起点上。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价值，这就是尊重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的价值——抵得上数千万条人命的价值。

李锐和他的同道们，凭借自身的胆略和实力，在大一统格局中撑开了一道缺口。他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开路先锋。在他 88 岁的肩头，承担着我们这些患得患失的壮年人承担不起的分量。衷心祝愿李锐先生健康长寿。

2004 年 5 月 8 日

李锐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宋晓梦女士写过一本关于李锐先生的书，书名是《党内有个李锐》。这书名是由李普先生最后定夺的，别具一格，可圈可点。关于李锐先生，从国内到海外，评论甚多。有人说他是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有人说他是中共党内的反对派；也有人说他是中共的叛逆者。无论哪种评价，可以肯定的是，李锐先生是中共党内的一个“异数”。或许可以套用学界流行的说法，将其称为“李锐现象”。

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言，李锐先生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资深中共党人。一重身份，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李锐先生自 1937 年加入中共，迄今已过八十年，大起大落，濒死回生，卑为秦城监狱的“囚徒”，尊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经历了中共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有过类似经历者，中共党内不在少数。另一重身份，他又是这段历史的研究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李锐先生撰写多部有关毛泽东和中共历史的著作，还原事实真相，深入研究毛泽东和中共政治，引发广泛的海内外反响，成为研究者和社会一般人士研究和了解中共历史的重要读物。有过如此影响者，在中共党内却并不多见。

与学院式的研究者不同，李锐先生关于毛泽东和中共历史的研究，是融合史料和个体经历、观察后的成果。《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和《毛泽东的早年 and 晚年》，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著作。三部著作揭示“大跃进”、庐山会议两桩中共历史的重大事件和毛泽东特别是其晚年的思想、政治操作的由来、渊源和流变，重构了中共历史。《庐山会议实录》由于再现 1959 年中共庐山会议的史事，而风靡海内外。该书并非纯记忆作品，而采用作者本人的当年记录、档案资料，真实地披露了当年扑朔迷离、波谲云诡的高层政治内幕，是解剖中共政治文化的经典性作品。出版近三十年，境内外四个版本，至

今仍无能与之比肩的相关著述。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仅以立言论，李锐先生对中共历史尤其是内幕的揭示和研究，即奠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将传之后世，可谓不朽。

2018年6月9日

附：“周惠谈话”辨伪

——驳一篇有关庐山会议的网文

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其波谲云诡，打出一个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导致了当代历史的一次逆转，而为史家和世人关注。1980年代以来，官方陆续公开了一些档案文献，数位亲历者也先后发表了回忆录。最引起关注者，就文献而言，要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就回忆而言，当推李锐先生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需要强调的是，《庐山会议实录》绝非仅凭记忆之作，书中的大量叙述，如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两次中常委会议的发言、数十次小组讨论以及会间印发的文件等等，源自作者当年的笔记和会议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文献史料的公开和亲历者记忆的披露，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许多被颠倒的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许多以往模糊的情节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研究者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述。当然，研究没有终结，任何来源真实的新史料（包括回忆），任何言之有据的新观点，都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但前提是，史料（包括回忆）应当是可靠的，观点应当是严肃的，否则，只会使历史真相变得模糊甚至混乱。

党史研究室有个周惠访谈录？

去年11月，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在“乌有之

乡”网首发，然后在网络上流传，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张文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了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派出工作人员采访经历过党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是其采访对象之一，有一段谈话涉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文接着披露了这篇“周惠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在“谈话”里，周惠对采访者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周说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锐给毛泽东写信，一件是李锐1959年8月11日的发言，一件是李锐“夜闯美庐”（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向毛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正是这三件事捅了娄子，“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没有李锐的揭发，“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庐山会议如此结局，很大的原因竟在李锐！张文披露“周惠谈话”，似乎要颠覆人们已知的历史叙述。颠覆已知的历史叙述，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倘若有理有据，如实地还原真相，还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问题是，张文不是一篇严肃的有理有据的文章，作者披露的所谓“谈话”漏洞百出，疑点重重，不仅没有还原反而歪曲和模糊了历史真相。

张文依据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访谈录，但作者本人并非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连党史研究室的来历都没有搞确切（顺便说一句，张文对周惠的生平介绍也有误）。中央党史研究室是1980年1月成立的，比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早成立四个月，两个机构并存了八年多，并不是张文所说的“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8月，是撤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机构之后组建的，也不简单就是“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么，“1990年代中”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没有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呢？说来也巧，“1990年代中”笔者恰在该机构供职。如果真有这么一项“工程”，该不会保密，笔者虽是一般研究人员，也理当知晓，然而笔者从未听说此事。更巧的是，笔者的具体工

作部门，是该室下设的第二研究室，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按照分工，要派出工作人员了解庐山会议历史，当属第二研究室的任務，但是笔者既没有听说、更没有参与此事。会不会是其他同事呢？最近询问第二研究室当时的负责人和同事，均未与闻。因此，这份源自所谓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访谈录，究竟来自何处？真实性如何？大可怀疑。

李锐犯了“欺君之罪”？

更令人生疑的，是“谈话”对三件事的叙述。与相关文献和回忆对照，“谈话”的叙述错误甚多，根本经不起史料的验证。

第一件事，“谈话”称李锐“自作聪明”，给毛泽东写信，发了“重誓”，却在信里“撒了谎”，“隐瞒”了“最敏感的话”。还说，“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遭受批判，招致厄运，是因为他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而不是受什么人连累。黄克诚、周小舟的遭际，是因为他们发表了与彭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不是受什么人连累。这是最基本的事实。批判彭德怀，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肇始的。7月25日，毛作出“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对彭的批判升级。这时李锐还没有写信，怎么会“连累”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呢？

李锐是7月30日写的信，这时，不仅彭德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而且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贾拓夫、陶鲁笏等人也都受到指责和追问。其中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去黄克诚住处一事，成为小组会上追逼甚紧的问题之一。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情绪激愤，发了一些尖锐议论，包括说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一旦查出实情，后果何堪设想！李锐回忆：“为了

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 23 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76 页）李锐所说可从周小舟当年的检讨得到证实：“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 年 8 月 13 日）这说明李锐给毛写信确实是胡乔木的意思，而不是“谈话”里说的什么“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自作聪明”。

信的全文李锐已在书中公开，有目共睹，字里行间，没有揭发彭、黄、周、周的什么问题。当然，李锐也坦承，信里“隐瞒”了“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庐山会议实录》，第 178 页）。这就是“谈话”所说的“撒谎”、“欺君之罪”。倘若这算是“欺君之罪”，那么，当年的当事人有谁没有犯“欺君之罪”呢？以周小舟为例，李锐写信的第三天，他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却同样“隐瞒”了 7 月 23 日晚上的私下议论，最后还表示：“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 年 8 月 2 日）按“谈话”的逻辑，周小舟一面表示要“老老实实”地把“所想所做”都告诉毛，一面又“隐瞒”7 月 23 日之夜的私下议论，是不是也犯有“欺君之罪”、“埋下了一颗大炸弹”？是不是也使得他们几个人的活动“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并且“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呢？再极而言之，如果把“隐瞒”实情都说成“欺君之罪”、“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那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领袖”的当事人都该主动坦白交代才是，而不该隐瞒不报，也不该被迫才报。可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惠，一开始也是“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直到别人交代了之后，“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的（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 年 8 月 14 日）。不能说周惠也犯了“欺君之罪”呢？

笔者以为，无论李锐还是周小舟、周惠（也包括其他受批判者），当年“隐瞒”实情都谈不上“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在那种

极为险峻的政治环境中，三位当事人避重就轻，无非是不想让事情更加复杂，不说是保护他人，至少也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我保护，何罪之有！在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历史上，这种情形并不鲜见，它恰好说明了党内政治斗争的严酷。

李锐缘何写检讨？

第二件事，“谈话”称李锐8月11日发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全盘认账”，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让二周“陷入极大的被动”。“谈话”还称，李锐此举是为了“反戈一击”，“立一功”。

这件事在李锐的书中有记载，“谈话”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反倒是弄错了史实：李锐不是作发言，而是写检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更要紧的是，“谈话”故意“忽略”了李锐写检讨的一个关键性背景。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在会议第五组作检讨，分在第四组的李锐被人带到第五组同黄克诚对质。对质的问题本来同7月23日之夜的事情无关，但黄见李突然被带进会场，以为李已经说了7月23日晚上的事情，便主动交代了7月23日晚上的情况，揭出了关于毛泽东的私下议论。关于这一情节，李锐有详尽回忆：

黄克诚一再被逼迫，突然看见我走进会场（而且我后面还跟着罗瑞卿），我又不是这个组的，他当然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和盘托出。黄克诚只好讲了以下几点……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23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住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这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虽然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经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庐山会议实录》，第281页）

黄克诚自述完全印证了李锐的回忆：“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

追问 7 月 23 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议论是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58-259 页）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阴差阳错的情节，揭出了“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接下来狂风骤雨般的批判和穷追猛打式的逼问，令李锐忧心忡忡：会议继续追逼下去，会牵连田家英等人。情急之下，李悄悄对薄一波谈了想法：由他作交代、作检讨，人事关系只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因为这些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晦，绝不能再扯宽了。薄很赞同，还要他“先发制人”。（《庐山会议实录》，第 285-286 页）李锐这才写了检讨。

如此重要的背景，“谈话”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而不详细交代事情的原委，却渲染所谓“突然”转弯，给人印象似乎是李锐另有用心。在笔者看来，这如果不是对历史真实的有意遮蔽，就只能说对历史史实无知了。

二周是如何“陷入被动”的？

据李锐回忆，他是 8 月 11 日上午交出检讨的，题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待》。关于这一点，李锐在书中已有回忆，坦承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 23 日夜晚的活动”。（《庐山会议实录》，第 286 页）“谈话”称，正是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的这个发言，让周惠和周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

如李锐所说，他的检讨的确交代了周小舟、周惠的一些言论，这是周小舟（肯定也包括周惠）对李“极其不满”的原因。如前所述，李锐当时的考虑是他和二周的活动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讳”，但不能让人再追查下去，因为有可能牵扯出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那样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此举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事情做一个

切割，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事后看来，李锐的想法或许过于天真，但其本意不是陷人于不义。何况李锐的检讨除了交代二周，还交了自己的情况。几十年后，李锐感慨：“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周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但也说明当时情况的复杂。‘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握啊！”（《庐山会议实录》，第286-287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周、周、李而言，庐山会议期间最要害的问题，是7月23日之夜关于“斯大林晚年”的私下议论。揭出这个问题，才是二周（其实也包括李锐）“陷入极大的被动”的关键。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李锐先后交代后，周小舟所在的第二组即追逼周小舟。有人问：黄克诚同志交代，周小舟、周惠、李锐三同志说，现在是不是达到斯大林晚期，中央有没有集体领导，现在反右会不会出乱子？这些话你都说了没有？周小舟答：我说了。接着周详细交代了那天晚上的言论：“二十三日晚上到黄克诚同志那里，我心情紧张。李锐和我讲得多，周惠讲得少。讲到毛泽东同志这样讲，是什么道理？这样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十八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到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当时黄克诚同志说，不能这样看，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83页）周惠也在当天承认自己“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一如他在检讨里所说：“我始终是隐瞒了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直到八月十日下午听说黄克诚同志已开始交代‘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时我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改变原来避重就轻、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的根本不够一个党员品质的错误态度”（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自己当年的检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听说黄克诚交代之后，才“被迫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交代出“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的。

“最重要的真实情况”都揭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他们

“陷入极大的被动”呢？可以肯定，对周小舟、周惠（无疑也包括李锐）而言，8月10日才是他们的“黑色星期五”，他们正是在这天“陷入极大的被动”的；而李锐第二天才写检讨，显然与此无关。

“谈话”还称田家英不需要他（指李锐——笔者注）保护，毛和田情同父子。“情同父子”的比喻是否准确、是否严肃，另当别论。只说李锐担心牵连田家英一事，连对李锐不满的周小舟当时也承认。周小舟在给毛泽东的信里说，“他（指李锐——引者注）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确实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到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周在书面检讨里的这番话是否发自内心，笔者不好妄加猜度，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李锐的初衷，确实想避免牵连田家英等人。

李锐“夜闯美庐”？

第三件事，“谈话”称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夜闯美庐，跪在毛的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说彭德怀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写给毛的信事先给张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出自张的手笔，而张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还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说受了毛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这番叙述，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简直就是一幕电影。这恐怕是“谈话”披露的最耸人听闻的“史实”了！可这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所谓“史实”。据“谈话”称，此事是周惠听周小舟说的，周小舟又是听田家英说的。田、周、周均已作古，这耸人听闻的“史实”竟死无对证！

问题还在于，“谈话”的叙述完全站不住脚。按“谈话”的说法，李锐“夜闯美庐”是在写他检讨的前一天或前两天。如果是前两天，

就是8月9日；如果是前一天，就是8月10日。9日晚上不可能，因为“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还没揭出来。10日晚上也不可能，因为10日上午追逼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会议主持者与各小组组长商定，当天晚上各小组继续开会，分别对周小舟、周惠、李锐进一步追查和批判。10日晚上李锐正在小组会上受到追查和批判，怎么可能分身去“夜闯美庐”呢？

从李锐8月11日写的检讨看，也不可能“夜闯美庐”。按“谈话”所说，李锐“夜闯美庐”一是揭发彭德怀、张闻天，二是交代7月23日之夜的言论。如果真是这样，第二天李锐的写出的检讨一定会有“夜闯美庐”时揭发的那些事情。但事实恰好相反，李锐的检讨无一字涉及“谈话”所说的那些彭、张的活动，甚至连张闻天的名字都未提到。至于7月23日之夜的私下议论，李锐的交代并不比头天周小舟自己的交代多多少。李锐要是真“想反戈一击，立一功”，为什么第二天交出的书面检讨不写“夜闯美庐”揭发的那些事呢？这不是个“立功”的机会吗？反过来说，倘若李锐“夜闯美庐”，已经向毛告发了彭、张，第二天的检讨敢只字不提吗？殊不知，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是非常看重文字“证据”的。仅举庐山会议的例子，8月12日晚上，周小舟曾去毛泽东住处谈话。第二天一早毛就致信周小舟，要周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周小舟在给毛的复信中恰好透露了这个细节：“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毛如此看重证据，李锐能不写在书面检讨里吗？这只能说明，所谓“夜闯美庐”，纯属编造。

还要补充一点，彭、张之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也是在8月10日之前就作了交代的，而且交代得比黄克诚还要早。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第二组被逼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第二天，8月10日第四组开会批判，有人追问彭“斯大林晚年”的问

题，彭也作了交代：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 280-281、284-285 页）张、彭的交代，李锐都知道，李与彭还分在一个临时小组（第四组）。彭、张自己都已经交代了问题，何需李锐“夜闯美庐”再作“揭发”！

“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谁扣上的？

“谈话”还称，“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这又是在歪曲史实。如前所述，李锐在检讨里根本没有涉及彭德怀在庐山的活动，倒是说过这么一段话：“虽然我同彭德怀同志没有直接的活动关系，虽然小舟同志同彭的勾结我不清楚，黄、彭的关系我也不清楚；但由于以下三点，我是陷入这个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李锐：《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1959年8月11日）莫非这就是李锐对彭德怀的“揭发”？难道毛泽东就是凭李锐的这一点“揭发”，给彭德怀戴上了“军事俱乐部”的帽子？

根本不是。“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毛泽东早在李锐写检讨之前就已经扣上了。据李锐回忆，7月26日以后，由于7月23日之夜的事情被告发，分组会内外已经传开“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的种种议论和传言。（《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如果说李锐所说还属于记忆，那么，毛泽东8月2日致张闻天的信则是白纸黑字的文献：“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还挖苦道：“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也就是这一天，周恩来在会上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军事俱乐部”的说法：毛主席说

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庐山会议实录》，第 219 页）此后的分组讨论中，批判“军事俱乐部”的声音便不绝于耳。仅举几例：

8 月 4 日，第四组有人发言：现在看来，可以说彭德怀同志这次向党进攻，是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的信中有很多暗语。（《庐山会议实录》，第 240 页）

8 月 5 日，第一组有人发言：他（指彭德怀——引者注）这次反党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军事俱乐部加上武文合璧，不但有共同的纲领，而且有纪律的约束，如黄克诚同志对彭的活动一直向党保守秘密）、有活动、有目的的。（《庐山会议实录》，第 242 页）

8 月 6 日，第五组有人发言：我对黄克诚同志过去的印象是好的。但从高岗反党事件揭露以后，没有听他作过自我批评，我的看法就有不同了。这次他又是反党的军事俱乐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说明黄克诚同志的党性是大有问题的。（《庐山会议实录》，第 244 页）

8 月 8 日，第二组有人发言批判周小舟：你（指周小舟——引者注）算不算军事俱乐部的一员？周答：看怎么说。从思想上说，有些联系；但彭是反中央、反毛泽东同志和反总路线的，就这方面说，我当然和他们根本不相同。有几个人追问：你怎么与他根本不相同？陶铸追问：你在俱乐部处在什么位置？（《庐山会议实录》，第 273 页）

8 月 8 日，第二组有人揭批张闻天：洛浦同志与彭德怀同志的关系，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并有实际行动的。（《庐山会议实录》，第 271 页）

8 月 9 日，第五组有人发言批判黄克诚：黄克诚同志今天下午的发言，在对于彭德怀同志的认识上比前几次发言有进步，但对于他自己在“军事俱乐部”究竟起什么作用，却仍没有谈清楚。劝告克诚同志把由不谋而合到谋而合的真相说出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军事俱乐部”的形成，也不外乎这个道理。（《庐山会议实录》，第 279 页）

8 月 9 日，第二组有人揭发周小舟、周惠跟他谈话的情况，并质问：（1）你（指周小舟——引者注）同彭、黄、张的基本观点那样一致，难道你没有参与军事俱乐部的机密？（2）你对彭德怀同志急于发

难，在彭对形势的分析上，起过什么作用？（3）你到彭德怀同志那里究竟议论过一些什么？23日毛泽东同志刚才讲过话，晚上你和周惠、李锐二同志又去了，议论过一些什么？你到彭处我碰到过两次，其中一次就是23日晚上。（4）到我处宣传，用心何在？拉我入“军事俱乐部”？发言者最后说：我们希望你迅速地从“军事俱乐部”拔出脚来，不要愈陷愈深。（《庐山会议实录》，第275页）

就在李锐写检讨的前一天，8月10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批语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31页）

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与李锐的检讨根本没有关系。有一个疑问，周惠当年的检讨交代过这样一个情况：“李锐有一天晚上到我们住处说，他说，中央已注意到我们二十三日夜到黄处谈话这件事，说已经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他想给主席写信……”（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所说李锐写信，就是李锐7月30日写信一事。周小舟当年也提到此事：“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指李锐——引者注）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李锐后来回忆：“7月23日到29日之间，我同周小舟、周惠还是有些来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庐山会议实录》，第171页）二周的检讨和李锐的回忆都说明，7月底以前周、周、李都已经知道起草关于“反党集团”决议一事。而“反党集团”的定性，正是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的。1986年，杨尚昆接受采访曾经谈到此事：“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指杨尚昆、胡乔木等人——引者注）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啊，你乔木也是在啊。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提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上引史料表明：扣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

在先，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后。周惠当年在李锐写检讨之前已得知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怎么几十年后说是李锐的检讨才使得彭、黄、张、周戴上“军事俱乐部”帽子的呢？一个是当年的文本，一个是后来的记忆，哪个更可信？答案必是二者居其一：要么周惠记忆有误，要么干脆是张文作者虚构。笔者以为，李锐没有使得谁戴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倒是“谈话”和张文给李锐扣上了一顶子虚乌有的帽子。

张文称，1990年代，周惠曾经对采访他的权延赤说，庐山会议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张文的信息来源何处，笔者不知。但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笔者所见史料，情况恰好与此相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惠还是宽大的，不许将周惠划入“军事俱乐部”。8月11日，也就是李锐交出检讨的当天，毛在大会讲话，谈到了周惠：“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8月11日）毛的讲话确凿无疑地表明，周惠根本没有被划入“反党集团”。事实上，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也没有提到周惠。倒是李锐，在毛的讲话中被明确划入了“军事俱乐部”：“秀才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8月11日）至于会后的结局，就周、周、李而言，周惠算是最好的。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下放到浏阳县任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直至196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不是“谈话”所说的“广州分院”）副院长；李锐则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只有周惠官居原职，继续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1年调任交通部交通工业局副局长。

庐山教训该如何总结？

庐山会议由“降温”始，以反右终，无疑是毛泽东翻的盘。论责

任，也许很多人都有责任，但“很大的责任”、第一位的责任无疑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推不到李锐的头上。要想否定这一点，除非拿出铁板上钉钉的史料根据来。

说到这里，笔者想提及朱永嘉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下简称朱文）。朱文首发于自己的博客，比张文稍早流传于网上，也是谈庐山变故的责任的，认为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人表达意见的时机、场合、技巧有缺陷，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朱文甚至认为：“这个教训还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朱文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分析庐山变故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是笔者认同的，因为它有益于更全面和深入地解读历史（当然，这种分析应该首先建立在对史实准确还原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朱文不是没有漏洞）。但是作者把他认定的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的“缺陷”当作“教训”，而且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这样的“总结”笔者不能同意。

彭德怀等人有没有缺陷，尽可以讨论。问题是，即便有缺陷，把这种“缺陷”作为庐山悲剧的“教训”，首先就同毛泽东的“党建理论”相抵牾。毛泽东早已宣布：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说，毛没有对言者预设任何条件。事实上，毛还多次鼓动党内同志长“角”长“刺”，开展尖锐的批评：“批评要尖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我常跟同志们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1955年3月）有意思的是，就在彭德怀写信前的一百天，毛泽东还号召党内同志批评他的缺点，甚至要求学习海瑞：“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

不客气……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5日）从毛泽东的公开表达看，他倒是希望党内批评不要顾忌“时机、场合、技巧”。其次还同中共党章相冲突。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有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有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党章没有对党员行使这些权利附加诸如“时机、场合、技巧”等任何条件。党章还规定，党员和党的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日）彭德怀等人无论有什么缺陷，至少没有逾越党内批评的原则和党章的规定，怎么能成庐山会议“沉痛而宝贵”的“教训”呢？

庐山之变的关键在毛泽东。尽管他鼓励像海瑞一样犯颜直谏，但仅过百日，言犹在耳，他就将写信提意见的彭德怀打压下去了。看来，毛泽东所说不等于毛泽东所做，也不等于毛泽东所想。据说胡乔木当时就私下提醒友好：毛提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3页）一语成谶，庐山之变证实了胡乔木的担心。党内政治生活中，言行不一、心口不一，不足为奇，但由于言行不一、心口不一而侵害党员权利，以言治“罪”，发动党内政治斗争，则绝非寻常。在党内表达意见，本来是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所拥有的权利。毛泽东因个人不满彭信，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政治批判，侵害了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的正常权利，按党章本应受到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实际情况如人们所知，毛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处分，反而将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对彭等人严加处分。毛以一己之力覆雨翻云，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党内铸造了一套集权的权力架构和制度。这个架构和制度实际上赋予了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力，领袖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剥夺他人的权利，而这个架构和制度对领袖几无制约和平衡的机

制。换句话说，党内权力架构和制度存在严重的缺失和弊端。

朱文曾谈到庐山会议的历史教训，在于“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围”。笔者赞同这个看法。笔者理解，党内民主的真谛在于尊重和维护党员的权利。在党内规则的框架下，对于党员权利的尊重和维护，不分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年龄大小；而党员也有行使其权利的自由，无论时机、场合、技巧。也就是说，尊重和维护党员权利以及党员行使权利具有一种普适性。不然，“党内民主”就是残缺的甚至是虚拟的。应该补充的是，仅有党内民主的“氛围”是远远不够的，更根本的还在于建立党内民主的“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可以维护“时机、场合、技巧”掌握得当的党员的权利，而且可以维护那些不擅把握“时机、场合、技巧”的党员的权利；党员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它可以有效遏制并追究侵权行为。没有这种良性的党内民主制度，民主氛围无从营造，即便营造一时，也必定是短暂的。这才是从庐山会议的历史中应当总结和汲取的深刻教训。不从制度的层面总结教训，而把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方式的“缺陷”当作“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笔者以为，这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走错了方向。按照这种逻辑演绎，对批判“小脚女人”、反“反冒进”、“文化大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历史事件，是不是也要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表达方式的“缺陷”来总结“教训”呢？

今年5月，《炎黄春秋》发表《李锐谈“周惠谈话”》一文，驳斥了张杰披露的所谓“谈话”。张杰在网上致信李锐，声称要李锐与历史对质，而同他则没有什么好对质的。张自称是“党史工作者”，应该明白还原历史首要的是史料证据，对有争议的历史情节更是应该慎重对待，依据史料详加考证，去伪存真。何况，这个“谈话”的来源和真实性已经被质疑。张文作者本该严肃地说明这一切，哪怕因史料不足表示存疑也可以。然而，张信对此王顾左右，不作正面答复，凭借迄今不作任何证实的所谓“谈话”强词夺理，甚至不惜污辱人格。这已经不是讨论问题，而是在施以许多人都经历和熟悉的“大批判”了。最后做一点说明。张杰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后，网上出现了一篇“党史专家金春铭”的文章，谈张杰“披露”的“周惠谈话”，对张文多有肯

定，并称张是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笔者从未听说“党史专家金春铭”，但知道并且认识党史专家金春明。会不会是笔者认识的金春明教授？为核实此事，笔者与金春明教授取得了联系。金春明教授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也不大上网，既没有看过张杰的文章，更没有就张文或“周惠谈话”写过任何文章，他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没有一个叫“张杰”的人。受金春明教授委托，笔者在此作出正式说明。

2010年9月

关于汪澍白先生的文章

刘小磊

2010年初，网上出现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说党史研究部门当年有周惠访谈录，周惠说，庐山会议开成那个样子，李锐有很大责任，是李锐夜闯美庐，跪倒在毛泽东面前，检举揭发了“军事俱乐部”，捅了漏子。

这篇文章的产生，我认为要放在薄熙来主政重庆，以左派盟主自居，高举唱红打黑旗帜的大背景下去看。当时，薄熙来四处撒钱，请全国的毛左、新左、五毛和投机分子到重庆，资助他们骂改革派，批自由主义。政治上，他们以广东为假想敌，以广东媒体为突破口，从此有了被妖魔化的“南方系”；思想上，他们批公知，从此“公知”成了贬义词。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这些“左派”的胸口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乎，搬倒李锐，也就势在必行了。

这篇问答，行文相当流畅，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口气更像外国记者，不像党史部门笔杆子采访老干部的作风。这里面恐怕都是艺术加工，充气娃娃，当不得真也。但还是有相当的迷惑性。我曾把这篇文章发给六七位我熟悉的史学工作者看，绝大部分人认为是假的，只有一位认为基本是真实的。

正好这时候汪澍白先生从厦门投来他的反驳文章，汪文七千余字，着重分析了主席几个秘书的关系，并采访了周小舟的夫人（当时尚健在），证明张杰文中所谓田家英到广州看周小舟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我将汪先生的文章送审，可惜因为你懂得的原因，未能刊出。汪夫人来电，情绪很激动，谈了很久。

当时我还请韩钢先生写了一篇考证文章，也只能退稿。

值得一提的，2016年《戚本禹回忆录》出版，大家才发现，张杰的文章阴魂未散，给了戚本禹很大“启发”，把张杰的编造，当成自己的回忆，写进书里了。于是有些人如获至宝：你看，戚本禹的回忆和张杰的文章可以互相印证，李锐就是历史的罪人，板上钉钉啊……其

实，戚本禹并没有去庐山（这点很关键），他关于庐山会议的记载，都是拾人、尤其是张杰的牙慧。后起的编造，竟然影响了“当事人”的“记忆”，“当事人”的“记忆”，反过来又给编造者提供了“铁证”，你说荒唐不荒唐！

据闻《戚本禹回忆录》出版前经过不少编外党史工作者的润色、加工、提意见，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看这件事的。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帮戚把书写得认真一点儿，是好事。但在读者眼里，戚的回忆本来就有很多破绽，一眼能看出来。有了这批自以为专业的人，明显的破绽都给补上了，普通人一下子看不出来了，要专家费老大劲才能看出来。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帮人撒谎，帮人圆谎，不应该鼓励。

附：李锐日记摘录

2010年2月28日（星期日）阴 元宵节

收到汪澍白为我写的：“为李锐同志辨诬，为党史研究扫除妖雾”。详谈湖南同周惠、周小舟的接触，分析庐山情况，约6千字。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晴

下午盛禹九来，关于“周惠谈话”他的为我“辩诬”长文已交《炎黄》，先在网上传，刊第五期，汪澍白的“辩诬”文也刊网上。随后接到张慎衡（汪夫人）电话，汪文《南方周末》将刊登。

2010年3月4日（星期四）阴

……归途去看望李普，坐了一会儿，因魏久明已到家（我忘记他来过电话）。同来的陈文斌（原冯文彬的秘书）已为“周惠谈话”事，草拟一文，说明当年党史征委会和党史研究室，没有找过周惠谈话，纯属造谣。我对原稿没有意见，让寄《炎黄》。

李锐二题

黄一龙

这是本世纪初发于国内媒体的一篇旧文，后收入拙著《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老问题闯新世纪》。应南央女士“约字”发表，谨表我对李锐这位已经十分稀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之情。

“历史虚无主义”何处寻？

李锐同志一生反“左”，群众十分敬仰，群“左”却不舒服，咒骂之声不绝于耳。他从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起就跟着背时，当然也跟着挨骂。后来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实录”了那次百姓本来无从“实知”的会议，使若干依靠“不公开性”即非实录反实录或“实录虚无主义”过活的人士非常难受，所以他的挨骂不算稀奇。后来又见一骂，有点特别。特别之处在于它给李锐戴了一顶新帽子：“历史虚无主义”！那文章的题目就叫《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标本》。

李锐以写“实录”而广为人知，为何“实录”一番却挣了个“虚无”的罪名呢？据那文说，是因为此人“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描绘成错误的堆积，一无是处，一无足取”，所以“堪称历史虚无主义的标本”云。李锐在什么时候、什么著作里面、把谁的历史“描绘”成如此这般了，这里暂不讨论。我不明白的是这条诛语为何把“错误”开除出了历史领域，认为“错误的堆积”就不算历史而算历史的“虚无”。按照此法，中华民国史以及清史、明史等等，写起来恐怕更须“历史虚无主义”帮忙，因为那里“错误的堆积”无论如何比我们多得多。这是一。而其二，假使我们遵从此说，认为“错误的堆积”不算历史而算历史的虚无，却依然不会使批判者感到满意。因为在此人看来，李某所描绘的“错误的堆积”还堆积得不够，因为它只是“左”的错误的堆积，而“令人惊奇的是，李锐一生反‘左’，对于右的倾向却讳莫如深。”就是说，如果他再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里“堆积”若干右的错误，错误之上加错误，堆积之上加堆积，它就可以不虚了，它就大有是处大可取法了，就是“历史丰满

主义”了。请看这种论证方法里面，还有一丝逻辑的地位吗？

近来又见一位斥责“历史虚无主义”的先生，说话比较讲逻辑，是把研究“我们的一切失误，即使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浩劫”，都称为“片面理解‘实事求是’的原则”，“纠缠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细枝末节”，因而通通打成“历史虚无主义”的。不知这位先生是因为年龄太小还是身份特殊，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旷古奇祸在他的脑袋里居然反映为不置一顾的“细枝末节”，这且不论；我看事实上他也没法把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底，至少不会贯彻到吃饭的行动中。为了反对“吃饭虚无主义”而不吃任何“细枝末节”的即具体的饭菜，顿顿只吃饭的“本质和主流”，他干不干？

黑皮本子的功劳

上文说的《庐山会议实录》，“录”的其实是李锐自己的一个笔记本，黑皮的。庐山会议的前半段叫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半段是八届八中全会。李锐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他那时的身份，最高的只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兼职秘书旁听会议，掏出自己的笔记本写写记记，既无汇报任务，也不上缴存档。会议完了，收拾大吉，随身带走了事。以后连年挨斗挨批，他将自己的日记、家信、笔记等物统统上交，惟独留下了这本黑皮笔记，直到1966年被关进秦城监狱时上缴。“四人帮”垮台以后，几经周折，这个宝贝本子又在陈伯达的档案里给找了出来，回到李锐手里。这就是《庐山会议实录》的蓝本。据宋晓梦《〈庐山会议实录〉成书始末》（载8月19日《光明日报》）介绍，黑皮笔记本回到李锐手里以后，他先是在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会上，依据这个本子讲述庐山会议的经过时，不仅“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使看到他发言的简报的胡乔木“非常激动”，写信给李锐说：“看了你在小组会上关于庐山会议的发言，真是高兴。很多事情我都忘了，有些不知道，想因你的日记又完璧归赵之故。”建议他“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这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

呢？”其时胡乔木正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于是就有了这部宝贵的《庐山会议实录》，实录了建国以来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问题”。

李锐在《实录》里说过这样的话：“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而看了这本黑皮本子的故事以后，我也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除了一个“兼职秘书”随手作下的这本“日记”性质的记录以外，居然找不出官方的完整记录来呢？怎么连亲手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的大人物，都得依靠它来弄清“庐山会议始末”呢？

何况这个会上发生的事情，曾经使得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到极为危险的境地，我们曾有上千万的父老死于它所造成的饥馑啊！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竟是这样被决定的吗？

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

胡平（美国纽约）



李锐这一生多灾多难。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配北大荒，时值大饥荒，险些饿死。文革中更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八年之久，还是单身监禁。一个人的身心遭受如此严重的摧残，还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还能像一般人正常工作就更不容易了。李锐不但活下来了，而且越活越健康；李锐不但能正常工作，而且成就非凡，越做越辉煌。李锐的一生，越到晚年越精彩。李锐竟然活过百岁，而且不像其他百岁老人那样悄无声息地走向死亡，在临近人生终点之时，仍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看李锐今年4月13日在北京医院病榻庆祝101岁生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视频，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那敏锐的思维、犀利的见解与清晰的表达，真令人叹为观止。人活到这份上，那便是臻于至境了。这样的一生就是一个奇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锐讲到：“中国这个国家，本来，五四已经解决了缺乏什么（的问题），就是人权，同科学。五四运动已经解决了，结果又来了一个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短短一句话，表明李锐已经告别马克思，回归人权与科学。对于一个有81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自我超越。

李锐还对记者说：“有一次大概是习上台不久，我与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在一起闲聊，她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她说，现在网上就有这样的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这样的话）传到美国去了，美国把它公开了。搞得我很麻烦（笑）。知道吗？”记者问：“你对他（习近平）有没有什么忠告？”李锐沉默片刻然后说：“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嘞……这个人他现在能接受。（摇头）不可能，不可能。”此前一个月，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李锐当时就直指“习近平要搞终身制”；“现在哪一个省的干部不拥护习近平？报纸上天天吹捧，我看都不看”。寥寥数语，掷地有声。

李锐晚年力主民主宪政，“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李锐说“对得起党”、“为党好”，那绝不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而是希望中共顺应历史潮流，接受普世价值。和我辈体制外人士不一样，李锐仍是体制内立场，然而他这种体制内立场却是指向从根本上改革体制的。我们之间的差异不重要，我们之间的一致才重要。

* * * * *

5月21日，我打开电脑，看到李锐之女李南央发出的一封短信“约字”。信上说：

“一般的习惯做法是等某人走了以后，由亲友们为逝者出本‘纪念文集’，以表怀念和追思。

刚刚过去的四月，我在北京医院陪伴父亲的日子里，痛切地体会到，他对所在的党将他这个有着八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划入‘另类’，将他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苦口婆心地对接党班的后来人说的那些泣血之言看作‘不稳定因素’，是梗在心头的。因此我想以违反传统的方式，现在就开始向你们约字，在征集到十几万字时立即成书，让父亲在世时能够看到人心的公道。我觉得这会比他走了以后再做这件事有意义得多。

所约之字形式不拘：一个字、几个字、一行话、几行话，一副挽联、一首诗词或是一篇文章都行。”

.....

李南央又说：

“5月19日杜导正老和王彦君去医院看了我爸，他们感觉不太好。我爸的主管医生每周五告知我一次我爸病况，我的感觉还能维持一阵，但是头脑还能有多长时间清醒则很难说了。盼能早点得到你们的赠字。”

我立即给李南央回信：遵嘱。尽快。

记得14年前，杨小凯病故，我代表《北京之春》给小凯的妻子吴小娟发去一封慰问信，其中表达了我们的后悔，后悔没有在小凯活着的时候，让他知道我们对他是何等的敬重，何等的钦佩。4年前，我们

在纽约举行陈子明追思会。会上我总在想，如果子明能听到朋友们的这些话，那该多好；如果我们能在子明生前就对他讲出这些话，那该多好。这也难怪，小凯和子明都走得太早了，我在和他们最后一次通话时心里总还想“这不是最后一次”。再有一种纠结，明知对方时日不多，有些话再不说出来，以后就没机会了；可现在就说出来吧，那好比对一个活人念讣告，合适吗？

台湾一位女作家曹又方身患绝症，一天，她给朋友们送上一封请柬，题目是“曹又方快乐生前告别式”。曹又方说：

“人一死，大家去致辞，都会说很多好话，这个人突然伟大了很多倍，这些好话我想活着听到。”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干嘛不呢？李南央提出的违反传统的方式，对李锐尤其合适。且不说李锐的达观，就凭他连101岁的生日都过了，生命早已严重超标，想必早就把生死之事看透了，想必会对亲友们表达最后的敬意笑而纳之，不会见怪的。

我写下这篇短文，希望李锐能看到，能听到。

2018年5月23日

于美国纽约

李锐老与《冰点周刊》

李大同



2006年“冰点事件”后李锐、李普、钟沛璋与《冰点周刊》同仁聚会

知道李锐这个名字很久了，或许是在我小学高年级时，家里有一本《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薄本书，作者就是李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读过这本小书的青少年，应以百万计。如今书中写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作者名字却没忘。

再次看到作者的姓名，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蜚声海内外的历史性大作《庐山会议实录》，这时才知道李锐老当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了解许多党内高层内幕。也才知道李锐老人生坎坷，九死一生，然而思想却从来没有钝化，仍然深刻、尖锐。《庐山会议实录》是第一次有人近距离、几乎以目击方式，完整准确与客观地呈现了毛政时代党内高层重大政治斗争的过程，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以往都是被严密掩盖的。事实上，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提供这样详实而珍贵的历史记录。仅凭这一点，李锐老就足以被历史记住了。而事实上，李锐老自平反复出，担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以及离休担任中顾委委

员之后，一直在代表中共党内的民主自由派持续发声，成为社会瞩目的公众人物，也是社会良心的一面旗帜。

即便这时，我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工作会与这个大名鼎鼎的前辈发生什么关系。1995年元月，我创办了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版。有一天另一个部门的编辑卢跃刚找到我，要求我当他采写的一篇长篇报道的编辑，这是关于长江三峡大坝论证与建设的一篇报道。报道头绪较多，但强烈吸引我的却是一场“御前辩论”。毛不懂经济，又有诗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气质，1956年就写下了“高峡出平湖”的词句，想着要建三峡大坝了。1958年“大跃进”，毛则在南宁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建三峡大坝。这时有人提醒毛，李锐有反对意见。毛则让用飞机把党内的两位专家接到南宁来当面听取辩论。这两位专家，一位是主建派林一山，另一位就是反对派李锐。在毛和几乎所有中央领导面前做的这次辩论，分为口头和书面两场。林一山也是党内才子，口才笔才了得，但两场都输给了李锐。毛及其他中央领导，均被李锐的分析说服。三峡大坝不建了。可想而知，在那个粗陋蛮干的时代如果要建三峡大坝，将会是一场何等的灾难。李锐老的舌枪唇剑，避免了这场灾难的发生，可谓为中华民族立一大功！我建议跃刚只写这四个人——毛周林李和这场辩论，因为这才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事件。跃刚接受了建议，这篇着重再现“御前辩论”的长篇报道，在中青报一版刊出。这是全国性大报首次将李锐老说服毛不建三峡大坝的事迹详尽公诸于众。

1989年后，李锐老因其坚决反对以军队戒严来对付学生抗议的立场，受到了各种压制，其中之一便是公开发表言论的空间越来越小。

2003年，新创刊的《21世纪环球报道》，刊登了李锐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篇专访，这是中国媒体上仅见的公开批评时政的最直言不讳的报道。不久，该报即被停刊。从此李锐老上了中宣部封杀言论的“黑名单”，他的文章、言论再也不能见报。

2005年11月23日，《冰点》借悼念著名改革派高官、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机会，得以突破封锁，刊登了对李锐的专访，同时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他在接受《冰点》访问时说：“现在腐败得不

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种权力的相互制衡，其本质只是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这种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实际上，他的原话就是“三权分立”。鉴于这种说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民主观”，当局根本不允许出现，《冰点》编辑改为“三种权力的互相制衡”，其实意思完全一样。可在给他送报纸时，他听说改了他的原话，瞪大眼睛大声问：“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就改？”送报纸去的年轻女记者觉得委屈，辩解说“能这样出来就是胜利了！”李锐老一听这话朗声大笑：“你说得对！”他拿起报纸感叹，“哈哈，共产党到底没有能封杀住我，多少年没有在大报上出现了！”

事后总编辑告诉我，这篇报道刊登后，中宣部立即问罪，“你们怎么能刊登李锐的文章？！”刚刚过去一个月，《冰点》即遭到封杀。

在《冰点》被勒令停刊整顿的当晚，我即通过互联网发布了对中宣部的强烈抗议，此事立即引发全球媒体的严重关注和密集报道。李锐老毫不避嫌，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

这是中宣部由来已久的做法，从毛泽东时代就这样，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中国是党国，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有不同意的声音。我们要求言论自由，大家遵守宪法，要搞宪政，不要空谈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不要空谈民主宪法，要实行宪政，首先真正保证言论自由。

中国的现实是，有宪法没有宪政，这是过去、1949年以后或更以前这种专制造成的一种根本的原因。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都是一个人讲话、一个人思想，其它所有人的声音都封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外、对各种情况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和政治、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大家都有许多正确的看法，但是这种正确的看法一出头就被封杀了，或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批判，挨整，很多人就被整死了。

这种情况，在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后有所好转。中共中央十

届三中全会就历史问题做出决议，开始改革开放，但是这种改革并不全面，仅仅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了，在政治体制上没有同步进行，所以现在还发生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我看老、中、青三代、党内党外、国家的各个系统、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家的意见都很多。但现在所有的媒体，凡是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或者认为同“稳定”、同中央一些同志的意见有出入，就把它封杀了。

我听说，中宣部专门有这么一批人查看各个地方的报刊，发现一点不对头就封杀。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类事情。我和其它一些老同志对此感到非常忧虑。

不开放报禁、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国家的民主化就无法搞好，市场经济、经济改革也搞不好，现在中国腐败丛生，根本问题就在于此。

李锐老不仅自己接受采访，还联合了胡绩伟、朱厚泽、李普、何方等十几位党内著名改革派人士，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怒斥中宣部扼杀言论自由的丑恶行径，要求中央立即调查此次事件并立即恢复《冰点》的正常出刊。声明最后说：“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冰点》的抗争终于有了效果。一个月后，鉴于已经构成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的新闻事件，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同日宣布，《冰点》即日复刊。这次抗争的胜利，与李锐老等众多老同志的坚定支持是分不开的。

又过了几天，李锐、李普和钟沛璋三位新闻界前辈，为《冰点》抗争设宴，我和跃刚及几位编辑记者应邀出席。这是我第一次与李锐老见面。李老年届九十，外出活动的机会不太多了，我自然抓紧时间向他请教问题，譬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后，影响很大，争论也不少，书中所述大量事实只有李医生一人的孤证，也不可能有旁证，秘史嘛！我问李老，“李医生这本书是否可靠、可信？”李老略一思索，回答“可靠”。“为什么呢？”我追问。“因为田家英跟我说

过，一组只有一个好人，就是李医生。”李老说。“一组”是中南海里毛办的简称。没有别的可能加以验证的话，人品确实就是一个可信度的基础。李老还谈起他在编辑中共组织史时，看了大量资料，令人震惊的是，中共肃 AB 团开始的内部清洗虐杀，竟达 10 万之众，远超国民党杀害的中共人数。席间还聊起了一件趣闻：五十年代初，李老有一次被邀去中南海跟毛泽东聊天，临到午夜，卫士来向毛报告夜餐的菜单，其中竟有一道菜是熊掌。毛问李老要不要在这里吃饭。李老心想这辈子还没吃过熊掌呢，有钱也没地方去吃呀，就说“哦恰！”（湖南话“我吃”）结果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不过毛的一顿普通夜宵竟然有熊掌，给李老留下深刻印象，有点帝王餐的意思了。这时中共建政还没几年啊。

要说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人们知道的是李老的《庐山会议实录》。其实，李老还有一项特殊的贡献，但了解的人比较少，那就是耀邦去世前几天，曾特别邀请李锐老到家里，长谈了数个小时，谈的问题十分广泛，大约有十个方面，耀邦对党内若干重要历史或问题，发表了直言不讳的看法。耀邦真的是找对谈话人了，而且是有准备的。李老回家后迅速将耀邦的谈话整理成文。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了复印件，十分震动。耀邦的这些意见估计对家人都没有谈过，这是一份非常罕见和珍贵的耀邦研究资料，也是一份重要的党史资料。

书柜中，李锐老的著作和文章结集有好多本，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李锐老近年来最强烈而响亮的呼声，就是中国“何时宪政大开张”。这一天必定是会到来的。而中国真正实现宪政后的“先贤册”里，必有李锐老的位置。他是为数不多的会被历史记住的人。

2018年5月24日

一生说真话的人

蔡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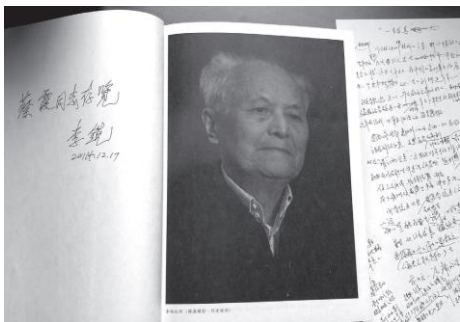
知道李锐老前辈这个名字，是读了他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著作。这本书震惊了我，党内斗争如此冷酷无情！

后来有牟兄广丰先生带着我去李老家拜访老前辈，李锐老前辈将他的《李锐口述往事》送给了我。拜访回来的当天，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读起来，这一读令我内心生出深深的敬意！李锐老前辈学生时代为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辗转北南、加入中共、去到延安……；1949 前后，办报、办水电、上庐山……；1978 后进入中组部治吏、解放思想、推进改革……。老人家人生百年，矢志不移，只为一个目标：追求宪政民主，追求和维护讲真话的权利！

因为讲真话，老人家在延安整风中“抢救”，关押一年多；因为讲真话，老人家下了庐山就被流放到北大荒、磨子潭；因为讲真话，老人家文革中被坐牢秦城八年多；因为讲真话，老人家在中组部工作时间不长就被“治”，去了中顾委；还是因为讲真话，全力支持炎黄春秋杂志，老人家耄耋之年依旧被这样那样有形无形地“软控制”……。

这些年来，人们议论中共党内一批老人“两头真”，这既有对退下来的老人敢于重新站出来说真话表示尊敬，也有深知在职在位时讲真话何其难的同情性理解。在我心里，“两头真”老人可怜可爱，而李锐老前辈更为可敬！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迫害，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苦难，老前辈一辈子说真话！

“说真话”是老人家的生命本色，是老人家巨大的人格魅力之所在！老前辈以他的“说真话”，展现了一个真正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之胸怀的博大，生命的精彩！



2018年5月24日

述往思来寻史迹

韦弦佩

（1）

我有幸读到《李锐口述往事》（大山文化出版社 2013 年 7 月版），这是一本承《史记》之宏旨，述往思来寻史迹的大书。

李锐《自序》。仅五行字。百年人生，前八十年，分四个阶段，每二十年一个阶段：一、读书、革命；二、革命工作；三、当贱民、坐牢；四、离休，继续工作。

朱正序。认为此书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不仅自述往事，也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怎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也就是（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彻底改变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完全堵死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赠李锐寿联一幅：“立德、立功、立言，备矣三不朽；不淫、不移、不屈，大哉一丈夫。”

丁东序。介绍此书编纂过程，从 2002 年始，至 2013 年成书的艰难性。穿越遮蔽，寻找真相，从中可感受到历史深处真实脉搏的跳动。从李锐一生，读者可见中共党史的缩影和中华民族百年沧桑的缩影。实质上，浓缩了追求民主宪政的几代中国人执着努力的心路历程。

付出最多心血的，李锐女儿李南央《编者说明》。她说：“口述的整理难度，比起书信和日记不是倍数而是指数关系。”确是“天大的功夫”！类似一次宇航探索。她说：“我开始整理‘口述’时，父亲已是九十二岁高龄，他执拗地坚持所有的整理稿要经他审阅后方可使用。”李南央希望，这本书，作为二十世纪百年历史的一页，“对史家有所帮助，对后人有所警醒”。

老共产党员李锐十二万分严肃、认真的著述，当然不会害怕和逃避，而是竭诚欢迎、甘愿经受万千读者神圣的批判武器考验的。

（2）

《李锐口述往事》，最后一部分《臧否人物》，特别吸引眼球。我先读为快。李锐臧否了十九位人物。他们依次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高岗、陈云、胡乔木、陆定一、薄一波、余秋里、赵紫阳、胡耀

邦、钱正英、李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加上三任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曾庆红、李源潮）。李锐臧否人物，有根有据，见仁见智，无所顾忌。但我不敢说没有一丝一毫不偏不倚，无所倾斜，也不敢说无一字一句不符合历史天平。

李锐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出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介绍和评价毛泽东，他对毛泽东或臧或否，是随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的。

在延安，李锐在《解放日报》管过社论，那时对毛泽东的文章非常佩服。“毛写文章是厉害的，确实写得好，一遍稿子。”李锐说，“毛泽东有他的长处，否则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威信。”（414页）

李锐对毛泽东的总体评价，主要有几句话。“毛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属于一种很极端的个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410页）“没有这种性格的人领导，共产党不可能胜利。”（411页）“说到底，毛还是个农民，心胸极其狭隘，生活上保留了很多农民的习惯。”（414页）杨开慧故居发现的杨开慧藏匿的日记，记载着杨开慧对毛泽东爱恨交进的评语。（411页）李锐诗云：“贤妻早识太心伤。”（414页）

李锐所评人物，读来真切可信。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无不是偶然机遇的必然归宿。

《臧否人物》中，李锐将胡耀邦和赵紫阳合在一起述评，篇幅比较长。摘其要，有如下文字。

文革结束时，共产党内文化高的官员大多在中、低层，高层中，文化低的多，有的甚至基本是文盲。这同毛泽东轻视知识分子直到轻视知识有关……”（435页）

在中国历史上，耀邦和紫阳这样的人不多。（437页）

耀邦去世前十天，跟我有一次六个小时的长谈，主要谈了十大问题，都是同邓小平的某些分歧，根本没有提他跟赵紫阳有什么矛盾，以前的多次闲谈中也从没有提起过。（438页）

我最后一次见赵紫阳是二〇〇四年的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在北京医

院的911号病房，是他去世前二十天。（李锐写了《紫阳同志永别了》，刊于香港《明报》第二版）（440页）

共产党总书记里面有两个人下台时不作检讨：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赵紫阳，……陈独秀一九四〇年就写文章反对斯大林专制……紫阳为了维护真理，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一直被软禁到死。（441页）

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当过陈云的政治秘书，当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他们都各有各的本事，尤其是毛泽东。但是他们跟赵紫阳、胡耀邦没法比。……我认为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领导人里头头脑最清醒，最能干，最能够按人民意愿做事的两位总书记。（442页）

耀邦去世十六周年，紫阳去世两周年时，李锐均写有纪念文章。书中有引录，足见中肯和公允。

权力不等于修养。子贡问孔子，是否有一言可以终身实践的？孔子回答说，大概是“恕”字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提是将心比心，与人平等，待人宽恕、宽容、宽厚。被李锐“臧否”的十九位云上高层人士，并非都谦让知礼。势利者、倨傲者有之，前恭后倨者亦有之。李锐的述评，形神兼备，典型白描，栩栩毕肖其人，过目难忘。

（3）

书再从头读起。

李锐祖籍湖南平江，祖居平江长寿街。父亲李积芳，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回国任民国总议院议员。母亲李张淑，别号存真。

李锐1917年4月13日出生于北平，有两个姐姐。李锐原名李厚生，小名明仔子。父亲1922年去世后，李锐由母亲和大姐（体育教师）负担生活、读书。李锐1938年在徐州为《救国青年》写稿时，第一次使用“李锐”笔名，亦作常用名至今。

李锐入学时，由母亲苦教，已识得千字。1923年入长沙私立楚怡小学就读，连跳两级，五年毕业，入楚怡中学。因指出国文老师授课错误，受老师诬辱，母亲向校方告状未果，就转考私立名校岳云中学

读书。1934年秋，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李锐诗云：“路从无路走而出，鲁迅文章是我师。”（56页、65页）

李锐读小学、中学，品学兼优，全面发展，天真活泼，广受师生欢迎。进入武大后，1937年离开。“说实话，在大学的那两三年，我没有好好读书，净闹革命了。”李锐这样说。（56页）热衷于抗日救亡，广交朋友，寻找、宣传真理，积极参与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书中记载甚详。

李锐进武大不久，就在校刊《珞珈月刊》发表一生唯一的小说《走》。1936年冬，参加武汉秘密学联工作，结识万国瑞（杨纯）和中学生代表范元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武大青年救国团发起全校追悼鲁迅大会，李锐创作了鲁迅大幅画像和幻灯片。文学院讲师苏雪林在《人世间》诋毁鲁迅，遭到进步学生在讲堂上愤怒质问。第二次全国木刻展，在武汉难以展出，李锐受孔罗荪请托，就在武大文学院大教室布展，把鲁迅木刻像挂在墙上正中。文学院院长陈源一见鲁迅像，慌忙退出。学校图书馆将鲁迅著作全部封存，足见现代评论派对鲁迅嫉恨之深。（84页）

1937年2月，李锐、谢文耀、陈约珥、万国瑞、习东光等八人，在谢文耀家（武昌贡院街三十号），成立自发党组织（武汉临时支部），举行宣誓仪式。后来方知，陈约珥、习东光都已是正式党员。除了从反省院出来的二人，其余人员都被中共北平市委接受为正式党员。

因进步刊物被查户口的警察发现，6月6日李锐在北平被捕，以“张训之”化名关押一周，交“保证书”获释。此后，张训之这个使用一次的名字，在延安抢救运动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均受审查。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以洗清。

在延安时，钱瑛和陶铸同志对李锐说过，李锐他们这个自发支部，对抗战前后武汉的救亡运动和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92—93页）大海上一只无舵的航船，终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在北平接上组织关系期间，李锐与万国瑞（杨纯）同居，转入山

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与万国瑞失去联系。

李锐的学生时代结束，成为职业革命家。

（4）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李锐、文立征和万国瑞三人，随天津流亡同学会学生离开北平，到天津，坐船抵烟台，转至济南，参加韩复榘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受训后，派赴山东各县打游击。男女学员分开，不可随便交往。倒有点像太平天国规制。李锐因事到女生宿舍找万国瑞，被女队教官撞见，惹了大事。训练班头头召集全体学员，把李锐押到广场台上，当众廷杖。鲜血染红了裤子，李锐不吭一声，台下很多女生哽咽、流泪。李锐被送医院治疗，伤愈可行走后，离开了训练班，仍到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形势日趋危急。万国瑞转至济宁，继续受训，李锐撤至泰安，遂与万国瑞断了音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锐才在北京与万国瑞见面，方知抗战期间，万国瑞一直在山东、苏北一带战斗，改名杨纯，与张爱萍将军有过一段短暂婚姻，后与张彦结婚（华东局副秘书长）。晚年与李锐成为隔楼近邻，常有来往，她已去世。（97页）

1938年11月12日午夜，日军逼近长沙。国民党实施“焦土政策”，因误译电文，放火提前，长沙烧了五日五夜，三千多人丧生，城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房屋烧毁。因误译电报代码为“文”，故称“长沙文夕大火”。

一天傍晚，李锐在大街上巧遇范元甄。她是随郭沫若政治部第三厅到长沙参加大火善后工作的。范元甄后来被派到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李锐与范元甄开始热恋通信。（112—113页）

1939年8月，李锐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9月13日晚，李锐与范元甄结婚，邀请一些朋友，吃了一顿饭。（119页）博古将李、范调往延安，同车有胡乔木、吕振羽、周立波、何思敏等人。12月31日到达延安。李、范1938年相恋至1949年前的通信，由他们的大女儿李南央编为一书《父母昨日书》（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得知李、范离渝去了延安，很有意见。周恩来、邓颖超给范元甄去信，邓问要什么东西，范要了一个搪瓷缸子，可喝水、漱

口、热饭、热菜多用。解放后，范元甄用“万全”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了一篇散文《搪瓷茶缸》。（141页）

李锐于1941年9月到《解放日报》工作。1943年4月初，被老同学魏泽同咬为特务，抓进保安处；1944年6月放出，回到报社；1945年10月初，离开延安。在报社工作，不到三年，用了六个笔名，发表文章（包括社论）约40篇，有若干作用大，影响好的得意之作。（134页）

书中，有专章，谈他们在“延安的夫妻生活”。

1940年上半年，范早产，婴儿死，后又两次打胎，范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组工作，身体、生活均受影响。李锐总觉亏心，很对不起她。整风开始以后，思想虽有分歧，关系还不算坏。李锐用毛笔写了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诗，范挂在她住的窑洞墙上。李锐被“抢救”，审查期间，范元甄与邓力群同居。李释放前，博古对范说：你和邓之事，绝不能跟李锐说。李锐被抓，党有责任，李锐受了冤枉，刚放出来，不能再出问题。可是，范还是对李锐说了她和邓力群的关系，说他们俩感情如何好。于是，李与范分手。正值抗战七周年，李锐赶写了几篇大块文章，疲惫悲痛，突发高烧，四十天不退烧。几位同志为李锐输血，烧才渐退，转危为安。1945年下半年，中央政治研究室对范、邓问题作了组织结论。范将杨尚昆做的结论，用工整毛笔字抄了一份给李，表示接受党的决定。由于夏英喆、蔡畅等人做工作，李、范复婚。博古把范调到了《解放日报》。

李锐说：“我二十二岁进延安，二十八岁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应当讲对我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特别是保安处的那一年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没有那一段经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在秦城监狱呆的那个八年，不会那样理智、头脑健全地熬过来。”（144页）

人生看来偶然的前因，蕴藏着难以避免的似乎必然的后果。

（5）

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是占较长篇幅的重大历史事件。延安那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毛泽东很好，顶呱呱。”运动目的，是

“确立自己在党内的正确路线和领袖地位”。其始，“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一样，就是号召群众给领导提意见”。（147页）

我注意到，李锐未在正文中提及洛甫（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实际领导职务，只在为61人叛徒案平反一条注释中，似不经意提了一下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明确指出：“毛搞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都是他的一把刀子。”（149页）

运动的荒诞性，在于说谎自诬，颠倒是非、荣辱，大搞逼供信，混淆敌我友，祸莫大焉！把坑害善良，乱杀无辜，美为“治病救人”。王实味之死，是一典型。李锐将希特勒与斯大林作了比较，虽然没有将毛泽东与希、斯作比，但读者自会比较他们的高低。（163页）只要看，苏区肃反，杀人十万（164页）；只要看，“在延安地区共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其中没有一个是真的。”（177页）怎么不个个战栗，人人自危？

1950年，李锐在湖南，读到国民党大特务所写《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写着：“现在延安的情况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大吃一惊，才恍悟延安“特务如麻”，其实一个也没有！（188页、411页）

李锐认为，否定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利大于弊。（178页）不然，年长月久、根深蒂固的形左实右，必难纠正。“否定”，既然“利大于弊”，又何来对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182页）欲“否”而还“是”啊！矛盾；悖论。整肃知识分子，“毛比列宁、斯大林更厉害。”（184页）李锐论此，仿佛余悸犹存。时至于今，很难说思想已经彻底解放。

因此，李锐恳切希望，对影响极坏、极大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应该有一个历史决议。（188—190页）延安整风、抢救，确立了“一把手”说了算的领导体制；开始了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发展了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打造出让知识分子服服贴贴的紧箍咒，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192页）

年仅五旬而逝的杰出历史学家高华，其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可以为李锐的论说佐证。

另外，“农村包围城市”（181页），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封恽代英的信，倡议农村包围城市而最后夺取城市。据此，应认定，恽代英才是这一革命策略的首创者。“文革”之初，我参观时所见，深祈专家核实。

（6）

从延安出来，李锐在热河办《冀热辽日报》。然后进东北，先后担任高岗、陈云的政治秘书。

随陈云接管沈阳的经验，由李锐帮助起草成报告，报中央，都收集在《陈云文选》之中。

“那个时候，陈云还有过一个和平土改的思想，所以后来中央分工没有让他管农村。”李锐说。（250页）跟随陈云参观了一大圈，李锐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迅速改变了岗位选择的意向，想离开宣传岗位。（253页）陈云告诉李锐，他是想回上海工作。南下时，陈云很想留李锐，但李锐不愿留在中央。李锐说，“延安时在中央呆了六年，呆腻了。”李锐不想坐而论道，想干点实际工作。（254页）

经采访者丁东再三追问，李锐才深入回忆，补充说了下面一席话。他深感党内人事关系复杂；对土改的“左”的看法，却同高岗合拍；接管沈阳，对旧社会的政策，许多方面跟陈云一致。1950年，陈云给黄克诚写信，要黄放李锐调北京。1952年，李锐调到了北京，陈云让周太和找李锐，要李锐到陈云那里去。李锐回答说：“你告诉老板，让我做点事情吧。”（255页）李锐离休后，到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也是陈云特意安排的。（405—406页）

李锐回忆到，1949年回到长沙，没有下过乡，“对土改那种批斗、杀人看不惯……”（278页）这都是大可研究的国史议题。

李锐认为，缺乏监督的“党国体制”，是极难改善的。这种异见，其实是关键点睛之笔。党政分层、双重指挥，叠床架屋，以致“政令不出中南海”（温家宝卸任时在记者会上讲话）。中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势所不免。李锐又说逆耳忠言。（405页）社会环境污染，伪革命化，数十年未改善，而日趋恶化，普遍权力至上，关系第一。

(7)

中国水电事业的开创，李锐建有功勋。事实雄辩地证明，李锐是将帅之才。他肯学习，重实干，思想开明，具有哲学思维和科学精神。一上手，他就探索地质与水电工程的关系，自培地质人员，胆大心细，悟性甚高，善于抓典型经验，把握住长远价值，很快入其门，外行变内行。他是事业心极强的实干家，他永远不会做官僚。他的远见、预见和灼见，处处闪光。知胜知败，尤其重视失败教训！

他为什么始终坚决反对修建长江三峡？从“动能经济”概念出发，他首先想到，必须有消耗电力的工业及地区经济与之配套，要有可行的全盘计划。否则，水电站只是摆设。浩大工程，岂可只为防洪，不思发电？动能经济同河流综合利用，加上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和积极改善，乃千年、万年大计。三门峡的教训，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所以，三峡工程，“陈云从来反对，坚决反对”。（326页）

1958年1月，中央召开南宁会议。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周恩来和陈云，毛说周、陈反对他的“冒进”，离开右派只有五十公尺了。毛写了“高峡出平湖”的诗，报上鼓吹三峡工程上马，热气腾腾。

薄一波委婉告诉毛：“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林一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到了南宁，知道了会议情况，朋友们无不替李锐捏一把汗。

李锐和林一山，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

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

林一山说，他要谈两个小时。

毛又问李锐，要谈多长时间。

李锐答：“半个小时。”李锐请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从汉元帝谈起，历代皇帝怎样防洪，把原定坝高235米改成200米，也谈到了水电。讲了两个小时。

李锐讲，修大水库，专门防洪是不行的，应该主要是发电。装机容量至少是一千七八百万千瓦，甚至两千万千瓦。全国当时电站装机总容量，才五百万千瓦。中国何时需要三峡这么大个电站？现在说不

清楚。根据苏联经验，全国不能只有一个电网。好比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公司，全国更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一个电厂的投资假如是一万元，那么消耗这些电力的耗电经济项目，投资至少要五万元，不是由防洪需要来决定，没有三峡修坝，照旧可以防洪。而且，长江不是黄河，它从来不是害河。最后讲到技术问题，三峡工程，最困难是地质勘察问题。单是选坝址，没三、五年，不能完成。其他如环保、航运、移民，李锐都没有讲。深入浅出，尽量简单，大家都听懂了。

毛泽东说：“好，讲得很好。但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布置了作业，两人分头去完成。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文章，当面褒李贬林。毛说：“我们要培养李锐这样的秀才。”关于发电，毛定下“水主火辅”方针。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着李锐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328—331页）

李锐心里害怕到毛泽东身边去工作。他心想，文章好坏不是决定因素，你过去能听信林一山的话，是因为你没有经济观点，也缺乏科学知识，水平同林一山差不多。

李锐诗云：

案前摆战场，亦似叙家常。
诸公心落石，朝日雾飞光。
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
已非涂抹手，斩水劈山忙。（332页）

李锐为什么反对三峡到底？他从防洪、发电、航运、投资、移民、地质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方面，讲了理由。（348—353页）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三峡工程，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一个最具体的例子。是非混淆，好坏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353—355页）

（8）

大跃进时，讨论超英赶美，订计划、指标，讲要翻番。李锐给毛

泽东写了第一封信（1958年6月），说有些事情霸道可以解决，有些事情霸道没有用处，比如电就不能霸道。不是波浪式前进，炼钢炼铁，都一哄而上，这样下去不行。北戴河会议，毛不找李锐。直到1958年11月21日武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找李锐去，还同他谈了话。毛从看不进这封信，到看进去，时隔五个月，毛说，你这封信的态度，还不够明朗。（374页）

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李锐未参加，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谈一些基本经济理论问题。写好信，给陈云看过，给李富春留下复件。三月上海会议，毛把李锐找去，一进房门，毛指着李锐说：“李锐，你这个人是不能当强盗的。”闻者莫名其妙。毛作报告，有一段题目就是《李锐怕鬼》。毛的意思是说，给他写信，李锐还把信先给别人看。李锐猜度，这样毛就不能把李的东西变成毛的东西，有了旁证，毛不好利用。（375页）

会议期间，李锐给毛泽东写了第三封信。毛说：“李锐，你只把骨头给我吃，不把肉给我啊！”非要李锐坐到前面去，他向李锐鞠躬，说：“李锐我感谢你呀，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把李锐恭维得不得了。（375页）

周恩来总理在工业会议上，也大大表扬李锐，说他给主席写信，起了好作用。在人们眼里，李锐焉得不红得发紫。

李锐给毛泽东三封信，是他人生的一次高潮。

1959年7月，中共八届八中庐山会议，毛泽东通知李锐参加。彭德怀事发。最后大会时，周小舟说出田家英关于毛泽东的三句话：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被人议论。会场内，田家英、胡乔木面无人色，全场紧张。会议主持人刘少奇问：“李锐，怎么回事？”李锐镇静起答：“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极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掩饰得无影无踪，毫无痕迹。但在人们心中，刻下了忠奸贤愚的密码。（379页）

《庐山会议实录》，是李锐接受胡乔木建议，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参阅。

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彭、黄、张、周，撤职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李锐一人，被一撸到底，送北大荒劳改。

李锐为会上无一人站起来为彭德怀讲半句公道话，而深感绝望。

安子文派人到北大荒找李锐谈话，希望他讲一点要求留在党内的请求话，李锐无以应。（380页）

几乎饿毙的李锐，挣扎在死亡线上，得到田家英、李富春等人及时的救助，活了下来。由于陈伯达的加害，“文革”中，李锐关押秦城八年。李锐得以彻底平反，是安子文、胡耀邦伸出了援手。

李锐说，共产党这样的错误，人类历史没有过。（382页）

（9）

李锐从流放、劳改地北大荒回京，无法再与范元甄继续生活，两人离婚。

李锐推测，范元甄揭发李锐的两本材料，可能是她同李锐离婚后写的，内容一定会有夫妻私下议论毛泽东的一些话。刘澜波看过这份材料，告诉李锐，材料到刘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材料邓小平看过，即下令烧掉。邓说：“太恶劣了！烧掉！”（385页）

在那饿死几千万人的岁月，范元甄也曾在生活上，照顾和接济过饥寒交迫的李锐。李锐没有忘记，范元甄托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带一箱饼干给北大荒的李锐。“文革”中，也就是离婚之后，上面要李锐写范元甄的材料，李锐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将心比心，李锐说：“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三个孩子。”（381页）

李锐被提名进中央委员会，有几人反对。其中两位，一是邓力群，一是范元甄。李锐的“政敌”里，竟夹杂了旧日“情敌”。（406页）

书中附录一，是44岁的李锐，给范元甄的一封信（1960年7月25日，写于北大荒），有血有肉，笔下尽是泪。日常干奴隶般的苦力活，“头部包扎如修女”，面部被多至七八种的小飞虫咬伤，“红白斑斑”，“思想也有顷刻的波动”。“但经常的状态是好的，是你之所谓‘单纯’”。（390页）李锐的“单纯”，纯然是纯真的童心。范元甄不是

不知其珍贵。离异远去的故人，毕竟曾经是知音！此种细节，司马迁最是熟稔。

（10）

李锐何人哉？

1991年，在敦促三峡工程上马的会议上，王震骂李锐，“这是一个反动分子！”有人告诉了李锐。李锐说：“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呢？大概说我是反对分子吧？”传话者又去核实。王震确实确实骂的是：“李锐是个反动分子。”王震当面对李锐也说过：“李锐，你是我的死对头。”

（346页）辱骂与恐吓，无损他人尊严，历史习惯于付之一笑。

读罢《李锐口述往事》，我心目中的李锐，货真价实是中共优秀党员，铁骨铮铮，光明磊落。可能过于“单纯”了一点。他是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他两次自标“成熟”，其实是耄耋老人的天真自诩，不无可爱的意趣。站立风口浪尖，他砥柱中流。

李锐“成熟”与否，“反动”还是正动，不妨让黄河说，让长江说，让人民说！

疾风劲草；炼狱煎熬。这部“口述往事”，是李锐《史记》。述往思来寻史迹，光风霁月现人物。谁害怕、容不得这本书，谁就是见不得阳光，害怕真理，害怕真实历史饱含着的真理。

敌视此书，仇视李锐，有可能心窄胸狭，却殊途同归，譬如因三峡工程的分歧而爱深恨切者，有待历史实践，作出公正的检验和严正的品评。此外，则必是罪错累累，怙恶不悛，终被万众痛恨、唾弃的城狐社鼠、魑魅魍魉。

卷帙浩繁的历史巨著，内容也许只容一纸。出生入死，百年奋斗，李锐只为中华时代列车，添加民主、科学之两轮，尚未完功毕役。借此读书札记，谨向挥着诗笔琢车轮的战士——李锐同志致谢、致敬。

2017年3月12日

李锐的“四个一”

阎淮

1982年3月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成立，李锐任局长。我作为第一批局员认识了李老。36年来，从部下到小友（近年他赐书皆题“阎淮小友……”），与这位父辈良师结下忘年之交。在李老101岁高寿重病之际，我回忆与他的多次接触。



2017年李锐为闫怀的著作《进出中组部》修改序言

1、

中共十二大首次提出“干部四化”，其关键是年轻化和知识化。当时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大学教育程度只占6%，绝大多数50岁以上。李锐指导青干局，提出：“目前省部级50岁以下和大学程度应占三分之一，三年后达到二分之一，八年后新提者都应50岁以下和大学程度。”此方案在中组部阻力极大。李锐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为此方案力排众议保驾护航，使其终于通过。上述“两个三分之一”成为随后调整省委和省政府的硬指标。我们都认为：“李锐很强势，思路开阔雷厉风行，提出一个想法，能把组织部上下裹挟着走。这很少见！”曾任青干局副局长任小彬，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如是说。

2、

1982年底中央决定调整全国各省级班子。湖南试点，李锐派我代表中组部参加工作组。我斗胆建议在所有的地厅级以上干部中搞民意测验，作为新省级领导人选的基础。李锐竟欣然批准，全力支持！我

们十余人的中央工作组在湖南工作 50 天，先后让 200 名现任和卸任的省级领导、600 名厅局长、600 名地市长对新省级领导班子提名进行不记名投票。事后中央转发文件，以湖南经验指导各省市的调整。李锐在省级干部的选拔中，开了民主化的先河！

3、

1983 年 5 月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的通知》，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长的李锐很重视，工作雷厉风行。6 月初他派我在北大召开北大、清华等六所重点院校的组织部长会议，了解“选调”的进度和问题。6 月底又让我到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各高校党委书记会，交流选拔工作经验，解决具体困难。随后，李锐把北京经验向全国推广。在各省的努力下，7 月毕业分配前，全国共选拔了两千余名优秀毕业生到城乡工农业最基层锻炼。我秉承李锐对青年的关怀，对各省青干处说：“我们应该是‘选调生’之家，他们基本是 60 年代生人，与我们 40 年代的差一代，又是我们催生的，象我们亲生的孩子，我们要当好家长，一直负责到底，直到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当年秋天我到东北三省和华北三省区考察省级后备干部时，都按李锐的指示看望当地的首批选调生；此后几年我到各地去调整领导班子和考察第三梯队时，都尽可能看望当地历届选调生，送去温情、解决困难。截止 1985 年，全国选调生共达 1.27 万。本世纪初，这些选调生中 6800 名担任县处级、420 名任地厅级、7 名任省部级。

4、

1983 年 10 月，中组部颁发《关于建立省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文件称：“中央最近提出，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第三梯队的建设。省部级后备干部，是指省委正副书记和常委，省政府的正副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的后备对象。每个省 20 名，共 600 名；每个部委 5 名，共 400 名；全国共 1000 名。”

八十年代喊得震天价响而又无比神秘的“第三梯队”，作为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成为中组部的中心工作，而具体负责的则是青干局。因

此它是分管青干局的李锐在中组部的重要政绩。拙作《进出中组部》（香港明镜出版社，2017年）中有万余字的详细记述。青干局的同事崔武年这次又撰文《李锐和“第三梯队”建设》回忆这项工作。因此不再重复，只说明我在李锐指示下，建立第三梯队前考察过习近平、张德江、李长春、吴仪、李铁映等，直接参与考察建立北京和天津的市级第三梯队。

5、

1984年，已不再兼任青干局长的李锐派我参加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讨论会”。我设计了一张《代表调查表》，其中除了基本情况外，专设了“困难阻力”、“要求希望”和“今后计划”三项。向百余与会代表分发。根据对“调查表”的分析，我写了近万字的《一代新人在崛起》的调查报告交李锐。他的日记记载：“阎淮来谈莫干山会议情况，人才不少。让阎去接触，了解内情真像！”（李老向我披露了日记中关于我的部分）随后李锐在新华社的《瞭望》周刊发表文章，介绍我的上文。由此，我与经济学界建立了良好关系，被推选为鲍彤为会长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理事，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建和内部研讨。同年我还参加了被夏衍誉为“文学史的遵义会议”的作协四大，并与文艺界开始交往。这一切都源于李锐对我工作上的信任！

6、

而李锐对我的恩重如山则体现在如下事例。在整党的“个人检查”中我说：“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可见我的激进和异端。中组部上层以我婚变为由，不定我为处级。李锐则为我力争，他1983年4月13日日记中记有：“下午参加职称评定会。幸亏来了，补上阎淮处级调研员。”时任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与我岳父母是半世纪的战友，得知我欲离婚。在政治局会议上对中组部长说：“这样的思想腐化份子，要清除出中组部！”陈部长回部里传达了邓颖超指示。我对李锐说：“我要求调离中组部。不能再给您添麻烦啦！”李锐回答我：“不能因为一个糊涂老太太的一句话，就断送一个优秀青年干部的

一生！”随后，在部长办公会议上，他说了上述同样的“四个一”的名言，并且强调邓颖超不分管组织工作，她的“气话”不是上级指示。根据潜规则，某位上级力保你，同级官员不会为事不关己的你，反驳得罪同僚。“邓老太太指示”就这样被降温了。李锐在我危难的关键时刻，再次保护了我。

7、

1984年夏，邓力群、李伯宁等人先后向陈云递交“声讨”李锐的告状信。9月，陈云批示：“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就调离组织部吧。”李锐认为自己没有犯错误，坚决不离开组织部。9月27日时任中组部长乔石做正式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求退下来。”既执行了陈云批示，又给了李锐台阶。国庆节我走冷门，到离休的李锐家拜节。这是继83年青干局成立后第一个春节，全局五六人集体去李锐家拜年之后，我首次单独登李府。李锐让我帮助了解陈云批示缘由。我立即先后到哥们儿刘泽彭和陈元家，随后向“前首长”汇报。李锐1984年10月4日日记：“阎淮来谈，与刘陈接触后，了解到陈云的‘将李锐调离组织部’的批示是批在李伯宁状纸上，此是借刀之法，欲盖弥彰。”我为能报答李锐恩情之万一而欣慰！

8、

再次单独去李锐家则是十年后了。1984—89年，我们分别忙着自己的事，我只是偶尔与青干局同事集体为李锐拜年。1989—94年我离开中国，李锐仍关心我。听熟人说，他非常了解我的情况，仅在日记就有两处提到我：1989年8月16日：“与来客谈阎淮从香港跑法国之事，令人浩叹。这是当年陈云给我青干局人选名单中第一位也。”1990年4月15日：“与刘某某同车，漫谈人事。阎淮在主持‘民阵’巴黎支部。”

1994年底，“风波”后我首次返国，第一时间拜访老长官。劫后重逢格外亲切，我们聊了五六个小时，李锐并送我他的两本新作。李锐说：“胡耀邦跟我说，原以为我是陈云的人，一直与我保持距离，后来

发现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个‘跟线’的人。”他诚恳地对我说：“我象耀邦看我那样看你。当年陈云处交来十余人名单，说‘你考察了解，满意的就要。只是第一名阎淮，不必考察必须要！’我心里有气，认为你是陈云和陈元的人，后来才逐渐认识了你。”

李锐日记 1994 年 12 月 12 日：“上午闫淮来，长谈他在国外五年经历，为何出国。6.3 夜在南池子南口亲眼目睹，时在康华有出国护照。在法国参加民阵活动一年，太不成话而退出。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研究所）二年，因一篇谈中国权力结构文被各方赏识，最后落脚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实为新加坡政府当咨询。同江泽民很熟（他在国外不谈人，只谈制度），对杨尚昆、杨白冰下台事件有分析（邓不能再换班）。江在电子部时，曾拟将他调去任干部司付司长。留午餐，二点始离去。”

9、

此后我每年都回国，经常看望李锐。他 90 岁后，怕影响他健康，我就只与青干局朋友为他寿宴了。2014 年《中国新闻周刊》杨记者为撰写“第三梯队文章”欲采访我，被我婉拒。杨后来说：“李锐也让我采访你，并想见你。”8 月 23 日我去李家，97 岁的李锐精神矍铄、记忆非凡、十分健谈。我们侃大山一下午，张阿姨又要留饭，我要开车载他们下馆子，最后双方皆未得逞。我也没空手而归，李锐又题字赠我两本新书《李锐口述往事》和《我的父亲李锐》。

李锐在中组部只工作两年多，担任青干局长和分管青干局各一年多，青干局多数同事只在他间接领导下约一年。但是，他们大都与李部长感情深厚。仅以近年我们为他祝寿为例，2015 李老虚岁 99，“过九不过十”，办寿宴！2016 虚岁百岁，祝寿！去年李老行走不便，各方寿宴不断，青干同事不宜独办，便到家庭寿宴去争席位。2017 年 4 月 13 日李老百岁正日子，李家人真照顾我们，其三桌家宴青干们就占领大半桌！

10、

在去年的寿宴上，我犹豫再三，终于在饭后厚着脸皮向李老提

出：可否为我的《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回忆录作序？孰料他竟欣然答允，让我一个月后取序稿。我呈上书稿，静待佳音、敬待嘉音。5月10日，我应约去李老家取《李序》。序中说：“阎淮这样的‘红二代’，认同我们‘两头真’的理念，要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祖国走上民主、法治、宪政、富民、强国普世价值的道路！”他还赠我近作《李锐期颐集》，问我：“题写什么？”

我答：“阎淮老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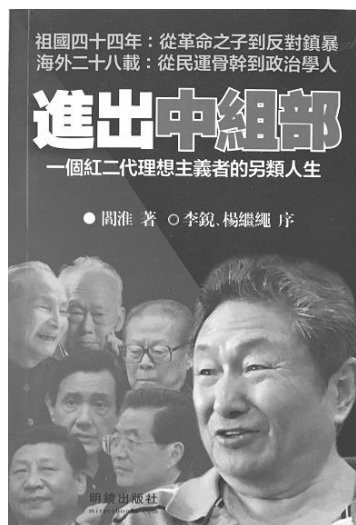
李老边说：“你老什么？”边提笔写下“阎淮小友存览”。

我诚恐：“友？是不敢当！”

李老指着序说：“你认同我们两头真老人的理念，就是两头真的后生，就是我的小友！”

《变革远未成功，后人更需努力》是百岁老人为我作序的标题，作为李老小友和政治后人，我愿为远未成功的变革，更加努力！

三十多年前，六十多岁的李部长在中组部保护了我；现在，百岁李老又为我作序，使拙作增光添彩、身价倍增。说李锐对我恩重如山，恰如其分，毫不夸张！



2018年5月27日

李锐和“第三梯队”建设

崔武年

我调到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的时候，是1983年11月，李锐已经是中央组织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了——当时，陈野萍是部长，是十二届中顾委委员，李锐是十二届中央委员，而且是中央组织部唯一的中央委员。李锐分管青年干部局。



2016年崔武年在李锐百岁寿宴与之交谈

那时，“第三梯队”的工作已经开始部署。最早提出“第三梯队”这个概念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3年5月，在中央为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座谈会上，胡耀邦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要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过了一些日子，到6月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第三梯队”的提法得到了陈云的肯定和强调——陈云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建立起来。差不多同时吧，邓小平也赞同了这个形象的提法。在随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第三梯队的建设”就成了中央组织部的“第一重要的工作”，整个工作则是由分管副部长李锐直接主持、组织进行的。

一、

在李锐的主持下，部里专门组织作了调查研究，制定了有关文件，确定了选拔标准和上报程序。程序很严，最主要的一道是：所有名单，必须要由所在省部级党委常委（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后上报中组部，再由中央考察组考察，经中组部审定之后上报中央。并且明确提出，这个最后确定的“第三梯队”名单要求在1984年七一以前上报中央。所以，按这个要求，各省部的预选名单应该在1983年年底

之前报到中央组织部。

实际的工作进程却不大理想，到12月了，报送的寥寥无几，大部分省部都表示要到次年开春以后可报——但是上面却等不及了！于是，在陈野萍、李锐等部领导汇报之后，就有了当时中央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亲临中组部做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催收催种”！

我记的很清楚，12月10日，宋任穷到部里听取第三梯队建设工作情况汇报，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和部办公厅、经济干部局、党政干部局的主要领导参加，青年干部局局长李志民、副局长刘泽彭并张洁瑜、刘广祥等参加，我亦恭临其末——附带说一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锐。

李志民为主汇报，李锐时有插话补充。宋任穷在整个汇报中间讲了很多意见。他说：耀邦同志最近几次指示要抓紧第三梯队建设，前两天又问我，这一千个人的名单什么时候能拿得出来？你们要作为第一件大事来抓！当李志民说到十三个省年底可报，十个省年底只能报一部分，还有四个省得到明年一、二月份以后才能报时，宋任穷说：这个不行。你们要抓紧催，告诉他们，对这个事，中央很重视，非常重视！选好的名单，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当大家议到年龄情况时，宋任穷说：年龄上可注明一下，特别是对五十岁以上准备就用的，八五年要开一次党代会，所以，实际上八五年就要用。耀邦讲八五年中央委员要更新一批，更新的来源主要就在这里面。当李志民说到为便于中央了解，这一千个人每人搞个四百字的小传时，宋任穷说：四百个字？这些人是要报给小平、陈云同志看的，一人四百个字加起来就是四十万字！怎么看得过来？要搞个简本！耀邦同志讲，可以一批批地给，分开来，有计划地给，成熟的先给。当大家议到部委工作基础比省市差，没“腿”的部又比有“腿”的部差时，宋任穷说：没“腿”的部委确实困难多一些，可以放后一点。将来这一千人是“全民所有制”，可以统一调整，现在提倡干部交流，就从这些干部开始，等等。会开了一个下午，大家夹叙夹议，气氛挺活跃。

当时李锐很少以“部领导”的身份说“指示性”的意见——我最初的感觉，老听说李锐说话“有锐气”，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嘛。

这次汇报会的直接结果有三项：其一，决定第三梯队建设工作列为中组部 1984 年第一项重要工作，动员全部的力量，抓紧组织考察；其二，决定专门就第三梯队建设问题出一个时期的简报，以推动和指导工作；其三，就是紧接着在这个月尽快召开一个全国的电话会议，各省区市的第一书记、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和人事司长参加，把第三梯队建设切切实实地变成全党都必须重视的一项一刻也不得懈怠的实际工作。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1983 年 12 月 16 日晚上，就在中组部简陋的礼堂里，召开了这个全国性的电话会议！陈野苹主持，李锐讲话——他的讲话语言形象，口风犀利，要求明确，责任到位，毫不拖泥带水，“第三梯队建设工作”一下子就提上了最重要的工作日程！

这一次，我对李锐的风格算是初有领教。

二、

中组部的发条一下子就上足了！并且在整个 1984 年的上半年把第三梯队建设当作了全部的第一项中心工作！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分管副部长的李锐，更是亲力亲为，亲自抓，亲自参加工作！

1983 年年末，部办公会连着三天开会——

12 月 27 日听取黑龙江省的汇报，李锐主持；

12 月 28 日听取江苏省的汇报，李锐主持；

12 月 29 日听取北京市的汇报，李锐主持。

1984 年初始，按照李锐的要求，赴黑龙江、江苏、北京三个考察组 1 月 2 日就出发了。

与此同时，部办公会又连续开会——

1 月 13 日听取中国科学院、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和卫生部的第三梯队建设工作汇报，李锐主持；

1 月 18 日听取陕西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汇报，李锐主持；

1 月 23 日听取内蒙古自治区的汇报，李锐主持；

1 月 26 日听取山西省的汇报，李锐主持。

到了2月以后，部办公会又分别听取了冶金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城乡建设部、国家体委、国家科委、经贸部、轻工业部、公安部、民政部、林业部、商业部、铁道部、邮电部、船舶总公司、中联部、统战部、旅游局、气象局、工商局等部委的第三梯队人选汇报。这些会议都是李锐主持的。

作为具体的工作人员，这些会我都参加了，当然只有听和记的资格——但是，对李锐主持会议的风格，我倒是渐多感悟，并且耳目一新了！

那时，这些会上较多涉及的是被选干部的“‘文革’表现”问题。一方面，这个问题挺奇特——所谓“‘文革’表现好”，其概念恰恰是在当时如何抵制毛主席的号召，或者“逍遥”，或者反对，总之是如何表现出不理解、不积极，最好是想方设法的抵制；而“‘文革’表现不好”，则意味着如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或有过激言论，或有过激行为，总之是多么积极、多么紧跟，甚至是花样百出的批斗老干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大家：“文革”十年，总要分个前期、后期吧，说到“‘文革’表现”，相当多的考察材料都是着重叙述某某人“文革”初期不理解、有抵制、反对批斗老干部；而对“文革”后期，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表现则常常是一笔带过。很多人觉得这种处理实际上是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会伤害很多真心跟共产党走的人。李锐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只听不说，让大家争论，在关键时他会打断，让回去进一步考察；但是在“前期、后期”的问题上他说都应该重视，而更应该“重后期”。这一点我记忆很深——因为这和我们局内好多人的意见一致。后来我们议论，这确实也难为了老爷子！整个“文革”，他被关了八年，正所谓“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当时，我直接负责，或者说是直接参与的是两件事情。

其一是选编《人物小传参考资料》。听李志民说，搞这个“资料”是李锐的意见。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针对当时的干部考察材料刻板、干瘪、不生动、不形象、千人一面、没有特点的问题，想有所借鉴，有所改变。这个资料我具体操办时可是费了好大劲！主要是无所

遵循。后来还是李锐说“像《范滂传》就不错嘛”，算是开了窍。最后，在李志民的具体指导下，完成了这个“资料”的选编。编入“资料”的“小传”共十四篇，分别取自斯诺的《西行漫记》及《史记》、《资治通鉴》、《后汉书》、《古代散文选注》等书。计有：李大钊小传、徐特立小传、李达小传、汪精卫小传，贾谊评介、曹操评介、嵇康评介、文天祥评介，司马迁评李斯、司马迁评韩信、司马迁评李广以及李世民谈诸臣、范滂传、种树郭橐驼传。这个“资料”经过李锐的审定，铅印以后以“中组部青干局”的名义正式发给了各考察组。在选编说明中，我们做了这样一番交代：“这些资料，有现代人物小传，有古代人物评介，有史家论赞，有人物传记，总之都是写人、评论人的。它们体裁不一，风格各异，着眼点各有不同，但都文字简练，语言生动，特点突出，褒贬鲜明，塑造人物准确，可供写干部小传参考。”这个“资料”引起了众多组织干部们的稀罕和议论，很多人说“考察材料还能这样写，真是闻所未闻！”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要为之一书！这个“资料”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堂而皇之的出现，当时令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现在更是不可想象，可谓是中共组织史上短暂一现的昙花。

其二是编写《省部级第三梯队建设工作简报》。这个“简报”当时被确定为“机密”级，只送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即一把手），出了一年多，一共出了十几期。这十几期有一半左右是我“写”的。这个“写”字打引号是因为最后刊出的东西与我最初写的原始东西距离很大，有的甚至面目全非。因为编写这个“简报”，我和李锐有了几次直接接触：记得去他的办公室三次，都是他叫我去的。第一次是我到他的办公室，他一边批着文件，一边头都不抬地跟我说：你这个“简报”太罗嗦，人家是抓特点带一般，你倒好，反过来，是扔特点留一般！特点全扔了，光剩下一般！这样不行，重写去吧！第二次是我到他的办公室，“简报”的文字不长，他跟我“耳提面命”地重新搞了一遍。第三次我去时他那里正好有人谈话，看见我，很简单地说：这个我改了一下，你拿回去再顺一顺。还有一次是李锐在走廊里碰到我，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局的“秀才”都是些“小知识

分子”，搞个“简报”象中学生作文！这是给小平、耀邦同志看的，用你们说那么多道理！唉，我起草的这些“简报”都是按程序经李志民或刘泽彭审核后报出去，到了研究室、到了办公厅反复改过，有的甚至给改得“体无完肤”以后才送到他那里的，但是他还是不满意！那时他官居中组部副部长，年近七十岁的年纪，还是这样“举轻若重”，这种负责精神，现在想来，真是令人感叹！

三、

第二批考察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6月了。这时，部办公会议听取考察结果的汇报，确定第三梯队名单，又成了相对集中的工作。这些会议，都是李锐主持的。比如——

6月7日的辽宁、安徽考察组的汇报；

6月9日的四川、陕西考察组的汇报；

6月13日的广东、河南、山东考察组的汇报。

我算了一下，加在一起，这七个省总共报了二百七十二人，经考察，确定了一百九十五人。要是算个百分比的话，那就是淘汰率近28%。

到6月下旬以后，部办公会议讨论名单的会议，开得就更多了。从汇报中可以看得到，这次的第三梯队考察，普遍非常重视非常认真，而且采用了一些新的考察方法，象面试、笔试、“请开列一个自己读过的书目”、“即时写一个简短的自我评价”，还有上海、浙江搞过的“德才测评”等。可别小看这些简单的“新”方法，在当时的中组部，这都带有一定的“革命”性质！我是去内蒙考察的，在内蒙我还开了一个“记者座谈会”——因为记者接触面广，所以请他们推荐“内蒙的出类拔萃之辈”。这个方式还是我出发以前碰到李锐，他随口和我说的。顺带说一下，那次座谈会，还真发现了一位来自自治区没有报的干部，几十年以后，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与此同时，部领导还采用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与在京的第三梯队名单上的干部见面。这样的座谈会在6月里连续开了五次，也都是李锐主持的：

6月20日的北京市青年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田成平、陆道洽、汪统、李其炎、陆宇澄、陈元、李志坚、张福森、颜昌远；

6月22日、27日、29日连续三次的中央党校学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苏德宜、张连珍、王培知、阙连春、王永多、张宗亮、孙守钦、南国柱、谢计达；欧进钢、张凯、李明贵、林兆枢、查世煜、王秀柔、周时昌、张寿山；李金华、兰友仁、陈德玉、赵世华、刘志鹏、李长春、高延青等；

6月25日的中央部委青年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王可立、李纪周、廖晓村、徐文伯、林炎志、覃志刚。

这些座谈会共有三十九位名单上的干部参加，在家的部领导能参加的也都尽量参加了。

7月中旬，我还随李锐去了一次天津，与天津市的第三梯队干部开了两个座谈会。一次参加范围都是做经济工作的，共七个人，有凌兆元、张立昌、叶迪生、李慧芬、潘义清、王述祖、梁肃；一次都是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共八个人，有邱允盛、张崇智、刘淑贞、张玮、陈钟槐、梁国庆、叶厚荣、杨戊辰。座谈的题目十分广泛，有时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开创工作局面时在人事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对组织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等；有时则比较宽松，完全是漫谈式的，比如新时期的党政干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就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干部队伍的特点谈谈自己的分析和看法等。

当时，为了把考察工作做的更细更好，部领导还召开了考察组的工作座谈会。在6月12日和13日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开了两次，李锐、王照华、曹志三位部领导主持，各考察组的组长、副组长参加。这种专门探讨考察工作经验教训的座谈会，后来还开了两次。有意思的是，各考察组的组长、副组长都是组织部各局的局长、副局长或刚刚退下来的局长、副局长，在会上议论考察工作本身不多，议论青年干部的困难、苦衷，议论如何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岗位工作倒成了主要的话题，这里面包括一些平时对这项工作颇有“微词”的“老组织部”。可见，当时选拔有知识有学历的年轻干部，并且尽可能地把他们

推上领导岗位，一时间成了“大势所趋”！

四、

接下来的更多的就是综合工作了，包括对已经确定的第三梯队名单进行初步的统计和分析，对考察材料、小传做最后的整理和修订，更重要的，就是就这项工作起草给中央的总结报告，等等。在这个期间，我和李锐也时有接触，但是那主要都是在部里的会议上了。到了9月，我的日记上还记着：

9月4日，参加大中型企业座谈会，李锐出席并讲话。

9月6日，根据李锐的指示，拉了一个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提供宣传线索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

9月12日，上午，按李志民的交代，把总结初稿送到李锐处，没说什么话。下午，参加李锐主持的部办公会，讨论云南、江西的名单。

后来的几天都没有提到李锐了，好像也没有谁告诉我有什么变动……直到9月18日，我的日记里写着：“下午参加部办公会，讨论甘肃、青海两省的第三梯队名单。尉健行、王照华、曹志、白治民等部领导参加……”没有李锐。这时候，我才确认李锐已经不是副部长了。

9月30日，我写了这样一段日记：

李锐同志已经免职。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得以提高到实际上与领导干部等同的位置，中央组织部的观念和工作得以开拓前进到今天这个程度，应该说，李锐是有“杀开血路”之功的。李锐是第一任青年干部局局长。我以为，青年干部局现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风格实际上代表了中央组织部工作改革的方向——承认这一点非常困难，承认这一点需要时间，但是承认这一点是早晚的事。

五、

前面说，我是1983年12月10日第一次见到李锐的。但是我能调到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却是因为我给李锐的一封信。那也是1983

年的事。那年年初，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胡昭衡被委派为派驻新疆的“中央机构改革工作组组长”，我被派为他的代理秘书，从而，在新疆工作了将近四个月。当时，每个省的工作组都有一个中组部的干部，新疆组的是胡光伟。后来，我和老胡就熟悉了，经常一起聊天，有一次说到七六年的“四五事件”，说了感觉又说看法，再后来就说到了各自的经历，居然观点差不多完全一样！我说我因“四五事件”被“隔离审查”，天天在单位里面大会批，小会斗，和“专案组”斗智斗勇，交代“问题”，折腾了三个多月！幸亏地震了，都忙着“抗震救灾”了，我才“解放”了，等等。我又说了很多我对“四五运动”的看法，老胡听了都挺赞成！老胡告诉我，中央组织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局长是李锐，思想挺解放的，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他谈谈。中央组织部有个青年干部局，我是早就听人说过的；局长是李锐却是刚刚知道。对李锐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我看过他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也听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开除党籍了！我一下子就动心了。到了5月下旬吧，就在乌鲁木齐的延安宾馆，我给李锐写了一封信，那天是5月22日。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找出来了那年的日记本，翻到了那天的日记：

5月22日

昨天一天大风，今天一天下尘。白天都是杂事，不太忙，可也没闲着。

晚上就是自己的时间了，我思之再三，给李锐同志写了一封一直想写的信。是的，我愈发地认为：在当前大批地选拔年轻干部的时候，对天安门事件的那批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应该给以集体的重视！对他们应该专列名单，重点考察！从1976年到现在，已经七年过去了。七年中，有些人可能会有分化，但是大部分人一定是更加成熟了。特别是其中的“老三届”，他们本来已经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前几年很多人又考上了大学，这两年正好毕业，补上了缺少学历的遗憾！他们是经受过严酷的政治考验的一批人，是真正反对“四人帮”、坚决拥护三中全会决议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不应该被埋没的，否则真是我们党的损失，是我们民族的损失。

已经 2:00 多了，该睡觉了。我自己当然是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但是写这封信我是心地坦然的。

第二天，这封信我就交机要交通发出去了，连原稿都没有留。

6 月份，我回北京以后，就听说有中组部的人来了解我的情况。到了 8 月吧，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的一男一女两位同志到我们单位找我谈话。10 月，中组部的调令发到了我们单位。11 月初，我怀揣着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大印的“中组部（83）干调字 299 号”调令，迈进了西单商场北边那座不挂牌子的灰色大楼——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刮风天的上午。

报到的时候，我才知道，到我们单位找我谈话的是青年干部局局长李志民和综合处处长张洁瑜。

在我调出中组部以后，有一年一起吃饭，李锐喝了两杯酒，跟我说：我是先看到你的信，后认识了你这个人。

六、

真是时光如梭，转眼就是百年！三十多年过去，李锐和他当年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同事们选拔的“第三梯队”干部到 2017 年十九大的时候也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今年的 4 月 13 日，李锐老也是 101 岁高龄啦！我在网上看到，现在仍然健在的原中顾委委员尚有八位，即刘杰、李锐、林乎加、苏毅然、袁宝华、焦若愚和万海峰、李力安。这几位革命老人，除后两位之外，都是年过期颐，人望祥瑞了。我希望他们都能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第一个“百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重生，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大开张”！这是他们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不管中间经过了多少挫折、坎坷、失败和流血牺牲！他们是那一代人所存不多的硕果的代表。我们应该珍惜他们，爱护他们，尊重他们。我们还能再要求他们什么呢？我们还能再指责他们什么呢？我们还能再希望



他们什么呢？剩下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了——包括那些没有做好的，没有做对的，没有做到的，没有做得尽如人意的。

仅此而已。也为李锐老 101 岁寿辰贺。

2018 年 4 月 13 日于北京

一封信和“两头真”

陈楚三

人们把早年积极投身革命、真心实意参加共产党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晚年认真反思自己和共产党所犯错误、追寻党史真相、探求国家复兴正确道路的一批老共产党员，形象地比喻为“两头真”。李锐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我对李老久闻其名，但一直到 2011 年才有缘见过一面。说“有缘”，“缘分”就是我的回忆录《人间重晚晴》中所提到的“三十年前的一封信”。

据阎淮的回忆录《进出中组部》所载，“为了记录在案工作，青干局局长李锐向我们十来个局员了解大学生造反派的情况”，1983 年 6 月 8 日才正式任命李志民为青干局长，刘泽彭为副局长；因此，李志民找我写红卫兵材料当在此之前。大约李志民不能透露“记录在案”的事，只好说让我写材料是为了让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了解红卫兵的来龙去脉。阎淮说，“陈写了万言信交李，李志民即呈李锐；李锐转给我们清华的几个人看，因为工作重点已转移至第三梯队，此事不了了之”；但是阎淮又说副局长刘泽彭“政治敏锐，把陈楚三的信交到陈云处”，刘泽彭此举导致陈云对我的信的严厉批示，才有了陈云对孔丹信批示中的警告“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并立即形成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 号，按阎淮说法，此文件“扭转‘整党偏向’、指导‘选优汰劣’”，可见，实际上并没有“不了了之”。我虽然至今不知道陈云对我的信的批示具体内容，但看了他对孔丹信的批示，不难判断他对我的信批示肯定严苛。陈元告诉阎淮，陈云内部讲话：“温和的造反派也是造反派，我们既不能用蒯大富，也不能用陈楚三！”

正是在 2011 年看到陈云对孔丹信的批示，我才起意给中共中央写信进行申诉，并要求获得陈云对我的信批示的相关文件；而这封给中共中央的信，我是通过李老转呈，也因此得以拜谒李老，并荣幸地获李老签名赠书《庐山会议实录》。当然，我给中共中央的信没有回

音，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我在回忆录《人间重晚晴》中指出，“有人推测，以孔丹、董志雄名义写给陈云的信，很有可能是针对我给李志民的信而精心策划的，说不定就是陈云授意甚至修改的产物。”阎准则说，“我无证据认定孔丹的信是陈云授意，但是孔丹信与陈批示的政治理念和组织措施高度一致，孔信四天后即被陈批、五天后成为中央重要文件，……中共对‘红卫兵’的正式定义，在2000年中国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年谱下卷》第349页，几乎与孔丹信上的说法一字不差。”

李老是陈云点将到中组部工作的，他在中组部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但两年半之后突然被陈云下令免职。陈云的“理由”是有几个人告状，“对李锐有意见”，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在于，陈云认为李锐不是“自己人”。

在《李锐口述往事》一书中，李老分析可能有两件事得罪了陈云：一件涉及陈云之子陈元，另一件则涉及陈云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组织路线上的分歧。

一九八三年某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和市长陈希同到中组部，找到部长陈野萍和常务副部长李锐，说王震推荐陈元当北京市委副书记，征求中组部意见。李老回忆，“野萍不讲话，我看出他不愿意，听陈和段的口气，他们也并不是很愿意，但是都怕得罪人。那时候我已经是常务副部长，一看这形势，就说：陈元刚到北京，对北京也不太熟悉，你们对陈元也不熟悉，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慢一点？我没有完全反对，只是说慢点。他们两个人很高兴，就走了。”尽管陈元没当成北京市委副书记的事和李老的表态无关（阎淮指出，“在党代会的差额选举中，陈元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但这笔帐陈云父子肯定会记住的。我的清华老师和朋友罗征啟，因为陈元公费出国问题引发校内教师强烈反应而给陈云写信提出善意的建议，被陈云父子记下一笔账，踢出“第三梯队”，就是前车之鉴。

也是在一九八三年，李锐到上海考查新班子，曾见到正在上海休养的陈云。李老回忆，陈云认为胡耀邦是搞“青（青年团）红（红卫兵）帮”，“明确地告诉我，让我去中组部，就是要顶住耀邦”，但

“我没有照做”，因为“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跟人的人”、“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想法做事的人”。李老的判断没错，这笔帐陈云也肯定记住了。

于公，李老在中组部没有“顶住”胡耀邦；于私，李老没有帮助把陈元扶上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宝座，於是——只能下台。

李老被陈云下令免职，表面看和我当年写给李志民的信无关，我以为实际上是有关关系的，这种关系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直接关系即刘泽彭：（一）刘泽彭的母亲给陈云写信状告李锐。状告李锐的其余三人中，李伯宁因李锐反对建三峡而结怨已久，范元甄视前夫李锐为“假革命”，不停地对李锐进行“阶级斗争”，邓力群则是有名的“左王”；可以说，李伯宁和范元甄与李锐有宿怨，而邓左王和刘母，很可能是在李锐推行的干部路线上发难。刘母并不在中组部工作，她状告李锐的所谓“材料”，只能或主要来自她在中组部工作的儿子刘泽彭，因此，引起陈云的格外重视。陈云正是以四人告状为由头，下了对李锐的免职令。（二）“巧合”的是，我的信是被刘泽彭“打小报告”捅到陈云那儿的，这封信引起陈云重视并批示，孔丹顺势而为写信给陈云为“老红卫兵”开脱，陈云立即批示“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由于和陈元的特殊关系，刘泽彭的“小报告”当然不只是我的那封信，也包括了对李锐的“小报告”（刘母的告状即是明证），其中很可能提到李锐对我那封信的态度。刘泽彭“小报告”有功，李锐前脚被免职，他后脚就越过青干局长李志民被提拔为中组部副秘书长，成了主管青干局的部领导，以后更被提拔成副部长。

间接关系就是所谓“青红帮”问题。阎淮回忆，“1984年初开始的全国整党，重点是清理文革表现，流行的做法是严格审查文革初期如何造反，后期则一笔带过。……我们向中央反映，应该‘重后期、轻前期’。但是，不起作用！”所谓“轻前期”，如阎淮所言是“要保护曾经对立的造反派学生”，即主张保护造反派红卫兵，避免“伤害当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造反的天真青年”。崔武年回忆李锐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时说，“在‘前期、后期’的问题上他说都应该重视，

而更应该‘重后期’。这一点我记忆很深——因为这和我们局内好多人意见一致”（见崔武年：《李锐和“第三梯队”建设》）。阎淮看过我给李志民的那封信，认为我属于“温和造反派”，很可能李锐对那封信的看法也一样，但若“轻前期”，就和陈云对孔丹信的批示唱了反调。陈云要李锐顶住胡耀邦搞的“青红帮”，其中的“红”（红卫兵）指的就是造反派红卫兵（而不是“老红卫兵”），李锐却主张（或同意）对造反派红卫兵“轻前期”，这当然是陈云绝对不能容忍的。刘泽彭打李锐的“小报告”，刘母向陈云告李锐的状，要害问题或许就是这个“轻前期”。刘是阎淮的“十七年老友”，但“中组部同事后近距离接触，关系似乎渐行渐远”，其最初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对李锐的态度……阎淮对李锐是：“我引以为榜样，愿意为其‘卖命’”，刘泽彭却有向陈云打“小报告”给李锐“上眼药”之嫌。

在邓力群问题上，陈云说“李锐捣乱”其实没错。李老指出，陈云很看重邓力群，“他看重邓力群，主要是邓编《陈云文选》，写《陈云传记》，还提出陈云思想”；但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中委落选，陈云就说是李锐捣的乱。尽管李老致信陈云辩解说“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资格参加选举，如何捣乱呢？”可陈云当然不会忘记，正是李锐给邓小平写信书面揭发邓力群的问题，引致邓小平批示“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加上邓力群“左王”的名声不得人心，才使邓力群覬覦中共中央总书记大位的打算泡了汤，在十三大上不但中委落选，而且中顾委常委也落选。

李老经历了延安整风，并在“抢救运动”中作为特嫌被关押一年多，他用大量事实控诉了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以及造成的冤假错案，指出：“当年的抢救运动，在延安地区共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其中没有一个是真的”。不过，李老根据《唐纵日记》中的一段话：“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就说“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地确信，延安根本没有特务”，这个断言却未免有失轻率。一则，李老在谈到“抢救运动的外部原因”时，已经指出国民党（李老说是戴笠在关中办的训练班，有误，训练班是在汉中，简称汉训班）

曾经派几十名特务打进延安并被破获；二则，国民党军统打进延安（包括其他中共控制区）的特务，当时并未被全部破获，有不少漏网之鱼，我的回忆录《人间重晚晴》（第七章第六节）谈及此事，详情参见郝在今所著《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

丁东先生说，李老是“中国执政党内追求民主宪政的代表性人物”。民主宪政是世界潮流，李老有生之年虽然看不到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现，但不论道路如何曲折，中国融入民主宪政潮流的那一天总会到来。我们的心和李老是相通的。

2018年6月12日

神往锐老

周孜仁（云南）

李锐这个名字，于我，是一个遥远却非常深刻的名字。

第一次听说他，是 1980 年代初，一位昆明水电设计院给领导做秘书的同学兴奋地告诉我，说《人民日报》有一篇谈选拔青年干部文章，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写的，为我们这帮大学老五届说了许多公道话。具体文字多已模糊，但核心内容至今清晰：对年轻干部的文革“罪错”，首先需作背景分析，总结历史经验，而不应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其时邓、陈实际主政，恰恰欲将这批年轻人划入另册。文革罪错，一板子全打在了因天真无邪而无知无畏的我们这批人屁股上。于是，母校复出的那一两个受过文革冲击的当权派像打了鸡血似地兴奋，让组织干部全国奔走，将已经过 10 多年社会实践、并已被社会承认的优秀同学硬生生从党内和领导岗位拉下来。党内高层有人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我们心中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

我已无意于仕途，只想用文字表达我们一代人经历过的苦难和思考，以见证人和书记员的名义，为那一页荒唐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正是读了李锐的文章，我对拨乱反正的国家充满信心。在 1982 年初一次我的作品讨论会上，感念于李锐文章激励，我这样发言：

曾经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欺骗过的一代，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决非某些电影、小说里概念化描写的“恶棍”、“暴徒”，当他们狂热投身于十年动乱的时候，作为他们精神支柱的那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为神圣事业献身的精神，不正是从他们光荣的前辈：从刘胡兰到向秀丽、董存瑞和雷锋那儿继承来的吗？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青年一代进行理想教育的时候，干吗一定要那么轻率地骂一声“动乱”或叹一声“浩劫”便万事大吉呢？

后来我便想起，很多年前读过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李锐的作品，还知道了他是水力专家，还知道他曾当过毛泽东的秘书，还知道在共产党云波诡谲的政治斗争中他因坚持正义而多次身陷困

境。于是我深深地把他记住了。我甚至还知道他喜欢游泳，有几次差点险遭水中不测……1990年代，我偶然去川中旧地遂宁，一家小书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唯一一本锐老的《庐山会议实录》让我眼前一亮。我读过苏晓康的《乌托邦奠》，印象犹深，尤其他写贺子珍秘密上庐山与毛约会被江青搅局，遂有次日毛大骂彭德怀之举——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领袖，让历史变得更加可信。再读锐老的会议纪实，丰富的、沉甸甸的现场史料和深刻精到的价值判断，其分量比之苏著，更高了一个大档次。那时我正在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供职，憋不住将新购的《实录》推荐给一位比我年轻许多的中国人大法学硕士，没想到他还书与我，竟看见他毫不客气在书页天头地角，密密麻麻批满感言，显然阅读时情有难抑，不吐不快了。记得其中一条最甚者，是：“XX皆可杀也！”足见书中所记的大恶、荒唐，让人何其愤懑！也许就因了这些“跟帖”，这本书很快又被其他年轻人借阅辗转，至今不知所止。真相的力量多么震撼！

至此我坚信，锐老已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些年近古稀的一代人，同时，也属于比我们年轻的、更年轻的一代人。

此后30余年，锐老的行踪和言论成了我和朋友们精神目光跟踪的轨迹。他和李慎之、谢韬、辛子陵、胡绩伟……一群“两头真”的勇者们的雅集和忧思，让人心驰神往。我们常常天真地渴望，中国如果多一些他们该多好！如果他们能长久地、健康地活下去，该多好！前不久，网上忽传锐老险遭死神暗算，我们几个校友顿时揪心不已，直到确认信息误传，方才豁然释。

虽然是一场虚惊，却让我们变得更加踏实了：未来不管发生什么，只要他们的书还在，他们的信念还在，他们伟岸的人格力量还在，我们国家总是有希望的。

2018年6月7日

李锐与三峡工程

戴晴

李锐一生，与浩浩长江、与江上“高猿长啸 清荣峻茂”（郦道元·水经注）的三峡、与体量灾难均堪称世界第一的三峡工程，有着怎样的一番情感，又是怎样几无一刻松懈的终生缠结啊！



1980年代李锐与戴晴在一次三峡讨论会上

1、

追溯起来，幼年时候嬉闹于湘江、少年时候惊诧于岳阳，还曾以一介青年学子之眼界，倾服于武昌汉口间辽阔江段……或许都算不上渊源。终于，仗打完了，他的党拿到政权——“毛主席上了龙庭，你我都是封疆大吏，”（语出谭震林）——这些，怕不是李锐之初心吧？加官进爵纸醉金迷，有如周边闹剧。进城之后，在这名张之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工科生看来，回返“科学技术报国”，才是中共要务。

他撇开自己文采上的长项，一头扎进大工业，扎进那年代即使对世界而言，也是十分新奇的水电。“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重视勘察”、“遵从客观规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地质、气象、水文、生物多样性……多少必须夯实的基础课！孙越崎、陆钦侃、黄万里、施嘉炆、李鹏鼎……环顾身边，多少民国英才！这些珍宝，绝不是用来当招幌乃至靶子、而是必须诚心求教的——李锐与他们成了终生益友；在他心里绘出的，不是执政党统战谋略，是一幅诚挚生动的同心携手建国图。

未料想，他遭遇的，竟是皇权转身之际的“后列宁时代”：主义当头拿天下而后，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者”，知识匮乏却权势无边。倾

扎权斗遍布朝野，处置技术问题，也是动辄挥舞阶级斗争大棒。

但钱在手里把着，总得干点什么……长江滚滚东流，利或灾？防洪、发电、航运？高坝、中坝、低坝？五十年代，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次公开争论在专业领域和主管部门间爆发。苏联老大哥给拉来仗势，配着大跃进的锣鼓，上万水库在全国大小河流一哄而上……即使在“反右”与“反右倾”还都没发生、即使政界学界还算清明、即使手边案头的技术性争辩……如若一心求真求实，也遭拦截——坏了人家阶级浪漫情怀，还是仕途？无奈之下，李锐工程技术上的驳诘，以杂文《大鱼网主义》刊登出（当然只能在副刊），但辗转传达的，竟是集中计划体制下一党一人断决之要害——当然，今天我们已然明了，这实在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梗阻：

生活中确实有人喜欢办大事情，热衷于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还有人把这提到理论的高度，说这种“大”癖是解决问题的“重点主义精神”。

到此，读者诸君也许愿意对比一下动辄千亿万亿的“两弹一星”、号称解救首都干涸的南水北调、以及地球级大梦“红旗河”、翼龙战机、“巨大中华”……锐公六十年前此文，是不是一语中的？

他或许已经感到，但没有明提——专制的政治体系、集权的计划经济，恰是这一风格（豪情）的基底。

时代在前进。

当苏联东欧开始挣脱列斯两魔，我们中国之伟大领袖，却有了越出国界，成为东亚、东南亚、亚非拉、第三世界、乃至“全球一片红”之主的念想。念想为战友怠慢——“反‘反冒进’”开场。

在噩梦般的南宁会议（1958）上，辅宰们惨遭主公揉搓。对搅扰他呼之欲出之美梦（“多快好省”）的战友，圣上不存丝毫怜悯。逞性之后，不知怎么，主上竟然接过了计委薄大人怯怯的进言，愿意听听在自己已然吟出“高峡出平湖”之后——那可是吃鱼、游泳、晤面神女而后的大悦喔——还有人说的“不”。

李锐被召到“总结一五，讨论二五和长远规划”的会议室——众大佬环伺亲聆。

那年，刚刚年届不惑，他态度开朗从容，冷静、清晰的表述外带图示，加上对党国大局的眼界和担当（或许与他湖南口音也有点关系），李锐对三峡工程不宜立即上马的谏言，竟然为领袖笑纳，破了为“大跃进开场”之成都会议诸项议案（除三峡工程而外）一一通过之记录。

主公当场一句“做我的兼职秘书”，李锐之人生，或许可说，先窜入峰巅，紧接着（不过一年多），堕入谷底：“反三峡、反水利、反火电”，外加“反党”。庐山会议与黑皮笔记本的故事，咱们另篇细说。

42岁，李同志被他的党一脚踢出——近乎20年的北大荒、磨子潭和秦城。62岁，他爬出死人堆，再回北京、再回水电领域（1979）。

2、

复职副部长，开手干的第一件事，居然是立令拆除镶嵌在部办公楼门厅整面墙上伟大领袖关于修建葛洲坝工程的语录——您老是“求真不惧抗上”死不悔改啊！

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

1970年12月26日

三峡主坝还没修，先兴建反调节坝；工开到一半，再修改设计——有这么玩儿的么？

按说，也不能全怪伟大领袖。77岁生日，对揣摩圣心者们缠磨不已的三峡替身工程批示几句，不过兴致所至。那些将此纶音立刻大肆张扬，演变成日后绝无可违之圣旨——“三峡工程”的钱小姐团队才是真正的推手：借助政治大局，让三峡工程成为再有理也反不掉的最高领袖决策。当然，接着照样玩儿的，已经是邓二、江三……

拆除领袖语录，小节目而已。回到水电部，再度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三峡工程论争。李锐发话，毫不含糊：

在泥沙淤积、堤岸侵蚀、山体滑坡、诱发地震、移民对环境影响等问题上，决不可以把话说得那么满。我同意生态环境专家马世骏的

判断：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我也与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怀有同感：三峡一带具有我国少有的亚热带气候，将数十万亩肥美良田与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淹没掉，是永远不能恢复的。以今天人类所具有的科学手段，没有人能预言这一改变长江水流状况的巨大工程，将如何引发整个流域生态环境资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连锁反应。

那年头，大家都怀着一股重整家园的心气儿，三峡工程上还是不上，陈、邓、胡、赵，都听过他的意见；由国家计委科委主持的论证，不仅没有排除反对意见，接下来的措置也都顺理成章。

长江与三峡，或许能保住？

历史之轨迹，有时真是十分吊诡：三峡，一个工程而已。掌舵大人物心里，还有更重的要事——“谁来接班？”三峡什么的，先放放啦，陈大人云把他安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干局长的位置——用他“选拔我们自己的人”——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就在他忙着组建第三梯队这几年，三峡工程上马之坎儿：“可行性论证”，落到非上不可派手中。这是一拨子很明白如何在“具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局面下如何精致利己的玩家——借“宁左勿右”的意识形态、借忽悠似懂非懂的权势、借面对开放争世界第一的心气儿、借无人为生态破坏痛心……

3、

八十年代中期，李锐被“逐出”中组部，安置“就位”于中顾委。而三峡工程上马之态势，已然波澜壮阔。长江，就要被拦腰截断了……

每想到国家这种局面，我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

李锐就是李锐。不打算“倚重”了么？好，那就退回本行，认真“顾”将起来——反对灾难性三峡工程，不踟蹰、不气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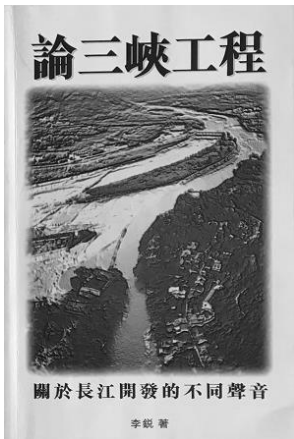
他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他力辨、再辩、“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他不厌其烦地为高层普及水电常识，给他们讲总理的故事，详述施工的种种难点，开列持不同意见专家名单……真真是惮烦死诸位当道。

三峡工程，李锐疾呼：

水库的运用，已造成长江上、中、下游发生了江水抢夺战（即如百姓所言：旱季蓄水，下游干得见底；雨季泄洪，下面冲得七荤八素），不仅中游防洪效能有限，还带来上游洪水与干旱，中下游船舶停驶。

出库清水不仅冲刷堤基，且影响河床基底，更令长江沿岸几大湖泊萎缩，而且库区沿岸因水位落差而形成面积世界第一的消落带——非常丑陋，正在酿造华中地区潜在生态、地质等危机。

水库蓄水之后，周边地区发生的天然气井喷、大震级地震、气候



变异明显增多，长江入海口消退与地面沉降正在威胁着超级大都市上海。

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一年后。他说，“要它停工，那时还来得及。”结果——顶层的话传下来：“不要搞串联”，要“服从大局”。

连“顾”都不许了。留给李锐的，只剩下总结自己对党、对家国、对民族的赤诚：把半个世纪以来就三峡工程说过的话，结集出版：

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工程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已经反复说过了，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

4、

李锐是“世纪三峡论争”的关键人物。作为共产党员李锐，其一生的经历与蹭蹬，与这一工程、还有这条惨遭蹂躏无语忍受的大江之命运，浑然一体。

在保卫三峡、保卫长江、保卫中国最为弱势，且岌岌可危的资源与环境上，李锐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至最后，在“关注地

球、关注人类生存、关注中国和长江”的“三峡工程 20 年研讨会”上，已届九五龄的李老，做开场致辞：

今天，关心三峡、关心长江、关心地球、关心中国人和全人类生存环境的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和工程师们，聚集在伯克利大学，讨论这个工程的利弊，令我这个九十五岁的老人感慨万千。

二十年前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有句很有名的影响全国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十年间，关于三峡工程，应该说，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的人，都有了比二十年前更多的认识，这个工程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究竟利在哪里、弊在哪里？是到了需要搞清楚的时候了。这不但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非常重要。

但非常不幸的是，三峡运行几年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当年我们的许多担忧一一变成了现实；更让人痛心的是，当初不曾清晰预料到——或者说，虽然有所预见，但没有料到如此不堪、如此危险的情景一个接一个出现了……

他说：三峡工程出现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绝非偶然。他谈起“非常关心三峡”的胡耀邦辞职之后送给他的几首诗；他说被迫下台的赵紫阳总书记也是反对建设三峡的。他说：三峡这一工程的出现，是中国集权的政治体制，与藐视科学、缺乏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结果。他说：“三峡和六四，是邓小平对中国欠下的两笔债”。

只因他生在共产党人以为自己可以改天换地的时候，只因他生在知识有限但权力无限的人比较恣睢的年代，只因他是共产党员、总以他惨遭灌输（却刻骨铭心遵从）的党性行事，只因他工科出身、对知识的尊崇超过对权势（包括今上）的依顺，只因他常怀丈夫的悲悯与士的家国情怀……共产党员李锐说：

心所谓危，不敢不言。

区区寸心，天人共鉴。

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2018年5月24日

我心目中的李锐局长

陆茂竹



2017年4月陆茂竹探访李锐贺其101寿辰

1952年9月我自天津大学水利系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央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办公地点座落在和平门内西交民巷胡同的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有个很旧的二层小楼，上下共十几间简陋的小屋是办公室；局长黄育贤（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水电处处长，留美的老一代专家），副局长张铁铮（革命老干部），有技术干部二三十人，参加一些小水电站的规划、设计、勘测工作；有老干部五六个人，负责秘书、人事和后勤事务；还有建国后在南京测绘短训班培养出来的五六十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担负着野外测量和描图等辅助工作。

11月1日新来的李锐局长正式上任，来到工程局的小院里上班。黄育贤调任总工程师，张铁铮副局长配合他工作，人事部门通知我做局长办公室的秘书。我感到很突然，也很胆怯，当时我21岁，刚出茅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秘书”，秘书该做些什么工作？也从来没有和“领导”接触过，有一种敬畏感。对李锐局长最初的印象是：身材英俊，两眼炯炯有神，说话精练、干脆利落，对人有时很温善，有时也很严厉，批评人时不讲情面，对工作认真细致，敢于承担责任，学习勤奋，自信心极强。我参加了一个月的俄语速成班学习后调回，在他的领导和亲手指导下工作了三年多时间，日日相处，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了他的精神魄力、工作才能和身上具备的优良品质。

他性格豪爽，敢说敢干，有远见，对国家、对水电事业一片忠心

当时的水电工程局是部内局，且名实不符，技术力量不足，没有施工组织，没有建筑、安装队伍，规模很小。从长远考虑无法保证完成今后水电建设的大任务。因此，组建机构搭大架子是他来到局后第一件最关键的任务。在原有人少力薄的水电基础上，他为筹建一个独

立、统管全国水电勘测、设计、施工队伍的综合机构竭尽心力，冲破了各种阻力，上下统一思想，提出多个方案进行比较，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 1953 年 6 月经中央财经委会批准建成为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下设计划、技术、勘测、设计、工程、施工机械化六个技术管理部门和供应、财务、人事、劳动工资、教育等七个行政管理部，另设有苏联专家工作室。全国各大区相应设立水电工程处，实现上下对口统一管理。随着水电站建设的日益增多和规划、勘测、设计、施工工作量的加大，相继成立了直属总局的建筑公司、机电安装公司；筹建了水电科学研究院，成立了北京、上海、长春、长沙、兰州、成都、广州、昆明八大水电勘测设计院及北京勘测设计总局。逐渐形成了整体的全国水电系统，水电队伍逐渐壮大，适应了水电建设发展形势的需要。

当时的燃料工业部包括煤、电、油三大部分，都有各自的工业局掌管业务，电业管理局内又分火电、水电两个部门，中央执行“以火电为主”的建设方针，人力、物力、财力，火电部门都能得到保证，而对于水电则重视不够，李锐曾戏称“水电不在话下”。他认为要充分利用中国特有的、清洁的、天然的、再生的水能资源，尽量减少煤耗和污染，必须综合开发水力资源，优先发展水电，加强水电基础建设和水电队伍的建设。为此，他到处呼吁呐喊，亲自动笔给毛主席，给中央领导写报告，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组织编辑出版《水力发电》期刊、举办水电展览会等等，大张旗鼓地宣传其重要性和普及水电知识。并多次向部领导汇报情况、反映意见，争取各方面给予支持。与此同时，他广泛揽集人才壮大队伍，组织开展规划、勘测、设计等水电站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他自己深入实际陪同苏联专家参与黄河、长江及一些中小河流的查勘，并着手进行河流规划工作。陪同领导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参观，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他为了中国水力发电建设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做出贡献。

他为人耿直，尊重知识爱惜人才，重视对水电建设人才的培养

他对上级领导敢于大胆发表意见，勇于据理争辩，主张一切从实

际出发，对当时火电、水电之间的安排，对水利和水电之间的矛盾都直言不讳，向上反映，1958年三峡问题的御前辩论即是一例，在毛主席面前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

他对下级严格要求，但在政治思想、生活上关怀备至。他要求干部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负责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特别对老专家、有经验的工程师异常尊重、信任，并虚心请教。对于工程技术上的难题，开会倾听众人意见，经认真研讨后才做决定。他充分发挥前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水电处留下来的黄育贤、张昌龄、陆钦侃、程学敏、胡福良等十几位老工程师的作用，让他们分别担任总工程师或计划、勘测、设计等处处长职务。他敢于大胆使用日本统治时期丰满水电站机电安装工程师于开泉，俄文翻译李名播；国民党时期玉门油矿的工程师郭可诤，并委以重任。令这些人奉献了自己的才能，使得建国初期的水电建设能顺利进行。他对老干部很信任也很爱护，和张铁铮副局长工作上配合默契，对资深年长的老同志如惠枫林大姐、涂国林同志非常尊重，有事先和他们商量。一些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分别担任了处、科级领导职务，主要做思想政治或行政管理工作，李锐要求他们积极钻研业务，在干中学会管理经济。并采取多种不同方式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和管理、技术水平，如选送局级的王景任、处级的韩晓洲到清华大学代培；保送吴华、成立良到人民大学速成中学补习文化后进入大学。从1955年开始连续三年共抽调60余名干部前往苏联学习进修，有计划的培养专业人才，其中有赵征、梁东初、袁定庵等领导干部，也有邹范湘、周玉崑、张德平等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学成后充实各单位都成为水电建设中的骨干。对于那一批短训班的小青年，大部分送进大学继续深造。除此之外，当时为扩大水电队伍，提高人员素质积极筹建自己的高等学院（西安动力学院）和中等专业学校（北京、杭州、成都、长春、武昌水电学校）及勘测、财会专业短训班，培养了一大批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毕业后投身水电建设，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做出了成绩。李锐到处招兵买马，只要听到哪儿有专业对口才学出众的人物，就千方百计地争取调来局里工作，他为壮大

水电队伍煞费苦心，也卓有成效。

他工作细致，认真负责，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李锐到任后首先是了解情况，着手翻阅第一个五年计划，熟悉规划中拟建水电站的说明材料；并找局内的一些部门负责人、工程师们研讨水电建设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机构的建立问题，广泛听取意见。随后深入基层，赴各工程工地考察，和各级领导、总工面谈，听取汇报。对于下属各大区工程局的建立，配备干部，都是共同研究的结果。他多次亲自登门拜访地方党政主管部门（财委、工业局、电管局等）领导，请求地方给予大力支援。

李锐刚上任不久，就遇到黄坛口水电工程由于勘测资料不全，造成大坝西侧因岩石破碎无法与山体连接事故问题，他抓住这个典型，组织召开全国水电勘测会议，强调水电基础工作，特别是地质工作的重要性。买来大批《一个伟大建设的开端》一书（书中记录苏联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勘测工作中的真人真事），分发给勘测设计人员阅读，号召学习苏联勘测人员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丈量七次再剪裁”的慎密、严肃而又大胆决断的科学精神，改进自己的工作，保证成果质量。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强调要保证“质量第一”的准则。

他谦虚好学，刻苦勤奋，知识广博学以致用

11月李锐上班的第一天就到资料室查看资料目录，借了《水利工程学》、《工程地质学》等几本书，想补充一些专业基础知识。12月初陆钦侃工程师跟他一起去华东、中南地区视察水电工程，筹建机构，在火车上请陆工讲授水电常识，学习水力学基本公式和原理。在局里讨论工程技术问题的会议上，大家的发言他认真听取并详细记录，弄不懂的问题不耻下问，刨根问底，直到清楚明白为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很快地熟悉了业务，发挥其领导才能。他还自学《水能利用》，为便于和苏联专家交流他学习俄语。1954年12月和刘澜波部长同去苏联参观访问三个月，他记下了3万多字的日记，内容丰富翔实，有行程，有实况，有苏联水电工程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有苏联专家的

谈话和建议等，还有自己的感想体会。是一本学习笔记，也是一本难得的史料。他看书效率极高，可达到一目十行，能提纲挈领抓住重点。而且记忆力很强。他写文章也极快，思路清晰，善于概括，几乎是出笔成章。他做报告从不写稿，只是在一张纸上写几条提纲，临场发挥，引经据典，语言精炼，有条理且生动，大家都爱听，觉得听后收获；特别是青年同志只愿意听他的报告。通过勤奋学习和实践，锻炼得他已成为一位专家了。

李锐局长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领导

当年李锐才 35 岁，有革命经验，有工作魄力，年轻有为。我在局长办公室工作期间，亲眼见到他不知疲倦地日理万机，有条不紊地处理一件件事务，批公文、看报告、写文章、听汇报，还接待来访，解决矛盾，谈话，开会，出差……掌管方针、政策、技术、管理、生活、人事……等等问题都经他主持研究拍板定案。他胸怀全局，落眼细微，是大家公认的新中国水力发电建设事业的开拓者。当然，建国前，黄育贤等老一辈水电先驱们艰辛地、默默地做了不少水电开发的前期工作，建成几座小水电站，但它已远远满足不了新形势下新兴工业发展的需要。建国后，是李锐局长带领大家广开思路，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艰辛创业，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水电建设事业各个方面都做出优异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在全国水电系统中他有极高的威望。

我当时年轻，刚出学校门，确实不知道怎样做秘书工作，是他亲自动手教出来的。他教我怎样写公文，怎样写报告，怎样整理档案便于查找。告诉我要及时整理会议记录，要每天写工作日志，他对我要求很严格，有时批评得非常严厉。1953 年初，我刚到局长室的第二天，我代抄一份材料，抄好后请他审阅，他看后问我：你学过标点符号吗？我说：我们学工科的，没学过。他严肃地说了一句：以后学点儿标点符号去。为此，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语法修辞》学了半年，感觉很有收获，对后来的工作大有益处。这件事我永远不忘。开始我帮助起草的文件，他修改得满篇红，我仔细复读，知道错在哪

里，改后再送阅，红色修改减少，反复几次后成文。就这样我不断总结改进，一点一滴地进步，在写作水平上得到提高。平日发生类似的事很多，他的耐心认真使我很感动，良师益友，我内心感激不尽。我不断观察他的工作方法，总想学上一点儿，经过努力只能学到一点点皮毛，因为那是他参加革命多年锤炼的成果，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我珍惜这三年美好时光，我有幸在李锐局长身边工作，让我受益匪浅。

1956年组织送我去苏联进修，离开了局长室，回来后调到水电科学研究院工作，没有机会再见面。1959年后，他历尽坎坷，顽强度日，体现了他光明磊落刚毅不屈的性格，1979年平反复出，前后二十年适值他中年鼎盛时期，却被隔离社会、停止工作，蕴藏深厚的才华不得发挥，是党和国家的很大损失。

2018年5月30日

探访新中国水电的奠基人——老部长李锐

张博庭

李南央同志：您好！

从李锐同志五十年代的秘书陆茂竹同志那里听说您在向友人们“约字”，要为您的父亲出一本“纪念文集”。很好，我非常支持。十年前拜访李部长，我曾写过一篇随笔《探访新中国水电的奠基人——老部长李锐》，现在发给您，您看可否采用？

谢谢！

水电学会张博庭



二〇一六年四月张博庭代表水电协会
探望李锐贺其百岁寿辰

曾经兼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是国内外公众都十分熟悉的人物。他的刚直不阿、才华横溢和一生追求真理、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品行是世人皆知的。但是，恐怕只有水电业内人士和一些十分熟悉李锐的同志，才知道李锐一生最钟爱的事业和最大贡献是开创了新中国的水电事业。

初次结识李锐是 1995 年在成都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在水电学会工作多年了，并荣幸地作为当年水电学会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在那次大会上当选为学会副秘书长。李锐老部长是我们水电学会当之无愧的创始

人，也是我们每次开会必请的重量级人物。李锐老部长也总会不负众望地带给我们精彩绝伦的演讲。记得那次会议发言的最后，才华横溢的李锐老部长用一首七言律诗作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们水电工作者的忧虑和无奈：

老去无穷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
呜呼大禹今何在？酸雨烟灰满地天。

十几年过后，2008年的四月十五日，我和从昆明赶来的水电老专家青长庚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李锐。作为水电界的后人，几乎每年的四月初我们都要去给水电界老前辈李锐祝寿。那年91岁高龄的李锐老部长突然患病住院，我们的祝寿也不得不推迟几天。尽管在病榻中，一谈起水电，李锐老就显得十分的兴奋，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他开创新中国水电事业的经过。

1948年沈阳解放后，李锐曾随陈云参观过丰满水电站，那时他就听说鸭绿江早建了大水电站。1952年，国家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李锐以自己上大学时读工科为由，坚决要求离开多年坐而论道的岗位，于这年秋天调到北京，分配在当时的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建设。这个部有部外的煤、电、油三个总局，水电则是一个部内局，不为人重视，实际受计划司管辖。李锐到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感觉到没有水电的机构不能适应水电发展，因此，他不怕人家议论“闹独立性”，坚持让水电成为燃料工业部下属的第四个总局——水力发电建设总局，这样就便于在全国范围内“呼风唤雨”地开发建设水电了。

当时，水电的技术力量是很有限的。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有个水电处，其中有一些在美、英留过学的工程师，抗战时在四川、云南、贵州历尽艰辛，修建过几座装机容量各几千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他们大部分留在总局，少部分在四川、福建和武汉几个地方水电单位工作。为发展新中国的水电，李锐局长在全国组建了8个水电勘测设计院、一个科学研究院和几所水电专业学校。为具体了解前苏联水电开发的经验教训，1954年到1955年间，李锐随燃料部派出的一个电力代表团去前苏联“取经”，访问了四个月。回来后，李锐在《水力发电》

月刊上发表了 5 万字的长文“苏联水力发电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当年新中国的水电人争取各种机会大力宣传水电的优越性，中国水力资源及其开发条件是世界第一，我国有能力做到多快好省地优先发展水电。经过极大的努力，“一五”期间我国就上马了新安江、刘家峡这样的大型水电站，而且新安江四年建成发电，投资同火电相当。

1958 年 1 月，中央南宁会议有过关于三峡上马的“御前辩论”，中央接受了李锐不上三峡的意见。李老趁此机会提出“水主火辅”的电力建设方针。随后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正式提出力争十年之内水电比重达到 50% 的目标。然而，令人永远遗憾的是，这种全社会正确认识水电、重视水电开发的局面，不过是李锐和当年中国水电人昙花一现的梦想。

1959 年发生的“庐山事件”，彻底地改变了李锐和中国水电的命运。由于李老被列入“彭德怀反党集团”，水电部也揪出了一个“李锐反党集团”。从总局领导到全国水电系统，受批斗、撤职等影响的有二百多人。这个“反党集团”的三项罪名是：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简称“三反分子”。整个水电事业蒙冤“三反”，新中国的水电事业被打入冷宫。“文革”十年，水电系统更成为全国受害最深的重灾区。从总局到科研、勘测设计、中专学校等，所有水电机构通通被“砸烂”、撤销（甚至连水电总局的全部资料都被烧掉了）。当时只有个别院所负责人顶住了“开除党籍”的威胁，侥幸保留下来。1979 年李锐复出，回京重新担任水电部负责水电的副部长。复职后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恢复所有被砸烂的水电机构，召回原来的工作人员。总算为我们国家今天的水电事业保留下来一些必要的“种子”。

1982 年 3 月，李锐按政策“到点下岗”，从水利电力部退休。随即被调入中组部担任青年干部局局长，为我国紧迫的政治体制改革选拔人才。然而，这却不能不算是我国水电事业的一大损失。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李锐的仕途也并不顺利。尽管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才华横溢、刚直不阿的李锐，总能在我国历次的政治斗争中坚定地

站在正确的一方。然而，至今很多人对李锐的评价仍然是毁誉参半。他用自己一生的执著和挫折经历所感悟出来的真理，往往不容易被普通人接受。这也难怪，从某种意义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不分场合的总说实话往往是不着人待见的。鲁迅先生讲述过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一家人生子，大家都来祝贺，有的说这孩子将来能当官，有的说这孩子长大能发财。这不过都是恭维、讨好主人的说法。只有一个人说“这孩子总有一天会死掉”才是大实话。的确，这就像李锐爱说的大实话，有时候听起来确实是让人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我们能放平心态，听听实话总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作为水电事业的后来人，我至今非常庆幸能从事水电这样一项造福中国、造福人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同时也为我能有幸结识到中国水电界里的一批有思想、有水平的时代精英感到骄傲。他们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淡薄名利、不惧强权的品格深深地感染了我，尽管这种影响难免让我在当今社会中时常感到诸多的不适应。但是，我仍然无怨无悔。尊重科学、不惧权威、追求真理，用自己的学识做一个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是我们新老水电人共同的追求。

探访李锐，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不过，毕竟与李锐老部长的年龄段和现实感触略有不同，我不由得把李老当年的诗句简单地改写一下，以便恰当表达我们当代水电人的心结。

改革开放遗恨篇，至今水电未优先。

妖魔大禹多矿难，酸雨碳气满地天。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和李锐老部长的水电心结一定会得到世人的理解。但愿那一天能早一点到来，不是为我们的事业，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为我们人类的未来。

中国水力发电奠基人—李锐

王作高

我是1953年9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前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的，局长是李锐。我们青年人很喜欢听李锐局长作报告，他每次在大会上作报告，一般三、四个小时，从来不拿讲稿，讲话内容丰富、生动，使人振奋，很受鼓舞，我们对他很钦佩。



2016年4月王作高随水电协会人员探望李锐贺其百岁寿辰

我是在水电总局设计处工作，和总局同在一个大楼里。当时我国的水力发电基础很薄弱，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下来的，规模很小，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水电站。那时在四川龙溪河支流上建了个桃花溪水电站，装机容量只有90千瓦，比现在农村的小型水电站还要小。

为了集中全国的水力发电力量，1954年，李锐将全国的水电勘测设计人员集中到北京，成立了北京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当时正在设计的有四川龙溪河狮子滩水电站、福建古田溪水电站、浙江黄坛口水电站、云南以礼河水电站以及江西上犹江水电站。当时我国水电科技人员不但很少，也没有实际经验，因此聘请了十多位前苏联水力发电专家，水力发电的形势一片大好，大家干劲十足，朝气蓬勃。之后总局决定以水电站为基地成立设计院；成都勘测设计院是以龙溪河狮子滩水电站设计组为骨干建立的；昆明勘测设计院是以以礼河水电站设计组为主体建立的；上海勘测设计院则是以浙江黄坛口和新安江水电站的技术力量为基础成立的。到1957年，全国一共成立了八个水电勘测设计院，当时称为八大设计院。设计是离不开科研的，当时水电总局在北京东郊有一个小小的试验室，只有几十个人，显然不适合水电的发展，李锐在北京木樨地要了一块比较大的地皮，建立水电科学院，购置了不少设备，调集了不少科研人员，就是现在的木樨地北京

水利水电科学院的前身。李锐还决定在中国进行水电资源普查和河流规划。仅仅三年的时间，水力发电的发展速度惊人，为我国水力发电打下了基础，他是我国水力发电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有人攻击李锐“好大喜功”，我觉得这种务实且具前瞻性的开拓实在是功莫大焉。

1954年四川狮子滩和浙江黄坛口两个水电站相继开工，由于在设计中，设计人员对水电站地基地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出了大问题。四川狮子滩水电站是我国解放初期最大的水电站，项目齐全。该水电站溢洪道的闸门段是小型重力坝，设计人员按照土木工程师手册，混凝土与岩石的摩擦系数定为0.6，因此坝首断面比较小，当开挖出来以后，发现有软弱夹层，但是并未引起设计者的重视，张光斗先生去发现了这个重大问题，后来软弱夹层的摩擦系数只有0.18，设计不得不大返工，进行修改。浙江黄坛口水电站亦有类似的问题。由于设计人员对水电站地质这样的基础资料认识不足，对工程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李锐局长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在大会上说，今年是水电站的地质年，摩擦年，过去设计人员不懂水电站基础地质的重要性，现在设计人员要抓第一手资料，学习地质。从此以后每一个水电站设计人员都深入勘测工地，了解地质，学习地质，设计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大大改变了设计队伍的面貌。

李锐局长重视年青人的培训培养，重用和提拔，刚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年青人就提拔到领导岗位，并分期分批赴前苏联学习，回国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锐本人并不是学水利的，通过工作学习，对水力发电专业渐渐变得很内行，成为水电规划方面的专家。我在前苏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实习的时候，1961年元旦晚上，地质专家那廖托夫请我吃饭，他在北京水电设计院当过地质专家，我们在国内就认识。在吃饭时我们谈到李锐，他说：你们批判李锐是不对的，我们认为（他这里指我们是当时在北京设计院的十几个专家）李锐是真正的水电专家，他懂河流规划。我说：人家说李锐反对大跃进。那廖托夫说：李锐没有反对大跃进，他不同意随便破除规程规范，水电是一门科学，不能乱来的，随便破除规程规范要出大问题的。不出所料，以后在水电工程建设中出了不少问题。那廖托夫是前苏联有名的地质专

家，他当过红军，他把他当红军时的相片给我看了，他还作过驻英国参赞，英文很好，后来又学地质，成为有名的地质专家。

前水电部长刘澜波在“文革”中，下放到了陕西，回北京后，因为心脏不好，住在阜外医院治病，柴树藩的儿子柴永年约我同去医院看他，柴、刘两家关系很好。我们和刘澜波部长聊了三个多小时，说到水电设计院被解散了，下放到工程局。刘澜波说这是不对的，一个机构的成立不容易，搞垮很容易，他跟我们谈了北京东郊水电学校成立的艰难经过。他说如果他在就不会这样办，先把人员都放下去嘛，不动户口，这样就不会伤筋动骨，到情况稳定了再说嘛！他又问李锐现在在哪里？我们说：听说在磨子坛水库教书。他说主持处理李锐的是李葆华，水利电力部合并，李葆华是水利部来的，我和李锐是电力部的，我不便于多说话。有一天，李葆华的善心发了，说庐山会议的主要几个人彭、黄、张、周都没有作组织处理，看来对李锐处理太重了，准备给李锐恢复党籍。后来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就拖下来了。刘部长说，李锐对水电是有贡献的，反党说不上，只不过骄傲一些！

李锐副部长恢复工作以后又重新组织和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了的设计院，虽然费了很大的劲，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是不容易的，人员散了，机构散了，特别是原来的北京的勘测设计院，技术队伍强大，做过很多大型工程，经验丰富，同行的人都为之可惜。

我离开水电系统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忘不了在李锐局长领导下工作的那几年，写了这篇短文，表达我对他的尊重和爱戴。

2018年6月3日

劈山斩水此生缘

程真

我的父亲程学敏是李锐伯伯的老同事、老朋友，又同庚同月，都是1917年4月生人。李伯伯生于4月13日，我父亲晚他一天，生于4月14日。1997年，李伯伯题写了一首诗送给父亲，同贺80岁生日：



1995年李锐与程学敏在水电协会新春茶话会上

髦日同临早几天，劈山斩水此生缘。
难忘六舖炕年月，三代相交道义传。

父亲是水电工程师，1953年水电总局成立后，在“难忘的六舖炕年月”一直和李伯伯共事。李伯伯一向尊重老科技人员，与一批工程师结下深厚友谊。1958年李伯伯面见毛泽东，与林一山争论三峡工程上马的利弊，就使用了父亲准备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1958年2、3月间，父亲随李伯伯一同陪周恩来乘江轮考察三峡大坝坝址三斗坪。

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劳改、软禁、关进监狱，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重回水利电力部。他到京后，立即把父亲从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调回北京。刚回京时，没有住房，父亲和李锐同住六部口水电部招待所。20年后老友重聚恍如隔世，虽已年逾六十，却都壮心不已。遂重操旧业，共议水电发展大计。1995年父亲出版《程学敏水电论文选集》，李伯伯题写书名，并撰写序言。

我的姐姐程平和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是女十中的同学、好友；我和南央的先生巴悌忠又是四中的同班同学、好友；两家的儿女小时常在一起玩。上世纪70年代末，李南央为父亲平反复出四方奔走，如今又

为整理收集李伯伯的日记和文字竭尽心力，我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帮忙做了些扫描复印的工作；于是就有了诗中的“三代相交道义传”。

父辈的友谊到我们这一代更加深厚，他们的理想和信念需要用心去传承。

2018年5月28日



1958年初李锐李锐（后排左二），程学敏（后排左四）陪同周恩来考察三峡坝址

李锐二三事

于善浦

李锐是我在北大荒结识的好友，他大我十八岁。他称我“小于”，我称他“老头儿”。我俩住在一个房间，相处了八个月，“同是天涯沦落人，情深似海”。



1984年李锐游东陵与于善浦合影

出于好奇心，初识李锐

听人们传言，在虎林西岗八五零农场大楼南侧的商店前，有一小片农贸小市场，在摆地摊的人群中，居然有一位国家的部长，八级干部在卖菜籽。观看这个“西洋景”，大有人在。出于好奇，我也跑去观看。李锐身材魁伟，头戴一顶罗松帽，上身穿一件灰布对襟袄，下身棉裤腿扎着腿带，两手揣在袖筒里，穿着棉胶鞋的双脚不停地在跺脚。地面摆放着一个个布袋，和一排瓷酒盅。只见他明亮有神的眼神，给人感到十分和蔼可亲。这可是古往今来最高级别的售货员啊。

出于同情心，近交李锐

庐山会议后，李锐被发配到“北大荒”开始在虎林国营八五零农场的兴华村劳动，后来调到虎林西岗八五零农场场部所在地，临时住在齿轮厂，后来又搬到日本时期关东军司令部门卫的休息室。我去办公室办事，需先从他门前经过，再上木楼梯。他这间住屋只有六平米，从南门进屋，北面有两扇窗户，西面砖墙下，放一张床，东面木板墙外是过往的通道。木床与木板墙之间约一米宽。遇到下雨天，屋顶漏水，除了床面不湿，地面则是一汪水。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我也没向行政科请示，就帮他搬到我的楼上去，我俩就成了一家人了。

出于共同爱好，深交李锐

我开始在宣传科美工组工作，与画家尹瘦石、杨角、张晓菲一道工作，后来在文教科文工团搞美术工作。

李锐喜爱书画，我给他画了一张像，他很喜欢，张挂在墙上。他给我写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当时八五零职工医院要写个牌匾。我就请李锐书写了“职工医院”四个大字，可是送给医院之后，就石沉大海无消息了。我当时业余还兼管八五零农场图书馆工作，李锐很爱看书，经常在那里借阅图书。当我在整理图书中，看到了李锐早年的著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更加敬重李锐了。

李锐爱好广泛，他喜欢摄影，也常给我看他家里的照片，他也讲他爱他的儿子苗苗，还有些家庭矛盾的事，我也不懂。我常到分厂出差，他就看家。相处八个月，情长谊深。星期天我俩沿着穆棱河与农民聊天，也广交了一些朋友。邮局朝鲜族女子李娜，常给我们送朝鲜泡菜，党校的苏庆珍，也常给我们送乱炖（茄子、豆角、土豆）度过了饥饿阶段。可惜那时的照片及信件，都毁于“文革”时期。

经年累月，更加崇敬李锐

1979年我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落实政策，在医院里见到了李锐，他还是那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落实政策时，我到木樨地家中，他和他的女儿李南央都帮了不少忙。他送我《龙胆紫集》，那是他在秦城监狱里用紫药水在书缝里写下的革命往事。李锐曾两次到清东陵，第一次是1979年12月2日他在水利电力部，视察引滦工程时，顺便到清东陵参观；第二次是他在组织部时，国庆节休假期间，全家来参观清东陵，在我家吃午饭，也十分亲切。

1989年木樨地是重灾区，只能用电话问候，得知平安，也就放心了。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1998年写《党内有个李锐》时，我尽全力写了李锐在北大荒的往事。2014年2月4日，儿子开车，我们一家三口到木樨地看望李锐。他已是接近百岁的老人，还是忧国忧民，精神矍

铄，更加令人敬佩。

2018年5月听到李锐身体欠佳，想去探望，他家中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没有家人的应允，也无法前往探视。李锐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

2018年5月25日

与李老的一次通信

张光渝



1959年庐山会议神仙会期间李锐同与会者游庐山合影（左起：张霖之、廖鲁言、吕正操、韩哲一、余秋里、李锐、吴芝圃）

2002年，我与李锐前辈有过一次通信交往。事出李老所著《庐山会议实录》的一段话。

《庐山会议实录》详细记述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是披露那场重大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材料。在叙述了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被定性为“反党事件”，会议开始群起揭发李锐的“反党罪行”后，李老话锋一转，写道：

回忆起来，也有使我至今感动的事情。还在会议初期，一次同工业各部部长游山，大概是在植物园，大家谈到农村的一些困难情况时，我冒了一句“中国的农民好”，意思是要是在东欧，早闹事了。走在旁边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听到了这话，没有作声。到小组会斗

争我的高潮中，他将这话悄悄地告诉了刘澜波，却没有在会上揭发，显然是有意包庇。这位保护过我的同志后来于“文革”中惨死。前述回忆刘澜波的文章，其中也写到了这件事。（《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一版，第 265 页）

这段内容中所提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就是我父亲。2002 年前后，我正在搜集整理父亲的有关史料，准备为他老人家写传记。看到李老的书，我很想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况，也想从他那里知道更多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于是，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草稿托人带给他，征询意见，听取指教。

2002 年 8 月，李老很快亲笔给我写了回信。这封信我至今悉心保存着，全文如下：

光渝同志：

文章粗读一遍，觉得很好，材料利用恰当，很多细节最能说明人的性格与为人。

庐山部分，提不出意见。我同你的父亲并无交往，当年只是在会议中碰面。我之所以要用“有意包庇”四字，乃针对当年变脸揭发我的人有感也。

第十章（我标了页码）有几处订正增补，请考虑：

P4. 12 行——他们都是电力部的（注：原文是“水利部”）；

P4. 14 行——“下放劳动”前加“开除党籍”四字；

P4. 15 行——快半个多月（注：原文是快一个月）；

P5. 7 行——把已逃避了的该说的话（注：原文没有“已逃避了的”）。

在庐山的同你父亲在一起的照片，能不能寄我一张？

丁东同志看了大作，拟向《老照片》做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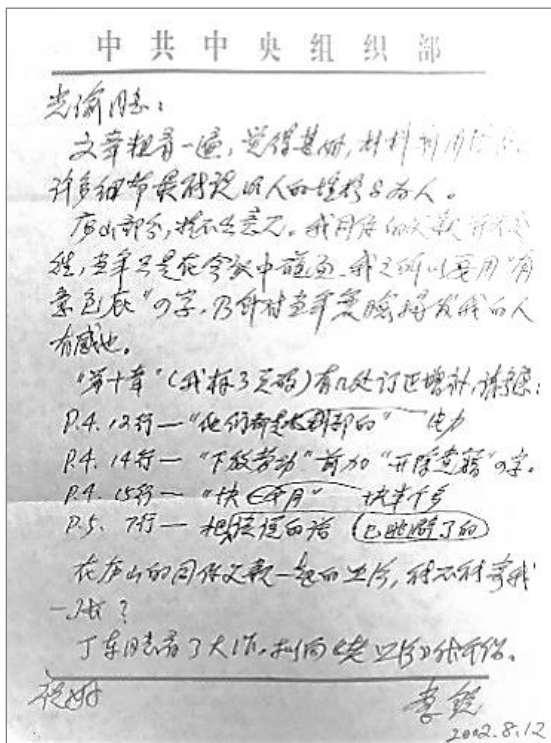
祝好。

李锐

2002. 8. 12

这封只有一页纸的信，在我看来，却包含了极为关键的信息：

首先，李老再次确认了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有意包庇”他的史实。其次，虽然我父亲已故，但此事的旁证是水电部的刘澜波（他曾是电力部部长，1958年水利、电力合并后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是傅作义）。



电力和煤炭是两大能源部门，我父亲和刘澜波的关系很好，是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他把这话私下讲给刘听，说明他知道此话的利害关系，但却不认为这是“反党”的证据，而且相信刘澜波也不会去揭发。李锐在回忆刘澜波的文章中提到刘知道此事，是文革结束后两人再次相见时，刘澜波告诉李锐的（李锐庐山会议时是水电部副部长，还兼任毛泽东的秘书）。

这是一个完整的链

条。

最后，李老特别对“有意包庇”四字的针对性作了解释。我父亲与他在会议前素无交往，在会议揭发批斗的高潮中却并未落井下石。实际上，“变脸揭发”李锐的人，肯定是他的熟人甚至好友，否则无从“变脸”。作为晚辈，我想，大概正是因为有“熟人”和“朋友”的关系，那些人才主动或被迫“变脸”吧。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李老逐字逐句为我修改文章，并标明页码和行数。那时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虽然我没有从李老那里得到关于我父亲的其他史料，但这封回信无疑是对我写作父亲传记的巨大鼓舞。经李老等人的推介，也使我的一些文章有机会在《老照片》等杂志陆

续发表。

李老在回信中提到的他和我父亲在庐山上的合影，是我家在文革浩劫中侥幸保存下来的历史照片之一。那张照片正是一张庐山游山照，我父亲胸前还挂着一个相机。照片上从左至右排列的七个人是：张霖之、廖鲁言（农业部长）、吕正操（铁道部部长）、韩哲一（华东局书记）、余秋里（石油部部长）、李锐、吴芝圃（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不知道李锐前辈所说那次“游山”的“闲谈”是不是发生在这一次？我把照片复制送给了李老。这是一件很令我欣慰的事情。

2018年5月25日

李锐病中探望记

盛禹九



2018年4月18日上午10点，北京医院西门。一辆

“红旗”牌轿车在我面前停住。车门打开，我和陪伴的儿子进入车内，见到一年不见的“小妹”李南央。南央告诉我：“我去长沙了。飞机晚点，昨晚两点才到北京。这次来京近二十天，看到爸爸情况好转，我准备后天回美国。”

轿车进入大院内。这是北京医院的高干医疗处所，里面戒备森严。我们经过几道关口，坐电梯来到李老病房，护士正在换药。我和儿子在客房里静候约10分钟，才进入病房。

这是一间近30平米的大病房，里面布置简洁，医疗设备齐全。朝南一侧，是几乎落地的玻璃门窗，室内灯光明亮。玻璃窗外，是陪护家属的起居室，也十分宽敞。李老躺在两边有着护栏的病床上。他面带笑容，看着我走近他的床前。

“还记得我吗？”我和老人相见握手，寒暄提问。

“你哟，有个‘九’字。”开始，老人记忆有点模糊，陡然，记起来了，小声地说：“盛禹九。”

这稍有戏剧性的变化，我看到，旁边的南央笑了。

“对，盛禹九。老人家记忆力真不错。”我夸奖李老。

“我当然记得你。我们两个人哪，是一致的。”老人慢条斯理地说着，后一句话，他加重语气，又重说一遍。

老人说“一致的”，这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没有去想。事后仔细琢磨，大概是指两人的经历，生活轨迹大体“一致”的意思。

记得老人在为我文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同我的情况相似：禹九同志于四十年代中后期在学校从事学生运动，时代大潮中参加革命。他曾长期从事报刊宣传工作，努力作“驯服工具”；可在许多可怕的事实面前，又止不住思考，结果因思考而受

难……

这次，老人又特意对旁边的家人南央和满起，介绍了我的一段经历：“盛禹九在武大参加学生运动，（在‘六·一惨案’中）差一点被国民党军警开枪打死了。”是的，和李老一样，我也经历过“九死一生”。当然，我的经历和老人的一生功绩和磨难相比，是无法仰望其项背的。

接着，我对老人说：“还记得吗？一个多月以前，我在您家里做客，当时您的身体蛮好，头脑十分清醒。我问您，今年过不过生日。您说，想等到‘茶寿’（一百零八岁），正式过一下。这次您病了。我很想来看您，但不敢早来。因为当时看望您的人很多，您很忙。只是在您生日的那天，给南央打了个电话，向您祝寿。刚好她在医院里。我相信：好人一生平安。您一定能好起来……”

之后，我告诉李老一件事：“中央党校的教授杜光同志给我来电话，想来看望您，并感谢您。因为您几次出席党代会，在写给中央的信中，附有杜光写的文章材料。再过十几天，就是杜光的九十寿辰，他邀请我出席他的寿筵。您老人家能否表示一下祝贺之意。”

老人欣然同意。于是，经我和南央一同商量好、在老人的新作《李锐期颐集》一书的扉页上，写上如下的贺词：

贺杜光同志寿诞欣逢鲐背（按：“鲐背之年”，即九十岁）尚望期颐。——李锐 2018年4月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病房条件，我们决定，只让老人亲自书写最后的签名和年月。南央和我边协助边看，老人在病榻上写字，和平时一样，字体仍然端正遒劲，又一次地表现了其强大生命力！

亲眼见到老人正在逐渐恢复健康，这颗久悬的心终于落下了。

2018年4月20日深夜



李锐与周有光的道义之交

韩磊

李锐与周有光是2009年相识的，那一年，李锐93岁，周有光104岁。两位老人的相识缘于周老的一封信。



左起：李锐、周有光、蒋彦永、周晓平、韩磊

2009年8月的一天

上午，我到李锐家串门，老人正在书房伏案写东西。见我来了，招呼说：“来，给你看一份材料。”我接过来看，原来是周有光寄给李锐的一封信——先寄给《炎黄春秋》杂志社转给李锐的。

这封信用圆珠笔写在横线信纸上，说的是让周老深为忧虑的一件事。他在信中说，当下中国的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因为课业负担太重，体育活动不够，睡眠严重不足，长此以往，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极为不利，希望有关部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信写好后，周老不知道该寄给哪位领导人还是哪个部门，因此就给李锐写了另外一封信，请李锐代为转呈。

我看完信，对李老说：“周老反映的是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恐怕不太好解决。”李老叹了一口气，说“是啊！”然后问我：“周有光你知道吗？”我说：“当然知道，周有光是个大学者，是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就是周老他们几个人搞出来的。”我继续说：“沈从文是周有光的连襟，他们的夫人是亲姐妹。”听我说了这些，李老提高声音笑着对我说：“哦，你比我厉害，我对周有光不熟悉，这些我都不知道。”

接着，李老问我：“你觉得周老这封信转给什么人比较合适？”我说“应该转给教育部吧？”李老沉默了十来秒钟，说：“这种事恐怕教育部一家解决不好，我转给温家宝，请他出面来协调吧。”

李老说干就干，提笔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短信，也就四五行字。连同周老的信，装在一个大信封里，说下午就让秘书发出去。

等李老忙完了这些，我对他说：“周有光是我非常喜欢的大学者，我准备近期去看看老人，顺便把信的事儿也给周老说说，告诉他您已经把信转出去了。”李老听我这么说，很高兴，说：“好啊、好啊，那你代我向周老问好。另外，我送两本书给周老，你也一块带去。”说着，李老找到手头自己的两本书，一本《龙胆紫集》，一本《何时宪政大开张》，题了签，交给我。

8月29日上午，我带着放暑假的儿子，一起登门拜访了周老，告诉老人，他的信李老已经转给了温家宝。并向他转达李老的问候，将李老送的两本书给了他。那天，周老精神甚好，兴致很高，和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使我们爷俩如沐春风。

老人告诉我，因为听力不太好，他现在基本不看电视了，但是报纸、杂志每天都看。“《参考消息》不错，我每天都看；《新京报》到得最早，早上6点就到了，我一起床就能看到；《炎黄春秋》敢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别的报纸、杂志发不出来的文章，它能发，了不起！”老人如此这般地向我介绍着他日常看的报刊，继续说，“香港、外国有我好多朋友、亲戚，他们每周都给我寄东西，所以我这里外国的报刊、书籍也看不完。”

临走，周老各送了两本他新近出的书给李老和我，一本《周有光百岁新稿》，一本《语文闲谈》。

9月24日，我接到李老的电话，说第二天周老要到他家去，如果我有兴趣可以到家里来听一听。李老在电话里说，是蒋彦永医生牵的线，“周老比我年长好多，要看也应该我去看他”，但周老说自己住的楼没有电梯，不忍心让李老爬楼梯，家里地方也太小，因此还是坚持来看李老。

25日一大早我就到了李老家。周老未到之前，李老和我聊天说：“我花了几天看了你带来的周老的书，没有看完，看了大部分。周老真了不起！”顿了顿，他接着说：“周有光在欧洲、美国留过学，受西方的影响大，眼界开阔，很厉害。”

9月25日上午9点半，104岁的周有光在蒋彦永和儿子周晓平的陪同下，坐轮椅来到李锐家。李锐迎到门口，弯腰与周老双手紧握，蒋

大夫说：“两位这么亲热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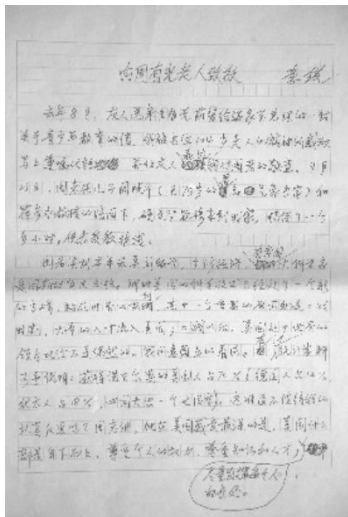
落座后，周老指着儿子周晓平说：“我耳朵不灵，带了翻译。”李锐说：“周老比我大十一岁，我现在只有一米七多一点，周老二米二，比我高两个脑袋。他的为人，他的思想都比我厉害。”两位老人风趣幽默的话把现场的人都逗乐了。

周有光对李锐说：“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是一个小范围的专业工作者，你是做大事情的，我做的都是雕虫小技。”李锐接着周老的话说：“但是你有政治眼光、历史眼光，你是站在世界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的。”

这一次难得的百岁智者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两位老人就政治、经济、文化许多领域的话题进行了交流。李锐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几千年都没有，现在也没有完全好转。”周老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周老则讲了几个故事，其中之一是，克林顿当年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男孩子在电视上见过克林顿，就说我认识你，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就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周老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明，“三纲五常”的传统，居高临下，大家养成了眼睛向上的习惯，凡事都要有领导，尤其一把手说了算，大搞个人崇拜，

这就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民主和科学的理性原则了。与周有光会面不久，李锐动手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周有光的敬意，标题就叫《向周有光老人致敬》。但老人对这篇文章一直不太满意，迟迟没有出手。后来，李老交代我把9月25日两人的谈话整理出来，他参考这份珍贵的谈话记录，又将原文扩充了近2000字，在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出来，题目是《向周有光老人学习》。2012



年，周有光的常州同乡范炎培编著了《周有光年谱》一书，将李锐此文用在书中，作为代序言。2013年1月，李锐因病住进北京医院。1月27日，我带着范炎培先生第一时间寄给我的新书《周有光年谱》到医院探望李老，李老靠在病床上看了此书好久，末了，还把我的书“扣”了下来，说他要好好看看，并交代秘书薛京“再到书店买5本”，他要送人。

2009年9月25日周有光登门拜访李锐，是周有光百岁以后唯一的一次登门拜访。好长一段时间，李锐一直为此事惴惴不安，念叨着要找机会回访一次。一来向周老表达敬意，更主要是想和周老作进一步的交流。

两位老人初次见面整整10个月后，2010年7月25日，李锐在蒋彦永医生和我的陪同下，来到东城区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紧抓楼梯扶手，慢步走上三楼，拜会了周老。两位老人在周有光9平米的小书房里，围坐在一张漆已几乎掉光的简陋木桌两边，谈了70分钟。



2010年7月25日李锐拜访周有光在书房交谈

之后，李锐与周有光没有再单独见过面，但每有新书问世，他们总会第一时间送给对方。在《炎黄春秋》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上，



两位老人多次见面，总是坐在一起，并且每一次都有精彩发言。按照长者优先的原则，每一次都是周有光第一个发言，李锐第二个发言。他们两位的每一次发言，都引起现场的

轰动和热捧。

在李锐与周有光交往的六、七年时间里，还有一桩佳话可以一说。周有光原来供职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作为顶级专家，周老原本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后来机构改革，国家语委并入教育部，周老的医疗待遇中断了。2012年冬天，他身体不适，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邀请他到自己供职的医院检查身体。10年前，蒋大夫勇敢地向国际媒体披露 SARS 在中国蔓延的真相，拯救苍生，誉满世界。但301医院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病人不是副部级以上不能进高级病房。为此，蒋大夫找李锐商量办法。

2013年1月，李锐因腿部血栓住院治疗。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到医院看望李锐，李锐对沈跃跃谈起周有光住院受阻一事，发脾气说：“周有光100多岁的老人了，对国家贡献这么大，是我们的国宝，国家就不能让老人得到更好一点的治疗吗？”沈跃跃劝李锐不要生气，当场表示：“这件事交给我了，我来办！”后来，李锐还是放心不下，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信，希望他能亲自过问，尽快解决周老的医疗待遇问题。2月4日，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携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到周有光家登门拜访，补发了医疗证，使周老于2月16日进入301医院高级病房就诊。

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央新春团拜会上，李锐见到了即将卸任的温家宝总理，温家宝告诉他信收到了，很高兴。蒋大夫得知此事，又给温家宝写信，建议他看望周有光。温家宝收信后，叫上教育部长陪同，于2月22日到301医院看望了周有光老人。

著名学者刘再复曾评论周有光说：“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我想，这话用在李锐身上，也是一样的。

2013年春节前夕，我到周老家拜年，老人说：“锐老的文章我差不多每一篇都读过，锐老的观点我几乎都赞成，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而李锐则认为，周有光以100多岁的高龄经常发表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创造了跨世纪的传奇。周有光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

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李锐对此深有感慨地说，真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李锐说，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三大垄断，我们有过讲假话、空话、大话的历史，最后导致十年“文革”，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也背离了探求真理的精神。改革开放使我们有机会向真理靠近，但问题还在要彻底解决这三个垄断，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在度过112岁生日的第二天与世长辞。今年3月30日，102岁的李锐因病住院，至今缠绵于病榻之上。

风走云飞，巨木枯萎。当下虽然是盛夏，但我脑海中出现的，却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肃杀。

诗人、杂文家邵燕祥盛赞李锐和周有光都是智、仁、勇三者兼具的长者。学者丁东则称李锐和周有光是当代中国重量级的思想家，而且是思想前沿的独立发光体和灵魂人物。他们像一团熊熊的火，一直燃烧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这个世界持续带来光和热。

2018年5月29日晨

终稿

记一次研讨会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对李锐先生敬佩已久，但接触有限，印象颇深的是在《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一书的出版研讨会上李锐老的发言。

由户县农民杨伟名写于 1962 年的一封名为《当前形势怀感》的信，以忧国忧民之情怀分析了当时的农村经济形势并探寻国计民生的出路，体现了一位农民思想家的智慧与胸襟。然而这封逐级递送至中共中央的信却遭到毛泽东严厉指责，致使作者杨伟名遭遇厄运，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2004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一叶知秋》为名出版了这封长信，也收录了杨伟名寄出的几篇文章和他后来的检查，同时收录了一些研究者的纪念文章。

在为该书举行的小型研讨会上，李锐老提出：**今日中国需要探讨的是如何不再出毛泽东的问题**。有如天问，振聋发聩；至今仍在耳畔回响，仍在脑海萦绕。

2018 年 5 月 22 日

李锐老为我题书名

王晓林

2014年末，我用去6年时间撰写的《顾准和他的时代》将近杀青，著名旅美画家李斌先生专门为此书新作了油画《顾准·1974》。在李斌的画室里，

我看到一幅未完成的人物肖像画——《李锐》，完全是我心目中的“那一个”——那位多年来崇敬有加的老人。画中人一双睿智而犀利的眼睛，令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顿时，在成书过程中阅读过的文字里，李锐老那篇纪念顾准的文章——《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浮现脑海，我当即决定要请老人为我的书题写书名。“李锐”——一个完全可以与“顾准”比肩而立的字，李锐——一位完全能和顾准比肩而立的、中国少有的男子汉。我担心的，倒是自己这本书配不配得上这两个名字，这两个大写的人。

顧准和他的時代
九十九變
李銳

那年恰是顾准逝世40周年祭年，接着的2015年又是他100周年诞辰，可偌大一个中国却无一处能对这位被西方学者称作“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界稍稍像点样子的”、被本土知识界众口一词称作“为中国读书人挣回了些许尊严”的人物作个小小的祭奠和纪念。忘却了他，这个国家、这个族群情何以堪？于是由最早探索和研究顾准的六位思想界知名学者发出了如下倡议信：

XXX先生，您好！

今年7月1日是顾准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画家李斌先生为此创作了油画《顾准·1974》，王晓林即将出版的新书《顾准和他的时代》将首次刊用。一个没有纪念的民族如同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顾准不应该被遗忘。我们倡议以我们大家的名义将此画捐赠给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校史展览室。偌大中国，也就只有立信——顾准12岁从那里开始展露天分——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在纪念他。如果您同意这一倡议，允许

将来这幅油画下方的铜牌上镌刻出您的名字，只需回复“同意”二字即可。

祝平安、健康。

我把这一倡议信同时传给了近四十位学者，上至 110 岁高龄的老人，近 60 万字的《顾准和他的时代》假如没有他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是无法想象能写得出来的；下至 70 后年轻人，这位可畏后生，顾准死去时她还没有出生，却在 2009 年写下了《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文章，直至今天还被许多年轻人口传心记。倡议信得到了绝大多数收信人的回应。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学界赫赫扬扬，许多人的回信除了“同意”还写来了十分感人的文字。李锐老紧排在有光老后面是第二名，请他题写书名简直就是天经地义。

其实李锐老的住所我十分熟悉。作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30 多年的志愿者，我常去长安街畔的复外大街 22 号楼——一栋承载着无数中国故事的、不起眼的居民楼，那里有孙冶方先生故居，也是我唯一一次见过孙先生的地方。当年借过他一本音乐导读小书，至今未还给他老人家，有点无赖，却成为今天我的珍藏。孙家对门就是李家，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一样的人生，一样的经历——求真、革命、奋斗、延安整风、进城、工作、抗争、劳改、坐牢、走进新时期……历经磨难几十年，1979 年两家又一起搬进这栋大楼，但可惜我一次也没有敲开过 212 孙家对面的大门。1982 年孙老去世，李老比他的孙老哥年轻 9 岁，眼下也已近百岁。李斌所画《李锐》就是他为老人期颐华诞准备的贺礼。

我的父亲和李老是武汉大学校友，低老人大约十届。他谈到李锐，常把李老那句“功高盖世，罪恶滔天”的著名点评挂在嘴边，并作为他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父女常为此起争，但并未妨碍那天我敲开 212 的大门。

冬日阳光中，老人好精神啊，简直和李斌画中人一模一样，甚至更神气。我真的没想到一位百岁老人竟能有这般的精、气、神。我告诉他我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多年的志愿者，写过一本他和他的亲哥哥、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薛明剑的书——《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

子星》。顿时老人和我之间的距离感就消失了。但让我吃惊的是，刚刚提到“顾准”二字，老人就激动异常，双目圆睁，两手拍打着沙发扶手，一边拍一边大声说：“他才比我年长两岁，是1915年的人，死得太早，太早，太可惜了！”

忍住快要忍不住的眼泪，我赶紧按住老人肩膀，请他安静下来，缓缓把我请他题写书名的意图表达出来。

即无人搀扶，也不用拐杖，老人按住膝盖噌地一声就站了起来，三步两步跨进书房。我看得目瞪口呆，毕竟是快100岁的人啊，这样易感和敏捷，实在匪夷所思。也许这才是他长寿的主因——嫉恶如仇又满怀慈悲，热爱生活，不惧死亡，从不脱离现实的人生。

在家人的帮助下，老人铺好宣纸，研好墨，调顺笔豪，缓缓写下“顾准和他的时代”七个大字和“九十九叟 李锐”一行小字。看着那遒劲的字体，我满心欢喜，满心感激。可是老人不满意，左看右看，决定重写。老人家一共写了三幅，终于挑了一幅自己最满意的，用吸墨纸吸干，嘱我放一放再收起，然后缓缓走向沙发，慢慢坐了下来，闭上眼睛。老人前后判若两人的神态和身姿，动如脱兔，静若处子，多么优雅又多么感人。顾准在他心头激起的也许不止一朵浪花而是一个巨大的浪头。孙治方、顾准和李锐，三位老人之间精神的默契和心灵的相通，毕竟不是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们所能理解的。

恰恰碰上最不好的年头，我的书终于还是没有通过书报审查的鬼门关。有一家出版社甚至连版权合同都签订了，却情愿赔偿也不敢出版。他们充满善意地告诉我，你不要再找出版社了，仅仅“顾准”两个字就足以“敏感”到必须“枪毙”，我们也可能为出版一本“不好”的书而被取消明年90%的书号。

半年后，当我拿到千辛万苦带过来的几套港版书送给李老并告诉他出版过程的艰难时，老人一把攥住我的手腕，一字一顿地问：“你感觉XXX比毛泽东如何？”我一时语塞。那还是2015年，坦率地讲，许多人包括我，还对此人抱着巨大的幻想，一本书的被禁还不足以打破这种幻觉。我说“李老，我和他是同一年生人，都经历过文革和插

队，他受的苦肯定比我还要多。给他时间，给他机会吧，不指望他做叶利钦，也许能做回戈尔巴乔夫？”可是老人不放开我，望着我的眼睛，还是一字一顿——“我不相信他，他比毛泽东还要专权。毛泽东当年也没有把那么多部门首脑的帽子都扣在自己头上，他可是已经戴上六个领导小组组长的帽子了”。我非常尴尬，也不相信，一时竟不知对老人说什么才好。可是今天，当我再也不愿打开报纸读那些肉麻到不堪的阿谀时，当我再也不愿打开电视看那些痴人说梦的节目时，当我不翻墙就再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时，当我带回一本杨继绳老师的《墓碑》、何方伯伯的《党史》就被海关当作走私犯处理时，当我因为提到一句“袁世凯”就被封了微信时，当我得知好友 20 年、几十本的文革日记被截留时，当我最喜欢的《炎黄春秋》突然死去时，当我每一次要求政府信息公开都被拒绝时，当我发现自己每买一次火车票都被记录时，当一位朋友突然就失联时，当我十分喜爱的、开了近 30 年的“季风书园”悲壮关闭时，当我的小外孙告诉我“老师说敌人就是美国人和日本人”时，当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国家图书馆查阅 1949—1977 的公开报纸杂志时，当我在何方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亲见人们怎样在慌乱中横涂竖抹杜导正先生的吊唁词“唤起民众，实现宪政”八个字时……我只能为那时的尴尬和不相信而惭愧再惭愧，羞愧再羞愧。

李老，我知道您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不好，毕竟您已 102 岁。但就在 212 明亮的小屋里，您可是亲口答应要向您的好友——周有光先生学习，先向 110 岁努力的呀。您给世人留下的最后那段录音多么清晰，多么有力，多么直插人心！多少人还在盼着您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下去，直说到那一天，我们和您一起迎接民主宪政的实现，和您一起亲见两千年东方式专制的崩塌。

李老，我们都爱您，您要努力呀！

2018 年 5 月 22 日

请李锐老为《知天命》题书名记

山西 李飞飞



1991年8月，我（李飞飞，时任太原卷烟厂厂长）因言获罪，惹恼了当时的省长王森浩，一纸命令：“正常调整”，便开始了近十年的人生赋闲之旅，时年42岁。此间与老前辈陈英茨先生多有文字来往，陈老把我写的东西推荐给很多人看，有些还送到刊物上发表过。陈老常与人说：飞飞企业搞的好，他们不让干，那就写吧，也是材料。

2007到2008年间，有了一种将这些文章集成一本书的冲动，可惜在杂文集即将付梓之时，陈老仙逝了。

我的这本自选集，收录了五、六十岁之间的文章80余篇，多为读史札记、时政评析，也有些四海云游后的杂感。这些思想“杂拌”，反映了我对当今世界的一些思考。这本书由原《工人日报》著名编辑王建勋先生编辑，石名岗注释。在建勋老朋友的帮助下，我的习作总算有个样子了。

出书就像养孩子，一朝分娩后，就想着起个好名字，又盼有贵人相助，使之一生平安。这是所有父母都脱不了的俗。我也一样，书稿草成后就想请几位敬重的老辈和老朋友来为我的“长子”张目撑腰。经过与王建勋先生商量，由于大多数文章是我五十岁左右的作品，故命名为《知天命》。由于王建勋先生与李锐老很熟，想恭请锐老题写书名。

2008年12月28日下午三点半，大风，寒流。按预约建勋带我去李锐老家去请书名，建勋、我与小孟（永定）一叩开锐老的家门，锐老夫人的笑容和房间的暖意就驱散了外面的酷冷。锐老夫人张玉珍早知来意，稍经寒暄便唤锐老见客。锐老因年高耳背，看了建勋写的文字说明后说声：“马上写”，起身进书房，建勋让我同去研墨抻纸，我稍有矜持，锐老已拿着尚有余香的墨宝回到客厅，“知天命 九十二叟 李

锐”跃然纸上。人说老墨藏锋，锐老却字如其人，老而弥辣，锋芒毕露。

当我对着墨迹还在遐想时，中气十足的老人已开始就“知天命”侃侃而谈了。老人先说了知天命内含的科学人生观，就是能认识大自然的自在自为，懂得按客观规律办事。接着话锋一转，说有些领导人别说天命，“地命”也不知。本是农民出身，可一亩地打多少粮也不知道，闹出了“大跃进”的大笑话。现在又搞了个三峡工程，后患无穷。

锐老接着谈了许多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说三峡大坝处在新生地质带，极易造成滑坡、崩岸，300年前曾发生过，如再现，那将是一场灾难。又谈及大坝建成后，由于水变清，清水对下游堤坝的冲刷可能造成溃堤等等，无不显现一个懂科学的专业内行老人对国家、人民的关心。锐老还谈到：

上三峡工程前，有人哄邓小平说三峡大坝筑成了，重庆可行万吨轮船。四川人邓小平一听就来了精神，其实万吨轮进重庆，就必须拆掉长江上所有的大桥，因为桥高所限，最大的桥也只能通过五千吨的轮船。我们的党如此不按规矩办事，如此胡来，国家和老百姓如何受得了。

对锐老鸿论，我心悦诚服，不是盲从。1981年秋，我参加轻工业部在镇江办的科技处长培训班，京、沪两地著名学者都来讲座。其中多次谈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正反意见都有，我意与锐老不谋而合，且发表了一番论道。因非专家，只是信口。其理由一是比照埃及尼罗河阿斯旺大坝给大自然和人类带来的弊大于利。理由二是上溯几千年尧舜时鲧治水，尽管有天神赐给的神泥“息”相助，见水就长的“息”也未能保住见水就堵者鲧的脑袋。而他的儿子大禹因势利导，归纳百川才是治水的真谛。凡水库大坝多是大涝开闸，大旱关闸，百姓不是耕地泛碱就是移民搬家却很少受益，上世纪70年代河南大水受灾人口近两千万，也是水库大坝惹的祸。

我这一番论道曾在班里翻起波澜。看了锐老有关三峡的文章，听了锐老的鸿论幸甚，幸甚。

锐老做心脏支架后仅半年，已能坐而论道，我辈甚感欣慰。锐老谈锋甚健，我们不愿让锐老过于疲劳，几次告辞才得以离开，唯一的遗憾是未带相机留下这珍贵的瞬间。

2018年6月9日

附：李锐日记摘录

2008年12月28日（星期日）阴

……下午王建勋同山西的李飞飞等三人来，让我为李的回忆录：《知天命》写书名。立即写了。略谈对形势的看法。

2010年7月19日（星期一）雨

五点半醒来，六点半起床。翻看《知天命》，我题的书名，完全忘记了此事。作者李飞飞，08年年底，王建勋同作者来家，书中第一篇随笔即写此事。

李锐老鼓励我研究彭德怀历史

滕叙究



我在中科院工作时就仔细阅读过李锐老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为他秉笔直书，为史存真的高风亮节而感佩不已。当我在 56 岁时走上文史研究的道路后，就把彭德怀元帅作为我研究的历史人物之一，很自然地关注起李锐老对彭总人生深刻精辟的评价。

2006 年，我的第一本彭德怀传记文学专著——《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出版。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李老的家，向李老赠送这本书的同时，希望聆听李老的教诲。李老听说我是毕业于哈军工的科技人员，惊讶地说，你是理工男呵，现在走进文史研究领域，不简单！那天李老同我谈了许多，他鼓励我深入研究彭德怀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彭总的光辉业绩和伟大人格。

我同李锐老成为忘年交，我把我的写作计划告诉李老，希望他给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彭德怀评传》题写书名，李老欣然应允。那年秋天，95 岁的李老身体不是太好，我试探着打个电话，没有想到，李老已经给我写好了，张阿姨在电话里说，你来拿吧。2014 年，我的第二本彭德怀传记文学专著《不信青史尽成——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出版。我给李老送书，他很高兴，夸我效率高。其实，这本书审查了三年才出版，而《彭德怀评传》目前在国内还不具备出版的条件。

我最后一次去见李老，他送我一套十卷本的《李锐文集》，我兴奋不已，先送到北京我姐姐家里暂存，以后分几次背回了深圳。

李老百岁纪念会，我因为不在北京，无缘参加，但我一直关注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今春老人家住院，我正好在北京，但是怕打扰老人家，所以不敢去见他，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愿老人家度过难关，早日康复。

2018 年 5 月 22 日

就高岗问题请教李锐

林蕴晖

李锐老是老一辈研究毛泽东问题的专家，我曾就有关高岗事件的若干问题请教李锐老。2004年11月28日，我拜访了李锐老在木樨地22楼的寓所，就毛泽东与高岗等问题作了长谈。李老特别嘱咐我说：“对毛的性格有一定认识的话，对研究毛的有关历史事件就比较容易，不然很多问题不好解释。”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2011年，我在《领导者》2011年4月总第39期发表的《毛泽东的性格与新中国的政治走向》一文，正是在李锐老启示下的一篇习作。



2018年5月23日

附：李锐日记摘录

2004年11月28日（星期日）晴

上午九点林蕴晖来，谈高岗问题近两个小时。他已看过张晓霁写的《高传》，有封信给我提出几个问题，关于毛其人及毛高关系。毛“心狠手辣”性格特点。高抱有幻想，因绝望而自杀。林还谈到，有研究党史人，在档案馆看到我当年写的有关高的材料（那是富春让我写的，没留底稿）。关于毛的性格谈得较多。

好花须映好楼台

——记李锐一席谈

梁国雄（美国圣迭戈）

2005年12月24日上午，我陪我岳父欧初先生前往北京木樨地22号楼探望李锐先生。门铃刚响，身穿红色夹克的锐老亲自开门，与我岳父互相握手问好。

两位老人因辅助萧克将军创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而深交。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岳父每次赴京都约几位老朋友聚餐。而这次时值隆冬，大家出门不便，我岳父因此改为分头探访。

1993年我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聆听过锐老的演讲。时隔11年，他变化不大，声音一如既往洪亮。

一边听两位老人交流共同熟人的近况，我一边打量李家的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两幅字，一幅是康有为手书的“本以无为心，发此清净理”，另一幅是梁启超写的明末清初诗人陈维崧所作一阙《虞美人》“无聊自撚花枝说，处处鹃啼血。好花须映好楼台，休傍秦关蜀栈战场开。倚楼极目添愁绪，更对东风语，好风休簸战旗红，早送鲋鱼如雪过江东。”看到两位粤籍先贤的法书，我这广东来客别有一种亲切感。

我岳父带了一册他写的《依旧红棉》，还有托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按原样印制的线装古籍《明弘治本诗林广记》一函八册，赠与锐老。

那年花城出版社出了我写的纪实文学《姚明的NBA生涯》，我呈一本请锐老指正。没想到他先拿起我的书问道：“你写的姚明的书？听说这个人不错，有多高？”

我答“2米26。”

他说：“我这个楼才2米7。我小时候也打篮球，中学、大学，都打过校队，当然那时水平很低。不过我知道怎么锻炼身体，否则熬不出秦城。在秦城关了我八年啊！”

锐老的思维相当活跃，由姚明想到打篮球锻炼身体，又想到秦城的经历。他继续感慨：“那时秦城关了502人，司局长以上干部占一

半，死了三十多，还有六十多人得了精神病。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不到一年就关死了。阎明复 1968 年关进去，还不知道他父亲死了。阎明复也关过秦城，当然他年轻，比我们年轻些。在西方，关单监是很厉害的刑罚，仅仅比杀头低一等，我查‘马恩通讯集’查到的。王若飞，脑子口才都好，关了五、六年单监，出狱看见一个怀表，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是‘锅盖’。退化成这样！这件事在延安流传很广。我知道这个事，所以坚持锻炼、思考。赵紫阳，软禁了十五年。凭什么？”

提起赵紫阳，锐老接着谈了对江泽民的评价：“2003 年《21 世纪环球报道》登了我一个访谈录，结果被封了。那里我提到，江泽民接班时邓小平对他讲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江泽民现在居然想说了算，想当邓小平。邓小平这种人物不可能再出了，连这点历史常识都没有！”说到这里，锐老语气略为缓和：“16 大我列席，发言谈过‘三个代表’。我说内容很好，但不能这样表达，好像为个人涂脂抹粉。不过我认为，讲三个代表比讲四个坚持好。”

绕不开的话题，依然是“六四”。锐老说：“82 年我调到中组部，下决心记日记。六四前后的事也记了。那时江泽民在上海封了《世界经济导报》，遇到抗议，打电话到北京来，要求中央不要再施加压力。他来了一趟北京，赵紫阳、芮杏文批评他。”

“赵紫阳访问朝鲜之前，已经把事情安排好了。他找了十几个人，有我、胡绩伟、秦川、吴明瑜，商量过。回来以后又开会，基本还是这些人，于光远也来了。其时，胡耀邦、赵紫阳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党淡化。政府机关的党组取消了，企业是厂长负责制，十三大提到政治改革，‘六四’一来，全变了。”

“邓老爷子有个讲话，说流一点血不要紧。那天我去萧克家，刚好张爱萍打电话来。七上将要联名上书反对开枪，项南、秦川我们几个人打算找一百个中顾委委员、人大代表、民主人士写信，后来徐向前、聂荣臻也表态了。可是李鹏和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谎报军情，结果这样。邓这个人呀！如果是毛泽东，绝不会动武。”

说到这里电话铃声响起，锐老接完电话后告诉我们：“这是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我今年八十八岁，叫‘米寿’。刚出了本文集，他们要出第二本，胡绩伟写了个序言。他们写我的文章集子，起名叫《大哉李锐》，你们有吗？”我们都说没有，锐老答应送我们每人一本。

锐老对我岳父说：“中国青年报这帮人很厉害，他们抱成团，不管谁来当家都不怕。听说你们要出仲夷（梁接：任仲夷，此前一个月逝世）的文集？上次仲夷那篇文章，登的时候还是删了一些内容，包括三权分立。广州还是好些。不过上次说广州附近的太石村，村长腐败，村民另选村委会，结果镇政府镇压，中山大学一个年轻女教授（梁接：艾晓明）写出来的。怎么广州还会有这种事？仲夷不在，你们把林若推出来。我去广州，他来看我，谈得不错。”

说到这里锐老话锋一转：“我那个家乡湖南，毫无办法，半个这样的人都没有。于幼军去了，又挤走了。我上次去湖南，是平江有个杜甫墓，有个祠，我去不能谈毛泽东，他们怕我谈。毛泽东现在成了当地的旅游资源。”

我们问起锐老近期的情况，他有些无奈，说：“上次纪念胡耀邦座谈会，我去了，但是没有机会发言，几个负责人讲完话就散会。有个台北记者要来采访我，我家外面站了四个便衣，不让她进来。有个年青人正好在我家，就下楼接她，已经进了电梯，便衣硬拉出来。我外甥孙女在英国回来，说网上讲我被封杀了。我这里电话监听是一定的，不过我放开讲，照骂！我现在连香港都去不了。中文大学请过我，但是不批，说有亲属在香港才能去。现在我的书都不能在国内出，名字不能出现在党刊上，文章只能发表在《炎黄春秋》这些地方。香港《开发》杂志今年六月号封面题目是胡锦涛忘恩负义，封杀李锐。这是给我找麻烦，这些东西他们都会看到。”

当时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刚三年，锐老对胡的评价相当正面。他说：“胡锦涛十二大上来的，当时我在中组部，负责这个事情，同他谈过话。那时耀邦对王兆国有意见，就把胡锦涛调到团中央。王兆国是邓看中的，邓去第二汽车厂视察，王兆国接待，邓觉得他不错。当时二汽的厂长是李昌的女婿，还找他了解过，但是不知道邓的意图是调

王兆国到中央。胡锦涛是清华 1965 年毕业生，学水电的，杜星垣见过，也比较了解。胡耀邦对他比较看重。后来又放到贵州锻炼，在那里有三句话：‘尊老爱幼，调查研究，滴水不漏’，有点威望。他到胡耀邦墓前哭过一场，有感恩的意思。这个事情是确实的。”

“这次纪念胡耀邦不错，九个人不完全一致，他拍板。曾庆红这个人，有人说他黑白两道通吃。刘宾雁走了，想回来回不了。上次苏绍智想回来，他跟‘六四’没有关系，‘六四’前就出去了。信转上去，曾庆红批了，具体批了什么不知道，后来公安部的答复是回来可以，先写份悔过书。于浩成回来了，具体怎么回来不知道。他原来不是公安部的吗？还有人想回来，有几封信在这里，我帮他们转。”

锐老取出几本书，一一签名送给我们。我说：“上次在美国我问《龙胆紫集》，南央说会再版，出了吗？”锐老很高兴：“你认得南央？”我说，就那次见过面，不过我现在是她的读者。锐老转头向我岳父解释：“我女儿写了我那个夫人范元甄的事，流传很广。”

锐老拿出一本《龙胆紫集》，特地翻到 249 页，让我看其中一首：“谚云得意便忘形，弹唱吹拉从不停。可怕‘话癆’难治也，惯于作秀显高明。”下面注明：扬州人称好讲话者为“话癆”。他笑着问我：“你说这是说谁？我确实是在报纸上看到扬州话中‘话癆’是这个意思。他也拿我没办法。”

我们告辞，锐老亲送到门口，然而谈兴未消。他说：“要发展，首先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历史、国家、党。现在还有很多历史问题搞不清楚。至于党，中国文化里面这个‘黨’字不是好东西，尚黑啊！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君子群而不党。现在我们这个党，大概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腐败得不得了。我看到这个买官的情况，军队最厉害。”

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向锐老挥手道别，他微笑看着我们离去。

2018年5月23日

三访锐老

蔡文彬

2012年4月2日上午，我到李府采访锐老。锐老一口气谈了近三个小时，深情回忆了他与赵紫阳交往的点点滴滴。在此之前，虽然久闻锐老大名，



却缘悭一面。我通过朋友联系到其女李南央，请李南央引见。锐老听说我要找他采访有关赵紫阳的事情，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锐老住在木樨地的部长楼。说是部长楼，其实除了房子大一点外，并无奢华的装修，反倒是满屋的书籍彰显了主人的渊博学识和知识分子身份。锐老此前已经了解我拜访他的目的，见面后也没有客套，几句话就进入正题。

他从上世纪50年代在广州见到赵紫阳讲起，一直讲到2005年1月29日早晨在八宝山最后与赵紫阳告别，其间多次感叹，甚至垂泪。他认为赵紫阳“宁可牺牲自己一切，也要坚持真理，这点很了不起，在党内他这点比耀邦厉害”。他尤其赞赏赵紫阳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他说：“八十年代以后因为年纪大了我就退休了，到中组部以前，开全国水利会议，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对水利工作的意见》，很长一篇文章，寄给赵紫阳。因为我估计赵紫阳对水利部的工作，对我的那些思想是能接受的。他把我这些彻底反对三峡水利工作的意见，在开水利工作会议时放在第一号文件，让会议讨论。”

他还讲到赵紫阳处理邓力群事件，与江泽民的恩怨，以及被软禁后凄凉的晚景等，讲到2004年12月29日下午，在北京医院最后一次见到病重住院的赵紫阳时，老人忍不住掉了眼泪。他说：“那天我们两个人去看孙大光，他也快不行了，我知道赵紫阳也在那层就去看他。病房门口有四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去，磨了半个小时，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了，结果她（指李锐夫人）发现四个人旁边有个手机，就让那些

人请示中央说李锐来看赵紫阳。那四个人中间的一个人就给上级打了电话，就批准了。那些人乱讲，说在进行紫外线消毒，不能进去，她（指夫人）懂医的，说消毒怎么就不能进去，可以进去的嘛。后来就进去了，看见赵紫阳坐在病床上，床上有一个小桌子，上面有一个小电视机，看电视、吃饭都在上面。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他就担心香港出的这几本书的作者还安全不安全。首先他就跟我谈这个问题。我说：‘宗凤鸣他们都没有被找去谈话，都没事。’”

从早晨 9 点到中午 12 点，锐老滔滔不绝讲了近三个小时，其间全无困意，精力非常充沛，而且记忆力非常好，很多几十年前的事情，他连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讲得绘声绘色，完全看不出是已经 95 岁高龄的老人。尤其难得的是，锐老思想非常敏锐，思考和观察问题都极有深度，对社会现实问题敢于直言批评。

不知不觉就谈到中午了，我怕影响锐老休息，赶紧告辞。锐老执意送我一套书，并且亲自签名。还让我给鲍先生也带一套，他说鲍先生也是他最敬重的人。

这次采访我意犹未尽，以后又两次登门采访。记得一次约的是下午 4 点，本来计划只谈一个来小时，哪知锐老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一直谈到下午 6 点都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次采访，不巧赶上锐老的夫人住院，保姆要赶到医院送饭，几次催他吃饭，他都说讲完再吃饭。后来一直讲到 7 点钟，他才吃晚饭。

三次采访锐老，我都被他嫉恶如仇、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与锐老交流，我受益良多。锐老已是过百之人，所有的祝福对他来说都显得苍白，但是我还是要祝愿锐老继续享受健康和幸福。

2018 年 5 月 22 日
于成都

回忆与李锐老的一面之缘

一哲土方

今天，有一位 102 岁老人的安危，牵动无数人的心。上午，在微信群中流传，老人家已经去世了。有人说，海外的维基百科，甚至登出了他的生卒年。有位群友说，一小时之内，他接到海内外无数微信、短信和电话询问。后来，有知内情的人告知，老人家还活着。他自己想下地，想吃东西，但医生不让吃，只能鼻饲，避免呛着。下午 3 点多，看到辗转来自李南央的消息，称老爷子情况挺好，与昨天很不一样，正和她讨论中美政治比较等等。下午，心情恍然之时，写了回忆老人家的一篇文章，发表于此。并祝老人家寿比南山！

1992 年下半年，我去北大进修。10 月 10 日上午¹，我在北大的电话亭里给李锐老挂电话，约见一面。因为本系汪澍白老先生是李锐挚友，托我带一本书给他。李锐本人接了电话，他说，明天就要去开会，要去报到，让我当天下午三点去他家。我猜他说的开会应该是参加十四大，但我没问。心想如果今天不去，至少要等一段时间，就马上答应了。李老随即告诉我他的住址，他说得很慢，我想他是为了让我记得住。虽然事先我已经知道他家地址，但仍然对他的细心印象很深。

我 1964 年在江西念高中时就读过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本书。当时我的语文老师推荐读这本书，并且告诉我，李锐很有才，当过毛主席的秘书，可惜后来犯了“错误”。那时候，我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人物的认识与评价充满着盲区和误区，对李锐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佩服中夹杂着惋惜。

李锐在文革后复出，并在平反冤假错案和反思中国当代史过程中

¹ 我查了父亲的日记，此处作者的记忆有误，应该是 10 月 4 日，那天日记记有：“下午人客而流：厦门大学讲师张 xx 来北大进修一月，带我台版《毛思中国基因》，言及厦大沉寂，福建陈光庆反和平演变，搞社教运动甚积极。”第二天的日记则记有入住海军招待所开会了。——李南央注

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这一辈学人，受他的恩惠挺大。80年代看了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让我对他崇敬。我理解了他“犯的错误”——最高尚的少数人一定会犯的那种“错误”。我对于历史——党史，中国当代史，个人的历史，有了完全新的体会。

在毛的几位秘书中，李锐是我评价最高的一位。文革前，老师告诉我，中共两大手笔是陈伯达与胡乔木。我那时看过陈伯达一些书和哲学报告的讲稿，对胡乔木主要是看过他一些诗词。文革初期，我曾经随风欣赏过陈伯达，特别是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批血统论的文字欣赏有加。随着官方披露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和后来的林彪事件的表现，他的“光辉形象”在我头脑中很快黯然失色。文革后，读了陈晓农整理的他晚年的谈话等相关内容，我对他的悲剧人生有了更多的警示、同情和理解。对于胡乔木，文革后有段时间我曾经对他恢复了欣赏。但随着他对周扬、王若水等人的讨伐，我对他的欣赏轰然倒塌。田家英是毛的很重要的一位秘书，81年国庆期间我曾在一老干部家听时任社科院领导的某人大谈他的朋友田家英，留下深刻印象。比较起来，李锐不算毛的主要秘书，但80年代了解到李锐御前辩论以及因此受毛一时欣赏的精彩情节，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另外，我的同事，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汪澍白先生是李锐多年至交，也常和我谈起李锐。这次汪老托我带书给李锐，他给李锐的信说，自己在厦大过着与晚年费尔巴哈类似的隐居生活，我是极少数与他有交往的朋友之一。

午饭后，为了不误约会，准时到达，我提早从北大出发。到达木樨地之后，先找到那栋有点神秘的部长楼，看看时间还早，就在周围散步。快到点时，我往部长楼走去，在门口我没有与传达室打招呼，而是像老住户般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果然没有人问我。

我看看手表，正指着2:59，就敲门，开门的是李锐夫人（玉珍女士）。她问明我的身份后，把我让进李老的会客厅，李锐老亲切而随和地与我打招呼，他收下汪先生的书和信。书是台湾版的汪先生研究毛的专著，书前有李锐写的序言。李锐告诉我，四点半有其他客人来，我们有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时间。这我完全理解。

这里像是李锐的书房，满墙都是书。李锐高大的身形，坐在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后，我在写字台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我起初的感觉像是面试中的学生，但很快，李锐的直率把我的拘谨一扫而光。我早就知道李锐是个直率的人，他写的文章，别人的介绍，都给我一个先验的印象。但一接触。其直率仍使我出乎意料。我们素昧平生，地位又相差悬殊，但这些大概对李锐都不重要。

他问到汪老近况，问到厦大和北大的哲学系，问到福建省的闻人和改革开放。他放言纵论，一语中的。谈到今年邓南巡后中国的变化，我们有共同的立场和观察，谈到福建省的人物，我们也有相同的观点和态度……这使我们的距离很快拉近了。

关于汪老，李老认为厦大没有兑现承诺。50年代初，李锐当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时，汪先生是理论处长。文革后，汪先生平反复出，担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听说调整湖南省委班子时，曾经有安排汪任省委副书记的计划，汪先生主动提出不从政而找一个大学好好研究毛思想。我从前听说，由中组部直接联系，让汪先生调厦大，好像就是李锐的安排。李锐没有明说什么承诺。我后来听说，厦大有关领导当时承诺专门为此成立一个研究所，这个是没兑现。至于其他，我并不知道。

谈到当时福建省的老大，我说了他为政的种种，不以为然。李锐说，他听到的也是这样。他说，可惜了，本来福建一直由项南当家就好了。

他问我在北大的骨干教师进修班的情况，对一些人和事好像不很欣赏。他从书架上拿给我看一本书，是香港出的冯友兰新版的《中国哲学史》。他说，冯友兰有些觉悟，有些新东西，可以看看。他又说，难道经济繁荣了，文化还像沙漠，行吗。

后来，我听汪先生说，李老从香港去厦门时，带回来几本书，被海关没收，时任市委书记石兆彬来看望时，李老请他去海关讨回来。²

李老好像有严重的气管炎，严重的哮喘，感觉他说话有点困难。

² 李锐未被允许去过香港。大概是熟人从香港带回他的著作被扣了。—李南央注

我觉得这种毛病在北京过冬是很难的，就建议他到厦门过冬。他说，有这愿望，但也许不容易真下决心。

有少数人，他们有幸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见证人。李锐一生的许多经历，使他多次获得这样珍贵的机会。

这次与李老见面谈话，还有一个要点，就是那年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了三峡工程上马。李锐告诉我，他最近给江泽民写了信，再次直言，反对修三峡。他将原信给我看，是一份打印稿。

我早就知道李锐是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主将。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主张三峡上马的林一山和反对派李锐举行了著名的御前辩论，毛泽东夸奖和肯定了李锐的意见，并且由此点将李锐当他的兼职秘书。中学时，我们学习了毛泽东的词《水调歌头·游泳》，背诵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浪漫主义诗句。那时候，我完全不了解历史的背景与真相。有时候我会想，58年正是全党全民头脑发昏的大跃进年代，而就是通过这么一场短短30分钟的御前辩论，雄才大略而超级自信的毛，就180度大转弯，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这件个案难道不是很有细究的意义吗？而且在三峡问题上，自从毛接受李锐意见之后，再也没有反复或后悔过。尽管一年之后李锐在庐山会议上因彭德怀问题惹怒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尽管一直有一帮上马派不断上折子，要求上马三峡工程，毛泽东从没松口过。在70年代还对此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可以说，毛在接受李锐意见之后，在三峡问题上一直难得地头脑清醒，可见那次李锐对他解说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就像武力解放台湾这件大事一样，虽然某些人一直在毛耳边叨叨，毛至死都没有松口。所以，我常常想，如果最高层有更多像李锐这样无私而敢言的人，有能用科学清晰的语言和逻辑进谏的人，应该也有可能减轻毛和党犯大错误的机率吧。

我对三峡工程的认识，部分与李锐先生有关。80年代看过他的许多言论，同时也看他的对立面的意见。92年时我已经大致形成了自己对三峡工程的比较稳定的立场。我上过一门系统论课程，近二十年时间，每次我都从系统论角度，讲解三峡工程的弊远远大于利。我有名学学生，后来做三峡移民研究，他的著作惊动高层，传播海外，也使得

我对三峡工程有了更特殊的了解和感受。那次我见李锐先生，感受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科学、理智、光明正大和为历史，为国家、人民负责的精神。

时间很快就到了，下一个客人已经进来。我与客人点点头，与李锐老告辞了。36年过去了，那天下午的场景我一直历历在目。

2018年4月6日

请李锐先生吃饭

程绍国



程绍国（后排右二）请李锐先生等人吃饭时的合影。前排左起：钱理群、资中筠、李锐、何方、邵燕祥、章怡和

请李锐先生吃饭，是我的荣幸。

前几天，我和朋友驱车福建看土楼，回程到了林觉民、冰心前后共同的故居。我这是第二次来了。纵观冰心一生，节操大于文学，活到 100 岁，也是上天赐福。林觉民就不同了，23 岁英勇就义。现在故居的墙壁上，有林觉民《与妻书》的复制件，我曾教书 19 年，此文读过不知几回，那天我还是重读一次。竟然有些哽咽。我想起现在的不少人，只讲权力和金钱，不讲真理，不讲正义，不讲道德，不讲伦理……

李锐先生的父亲和林觉民都是同盟会会员。前者 1905 年留日，后者晚两年留日，不知他们认识不认识。我请李锐先生吃饭，我极少问他问题。我一直读着他的文章，答案都在书中了。2010 年 10 月 27 日，应邵燕祥先生的请求，李锐先生送我一套 19 卷的《李锐文集》，我对他更是了解了。书中有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对于自己认定了的道理就要坚持，绝不改变初衷，这也是屈大夫所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不悔”。

1954 年，毛泽东乘军舰从武汉到重庆，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和毛泽东谈，要在长江三峡修一个大水库。1956 年毛泽东写了《水调歌头 游泳》，诗曰“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

湖。”这一年的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长江水利委员会要建三峡的文章。李锐即写了三千字的反对文章给《人民日报》，报社把清样都寄给李锐了，却又不发，说是周恩来不让公开争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关心的、赞成的。这种情况下，李锐还是写了一篇杂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对三峡计划予以挖苦。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当知道三峡有个反对派时，毛泽东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结果，李锐谈得简洁有力。毛泽东又让两人各写一篇文章，毛泽东夸奖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出人意料，毛泽东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后来，李锐做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李锐、黄万里们没能挡住三峡工程的上马。李锐关于三峡问题的最后一篇上书是1996年4月写的，那时三峡开工都已一年了。李锐为这事已经竭尽全力了，有香港出版的《论三峡工程》一书为证。他在《再版前记》中写道：“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三峡工程究竟如何，李锐是专家，我不是专家，不敢妄言，交给岁月评判吧。而李锐为国的赤子之心，如同日月，昭昭可鉴。

李锐苦难的开端，是在庐山会议上。在这之前，李锐就曾当面对毛泽东说，他对柯庆施等“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很不以为然。他还写了几封信，如1958年7月7日的信，“忧心忡忡。反映华东会议高指标情况，以及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家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原来是要纠“左”的。“六月底，庐山会议之前，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特别是共产风，已经发现，在逐步纠正之中。开会前夕，毛主席提出十九个要讨论的问题，准备纠‘左’。”

（李锐著《怀念田家英》）可是，张闻天的讲话，特别是彭德怀的信件，触犯龙颜，纠“左”变成反“右”。批判彭德怀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德怀讲半句公道话。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对毛泽东的三点意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

年以后有人议论（被人当作斯大林）；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李锐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

李锐是唯一被开除出党的人，流放北大荒，差一点饿死在那里。

1967年8月间，李锐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劳改。1967年8月间，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李锐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当时李锐虽已50岁，且是8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是陈伯达”。——李锐不仅亲身感受到，更从田家英那里了解到陈伯达的小人品性。田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探听气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风，他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但这时的陈伯达已是党内四号人物，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很快，在一个夜间，李锐被逮到合肥，次日被一架专机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一关八年！

李锐生于1917年4月，今年已是97周岁的人了。但他仍然关心中国的未来，希望社会好起来，人民有尊严。从他退休后，每一次党代会，他都向党中央进言，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做《炎黄春秋》的顾问，也是为了实事求是，鞭挞假恶丑，以防拉历史倒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他的文集第19卷，叫做《何时宪政大开张》，我对他的敬仰，没法用语言形容。

请李锐先生吃饭，凡4年4次，同时还请何方先生、张思之先生、资中筠先生、邵燕祥先生、章诒和先生、蒋彦永先生等。他们都是中国的良心，他们的精神和先驱林觉民一脉相承。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有一件事。2012年2月9日11点多，章诒和来了，大声说：“我有新闻发布！我有新闻发布！王立军逃到美国成都领事馆了！”她站在李锐身后，大家都簇拥而来。我在他们对面，有人说“绍国，你也过来。”另一人说“他的耳朵不背。”他们听了细节，脸上都可用“兴高采烈”来形容。重庆“唱红打黑”，无法无天，用的是“左”的手法。薄熙来脑

子不坏，精明得很，只有左才能出彩，只有左才能爬得更高。这回机关算尽，王立军这条狗也不是吃素的。老人们认定薄熙来将要出事，无法无天将受制止，坏事可能变成好事，此后法制可能有所好转……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原来追随薄熙来的一些人仍然大行其道，而且似乎行情见好。“左”的市场仍然很大。一些报刊不让讲真相，不让反思。“文革”臭气似在弥漫。似乎唱赞歌的都是“正能量”，批评的，类似彭德怀为民请命的都是“负能量”。有的人不用脑子，不明就里，还可谅解，像毛泽东说的“僧是愚氓犹可训”。有的人明明知道真相，却偏偏反真相，搞两千多年前赵高指鹿为马那一套，如《中国社会科学报》所载，“三年困难时期”只有250万以下的“营养性死亡”。该报另又说大饥荒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甚至还有人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唱赞歌。北京一位我尊敬的学者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不可能再发生了，类似反右这样的运动可能还会重来。而上海的一位朋友严肃地说：“文化大革命很可能还会重来！”

李锐先生著作甚丰，其中两本书最热销：《庐山会议实录》和《李锐反“左”文选》。我在书店里找不到。前者能够网购，后者我买了两次，寄过来都是盗版的。我倒也喜欢，盗者也在干好事。

每回吃饭，都让我先说几句祝酒词。我每回只有一句：“祝你们健康、长寿！”

后记：

以上《请李锐先生吃饭》发表于2014年12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2016年3月20日，我又在“大董”请李锐先生吃饭，这回除原班人马外，还有钱理群先生。有一点我要指出，我觉得李锐比较感性，诗人气质很重，这气质我觉得和胡耀邦相通。他先后当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陈云把他派到组织部，可他并不做亲信。他服从的是正道和正义，他有别于周恩来的理性和缜密，更不同于林彪的阴沉和多疑，他迥异于广义或狭义的政客。

今年3月中旬，我打电话给邵燕祥先生，想请他约李锐老在生日前夕再聚一次。未及安排，听到了李老住院的消息，且一度病情凶险，心中十分难过。从温州遥祝李老再一次逢凶化吉，创造新的奇迹。

2018年5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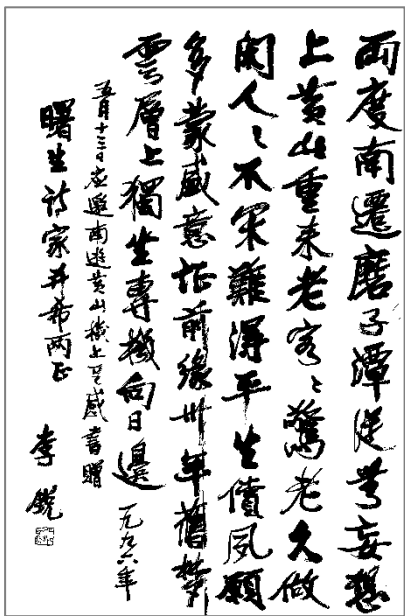
我是李锐忠实粉丝

尹曙生

1996年5月，我通过著名作家、诗人邵燕祥，邀请李锐到安徽黄山旅游，他愉快接受。在老伴张玉珍、邵燕祥及夫人谢文秀和著名学者朱正陪同下，圆了他老人家上黄山的梦。

此前我和李锐并不相识，为何邀请他？因为《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深深地震撼了我。身为公务员，我自信读书不算少，但是没有哪一本书，会使我如此着迷、如此激动，李老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我想见他老人家，没有机缘。邵燕祥同志帮助了我。当时

我身为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还分管警卫工作。我按照接待中央领导



邵燕祥
黄山留影，左起尹曙生、朱正、李锐

的规格（他完全有资格享受），专门成立了接待组，成员有副厅长范绍明、交警总队长陈富有、警卫处有关人员共7人。我和妻子夏明聪全程陪同。李老一路受到欢迎，心情愉悦，精神矍铄。

李老一行离开安徽后，我思考如何向他学习的问题，从此放下文艺创作，认真反思历史，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曾经接触过的档案资料，写了几十篇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披露极左年代中国政治风云和人民群众所受到的苦难，为后人书写历史提供一些资料。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22年过去。期间我曾经两次到北京拜访李老，还不断收到李老给我题赠的著作，我都认真拜读。用当下年轻人的话来说，我就是李锐不折不扣的“粉丝”；他给我的墨宝一直悬挂在我的书房兼卧室里，激励我前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接待过很多国内外贵宾、要人，而接待李锐一行，是我最愉快的一次。

2018年6月4日

我喜欢李锐 钦佩李锐

周成启住院时草就

李锐是我一生中的师长和好朋友。我喜欢他，学习他，钦佩他。

第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内真正的英雄好汉，少有的杰出人物，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他长期挨整，但历史又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伸张正义，一身正气，与党内的左倾路线和左倾幼稚病进行斗争。

第二，他讲党性，但更讲人民性。当党性与人民性发生矛盾的时候，能服从人民性，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三，他历尽坎坷，多次遭冤，坐牢、劳改 20 年，面临死亡。但他不畏强暴，讲真话，办实事，坚持真理，按事实说话。

第四，他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学富五车，是真正的革命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学问家、著作家、书法家、诗人。19 卷《李锐文集》及其他诗文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第五，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他对上，从不趋炎附势，吹牛拍马，当意见相左时，能直言相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朋友和下属，能平等待人，不摆架子。和他聊天，是一种享受。

第六，在 101 高龄时，他还忧国忧民，心怀大众。建议当权者，要广开言路，实施宪政，坚持普世价值。

我是党内的民主派、改革派，但又是小老百姓、胆小鬼。我要以胡耀邦、赵紫阳、李锐为榜样，鞭策自己不断进步。



2018 年 5 月 28 日

您就是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

王智仁

我“认识”李锐老始于老同学推荐我读《请读〈胡杨泪〉》。我虽然不及《胡杨泪》主人公钱宗仁那样努力、那样优秀、那样执着，但我们有同样的名字——文革前的高考“政审”落榜者。

毛泽东把中国人分为“依靠、团结、打击”三种类别。高中时，我笃信他说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得越多越好！”如今已经年逾古稀的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整个学生阶段我都是品学兼优的。一纸高考“不录取通知书”击碎了我的梦想：我不仅不是“依靠”对象，连“团结”对象都不够！今天人们都知道，哪怕有千条理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浪费人的生命就是犯罪！

我记得类似的文章还有《戴着锁链的攀登》——主人公是上海一位连“低能物理（指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女士曹南薇。她靠糊火柴盒为生，更要命的是还“戴着锁链”！竟然报考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生！

1967年春节前，单位出差旅费，我们去劳动部上访，反映“狗崽子”的“临时学徒工”问题。虽然无功而返，但看到了《中学文革报》刊载的《出身论》是意外收获。我一口气读下来，畅快淋漓！《光明日报》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主人公就是《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读《出身论》时没有记住遇罗克的名字。

那是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让人们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常发表类似这样的文章，一次又一次地感染着我。我当时没有刻意记住这些作者的名字。后来才知道《请读〈胡杨泪〉》、《戴着锁链的攀登》、《划破夜幕的陨星》的作者分别是：李锐、刘宾雁和当今的王晨副委员长。尤其想不到《请读〈胡杨泪〉》的作者竟然是主管青年干部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爱才、惜才之情跃然字里行间！

2004年，我读了赵诚先生的《长河孤旅》，接着又读了他编著的《追寻黄万里》。代序《悼念黄万里》是李锐老写的，和《请读〈胡杨

泪》》异曲同工，依然是爱才、惜才。

我告别“为稻粱谋”的年龄有幸与互联网的兴起同步。我有时间读自己想读的东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只要是李锐老的文字我都想读，只要是他的书我都想买。我从小生长在“芳草萋萋鹦鹉洲”，邻居、同学大多数是湖南人，特别喜欢听李锐老接受（其中有鲁豫）采访时绘声绘色的湖南口音，有时候还手舞足蹈。

李锐老生于1917年4月13日，家父生于1916年11月30日。两位老人相差不到半岁。

1937年李锐老从武汉奔向延安。“整风”时“抓特务”，说老人家有亲属被共产党杀死，康生怀疑他对共产党有仇。青年李锐义正辞严地回答：“我家亲属既有被共产党杀死的也有被国民党杀害的。我选择了共产党！”

我的父亲没有李锐老这样的机会。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在12、14岁的年龄先后失去双亲。也是1937年，他从武汉出发奔向淞沪会战的战场。

两个家庭所处湘鄂赣、鄂豫皖，当年情况相似。2014年我为父亲整理的《柴山保往事》投稿以前，冒昧地将初稿寄给李锐老征求意见。李老的秘书薛京电话答复我“考虑到李老年龄太大，没有给老人家过目”。这让我非常内疚！2014年第9期《炎黄春秋》发表了这篇文章。

李锐老曾经给郑州思想沙龙的朋友赠阅《李锐口述往事》，我读到了这本书。2016年3月26日我随郑州思想沙龙的朋友专程到北京祝贺李锐老百年华诞。对我们这些未曾谋面的后生，李老讲党史如数家珍，硬是想把他知道的全部告诉后人！

李锐老告诉我们，“上面”要求不能“大办”寿宴。我笑着告诉李老“家父是旧营垒的人，半年前百岁寿宴办了五十桌”，李老哈哈大笑！我体会这种笑充满了酸楚。

我为父亲整理的《柴山保往事》有幸和李锐老《我知道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刊登在同一期《炎黄春秋》。我特地带上这一期刊物请李

锐老签名，李老欣然命笔。

晚辈王毅先生撰写、武汉首义书画院长洪平先生书写的对联：

青松百岁文章犹可倚马就
庐山风云人间尚有月旦评

挂在宴会厅的显眼位置让我们格外欣慰。后来，我又把家藏李锐老的著作寄到北京，通过王晓林女士请李锐老签名。这些书籍都是我的宝贵财富。

今年“两会”，德高望重的李锐老作为特邀代表参会，可惜因身体原因没有出席。但老人家写给大会的书面发言，特别是对《炎黄春秋》的命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您就是那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树！

2018年5月26日



李锐百岁寿宴，墙上所挂是本文作者与友人们赠送李锐的寿联

写给李锐叔叔的一封信

周七月



李锐叔叔：您好！

常常从南央那里了解到您身体的情况，很是挂念。您这样的老革命，保重身体是第一位重要的。

我现在常常想，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你们这一代走过的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在世风日下，各种积弊已经常态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当年投奔共产党的那些热血青年们？

我为你们自豪！

从 1840 年起，救亡和启蒙就是中国知识界思考的两大主题，而且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军事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体育救国……都曾经是选项。无数志士仁人投入到寻求真理的大潮中，许多人失败，许多人牺牲；也有许多人颓废、堕落，甚至走向反面。

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直接将更多的年轻人推向救亡和启蒙的队伍中。许多人选择了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非法且弱小，选择共产党就是选择牺牲，是需要理想、勇气和道德力量的。

用今天的眼光看，我还是认为当时的这些年轻的个人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我父母参加八路军后一直在晋察冀抗日前线，他们目睹过战友的牺牲，自己也随时可能牺牲。

他们当年选择抗日，没错；选择建设新中国，也没错。年轻人，谁还没个理想呀！

延安整风，尤其是 1949 年以后，军政大权逐步向毛泽东个人集中，包括写入党章的副统帅最后都无法影响毛泽东，反而自己落得折戟沉沙的下场，一般干部更无法左右局面。这是包括我父母在内的许多党内干部对罩着马列主义光环的领袖信任的结果，他们有道义的责任。

文革结束以后，党内外曾经有过“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

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萌芽，您再次积极投入到这次给国家带来新希望的改革大潮中。

可惜这个萌芽很快就枯萎了。

执政近七十年的实践证明，原来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又重新摆在了党内外志士仁人的面前：启蒙成了最重要的课题。而且在距鸦片战争近 180 年时，主张启蒙竟然同样面临牺牲，需要理想、勇气和道德力量。

您这次还是好样的。

好在现在很多人已经觉悟到启蒙就是救亡，更多的人投入到新的努力之中。

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实践者之一。您确实坚持了当年投奔共产党的救亡和启蒙的志向，因此，我要向您致敬！

衷心祝愿您早日康复。

我去看您。

晚 周七月

2018年5月22日

写给李叔叔的信

陈巧巧

李锐叔叔：知道您病重了，一直为您祈祷，愿您内心的强大再一次战胜死神。命运一次次地撞击，在寒风荒野里扒过黑泥土去啃，在黑暗的牢房里用紫药水作诗，厄运只让您更强壮。您不死，您还有使命未竟。

1982年我母亲被病痛折磨得只有皮包骨。有天晚上您突然来敲门，告诉家中昙花开了。我们搀扶单薄无力的母亲去楼下看花：在黑夜的笼罩下，安逸温暖的灯光让那花儿仿佛像初生婴儿般娇嫩与圣洁，母亲伏身去闻花儿的芬香，她微笑了，似乎脸颊上泛起一丝血色。这一幕惊呆了我（昙花照片保留着）。

1992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姐仨去拜访您，请您谈谈父亲。您想了想说：他是两头真的人。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词。

父母都不在的日子里，我每次去看您，都送我您写的新文章（多在《炎黄春秋》上，也有复印的）和新书，讲它们的命运。您寄希望于下一代的情感感染着我。我却忧心我们的下一代。您说莫愁，您对当下社会的忧虑不逊于年轻时，何时宪政大开张已成您的一张名片。

2014年8月，我爱人与兄弟合作的书《周肃清传》终于出版。我们拿着刚印出的书去看您，想请您出席书的发布会。您拿过书来就看，足有近一小时说：好。未想到您在会上发言那么慷慨激昂，也许是您们共同经历过被流放甚至接近死亡的命运，也许是您们一样九死一生不弃地追求，从未见过周肃清的您，却对已经去世36年战友那般尊敬。您回顾中苏两党关系与苏联灭亡教训，您仍在抓每个机会去启蒙。

父母和您那一大批优秀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放弃学业和不愁温饱的生活毅然投身革命，那意味着多重危险与牺牲，几十年来无论在战火中还是建设中，无论命运怎样一次次降临，您们的牺牲与担当从未改变。我们为你们骄傲。

文革后的反思，是您们对自己过去的反省与批判，犹如一个人自

已动手为自己做手术，那种面对撕心裂肺痛苦和世人唾骂的勇气，让我再次看到了您们不倦追求真理，放弃一切的牺牲与担当。无论您们离真理还有多远，从未放弃的追求犹如一盏明灯在前方。

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么短暂，如昙花开放，留下的定是对星空的仰望。

晚辈 陈巧巧

2018年5月28日

于墨尔本

我敬仰的李锐伯父

吴萍

知道李锐的名字始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从一个存书万卷的同事家里借到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把庐山会议的真相原封不动地呈献在人们面前，让我们去进行独立的思索。

我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最纯洁无瑕、没有任何生活经验与社会经历的一代人，也是最容易被洗脑、被蛊惑、被欺骗和左右的，高举红旗整天喊万岁的狂热的一代人。虽然没有经历过庐山事件，但早在文革前就因彭德怀“反党”一事而听说过庐山会议这件事情，并完全接受官方的一面之词。

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后，看到了文革中的杀戮，听到农民讲的土改和屠杀地主过程：我所在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庞三生产队在土改时期分配到一个“恶霸地主”名额，当时村里的地主老柳已经去世，无奈，就让老地主的五个儿子中最大的儿子顶杠。这个 26 岁的儿子被枪杀在村头，没有人敢为他收尸，到了半夜，有几家村民将他的脑浆分而食之，说是治病。鲁迅先生写的一幕真实出现在我的脑海。听老乡讲，还有一个小女孩在人民公社大跃进期间因为饥饿偷了生产队的苞米被斗而自杀身亡。听到的不止这些，所有这一切让我对真实社会和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关注一些政治问题。

当我从借到的李锐写的这本书里看到了庐山会议的真实情况，我十分震惊。除了震惊，还有无尽的难过、悲伤、痛苦和愤怒。经历了国内战争的浴血奋战、战后重建国家的艰难，帮助毛泽东登上皇位的这一群元勋们竟也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对待。只因为他们看到了毛泽东执政的丑恶和不公，而且还要直言地大声说出来。无论党的最高领导还是最下层的老百姓的生命在共产党眼里都不如草芥。

李锐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说道：“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党内大斗争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敢于凛然直言的彭德怀、作了深刻剖析的张闻天、提出中肯批评的黄克诚、周小舟，被定性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

困’。”这本书，真的能让我体会到那种惊心动魄，一边看一边手抖，一些党内的高官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丑陋和忠诚一会儿让我愤怒、一会儿让我哭泣。原来，共产党不仅仅杀地主，还杀自己人，而且相当残酷。合上这本书时，我告诉自己，只要共产党不承认自己建国以后的一系列罪恶，我要学习那些不怕丢官掉头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这个邪恶的势力干到底。这也源于从小受到的“英雄主义”的教育吧。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李锐能写出这样真实的历史，让我对李锐写的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去找同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李锐写的书，找到了一本《李锐日记》。李锐在80岁时将自己从1954年至1993年的日记及一些讲话、思想、看法，集结成书，给我们留下了真实完整详尽的历史资料。书中尤其对中国的水电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思考与规划让人感动，无论对否与成败，那种对祖国的忠诚赤胆，光照日月。另外，这本书也能让我们感觉到李锐思想形成的过程与升华，尤其是在最后附录的文章中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书的背面有一段话：“李锐从不夸夸其谈，历来敢作敢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革命年代如此，在任毛泽东秘书时如此，在‘左’的错误泛滥成灾的时期更是如此，在新时期对历史的理论性反思中同样如此。因此，李锐做到了原汁原味地公布自己的日记。”能做到这点，在那个历史时期多么难能可贵（现在更是如此）。这两本书我再也没有舍得还回去，脸都不要地据为了己有。

到了21世纪，和小学同学聚会，竟然让我知道了我的小学同学李南央是李锐的女儿，也听到了小学同学的评语“李南央在美国对中国共产党胡说八道呢”。由于多年的封闭和洗脑，我对所谓的“胡说八道”非常感兴趣。经过多重渠道和几年的努力终于和李南央取得了联系。在和李南央接触中，我们交换思想、畅谈过往，无话不说，我开阔了眼界，清晰了思维，也能够更多地听到李锐伯父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欣慰。五年前，听说李锐伯父又出了新书《李锐口述历史》和李南央写的《我的父亲李锐》。我非常想快点看到这两本书，可是没有想到，这种描写真实历史的书籍在大陆竟然不能出版，要到香港去出书。最后在带入大陆时又竟然被海关扣押，真是天理何在！南央坚持海关必须给一个说法，五年了，中国海关从开始的装模作样到直接拒

绝，海关和法院演尽了人间丑剧，但南央从未退缩过，一直不卑不亢、心平气和地据理力争，绝不退让一步。五年的抗争感动和鼓舞了无数的人。海关扣书事件也让我联想到如果在今天，伯父的《庐山会议实录》和《李锐日记》一定无法出版，伯父还不知道再遭受怎样的迫害。真是天理难容人神共愤。

2018年4月得知伯父病了的消息，很难过。想到伯父已经是过了百岁的老人，一生被自己所在的“亲爱的党组织”从身体和精神上摧残与折磨，无法为国家和人民做自己能够做的贡献，在无缘报国的情况下仍然关心政治，体恤民情，时刻不忘用自己的地位和声音为老百姓说话。现在，老人生病住院了，感到真的、真的非常难过。他在我脑海里最深的印象永远是那张游泳健将一样的照片。伯父年青时的英俊健美固然让我十分的喜爱，但更让我爱和敬仰的是他不屈的性格，从延安时期就遭受迫害，可是与其他许多高官不同的是，他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的理念，决不动摇，到了晚年仍然绝不改变说真话的性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很多已经看到中共罪恶的革命老人嘴上也说这样不行，应该改变，但是决不愿意写下真实历史，说出他们知道的所有事情的真相，怕影响纱帽、影响升迁、影响地位和名誉，甚至影响后代的俸禄。伯父的勇敢和良心没有几人能够相比左右。想到他可能不久人世，我的眼泪几次忍耐不住。这样的中国脊梁一旦离开我们，岂止是心内空落可以言表的。我也真心祝愿伯父能坚持到他的书被海关放行的那一天。

现在能有伯父、资中筠、鲍彤、章怡和、周孝正、陈丹青……这样一群中国的良心（我欣喜的知道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我们的心灵不知道得到多么大的安慰。很多这样的老人已经怀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看到新中国的那天，我们的努力还要坚持多久？李南央对海关扣书一案的坚持已经五年之久，每当我感到气馁和无望时，她的勇气和胆识让我增添更多希望和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我们先做那些最初的星星吧。相信我们期望的美好中国一定实现，即使我们不一定看见。

2018年5月20日（6月21日修改）

三辈猛士

王承鹤

锐老的父亲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把盘据中华大地数千年的皇权推翻了，建立了华夏开天劈地以来的民主国家——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在建立之初衰败不堪，而且面临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列宁、斯大林食言，不但不把原先允诺归还的沙俄占据的我大片领土归还，反在我国腹地建立飞地，像尖刀插在新生的民国的胸上。情势严峻，内忧外患，民主制度一时难以完善。但是，纵有千般不是、万点不足，它毕竟是民主制度，公民作主；假以时日，它会日臻完善。试看法、英、美、德、意、日，莫不如此。台湾更是直接的证明。它实行民主之初，立法院常上演全武行，混乱不堪；我们幸灾乐祸，笑得东倒西歪。如今呢？即便再有精彩的洋相也笑不出来了。

锐老与一大批忧国忧民的青年不满于社会的弊病，起而追随毛、周、刘、邓等造反，推翻了民国，把飞地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全国，更加专制与独裁，甚于皇权时代。晚来，锐老与一些正直之士才看清，有人当了不穿龙袍的皇帝，与他的一伙压迫大众，搜刮全国；皇位似有代代相传之势。这违背历史潮流，不是锐老们的初衷；又起而要扭转方向。开了个好头。他们启发点醒了无数人，包括我。

锐老已经尽力，他应当无憾！南央接过祖辈与父辈的旗帜正义无反顾地前进。三代猛士！有其父必有其子，将门虎子，一代更比一代强！南央说，他没有祖父和父亲的声望与资历，但是，她有更加汹涌澎湃的民主大潮。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哪里呢？“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诗）

猛士一词，取自鲁迅先生；用来称呼这祖孙三代也许不都确切，但比猛士更高的英雄怎么称呼？我不知道。恕我才疏学浅吧！

2018年6月9日

从共产走向共生的李锐

——致敬“不撕破脸”的锐公

朱健国



两幅对联

昨晚重读三十年来与王元化、曾彦修、李普、任仲夷、袁庚、雷宇、何家栋、贺卫方等赞叹锐公的旧文，得一联，谨敬献在北京医院安澜 102 岁的李锐先生：

红朝党内自由旗，
民主大道共生师。

为诠释“锐公既自由又共生”，从共产走向共生的博爱境界与心路历程，又写一联：

既“五不怕”又“不撕破脸”，庐山雾里勇治“毛晚病”，天下“魏征”皆下辈；
唱“水部诗”弹“吏部文章”，中国梦中智说“马早亡”，故宫“卢梭”多门生。

两访锐公

上述两联的背景源于我两访锐公。

2005年6月25日8时至11时，在李锐北京家中，我与锐公访谈三小时。面对中心问题：“如何看待焦国标讨伐中宣部”，李锐先生毫不迟疑地说：“‘讨伐中宣部’从本质上讲我认为是对的！”“根本不应该有中宣部！”但李锐老也同时劝告焦国标：要有“不跟党撕破脸”的“消极自由”渐进策略，要全面观察美国。

何谓“五不怕”？锐公答：“第一，不要怕戴机会主义帽子；第二，不要怕撤职查办；第三，不要怕开除党籍；第四，不要怕老婆离婚。第五，不要怕坐牢；第六，不要怕杀头。我呢，（笑）前面五‘不怕’都实践了，都经过了，脑袋嘛，还留着。就是这个意思啊。”

后来，2007年4月23日，李锐在喜度九十寿辰时又重申了“五不

怕”：“来到人间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烟。曾经实践‘五不怕’，留得头颅搁铁肩。”

仅有“五不怕”，难免也重蹈“积极自由”之激进，加上“不跟党撕破脸”的共生底线，方进入“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从共产转型共生的新境界。

蓦然回首，锐公正在共生灯火阑珊处——共产必然走向暴力，共生才可真宽容真自由真民主。

此次访谈我写成三万字访谈录《痛感始皇难绝缘——李锐谈“焦国标讨伐”》，在香港杂志摘发，网上全文发表。

文中的小标题有——

我还没有跟党撕破脸

毛泽东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农民领袖”

你清华能出得了焦国标吗？

我为什么对毛泽东一直是清醒的

红军肃反自己杀自己杀了十万

我父亲跟宋教仁同班

彭德怀将长寿街变成“肉体消灭点”

在庐山参加“秘书起义”的思想资源

毛说“我穿斜纹布，吊口袋，我看书点两根洋蜡”

田家英是上吊死的

中共没有人权思想

“讨伐中宣部”从本质上讲我认为是对的

周恩来到最后就是他（毛）的丫头

根本不应该有中宣部

陆定一是紧跟毛的啊，左得很啦！

没有党，中国的情况可能要好一点

邓小平这个人对中国来讲，可以对半开

他大体很厉害，很刻薄

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用的一个招牌

江泽民和胡锦涛

2012年7月15日，我在清华大学参加“全球首届共生论坛”，会后

又到李锐老家中访谈了一个多小时。李锐先生赞同从共产走向共生这一历史新潮流——“共生”不是共栖的“依生”、寄生，而是要升华为平等互利前提下的异质开放。社会科学视角下的共生范畴之底线，在于保证一切竞争者、对立面、异类的政治平等和机会平等，包容和宽容异端与谬误——虽不赞同你，但坚决捍卫你的生存权，自然共生。其底线是，远离任何名义的暴力，世上没有敌人，只有“病人”。

与王元化谈锐公

我感悟李锐先生的心路历程，始于1997年10月31日—11月1日。其时77岁的王元化先生与45岁的我一见如故，促膝对坐，开怀畅谈两晚（约6小时），上海衡山宾馆二楼一个简陋的标准间客房，成为这一思想盛筵的见证。

当时对话主题是“五四”运动后的“知识分子改造”与“党文化”。

访谈中，王元化先生说到锐公给他写了一个条幅，其文录自刘禹锡《浪淘沙》之八：“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以此支持他研究“知识分子改造之灾”——真是痛快淋漓！

王元化先生说：“我们关于‘知识分子改造’这类说法，这恐怕不是马克思的原点问题派生出来的，在苏联似乎也没有提到‘知识分子改造’这个问题，这好像是根据中国政党的一个特殊情况所提出来的。”按照王元化先生的观点，李锐先生就是一个坚决拒绝“知识分子改造”的成功典范。

这次访谈，后来写成六万字的访谈录《王元化四反“知识分子改造”》，在香港杂志和网上摘要发表。

雷宇说任仲夷与锐公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广州拜访了广东改革的护航人任仲夷老人。86岁的任老，对李锐、于光远引为知己。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病逝。四天后，19日17时，我在广州珠江宾馆10号楼103室，采访任仲夷30年的“幕僚”、改革家雷宇先

生，请教任仲夷追悼活动的困惑。

曾为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后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岗位离休的雷宇，虽然 71 岁了，依然声如洪钟，直言快语，在直说了任仲夷追悼活动受到官方特别控制后，又披露，除了“田纪云来给他（任仲夷）题字……‘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真正的共产党员，改革开放的大将’”，“还有人联名题写了一幅：“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

而这挽联联名者有 11 人：杜润生、于光远、李锐、李昌、李普、杜星垣、冯兰瑞、曾彦修、朱厚泽、杜导正、吴江，由李锐执笔书写，因为大家公认李锐文章、书法双一流。

可以说，田纪云、李锐等人的挽联，给当时压抑的任仲夷追悼活动增添了一点“东方的微光”。

何家栋心中的李锐

记得那天在访问李锐先生六个小时后，2005 年 6 月 25 日下午 6 点，我来到北京工人出版社的一栋老宿舍，与八十岁的何家栋先生访谈。1938 年参加革命的何老，1962 年又因组稿出版长篇小说《刘志丹》，成为“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者之一，蒙冤十八年平反后，一如既往。他赞叹李锐是“一二·九”运动幸存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建国后，由于毛泽东迅速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以极端化的手段推行极权化，‘一二·九’一代就发生分裂了，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如顾准、田家英、李锐、李慎之等均陆续离毛而去。”

何家栋先生在论“新道统”时，特别喜爱李锐老的“八九”名诗：

“通灵宝玉”不能丢，刀握手中岂可收！

“您好”之声犹在耳，门前坦克似洪流。

他说李锐老支持焦国标，可称“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

几天后，我写了《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何家栋思想访谈》，在杂志专栏中发表。

刘绪贻致敬校友

两年后，2007年7月18日晚，我独上珞珈山，探入一个九十五岁教授的书房，与著名美国史专家刘绪贻先生“一部旧书喜相逢，开怀放谈冲禁区”：怀念李慎之，赞颂李锐老。“浪遏飞舟”，不知夜深沉！

刘绪贻先生说：“我们武汉大学的老校友李锐有见解。他现在思想越来越激进了，他现在也主张废除一党专政。他的态度是乐观的！”

刘老先引述原人民大学的副校长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文章说：“他在文章中说，恩格斯跟马克思晚年否定了他们早年的一些理论，否定了暴力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晚年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他说马恩的正统的接班人是考茨基，是伯恩斯坦，他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然后说：“李锐、谢韬，他们两个人都认为，现在这个一党专政体制如果不改的话，中国没有前途，我也是这个看法。”刘绪贻教授还说：“从邓小平到胡绳、李维汉、李锐、任仲夷等同志，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解放以来，过早地批判了资本主义，而对封建主义的东西批判不足。”

回家后，我以《刘绪贻“九五”登高一呼》一文记述此次所谈。

从贺卫方想李锐

2008年10月3日下午三时许，我拨通“中国改革家的法律顾问”贺卫方教授的电话，他在重庆度假讲学的一个临时电话，就“伪现代化”和“共生论”问题，访谈了六十四分钟。因为访谈联系几经干扰，贺卫方首先谦虚地说“健国兄！哎呀，真是抱歉！”接着就表达了对李锐等人批评一党专政体制的支持，认为一些著名“风波”，其实只“是一个行政诉讼的法律事件！”，可惜一些人总有“法外党”的思想传统，将“所有的法律问题最后都转化为政治问题了，然后通过政治的途径加以解决。”

十年之后，我在收读“小李锐”的“约字”信时，再次想到了贺卫方的“法外党”论——2018年5月22日14时51分，友人用微信转来李南央2018年5月21日的“约字”信，信云——

刚刚过去的四月，我在北京医院陪伴父亲的日子里，确切地体会

到，他对所在的党将他这个有着八十多年的党龄的老党员划入“异类”，将他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苦口婆心地对接党班的后来人说的那些泣血之言看作“不稳定因素”，是梗在心头的。因此我想以违反传统的方式，现在就开始向您们约字，在征集到十几万字时立即成书，让父亲在此时能够看到人心的公道。我觉得这会比他走了以后再作这件事有意义得多。

只因李锐先生有所微词，便将“有着八十多年的党龄的老党员划入‘异类’”，视为“不稳定因素”，这种违反宪法中言论自由条例的行为，不正是根深蒂固的“法外党”病态？

这就更加闪耀李锐先生的高风亮节，其既“五不怕”又“不撕破脸”的共生智慧，好似超越了人类导师的“阿尔法狗”（AlphaGo），成为源于党而高于党的一种新型“人工智能程序”。

丁东先生说得好：“他（李锐）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想方设法启动政治改革，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中国官场普遍失去信仰，追逐私利，日趋腐败；中国知识界主流精神矮化，畏于关怀公共事务的今天，李老尤其显得可贵。”

如此“思贯古今少旧辞”，“思想领军永向前”的共生先知李锐，永远“天下风走而响应”！

2018年5月25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我和李锐

皮公亮



在夫人告别仪式上作者与李锐合影

我认识李锐学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武汉大学成立校友总会。这以后几年几乎每年都召开，全国各省

（市区）校友代表来校聚会。当时李锐是武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我是武大武汉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每次我们都参加会议。一次在聚会时，我很熟悉的武大长沙校友会会长潘基礪（在校时与李锐是同届的同学）把我介绍给李锐。李锐约我在会议休息时，到他房间里谈话。

李锐在武大读书时，我父亲皮宗石是武大的教务长，他们很早就认识。“一二·九”运动时，李锐在校带头“闹”，我父亲代表校方处理。从李锐后来写的文章中对我父亲的印象不好，说我父亲很保守。解放初期李锐南下到长沙，与我父亲见过面。

我到李锐房间与其交谈时，他很平易近人。向我了解我父亲及我的情况，他说：“你父亲认识我父亲，可惜我父亲去世太早了。他们是同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是你父亲在长沙时对我说的。”

每次校友总会聚会我们都见面，我们逐渐更熟悉了。李锐向我了解徐懋庸在武大的情况以及庐山会议后，武汉又打出了一个什么“文化俱乐部”的情况。徐懋庸是参加接管武大的军代表。他从来不是武大的一把手，但此人很霸道，实际上掌握了武大一把手的权力。徐懋庸到武大时，我已毕业离开了武大。我与徐懋庸从未谋面，但我听说了有关他的不少传闻。他目中无人、功臣自居，瞧不起武大一些教授，执行极左路线，尤其是在思想改造及三反五反运动中，他无情地批斗一些教授，甚至电令已被周总理兼外交部长调到外交部当顾问的原武大校长周鲠生回校接受批斗，幸周总理阻止未果。

徐懋庸极其粗暴的作风，引起武大广大师生的严重不满。据我同事宫强（曾是中南局的干部）对我说：“在一次中南局大会上，他亲眼看见叶剑英当众狠批徐懋庸，说他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造成了极

坏的影响，并把徐懋庸调离武大，降职处分到中南局党校，任一教研主任。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李锐学长，李锐说，徐懋庸在太行解放区就是一个坏人。后来我又将武大子弟项烁撰写的“徐懋庸——武大整人第一人”一文寄给了李锐。至于所谓的“文化俱乐部”，长江日报的几位领导都被打成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都平反了）。我找他们了解“文化俱乐部”的情况后，在1994年我去北京时，到李锐学长家中向他作了汇报，他认真地听了，并作了记录。

李锐学长知道我是党报的记者，他要我利用报社资料室为其找一些资料。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与他有些书信来往。

每次校友总会聚会时，我们武大武汉校友会也尽地主之谊，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校友，参加一些活动。一次武大武汉校友会在黄鹤楼举办跳舞晚会时，李锐学长也参加了。他的交谊舞跳得很好，因他职务最高，许多人称他李部长，他立即说，这里只有学长，没有首长。他为人低调，可见一斑。

1993年，武大百年校庆时，我的妻子刘茂舒（也是武大校友）在聚会时，因过于兴奋，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恰好李锐学长在武汉，我请他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他即刻同意，我非常感激。

辛子陵撰写的《千秋功罪……》一书出版后，我们在武汉的许多人都看了。我大学同班同学王孔旭看后，写了一百首打油诗作为读后感，想寄给辛子陵，但不知其地址。这本书是李锐作的序，王孔旭知道我认识李锐，托我给李锐写信，希望能得到辛子陵的地址，李锐学长很快回了信，告诉了辛子陵地址，从此王孔旭与辛子陵联系上了。辛子陵写了一副条幅，送给王孔旭，以示感谢。

我在武汉，李锐学长在北京，无法见面，但他的文章和记者的访谈录以及他的一些活动，我从《炎黄春秋》上和网上都看到了。他的观点我基本同意。他这个入党八十多年的老党员，一生坎坷、受尽磨难，能健康地活到一百多岁，真是奇迹。祝愿他健康长寿，看到祖国美好的未来。

2018年5月23日 时年九十三岁

一株高贵的野草

金常政

向高贵的野草——李锐致敬！

在《野草诗辑》出到第 11 辑时，也就是 1993 年前后，不知是哪位社友把李锐拉进野草诗社来了。野草嘛，李锐早就认为自己是党内狂野的了。说李锐是“高贵”的野草，他确实高而且贵。高贵，是指他的名望，他的地位，他的才干，他的胆量。他在中央是力排三峡工程上马的大势力，敢在最高层会议上与力主三峡上马派对决，而且竟把主席给说动摇了，以至当场封他个“兼职秘书”的头衔。到 1958 年，他以这个身份上了庐山，因支持和同情彭黄张周，便成为反党集团的一员，后竟被下放北大荒，再投入那座高级的秦城监狱。有了这些生活体验，他能写出《庐山会议实录》和《龙胆紫集》这样的名著。遭贬前，他已是水电部副部长，复出后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当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能说不高贵吗？

说来也怪，许多高贵者投身野草丛中，既不甘心在野，又不甘心是草，李锐交《野草诗辑》第 11 辑发表的诗，毫不犹豫就表现了他的野草性格：头一首就是《三峡问对》。那胆量，那勇气表现在最后一句：“剩得双肩搁一颅”。第二首就是《庐山吟》，他写道：“晚霞正爱仙人洞，骤雨旋迷五老峰。山上风云时易变，岂能不测怨天公。”这一辑还刊出他的《怀田家英》、《秦城吟》等诗。

李锐跟我有何关系

李锐比我大 12 岁。从前是慕名，现在是诗友，别看他“高贵”，我却觉得他是真正的野草。在诗社活动中，野草遇野草，更易相知，当然会接近了。我与李锐结识，可能就在 1993 年他刚参加野草诗社的活动中。后来在书摊上买到他的名著《庐山会议实录》，读后得知不少庐山会议斗争的真情实况，受益匪浅。不久，我写信给他，因为敬仰，希望讨得他的墨宝。我知道，向他求字的人一定不少。名人嘛，所以在信中特意表白，我非轻易求字的附庸风雅之徒，生平仅向三位我最

崇敬的人求过字，一位是我的老师萧军，一位是我敬佩的楼适夷，您可能就是最后一位了。我在信中还告诉他，曾读过他的《庐山会议实录》，发现书中印错字达 60 多处，实为遗憾。

1995 年 12 月 29 日，他电话约我去他家见面。第二天我和老伴张曼真带着那本《庐山会议实录》和编好的正误表，前往复兴门外 22 号高干楼登门拜访。他已把字写好，但是我还是先把我的“编辑成果”献上，表示我并不是无功受字的。李锐奉茶毕便笑道，那是本盗版书，他已知道有多个盗版矣。他说着便从书柜中取出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并题字相赠，说这是他刚收到的真真正正的正版书。得，我找了半天错字，劳而无功，白费劲了！但是，我还是把盗版书送他，建议他留作个“被盗版”的纪念好了。还好，我有备而来，把我的劳动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和近作《辽宁寻旧行》诗相赠。李锐聊着聊着，还取来一篇近作打印的《澎湃怒潮天尽头》文章赠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字，写的是《秦城旧句》，那是一首七绝。我们取回裱好，一直挂在我们客厅的墙上。诗如下：

无可奈何人已老，似乎觉得气犹横。
莫辞头白仍堪饭，依旧胸中血沸腾。

无论是诗还是字，从中都可看出一股气。什么气？骨气啊，傲气啊！正是我所仰慕的那种气呀！

在李锐同志 102 岁超高寿时，特以本文向李锐同志致敬！

另附七绝一首

怀李锐

百年傲骨成国士，德赛先生乃锐公。
每诵秦城绝句后，风生水起荡胸中。

野草诗社诗友 金常政 时年八十九岁

附：李锐日记摘录

199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晴

.....

中午稍休息，即写字：帅大姐、张扬、金常委，黄伟经。

.....

1995年12月30日（星期六）晴

上午金常委夫妇来，大百科副总编，学俄、英语的。夫人是原军事系统翻译。一个中右，一个开除党籍，都是杨成武造的孽。送我《天文卷》，第一本，金的责编。野草诗社发起人。向我要字，写了幅“咏老”。谈到日前野草聚会，魏传统着军服挂毛像章，侃侃而谈世道人心（魏签名151人抗议李志绥《回忆录》）。

千人之诺诺 不如一士之谔谔³

——读李锐新著《直言》有感

胡显中

捧读老革命家李锐的新著《直言》，如夏日饮冰，雪夜围炉。掩卷沉思，从大脑的记忆库里，自然地奔涌出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里那段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

综观中外历史，专事揣摩、善察风云、见风使舵的“诺诺”之徒夥矣。经过历史长河的反复冲刷淘洗、严格筛选，大浪淘沙，至今大都灰飞烟灭。有的甚至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骂名千载。从秦朝的赵高直到距离我们最近的陈伯达都是如此。与之相反，心系社稷、关怀民瘼、善于思考、敢于仗义执言，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人们敢思而不敢发者，几稀矣。正因为少，更显其难能可贵。难在何处？贵在何处？就在于不媚权势，不随流俗，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犯颜直谏，或慷慨陈词，或秉笔直书。这样的“谔谔”之士大都不为当时社会所理解，不为世俗所容纳。因而大都生前常戚戚，身后更萧条。但是，历史无情却有情，吹尽黄沙始见金。历史终将还其清白，显其高大。这样的“谔谔”之士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弥足珍贵。历史为之而生辉，民族因之而自豪。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李锐从1939年投奔延安，至今整整60年。所以该书的副题为“60年的忧与思”。60年来，作者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办报、水电、组织人事……。从1958年起，作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为时仅20个月。1959年夏，庐山风云突变，作者也被卷入政治漩涡，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被迫下放劳动改造。1967年到1975年更身陷铁窗长达8年之久。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所经历的60年，本身就是一部大书，值得许多

³ 胡显中先生的文章是通过陶老师群发给蔡新平，蔡发给大雪/久业，再发给王克斌，最后落脚到我的电子信箱的。其分量、其情谊……

晚辈仔细阅读，认真点评。特别是在 1958—1959 年间，参与中枢决策活动，后来又遭贬，其所见所闻，所思所言，无不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无不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该书以 60 年历史为经，分为 10 个单元。每一单元撷取其重要著述，配以照片，古体诗词、楹联等，从编辑技巧方面来看，可谓图文并茂，诗情兼备，相得益彰。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列席党的 15 大时的书面发言。这一长达万言的发言稿，曾在境外媒体上披露过。¹ 笔者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渠道阅读到这份文件，但难断真伪。该书首次向国内读者公开发表，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一来可以免除“出口转内销”辗转过程中的失真和讹误，二来也表明：近年来国内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允许某些不同的声音公开发表。几十年来，国人过惯了“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精神生活，偶尔听到一些并不“一律”的声音，真如空谷足音，喜不自胜。

李锐的书面发言分四部分：

- ① 党 76 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
- ② 其根本原因何在？

③ 应当总结 1978—1998 这 20 年的经验教训。作者建议：应当像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做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作者并列举了不容回避的几大问题。（这部分与境外媒体所载稍有出入。境外所披露的是七个问题，《直言》只公开其中五个，见第 446—447 页）。

④ 中国今后的危险是什么？在这部分，作者首先举出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在各级干部中是否存在的问题，其次是党的领导问题。作者尖锐地提出一个一般人所不敢涉及的但却非常重要、至为关键的问题：如何能保证党不犯错误？作者沉痛地说：“过去我们是吃尽这方面的苦头。党是受人控制的，人又必然受到三种限制（恩格斯说三条：历史时代、知识经验、思维能力。还应加上一条：个人品德）。”

细读这篇书面发言，真切地感受到一位年届耄耋、自感“来日无多”的老革命家对国事、天下事关怀备至、耿耿进言的赤子之情，感

受到这位老人为了党的清廉、国之富强而上下求索的拳拳之心。不禁令人想起曹操在《步出夏门行》里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本书在编排方面也颇有可玩味之处。如李锐与毛泽东的另一位秘书田家英的交往。由于工作关系，二人从相识到相知。庐山风波时，也就是1959年7月23日风云突变之时，李与田等四人沿山漫步，相对无言，默默地走到一石亭中，有人提议为亭写一首对联。田家英即兴写下：“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四人依旧默默而行（该书第361页）。“默默而行”，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细品此联，对仗工整，寓意深刻。上联写景，下联写情，情由景生，情也代表了此时此地四位知音的共同心声。

耐人寻味的是，这副佳联在第406页再次出现，并用三号宋体刊作标题，该页刊有一张照片。照片的文字说明是：“1996年5月16日李锐夫妇同邵燕祥夫妇、朱正游黄山等名胜。”

1996年5月16日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仔细一想，啊！这一天不正是“文革”初期重要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发表30周年吗？

我们党一贯重视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一贯强调“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甚至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诞生或逝世的日子，各大报刊都要事先组稿、及时刊发有分量的纪念文章。可是，不知道是由于疏忽或健忘，或是因为某些人的忌讳，惟独对于反右、文革等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特大事件却讳莫如深，所有媒体上没有片言只字提及。这是为什么？

人们有理由怀疑：对于历史难道有两个标准？两套办法？

我们常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又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一贯作风和传统美德。可是真正做起来又是多么不容易啊！可能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李锐夫妇等人恰恰选择“5·16通知”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30周年纪念日去游黄山并拍照留念，并收入自己的新著中，占据一整页的篇幅。其中大有深意在焉！

还应该指出：照片时间是1996年，而作为标题的那首对联却是在

27年前所写。当时四人除李锐外均不在照片之中，地点也不是当年的庐山。时间、人物、地点都不吻合。用那副对联作为照片的标题，是编辑或作者的一时疏忽大意吗？当然不是。虽然地点由庐山变为黄山，时间相距27年，人物均不相同，但那副对联与照片上人物的思想仍是相通的。这正应了李商隐那句名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照片人物与当年漫步庐山四位知音的心境毕竟是相通、互相理解、共鸣的。只可惜随意写下这副妙联的田家英已在文革初期以死抗争，为真理而献身了。那么活下来的人自然有义务继续为田家英当年为之献身的“理”而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了。果然，照片中的人物中，李锐本人近年来关于党史方面的著作颇丰，邵燕祥也是笔耕不辍、屡有新作问世的知名作家，朱正则在去年向读者奉献了一部血与泪的纪录——《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最后还应该提到：作者是在医院中完成这部新著的最后校订工作。以久病年迈之躯，勉力而为，其精神十分感动人。作为读者，衷心希望李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并献上《三国演义》卷首那首《临江仙》中两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希望李老这座青山长在！

发表于《随笔》（广州出版）2000年第1期

注1：《当代中国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98年第2期4—16页。

李锐情注毛泽东

董国和

李女士：寄上一篇早年的旧文，以示对李老的敬意。

——董国和匆匆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早年毛泽东》的前身。它一九五七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是李锐研究毛泽东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新中国研究毛泽东的开山之作。它为大三十三开本，印数为十万零四十七册，全书二百七十六页，当年售价仅一元。

说起李老写作这本书，也是他特有的缘份。长沙解放后，他成为《新湖南报》的负责人。有一天去拜访湖南《大公报》老板张平子，因交谈甚欢，就以全套合订本相赠。读了报中毛泽东发表的早期著作，就使他萌生了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想法，此后就开始搜集资料。湖南为毛泽东故乡，资料异常丰富，其中就有周世钊保存的信件和书籍。通过研读毛泽东写在《伦理学原理》上的读书笔记，他感到这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有直接关系，就更坚定了研究的决心。书稿写成后，自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青年》上连载。因发表时有删节，单行本才恢复了原貌。书出版后反响强烈，也很快就销售一空。

它因供不应求，1958年和1959年分别又出版了再版本。1959年4月，它还出版了朝鲜文和哈萨克文本。1960年，大连工学院在召开1959年度先进工作者大会时，它还被当做奖品，颁发给获奖者以示鼓励。而李锐此时早已成为另类，被发配到安徽磨子潭去进行改造了。

此书大受欢迎，除了主人公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主要还是写得好。说李锐的文笔有多好，仅用一事就可举一反三。1958年“南宁会议”后期，他奉命到会，与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林一山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三峡建设的意见。林为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李锐职位比人家低，但他明知毛泽东在视察长江时，已挥笔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诗

句，其主张上马的意向于此可知。然而，他不同意立即上马的谏言竟然获得赞同。这除了他敢直陈己见，就是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我们需要这样的秀才”，还由此调任为秘书。文笔能受到毛泽东赞赏的人屈指可数，《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为何受欢迎，也就于此可知了。

《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合二而一之作。李锐在它的《前记》中，对它作了详细介绍：辽宁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了我的两本书，一是旧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修订三版，内容有所增补，书名改为《早年毛泽东》；二是《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现在文化出版界的朋友建议我将两书合成一书出版。盛情难却，也是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毛泽东的早年，就答应下来”，这就是它成书的由来。它由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第一版，到1997年7月已再版三次，印数由9501册增为14000册，可见它的畅销程度。

如果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李锐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早期部分，那后来的《庐山实录》、《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大跃进亲历记》等著作，从党史、思想史的角度看，更有深度也更有价值。《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毕竟是凭资料而写成的一本书，而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则是由耳闻目睹的亲密接触而得，它的真实、准确和私密性，就无可替代也无可能比。

在《老社长》一文中，钟叔河先生对李锐先生毛泽东晚年的研究，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李锐以研究毛泽东晚年而树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全世界都承认他，历史上也站得住脚，这是为中国和中国人做了大好事，也就是立了德”（《小西门集》186页）。古人有“三立”之说：“立德、立功、立言”。而将立德排在第一，可见念楼的评价之高。但这一切，都缘于《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本书。也是由此，他才写下这样颇为自豪的诗句：“往昔珍闻谁敢录？当今轶事我书成。”这一个敢字，显示出他从事毛泽东研究的风骨与追求。无此，也就无有立德之誉。

三 | 字

李锐
字

人
民
不
會
忘
記
您

清華學人



清华学人 王普

李锐先生高寿

一群清华校友
戊戌夏 敬书

天地良心

一群敬仰您的清华校友
戊戌夏 林海敬书

陈国阶

理真志锐，百年锤炼，世纪英杰，思想先行。不为权倾，不向势倒，不齿媚态，不畏专横。秉直国计，任贤选能，心净路正，神鬼不惊。诤言遭忌，良策受惩，生命跌宕，信念不更。识君者醒，信君者诚，敬君者笃，赞君者贞。骂君者昏，辱君者鄙，恨君者腐，批君者虚。天佑俊才，山寿为证。

2018年5月24日

甘肃兰州 李连斌

我认为，李锐老的《庐山会议实录》是理解现代中国、认识毛泽东不得不读的伟大著作。

2018年5月23日

刘 海

人生苦短，但是只要活的有意义，才是根本。尤其是敢于不顾生命地揭露当局者的谎言，也就活出了尊严，历史将记住他，人民也将记住他。他将是一面文明的旗帜高高飘扬。

2018年5月22日

大众一员

一直都在探索追求坚持真理。坚持真理的声音越微弱就越清晰越珍贵。

2018年5月22日

韦 石（博讯新闻网）

给尊敬的李锐先生：

我长期关注您。您在过去和现在，都展现了正直、良知、有担当，难能可贵。诚挚的感谢您！

2018年5月23日

陈建源

李锐老人病情严重的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许多人对老人家充满了关注和祝福。关注他，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投身革命即具有“四化”标准，有着非同一般的传奇经历。祝福他，因为像他这样敢说真话的人太少了，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这样的人。衷心祝愿老人家能躲过此难，恢复健康！

2018年5月29日

普通人 陈长久

李南央女士，

我是一个普通百姓，非常关心李锐老先生的健康，并且关注他的有关思想和经历，尤其是他对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文章。

关注历史，也是关心每个百姓个人的命运；关注历史，也是防止我们这个社会重走过去的错误道路。作为普通百姓个人，可能在国家政府的决策方针上做不了什么，但是关注就是力量，关注的人多了，也会防止某些坏人把我们国家拉向倒退的方向。

为了惦记他的人们，为了这个国家的百姓能够更多知晓我们真正的当代历史，为了让这个社会有正义和良知的人们还有感情上的依靠，当然也为了您们全家的幸福，祝老人家尽快恢复健康，告诉老先生太多的人祝福着他，爱着他。

2018年5月22日

湖北 越峰

李锐老：

虽未谋面，却见字如面。读过您的文章听过您的故事，由衷敬佩，您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在我的字典里，民族脊梁并不一定有丰功伟绩标炳史册，却是那些在民族危难之时敢于振臂一呼之人，或特殊转型期人们迷茫之时敢于仗义直言之人。共识、良知和人性，应是一个民族的底线也是良政的职业德操。

2018年5月22日

张欣生

李老年轻时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为追求国家的民主自由而千方百计找到了共产党。但是，在延安及建国后却屡遭磨难。文革后终于复出，重见天日。如果他活得自私一点，可以轻松地安度晚年。但是他没有，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继续为宪政的建立而呐喊。他写下的回忆录，使我看到了真实的历史，才知道过去学到的只是伪历史。他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功德无量。

2018年5月23日

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南央女士：

我大概在八、九年前曾与广州一朋友拜访李老，也曾照相留念。后来虽未再谋面，但是通过各种渠道，他老人家的一些重要活动和讲话时常传来，给我们后学以很大的鼓舞，让人感到这个党尚有良知在，这个民族并非都是懦夫和犬儒。近几年，我本着公民和知识人的本分，教学研究之余，也参加了一些呼吁政治文明和司法公正的活动，包括为癌症晚期的刘晓波先生说几句公道话。今天，自然环境的雾霾尚未减轻，社会政治的雾霾却越来越浓，让人简直无法喘息。但我坚信，一切与历史潮流相悖的做法都长久不了；只要改革开放能坚持下去，市场经济真正发挥基础作用，中国的天空一定会晴朗起来，李老的精神也终将照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

录鲁迅先生言以敬献李锐老：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赴后继地战斗，不过总在一面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诳骗，却看看他的筋骨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2018年5月22日

一个在“祖国怀抱”瑟瑟发抖的人——抱歉，不敢具名

一个晚辈，一个在“祖国怀抱”瑟瑟发抖的人，在深夜写给李锐老的私房话：

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同是共产党人，早期建党之初的那批仁人志士，以及之后二十八年间为了内心的理想，出生入死视死如归的、一波又一波毙命屠刀下、扑倒在枪林弹雨中的英烈们，与今天的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之流，以及大小不可一世专横跋扈惯于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高官恶吏们，他们真的是同一类人吗？他们果真怀有相同的理想和信仰，共同的人生追求吗？如果真有所谓阴间，这前后两种共产党人在阴曹地府遇上了，会不会剑拔弩张怒目相向，互将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呢？

李锐老以一个永怀初念不更初心、有八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之坚定刚毅，固守着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和誓言，却被其所在的党划入“另类”，此一事件再次证明了我心中的一个判断：今日之共产党已非昔日之共产党，今日之共产党人已堕落到昔日之共产党人要清除埋葬的对象。

李锐老，您对理想的坚守，您对信仰的忠诚，使您成为了“他们”脸前高高耸立的一面照妖镜——当“他们”视您为“另类”时，再充分不过地表明了三个事实：

- 一、“他们”是一群挂羊头卖狗肉的共产党人；
- 二、“他们”是中华民族登峰造极的祸害者和败类；
- 三、“他们”是一群真正的人渣甚至比人渣还坏。

2018年5月23日

马昌海

南央好：

我想对令尊大人说一句话：李锐老这一代大彻大悟的民主战士，启发，教育、影响了无数人。我们永远感激这一代有良知、有理性深度的杰出启蒙者和引路人！

2018年5月24日

林梅梅（林枫之女）

李锐叔叔：非常佩服您的正直，说真话。向您学习！

2018年5月22日

唐怡

李锐先生：理性的光辉，人性的楷模！

2018年5月22日

杜厚勤

走出二十四史，邁向現代文明

李銳老晚年以其“何時憲政大開張”的詩句道出了他一生的矢志追求和對未來的殷殷期盼，也表達了我等晚輩的心聲：儘管前路漫漫，依然充滿荊棘坎坷，但千江萬河終將匯入大海，世界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明日之中國必然會走出二十四史，邁向現代文明。

2018年5月26日



杜厚勤拜访李锐时摄

顾晓渔

献给可歌可敬的李锐并安慰李南央及家人

在阅读您和您女儿写的回忆录后，才真正体会到您才是共产党员中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您毕生追求正义，不怕打压，为苍生呐喊，以良知告诉大家真相，内幕和历史。表明您心地光明善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深挚的爱。中国需要更多像您这样的引领者。

您永远值得全国人民尊敬和敬佩！追求真理的人必得永生！您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2018年5月27日

后学许有为（安徽合肥九十三龄离休干部）

敬献李锐老

嘉禾人瑞，国之祯祥；学贯中西，术通文理；心系朝野，道达古今。

二零一八年岁次戊戌仲夏之月上浣于古庐州

汪葆明

李锐，一个大写的人

早就想给李伯伯写几句了！一则因为我母亲安若作为新华社资深记者与李伯伯历史渊源深厚，使我有幸主持了李伯伯的米寿，亲眼目睹了这些老新华社记者为争取中国的民主政治不忘初心，坚守信仰，以及对当今时局的忧心忡忡，痛心疾首！二则因为《庐山会议实录》洞悉了李伯伯成为中国政治风云标志性人物的真相，他虽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仍坚守信仰，矢志不渝。无论是在秦城监狱用紫药水涂就《龙胆紫集》，以铭心志，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屡屡上书，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大声疾呼！

李伯伯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不畏强权，秉笔直书，以百岁高龄挺立风口浪尖之上！李锐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大写的人！

2018年5月24日

邹平（西南政法大学 79 级）

写了两句话，献上我对老爷子的衷心爱戴和美好祝福！无论什么朝代，在历史的长河里都是短暂的瞬间！李锐老先生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将被载入史册的历史先贤！对于那些付出了巨大惨痛代价而勇敢追求真善美的人，人们会永远尊敬和纪念他们的！

沐天恩登龙门捍赤旗享太庙咫尺之近
请民主入冷宫怜苍生立丰碑千秋以远

敬重李锐伯伯的晚辈：罗京生、张晓观、白东风、李康力、沈云彪、魏北秀，谢庆庆、谢明、谢三红（李锐挚友谢文清子女）

我们渴望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
我们渴望中国尊重遵循普世价值！
我们渴望中国人民都能成为公民！

到那时，我们希望华夏大地也有一座拉斯莫尔山，在那山峰之巅，耸立着李锐伯伯的伟岸身躯，还要有耀邦，紫阳。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普罗米修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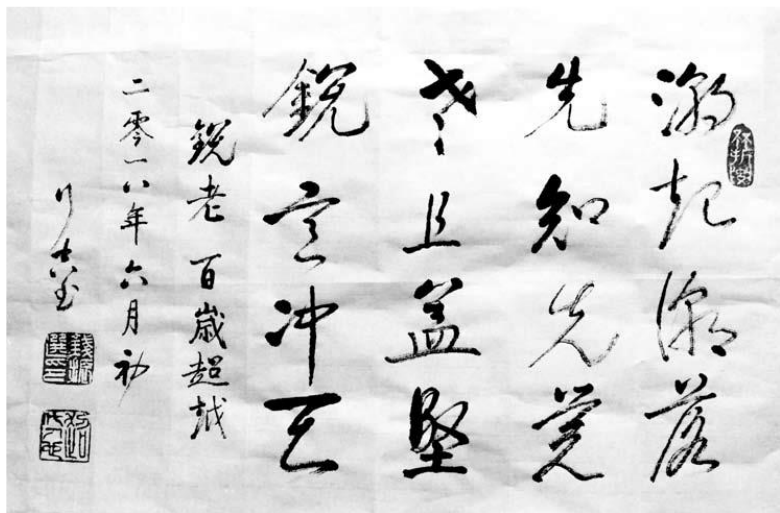
这是我们的梦！

2018 年 5 月 24 日



左起：汪葆明、老鬼、谢庆庆、张丽娜、沈云彪

钱振选



鹤兄：您好！

读过《约字》后，不知写什么为好？思来想去，得以下几字：

潮起潮落，先知先觉，老且益坚，锐意冲天。

写了几遍，选了一件附上。如可以，请转达南央女士。

鹤兄：那幅字发出后，为阐心意，拟了小文于下：

百岁超越

他，开始了一百零二岁的生命历程，超越了百岁。奇迹！何止超越了百岁！

他，超越了权势，与百姓同命运、共呼吸。

他，历尽坎坷，百年历史的见证，尽力还原真相，撕去伪装的画皮。

他，超越了血色的信仰，回归到普世的家园，捍卫着这个蓝色星球的美丽。

他，超越了名利，超越了自己！展现出人性之光辉！

敬贺锐老，百岁超越。

向锐老致以崇高的敬礼！

2018年6月3日 于行空居

祁雪（郑州市民）**敬佩李老风骨！**

由李老坎坷的人生，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是离休干部，同样是为说真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始终如一，无怨无悔。两位都是恪守良知，不肯摧眉折腰的大写的人。做为后辈，我们一定会继承光大他们的硬骨头精神，为乾坤正气增资！

陈祖堃 华伟范（美国）**李锐老先生精神不朽！**

南央、悌忠：你们好！

《敬寄李锐》（电子一版），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当前思想界、舆论界一片死气沉沉的表象下，还是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他们挺直脊梁，不畏权贵，独立思考，衷心地支持李锐老先生。这股涌动的热流，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们也说几句自己的看法。

李锐先生躺在病榻上，自知来日无多，他看到一生所追求的民主，宪政，法治的目标仍未实现，而且还有越来越远的趋势，让他难以瞑目，多么让人心痛！李锐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磨难，还是保住了脑袋，并活到了百岁高寿。许许多多为真理呐喊，为权利而抗争的人士被杀头或被折磨而死，比起他们，李老还是幸运的。李老一生光明磊落，忠心为国为民，刚正不阿，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保持了高尚的人格和良知，已无愧人生，何憾之有！“世间无人问是非”，非也！其实谁是明君，谁是昏君、暴君；谁是忠良之臣，谁是奸佞之臣；以及历史事件的种种是非曲直，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即使暂时被蒙蔽，也总会有醒悟的一天。请告诉老人家，海内外大批有识之士都认同、支持李老的观点，钦佩他的学识，崇敬他的为人。我们相信开历史倒车是不会长久的。靠愚民、禁言、高压来维稳，不符合大禹治水的道理，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中国的出路在于顺应世界潮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进入民主、宪政、法治的文明社会。

2018年6月22日

荐志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78 级）

李锐老，我是青年时代知道您的。这些年来，读到您的一些书籍文章和关于您的事迹介绍，每每为您感慨、为您叹息。特别是为您的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胸怀真理和天下苍生的情怀和思想所折服。因为有您这样的前辈启发引导和同道同行，更坚定了我对中国未来实现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社会的信念。但愿那一天早日到来吧！

2018 年 7 月 3 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78 级部分同学

向李锐老致以诚挚的敬意！感谢您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启发和引导！真理之光永存！

2018 年 7 月 3 日

邵晟东（河南“郑州思想沙龙”发起人之一）

敬献李锐先生

一生坎坷，壮志终不坠；
百年梦想，宪政必成真！

自注：

“郑州思想沙龙”于 1995 年创办，至今已逾 20 年。沙龙秉持宽松、包容、理性交流的原则，广交朋友，广泛探讨各类问题，期益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现在沙龙在继续发展，影响力日益增强，名声远播海内外。

2018 年 6 月 20 日



曹思源（左 1）陪同郑州思想沙龙的崔晟（右 2）曹小龙（右 1）拜访李锐

四 | 诗

祝李锐老平安
李锐已入千秋史
帝王难开一页新
万千祈愿可沉山
一众几代江海心

一个老友女儿谢小玲
吕文崇书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祝李锐老平安

李锐已入千秋史，
帝王难开一页新。
万千祈愿可沉山，
一众几代江海心。

谢小玲

2018年5月23日



给李锐

周实



我曾去过你的故乡
在那叫作平江的地方
和南央
和悌忠
和忙忙

我听说你离开故乡
投身革命去那远方
没有告诉你的妈妈
乡人都以为你死了
不知死在什么地方

后来
过了好多年后
直到一九四九那年
你才南下回到故乡
你赶回去看你妈妈
她却给了你一个耳光
大家以为你是个鬼
借尸还魂
回到故乡

我还听说
我还听说
听说很多
我无法说

你已成了一个传说

附字

认识李锐、李南央当然是在编《书屋》时。李锐我就不多说了，我曾写过一篇长文，题目就是《李锐先生》，收在拙著《老先生》中。李南央呢，也不多说，自从她的那篇宏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在《书屋》杂志发表之后，她的名声已足够大，很多人都为她叫好，不少人也说她不好。

我想说的是5月21日，她给我发来一封电邮，说她想向我们“约字”。她所说的这个“我们”是指几位老先生，一个是钟叔河，一个是朱正，一个是李冰封，同时捎带上我。她所说的“约字”，是说一般的习惯做法是等某人走了以后，由亲友们为逝者出上一本“纪念文集”，以表怀念和追思。但她不愿这么做。她想以违反传统的方式，现在开始就“约字”，向认识或不认识但知道李锐的人“约字”。如果约到了十几万字，立即就做成一本书，让父亲在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人们的评说。她觉得她这样做比在父亲走了以后再做事有意义些。

这就是李南央。

她的“约字”立即实现，我说的是她这次电邮。钟叔河先生当天交我他的挽联；朱正先生和儿子第二天写了；李冰封先生告我要好好动脑，第三天交我他的挽联。我当然也写了，就是上面这首大白话《给李锐》。

2018年5月23日

贺李老寿辰四首

牟广丰

白发耄耋近百年，人如松柏气如兰。
一身正气压邪恶，满腹经纶著巨篇。
风雨庐山扬道义，雾霾京兆奏直弦。
董狐史笔今重现，勇将何谈壁上观？

2015年4月12日

百年都在路途中，宪政开张攀险峰。
武汉求学真理探，延安抢救挫折逢。
庐山风雨初心见，京畿文章肝胆红。
老骥伏枥千里志，廉颇依旧气如虹。

2016年4月12日

耄耋已是年轻日，百岁犹如青壮时。
老骥伏枥前程远，精神矍铄退休迟。
忧天忧地为华夏，救国救民当尽职。
末世艰辛史命在，孤臣孽子守良知。

2017年4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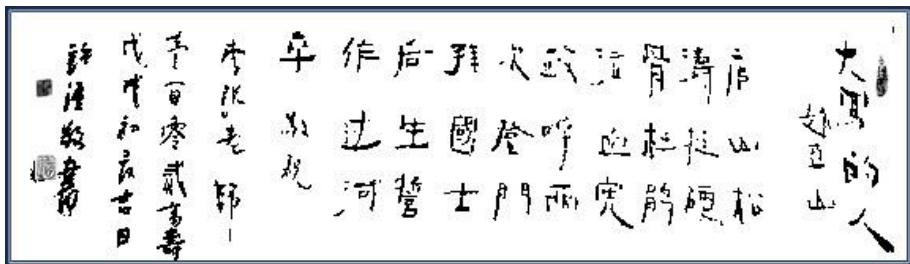
铁骨铮铮老亦强，承压淬火铸成钢。
伤风感冒一周愈，咳嗽发烧半月康。
游泳下棋皆不误，读书写字也无妨。
铁肩道义担当久，宪政终将大开张！

2018年4月9日

大写的人

赵亚山/许强书

庐山松涛挺硬骨，杜鹃泣血宪政呼。
两次登门拜国士，后生誓作过河卒。



李锐老师壹百零贰岁高寿
戊戌初夏吉日
许强敬书

笔者赵亚山，曾经于 2014 年、2016 年，先后和郑州的朋友曹振书，武汉的朋友王智仁、王毅两次登临李锐老人家府上，聆听李老教诲，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2018 年 5 月 23 日

民族脊梁民族魂

秘书三任尽职责，
书生报国十卷在。
真理长剑刺三峡，
江船论战辩雄才。
匡庐云霭青松立，
北国荒原苏武哀。
寿星期颐民族幸，
铮铮铁骨撑国泰！

2018 年 6 月 1 日

书生当如李锐老

北国锤炼文人胆，
秦城难折赤子腰。
秉承齐董气如虹，
纵笔时政推墙倒。
期冀宪政早开张，
“双料流氓”揭国妖。
使命良知一身兼，
书生当如李锐老！

2018 年 6 月 3 日

敬李锐老 七律五首

王毅

（一）

飞落春花怨雨风，
苍天夺我老元戎。
匡庐云雾显刚节，
北国荒原挺劲松。
为济黎元君仗剑，
秉承董蔡气如虹。
泉台一去盖棺定，
马列别揖见盛翁¹。

（二）

手擎大纛创《炎黄》，
一扫迷云去伪装。
司马文章跃史册，
陶潜风骨永留芳。
暴君自古奸民意，
官吏从来著假章。
留得真言抛后世，
功德自有后人量。

（三）

革命百年戏五分，
分分浸透泪斑痕²。
延安抢救入囹圄，
彭案奇冤遭暴秦。
九载单囚锤意志
百年炼就好精神。
风霜剑雨等闲视，
打铁此才硬自身。

（四）

气节凛然不可摧，
党与人性两相违³。
谄媚自古多膏腴，
秉直从来顾采微。
良相奸雄若冰炭，
民主独裁不共飞。
百年回首坎坷路，
一瓣心香已渐灰。

（五）

百岁寿辰曾赴京，犹为民主费精神。
一晋高士浴春日，双料流氓说暴君⁴。
白发苍生庶民泪，暮年壮士老骥心。
口述历史真言在，自有人间月旦评⁵。

注1：盛翁，指华盛顿也。

注2：李锐老曾将自己革命生涯分五个20年，每段都有内容。

注3：李老曾说，在党性和人性发生冲突时，我选择人性。

注4：双料流氓指毛。是在长沙老宅发现杨开慧书信中所写。

注5：“月旦评”典故。本人曾在李老百岁寿辰赠寿幛一幅：
青松百岁，文章犹可倚马就；庐山风云，人间自有月旦评。
并赠诗“七十感怀十首”

南央女士钧鉴：

令尊百岁寿辰吾与河南朋友赵亚山前往北京贺庆，并赠寿幛：青松百岁，文章犹可倚马就；风云庐山，人间尚有月旦评。并与李老合影留念。上月误传李老仙逝，心中悲痛，并作七律五首，以示怀念。后又得消息，先生尚好，将诗放下。今武汉朋友王智仁转你“约字”，并要我将诗寄出，不知妥否。李老现在病况如何，念念！

顺致夏祺！

王毅

网名：望江楼主

2018年5月23日

致李公

毛新华（南开大学历史系79级）

高德高寿高文章，后生后学仰止望。
当年东床不得意，如今西宫未寂凉。
白发苍桑犹少年，赤心涅槃如凤凰。
民生民主真信念，公道自在青史长！

2018年5月24日

慰李老

云眷云舒

叱咤风云几十年，为民请命鼓而呼！
期颐之年不气馁，心系家国难去留。

2018年5月23日

赞百岁老人李锐先生

金陵南浦

百岁老人，不忘后生，谆谆告诫，谨记教训。
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控制权力，保护百姓。
百年易过，难忘沧桑，晚年悟道，光芒万丈。
泰山苍苍，长江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18年5月22日

诗一首

张楠

敬仰刚直诤言君，
李白桃红色分明；
锐意济世志难酬，
老翁抖擞待后生。

2018年5月23

王克斌

一、敬李老

李老贵良知，
傲骨抗寒霜。
庙堂进真语，
秦城志愈强。
三峡秉卓见，
笔耕赋华章。
浩气笑奸邪，
百岁美名扬。

二、敬慕百岁翁

吾敬李老师，
英名天下闻
少年爱国热，
白首卧松林。
笔下文中圣，
阿谀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

2018年5月

明月清风

敬寄李锐先生

毕生追求唯民主，
坎坷历尽大写人。
百年风雨百年搏，
为斯黎民献赤心。

南央先生：请代我向李锐老先生转达我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普通中国人对他老人家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祈祷和祝福！祝愿老先生平安长寿，狗年大吉大利，衷心祝愿他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的伟大愿望得以实现！

2018年5月22日

初心不改吁宪政

延河流浊庐山难，
铁窗八载傲骨坚。
坐牢只为济苍生，
求真何惧犯龙颜。
渡尽劫波存初心，
开张宪政是夙愿。
拼将期颐鼓与呼，
横眉利剑向皇权。

2018年6月3日

步李锐老韵谨为贺李锐老一百零二岁生日

沈汇丰

漫漫长夜痒难抓，
不见雄鸡啼曙华。
宪政自由民主事，
攸关十四亿人家。

附李锐《百年回顾》诗原玉

阶级斗争狠狠抓，
秦皇马列管中华。
个人崇拜成功了，
邪教焉能治国家！

再步李锐老

林鸟思飞欲出头，
几人耻为稻粮谋？
管它今夕是何夕，
天道轮回永不休。

李锐《百年回首》二首之一

“双百”方针刚起头，
忽然反右是“阳谋”。
自夸无法无天也，
文革十年到死休。

2018年4月13日

读李南央《李锐寿宴前前后后》兼贺李老百岁诞辰

张宝林

伴虎何曾百寿期，
依然强项骨清奇。
残窑未死凭天孔，
荒野余生赖野葵。
人仰一株冯异树，
世传千首马迁诗。
可怜家宴不名客，
应是粘杆卧底儿。

李锐女儿李南央近来著文，记述家人、朋友为父亲办百岁寿宴的遭遇。颌联说李锐在延安时被审查，多人关在一孔小窑洞内，夜间缺氧几乎憋死，亏得上方有一小孔，众人拼命扇风才得以幸免，庐山会议后曾被发配北大荒种地，赖野菜豆饼充饥。颈联说李锐如大树将军冯异为人敬仰，在秦城囚禁时以紫药水写了许多旧体诗，结集出版《龙胆紫集》，后又出版《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大跃进亲历记》等有影响的党史研究著作。末联指最初组织同意在中组部招待所食堂举办寿宴，来宾约200人。后看了名单，不准。改为五桌几十人的家宴，也有陌生人混入，读来令人啼笑皆非。粘杆处，雍正帝的内务情报机关。

2016年5月10日

赞李锐老

曲乙家

为争真谛惹君癫，久谪边农志愈坚。
胸纳百川筹国厦，不堪迷恋庙堂沿。

赞李锐老

郭绍华

一生正直两头真，
为求真理献此身，
百岁仍未停歇步，
犹盼普世早生根。

2018年5月23日

致敬李锐老学长

陈昕舟（武汉大学小辈）

少年出湘水，明志始珞珈。
意本随德赛，误披闯王甲。
牯岭冤风厉，狱黑终见曦。
勤力正毛病，更期除恶习。

2018年5月24日

七律 致百岁老人李锐

黄学章

与魔共舞度百春，梦醒之时泪纷纷。
恨不君王成尧舜，哀闻浩劫惜苍生。
中南海内秉笔墨，监狱城中志唯真。
咫尺天堂难无悔，痴心一片待后人。

2018年5月29日

赞李锐老

李包罗

生于汨罗畔， 年少志气长。
武汉搞学运， 华北抗日忙。
双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延安遭整肃， 绵羊遇豺狼。
江山一片红， 专业露锋芒。
才华有人识， 行走上书房。
为民进箴言， 何言结私党？
龙颜雷庭怒， 发配远庙堂。
煮豆燃豆箕， 再进党班房。
文革浩劫起， 八年牢房凉。
两头真情现， 庐山破迷瘴。
雄文批迷信， 思想得解放。
领袖下神坛， 毛左当头棒。
民主旗不倒， 宪政奔波忙。
紫阳肱股臣， 明主是耀邦。
六四挂冠去， 百岁泣国殇。

七绝

两头真与庶民通，
百岁还悲变革空。
宪政自由云罄日，
泪飞公祭告锐翁。

又赞

李锐老是我们心中的真君子，大丈夫！

手捧天地良心，胸怀浩然正；
庙堂之高有真谏，江湖之远系民心。

2018年5月22日

七律·贺李锐老一百零二大寿

王强山

从无一面谒先生，
万古文章举世倾。
雾锁匡庐遭厄运，
冰封华夏有群氓。
幸存燕客真风骨，
已见楚人醇性情。
烈士暮年忧国是，
清江依旧绕空城。

七律·贺李锐老一百零二大寿 步韵王强山

王庭恺

人生不满公今满，
寿酒三杯且共倾。
两袖清风承德运，
等身著述启群氓。
家山万里留归客，
故国千回动晚情。
白首青云存远志，
湖湘自是有长城。

2018年5月26日

南央姐，

得悉你在收集有关文字和相片，兹呈上令尊期颐大寿时到府上祝寿献给他的一首诗及 2005 年的另一首。

崇义

2018 年 5 月 28 日

贺李锐前辈寿登期颐

冯崇义

楚魁无意创奇迹，太上有眼赐期颐；
身许赤潮青春误，道归宪政桑榆僖。
岂忍党国殃社稷，啸傲江湖擎义旗。
毛病根除转厄运，积习去尽看彩霓。

2016 年 4 月 13 日

读《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题赠李锐前辈

少年狂狷老更锐，健笔真情士中魁；
念在苍生琴心长，笑傲劫波侠胆贵。
极权专制国殇随，英雄无泪哭冤鬼；
狂澜难挽迟暮愿，得道宪政平生慰。

旅京蒙李锐老前辈赠《李锐近作》，虽其中多篇先前便已奉读，读来仍感慨万千，因得此诗。

2005 年 8 月 31 日



为黄肖路代拟俚句恭敬李锐老遐龄之庆

杜鹏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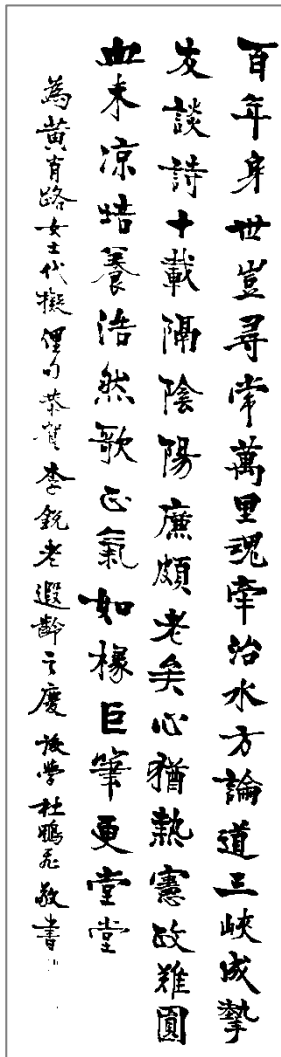
百年身世岂寻常
万里魂牵治水方
论道三峡成挚友
谈诗十载隔阴阳
廉颇老矣心犹热
宪政难圆血未凉
培养浩然歌正气
如椽巨笔更堂堂

戊戌夏敬寄李锐老先生

马杰

风雨沧桑百岁身，
艰辛世纪独行人。
横眉奸佞难容垢，
直面昏君岂步尘？
枢密飘蓬非九鼎，
春秋秉笔亦千钧。
紫书龙胆存青史，
铁骨铮铮为万民。

2018年6月26日



作者 1962 年考入西安交大，文革中以“反革命罪”滞留学校批斗。1970 年“一打三反”入狱，报呈死刑，实判十七年。1979 年元月平反。后从事新闻工作至退休。

敬寄李锐老

武汉 李乾

仿佛是来自雪山的一股清泉，即令融入大海，
留给世界的，还是那最醇厚的甘甜。

仿佛是来自亘古的一双慧眼，即令风沙蔽日，
告诉这世界的，也是那穿透迷雾的洞见。

仿佛是来自上天的一个使者，面对权势的迷误，
展示给世界的，永是那掷地有声的规劝。

仿佛是来自未来的精灵，匆匆此行，
一次又一次泣血的呐喊，
只为神州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明天。

面对多舛的命运，您从未有过丝毫的退缩；
面对权势的专横，您从未放弃心灵的自由。

面对诡谲的风云，您总是能站在最高的层级；
面对民族的未来，您总是力透纸背，沉思案头。

外一首

人生有终曲无终，
生前身后理当同，
长歌当哭情何寄？
惟念神州一锐翁。

自注：十一年前拙作《迷失与求索》请李锐老指正。李锐老安排秘书薛京先生代为回复，满满两信笺的语重心长，令笔者感念至今。闻讯李锐老身体状况堪忧，谨寄数语，以表寸心。

2018年6月24日

李锐老人

张琳璋

长安贤锐老，不识也相知！
少壮一投笔，扶乂赵氏厮。
悬壶稍觉晚，鼓击骂曹迟。
志士一歌怒，声声普世诗！

2018年4月28日

李锐公

西安 车天启

求真罹难心无悔， 笞恶醒人事有成。
谁解晚年犹砺苦， 唯将大爱悯苍生。

西安 马育中

君为求真苦，余忧泪满襟。
民谟天下事，俯仰大悲心。

2018年6月13日

祝李锐老长寿

王昌民

铮铮铁骨宪政呼，皤皤白发忧民苦。
情系苍生存初心，万众为您茶寿祝！

自注：我父亲王铭勤是1915年生人，锐老是我的长辈。父亲辛勤工作，曾被评为河南省、中南局一等劳模，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惨死。我18岁立志挖出中国人民苦难的根子，寻求脱离苦难的道路，为此坐牢，至今不悔。自读《庐山会议实录》始知锐老，知晓越多，敬重越深。锐老是一面旗帜，我和万千民众一样，切盼锐老长寿。

“茶寿”代指108岁寿龄。“茶”字分拆看，分别为双“十”，“八”，“十”和“八”。全部相加，共“一百零八”，故称茶寿。茶树一般不会老死。即是枯死了，被锯掉枯枝后，下几场雨又会在树头长出新枝叶。茶树的生长期限的确比人长久多了，故以茶喻寿，有祝福长寿的美好寓意。

2008年6月22日

后记

李南央

我是在2018年5月21日这一天发出“约字”的，今天是7月3日，这本逾十四万字的《敬寄李锐》字集已经完成。我要感谢所有送字的人——你们用“字”寄给李锐的情谊，深如大海、邃如天穹！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父亲的老友朱正、李冰封、钟叔河三位老先生，他们旧学鸿博，却是最先回应我违背中国传统情理“约字”的人。

令我最喜出望外的是父亲北大荒的难友于善浦先生，绕着圈地看到我的“约字”，连夜写出了他与中国最高级别摆摊儿卖菜籽人——李锐的患难情谊，又绕着圈地设法转我，我同时从三位素昧平生的人那里收到了他的文字。

陈巧巧是父亲楼上邻居、好友陈伯村的女儿，她人在墨尔本，生怕我收不到她写给我父亲的信，托了崔武年、周七月，自己也再三发我。

父亲当年同操水电的友人都已作古，他五十年代的秘书陆茂竹，他倚重的工程师程学敏的儿子程真送来的字，弥足珍贵。

戴晴为不会使用邮件发图像的人代劳，闫淮、丽娜将我这个坚决不用“微信”顽固分子造成的麻烦没有二话地接过去烦劳——将“微信”转换成电子附件发我。

……

深深的情、浓浓的意、写字的劳、转信的累……十万余从太平洋两岸飞来的字呵！如今汇集成这本“字集”。它是认同李锐，同盼宪政开张的人们，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带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最笃诚的探望，最温馨的慰藉！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018年7月3日

约字

收启人：

一般的习惯做法是等某人走了以后，由亲友们为逝者出本“纪念文集”，以表怀念和追思。

刚刚过去的四月，我在北京医院陪伴父亲的日子里，痛切地体会到：他对所在的党将他这个有着八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划入“另类”，将他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苦口婆心地对接党班的后来人说的那些泣血之言看作“不稳定因素”，是梗在心头的。因此我想以违反传统的方式，现在就开始向您们约字，在征集到十几万字时立即成书，让父亲在世时能够看到人心的公道。我觉得这会比他走了以后再做这件事有意义得多。

所约之字形式不拘：一个字、几个字，一行话、几行话，一幅挽联、一首诗词或是一篇文章都行。如您同时发来您同李锐曾经的合影，我在制版时会将照片附在您的字旁。

如蒙认同，请将您们写下的“字”发到我的信箱，或者发到转发我这封“约字短笺”的朋友那里，由他/她转交与我。每一位送“字”的朋友，我都会赠上一本“纪念字集”（书名待定，也希望得到您的建议）以表感激、以为留念。在纸质“字集”印出之前，我会先将电子文本发给您们，供保存或转发。

此致，

敬礼！

李锐之女李南央
2018年5月21日

编后感

——追求单纯的快乐

蒙宪

这是迄今为止，我为与李锐老有关的第三本书做责任编辑。

多年前，辗转得知南央有一部书稿，上手略翻看，直觉和经验告诉我：好稿。当即准备材料向公司报选题。老板慧眼识珠，终成事。该书甫一面世，即引起坊间关注；短短三四年间一再加印，出到增订第三版，后因故中止。

那就是《李锐口述往事》。

前不久得知南央又有一书稿，索来电子版一阅，始一惊，复一叹——生祭！虽古已有之，然现代人，非豁达通透、有大智慧之人不敢行此事。李锐老，南央君果非寻常人。

通览全稿，全书作者不愧“学操董笔”之士，钦慕贤达的高风亮节而为文，此心可鉴。其中竟有几位故人，都是因了书而相识（有的更早！）。

直觉和经验又告诉我：这个选题可为，马上向公司报选题——遂成此书。

尝闻：编辑是在为他人作嫁。当真是井蛙之见！我从事出版至今，一直心存快乐：一开始，只是单纯做编辑的快乐；后来几乎涉猎了出版链上的所有环节。虽繁杂紧张，却也练就不少技能，更是乐在其中。

做书，除了有先睹为快之便外，还为自己增值：此生有涯，太多的虚假困惑不可能一一亲身辨伪求真，籍做书，可补己之短。好书如他山之石，如他人杯酒：可解惑，可警醒，可受教。尤其是编读李锐老这类纪实性的文史传记回忆录，获益良多，如馈我以琼琚——一册在手，了然于心：大则知兴替，见得失；小则修身自省，辩伪明真。虽偏居一隅，却有幸与天下有识之士神交，复有缘将其坐而论道物化成书。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何幸有之？！书成，将一

部书稿做成一件可以令人欣赏的作品，得作者喜爱，获读者青睐。何乐不为？！

这就是做书的快乐，一种单纯的快乐——能寓与趣于稻粱谋者几何？！

听南央提及，《李锐口述往事》是李锐老著作里最令他满意的，不时拿在手上翻阅把玩。李锐老懂书，他那几本亲历实录掷地有声，定将青史留名，真正完整的史书无法绕行。写书如此，做书亦然。睿智通达、健笔如椽的李锐老，竟会为一本书做得好而喜乐，那定是单纯一如初心。正如他自况：“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想他指尖翻过，是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心中思虑，必关涉多蹇社稷黎民。

这一本，亦如是。

谨以此文，向李锐老致敬！向那一代人的初心、单纯和理想致敬！

祈李锐老：寿尔康，多珍重！——后学不才，愿为您再做几本好书。

蒙宪敬识

2018年7月16日



二〇一三年十月李锐为蒙宪题赠书法

敬祭李锐

(增订版)

增订版前言

李南央

在为《敬寄李锐》一书“约字”时，我就告诉大家这是第一版，待父亲李锐离世后，还会再出第二版。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对“生祭”有顾虑，除了太反中国传统习俗，也担心会不吉利。

四十九天前，北京时间2月16日早晨8点32分父亲走了，我在北美西岸的15日晚上9点12分向朋友们发出了音文讣告。很快地，挽联、悼诗、字、文，源源不断地流入我的邮箱。我不需要再发出另一份“约字”，只需忙乱过去后，静下心来整理、编辑……

今天终于将所有如片片雪花撒撒飘飘而来的“字”归拢、整理好了，这期间，多少次热泪涟涟。心里也实实在在地明白父亲是走了、真地走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生前看到了《敬寄李锐》的一版，他说：“了不起、真厉害！”这一册二版的《敬寄李锐》愿他在天之灵也能看到，会因为这么多的人喜爱他、纪念他，继续追寻他没有看到的那个梦想：“**总有一天我们能真正实施我们的宪法，以保证我们今天被践踏的权利**”而含笑九泉。

2019年4月5日

父亲离去未七日

增订版前缀

记送《敬寄李锐》（一版）

安锦珊

时间：2018年7月21日上午11点

地点：北京医院。



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去北京医院无数次，第一次听说还有西门。到了西门，看见有武警把守，感受到了医院的政治性。

这次去北京医院是受中学同学李南央之托，为其父亲送上一本书。送本书真是一件小之又小的事情，可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小中有大。

7月20日从加拿大到北京之后，晚上9点给李老的保姆小余打了电话，约好第二天上午去医院，但是没说几点，我也没问，一切按照节奏走吧。

在加拿大期间我就有点感冒，本想拖两天再去医院，生怕把病菌传染给体弱的老人，转念一想，南央着急送书是老人现在身体尚健，思维清晰，早一日看到书，看到有那么多人赞同他的一些理念，应该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不去想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了，带上口罩出行。

11点小余到西门接我，并介绍说早上李老下床看书看报，现在刚刚上床休息。在病房门口，用消毒液洗手，有一次性口罩提供使用。轻轻走进病房，见李老闭眼半坐躺在床上，电视放在新闻频道。听见有人进来，李老睁开双眼。

20多年前，因工作关系我采访过李老，那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睿智老人。如今从八十岁跨进百岁，变化自不待说，但是坚定智慧的眼神没变，一点没变，尽管病体缠身。

看见李老睁开眼，我自我介绍说是南央的同学，刚从美国回来，南央托我给他带本书。李老对我说：“坐”，并示意墙边有把椅子。我把椅子搬到李老床边，在他身边坐下，看到李老眼神中流露出欣慰，我知道这是我搬椅子的动作使他感到亲切。我把南央的书拿出来给他

看，并一一讲解，可能是戴着口罩，加上嗓子水肿声音发哑，李老没太听清，小余在他耳边大声翻译一遍，李老听懂了。趁着我给李老解释各种问题，小余给我们照了几张相。李老问我哪篇文章是我的，我说没有我的，是认识和接触过他的人写的文章。南央又特意打了一张大字的目录，可以先看大字目录，再找文章看。有一篇文章没有来得及收集在书里，打在一张纸上。书是南央自己打印装订的。看见李老都已经明白，我便起身告别，生怕时间长了把感冒传染给李老。临走时，给李老照了张照片，照片中有南央的书。

李老见我要走，伸出手来握手，手有点凉，这是风烛残年老人的特点，身体的活力已经不见。走到门口我转身再一次与李老招手再见，意外发现李老一直目送着我，眼中充满着信任。

短短相见前后不过五分钟，祝愿李老早日康复，风采依旧。

2018年7月22日

五 | 海外媒体报导

美国《纽约时报》

2019年2月16日

（中文译文刊 2019年2月17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共元老李锐逝世：从毛泽东亲信到中共批评者

张彦

北京——在近四十年里从 1950 年代的毛泽东私人秘书之一转变为

共产党的批评者、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和中国自由主义价值观领军人物的李锐，于周六在北京去世，享年 101 岁。

据与医生进行过沟通的李锐女儿李南央说，死因是由肺炎和消化道癌症引发的器官衰竭。李锐一直在北京医院接受治疗。

李锐坦率、张扬、思维敏捷，他的经历浓缩体现了一代人的希望和失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的历史中，顽强和长寿让他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政府批评人士。他的工作还关乎中国历史的重新塑造——尤其是毛泽东在灾难性的大跃进中应负的责任，在这一时期，饥荒导致超过 3500 万人死亡——与此同时，他在政治上的人脉让他得以保护一些较为温和的批评人士，并且公开对言论自由和宪制政府作出呼吁。

但李锐并非异见人士。他去世时仍是一名共产党员，享受着 1937 年加入中共带来的特权，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在当时尚未出生。他有一套宽敞的寓所，丰厚的退休金和大量福利待遇，例如最高规格的医疗护理。党曾经将他囚禁、下放，几乎要让他饿死，但即使被党开除，他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党组织，希望能从内部发挥作用，带来改变。

“他视自己为革命和共产党的良心，”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马



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曾这么说过。“但他对自己毕生为之服务的体制存有深切怀疑。”（马若德于周日去世。）

李锐很早就已经是一名热忱的共产党员。1917年，他生于中国南方省份湖南的一个富裕家庭，当时的中国正被军阀和外国侵略者瓜分割据。他的父亲是地下革命党同盟会的成员，该组织参与推翻了清朝，并建立起一个共和国。他于1922年去世，留下了一个没有父亲、但迫切想要追随父亲的脚步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李锐。

在武汉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期间，李锐参与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该运动是为了向政府施压，反抗不久前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行为。1937年，他作为一名地下活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使得李锐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想主义的新一代共产党员的一分子，在当时，共产党的成员主要是街头战士和像毛泽东这样的老资格革命分子。从这个时期李锐的照片中看到的是个明显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有着运动员的体魄，国字脸上带着意气风发的表情，目光炯炯有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锐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利（更正：电力）部工作过。1958年，他被提拔为水利（更正：电力）部副部长，这让他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副部长。

同样是在那一年，他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当时毛泽东在南部城市南宁举行一场会议。会议议程上的一个事项，便是建造三峡大坝，这是长江上的一个大型防洪水电项目，将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内陆湖，并摧毁上游沿岸大面积的村庄和古迹。

大家都知道李锐是这一计划的反对者，毛泽东让他从北京飞至南宁，当着他的面讨论这一问题。他的发言有力且简洁，说服了毛泽东。不久，李锐就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之一——这让他成了一个手握重权的看门人，为一个以帝王的方式统治国家的领袖服务。

但李锐在最高层却没能待多久。1958年，毛泽东着手开始大跃进，这是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梦想，希望能通过一系列鲁莽的经济政策超越西方国家。没多久，农民纷纷开始饿死。

党内温和派以中国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彭德怀为首，曾试图缓解毛

泽东的政策，控制饥荒。1959年，在中国中部疗养地庐山举行会议时，毛泽东棋高一着，打败了他们——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导致了人类历史记载中最为严重的一次饥荒，并进一步促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形成。

在庐山会议中的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的一名私人秘书被指控曾说过毛泽东听不得批评。全场陷入了沉默。李锐被问到，是否曾听到过那人有这样大胆的批评言论。在对那段历史的口述中，李锐回忆道：

“我站起来说：‘（他）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

李锐迅速遭到清洗。与彭德怀将军一道，他被认为是反毛泽东的同谋。他被剥夺了党员身份，送至苏联边境附近的一个下放地。

由于当时中国深陷饥荒，李锐几近饿死。后来是他的朋友设法把他转到另一个能获取到食物的劳改营，他才幸免于难。

很快，就有政府巡察官员来看他，说如果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就能重回党内。但李锐对自己在最高层目睹的一切深恶痛绝。

“我却因为对于庐山召开的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而深感绝望，回答说：‘同意开除’”，他回忆道。

1961年底，李锐返京。他的女儿李南央在一则采访中表示，尽管当时的中国首都笼罩着极权主义的气氛，他仍敢于直言。她回忆起自己写了一篇作文赞扬因为共产党，大跃进时期没有死人。父亲训斥了她：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国家没有死一个人呢？’”

“我小眼一瞪，脖子一梗：‘你怎么敢这么说？老师和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你怎么敢这么说？’”

恼怒于李锐的固执，结婚22年的妻子与他离婚，带走了三个孩子。之后，她谴责他私下里批评毛泽东。1962年，他被下放至一个偏远山区教书。

四年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是打倒党内温和派。就像在庐山会议时一样，毛泽东自己的私人秘书由于不够激进，受到

调查。

调查人员飞到了李锐所在的山区下放地。他为所有的秘书都做了担保，除了一个人：陈伯达。此人是毛泽东秘书中众所周知最左的一个。挑战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几乎属于自杀行为。几个月后，李锐被送进了中国的巴士底狱——位于北京北部的那座臭名昭著的秦城监狱。接下来九年（更正：八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那里被单独监禁。他用监狱诊所里的碘酒（更正：紫药水），在马克思和列宁文选的空白处写下了 400 首诗，以此对抗孤独。

“我的痛苦和烦恼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他在 99 岁生日之际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把脑袋瓜保住了”。

1975 年，他从秦城监狱获释，但被送回了山区下放地。当时毛泽东刚刚去世。1978 年年底邓小平掌权后，李锐恢复了党籍。他回到了北京，重新进入水利电力部。他再次对建造三峡大坝的计划表示反对，与记者、环境活动人士戴晴联手，阻止这个庞大的项目。

他后来被调至党内颇具影响力的组织部，在那里，他帮助监督新官员的选拔。但在 1984 年，当他拒绝给一名高级官员的后代特殊待遇时，他的职业生涯突然中断了。

“在讲真话或有前途的仕途之间，他总是选择讲真话，”戴晴在一则采访中表示。“他一辈子都在说真话。”

这开启了李锐一生最具影响力的阶段：有良知的政界元老。

他在三峡大坝的问题上败下阵来，1989 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以及党内改革派在斗争中落败后，强硬派推动通过了三峡大坝计划。

但他写了一本关于庐山会议极具影响力的书。《庐山会议实录》反驳了共产党称饥荒并非毛泽东责任的说法。他还写了很多随笔、杂文以及致高层领导的公开信，呼吁更多透明度和包容。

最为重要的可能要数他成为了先锋刊物《炎黄春秋》的保护人。该刊物会探讨敏感历史问题，例如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或是文化大革命，而这些都是中共希望忘却的。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担任刊物主编至 2016 年的吴思说。“他不为政治利益。”

但李锐设想中的一个更开放和民主的中国越来越遥远。到了 2016 年，吴思被解除了刊物负责人的职务，该刊也被强硬派接管。

“恐怕李锐没什么能做的了，”吴思说。“这已经超过了一个人能保护的能力。”

然而，李锐拒绝后退，他撰文批评自毛泽东以来最具威权的领导人习近平。在一篇文章中，他将习近平与其已过逝的父亲习仲勋做了一番比较，习仲勋以宽容及反对强人统治而闻名。

李锐写道，2006 年左右，他前往浙江，习近平当时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习近平请他吃饭，李锐敦促他对体制中滥用职权的事情发声。根据李锐的说法，这位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当时一口回绝了他：

“我怎么能跟你比啊？你可以打擦边球，我不敢。”——言外之意，当时野心勃勃的习近平希望进入权力的中心。

李锐又给这个故事加上了一个谴责性的评价：“西方有句老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中国历史学家章立凡看来，李锐代表着一代人的悲剧。许多人最初将共产党视为中国的救世主，眼看着它在毛泽东近 30 年掌权期间变成了一股独裁力量，然后渴望改革时代终将带来变革——然而由于中共无法放弃威权主义，那些梦想一一破灭。

“《炎黄春秋》事件表明，李锐及其同僚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章立凡说。“但我理解李锐：否定中共就意味着否定他自己的人生。”

注：括弧内更正为李南央作（后文同）。

日本《朝日新闻》

2019年2月17日

李锐先生——做人与当党员，他一贯坚持做人的良心 及川淳子（日本中央大学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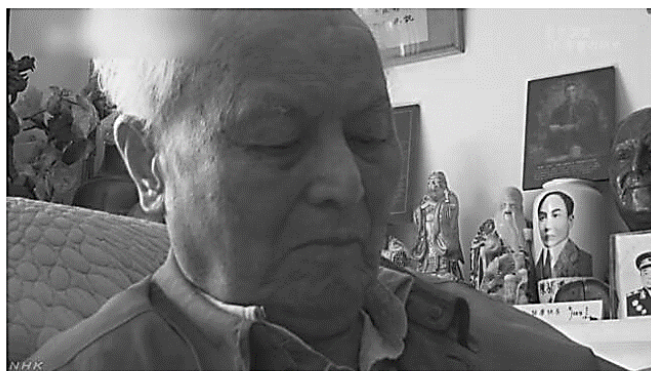
李锐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派老党员，他在党内担任过诸多职务，拥有丰富经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被称为“党的良心”。

他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并强调在政治上跟党和政府不同的自由声音的重要性。他即使在退休后也一直致力于通过实现党内民主化，从而促进整个中国的宪政民主。

李锐先生的一生可谓是中国共产党体制内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象征。他文革后被平反，后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作为老党员还坚持对高层领导提出不同意见，这现象也是党的强韧性的一种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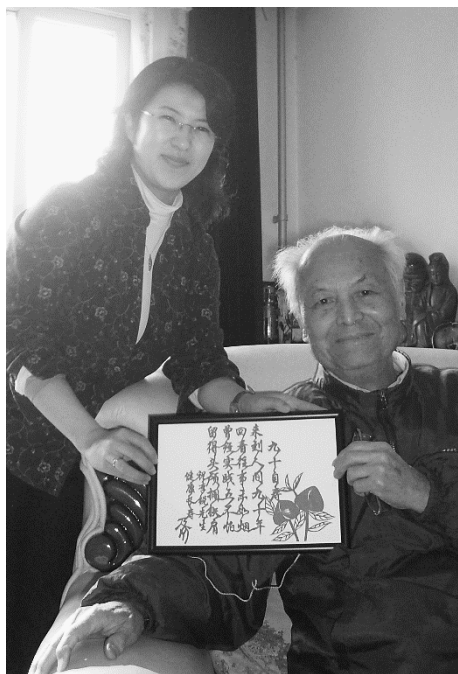
本人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的言论空间，并一直在做李锐先生

的口述历史编撰工作。曾经围绕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李锐先生对毛泽东也提出过反对意见，他大胆敢言的气魄使我着迷。我时常到北京去拜访李锐先生，转眼



中国改革派の重鎮 共産党元幹部の李鋭氏が死去
2019年2月16日 19時26分





作者 2007 年 11 月访问李锐时的合

之间已过 19 年了。

在我的大学研究室内，有一幅镜框装帧的亲手书法，这是李锐先生赠送给我的。

锐利的笔锋写道：“做人与当党员发生根本矛盾时，我不惜牺牲一切，坚持了前者，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历史。”这是李锐先生文章中的一段话，我特别欣赏。

无论在某个组织内部还是对政治权力，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发出不同的声音，“不对，就是不对！”。接触到李锐先生的百年生涯，我深深感到不同声音的重要性。

1989 年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与市民的民运被镇压时，李锐先生始终坚持反对开枪镇压，该事件之后仍一直在呼吁要平反六四以及恢复有关人士的名誉。李锐先生的著作在中国大陆不许出版发行，但每逢 5 年一次召开的党的大会，他都坚持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书。

今年恰逢 1919 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30 周年，正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李锐先生经常讲述“何时宪政大开张”。我作为一位有幸能与李锐先生亲近交往的后生，深切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我会努力将李锐先生的思想与行动继承下去。

BBC 中文网文章

2019年2月16日

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十余载，李锐也没能等来党兑现民主宪政的承诺

冉冉（BBC 中文记者）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周六（2月16日）早上确认，当日早晨8点32分，父亲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

李南央周六接受 BBC 中文访问时说，李锐把其从1935年到2018年3月26日（住院前）的所有日记原件都捐献了出来，在美国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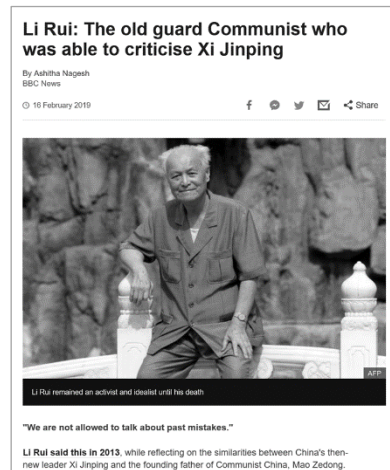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永久保存，并将在几个月内向大众公开。“他所有的日记，我和我先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整理，恰恰就在几天前刚刚录入完了，”李南央说到这里一度哽咽。

李南央说，除了父亲的日记、信件，捐献的资料还包括他的书《龙胆紫集》，以及他在庐山会议时期、参加土改时的工作笔记，录入的内容大概有一千多万字，“这些大概就是父亲留下的最有历史价值的、可以帮助后人的东西”。

她觉得很幸运，最后给这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找到了很好的归宿。“在这这么多年里我和我父亲像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一点把他们全都带了出来。”

李锐是“一二·九”运动前后加入共产党、要求抗日救国的青年之一，是以敢言闻名的中共改革派人士。他曾身居高位，说服毛泽东推迟三峡工程上马，组建后备干部“第三梯队”；也与许多其他中共高官一样，在数次政治斗争、高层博弈中身陷囹圄，起起落落。

退休后，他著书立作成为党史和毛泽东研究专家，建言献策希望



BBC 英文网报

推动中国宪政，却不料时移世易，对于他追随一生的党来说，自己悄然变成了“敏感人物”。

“何时宪政大开张”

李锐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中国的民主宪政。88岁米寿时，他作了一句诗，“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他的媒体采访和所有出版物，无不是按照这句话在呼吁和行动。

“过去党内历次的政治运动，没有让他折腰，”与李锐相识多年的历史学者施滨海对BBC中文说，李锐性格直率、敢言，“有很多人经历过很多次运动学得很乖了，不讲话了、保持沉默了，他始终没有，所以这几年不断看到他的言论或者出版物。”

即使已到百岁高龄，他仍然数次向党内高层递交建议书，呼吁改革，呼吁尊重宪法、实施宪政，开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近些年，他也会接受媒体采访，表达自己对时事的看法。一名采访过他的记者用两个“特别”来形容李锐，“精力特别好，说话声音特别大，完全不像100多岁的老人”。

2018年，两会投票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要删除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他对媒体评论说，“习近平要搞终身制”。甚至去年4月17日（更正：4月13日）他101岁生日当天，即使不久前刚因为呼吸道感染昏迷，当天还住院观察插着鼻饲管，他跟朋友和记者聊天时仍然语惊四座。

“（我跟）习近平最后一次接触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他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过去我也不知道，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在美国之音曝光的影片中，他这样评价中国现任国家主席。

这位党龄80余年的老党员，中共的元老级人物近年来自己却成了中国官方封杀的对象。最近十几年，他的书在中国内地出版屡次受阻，甚至曾经出版过的书也不允许再版；他的访谈基本上只在香港媒体和外国媒体出现；他还说，中组部的老干局和办公厅也会找他谈话，批评他的文章和讲话。

“从 50 年代、80 年代至今两个时期，我一共由中央和各地的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十七本著作和选集四种，第十八本《李锐近作》却只能由香港出版了，”李锐曾在其书中序言感叹。

在香港出版的有关李锐的书也遭到中国当局的审查。2013 年 10 月，李南央从美国回中国探亲，中国海关扣查了她行李中 50 多本其编著的《李锐口述往事》，称这本书不能进中国内地。李南央随后起诉北京海关，“李锐是共产党的元老，如果他都没有言论自由，谁还有？”

深刻反思

仕途经过几次大起大落的李锐亲身经历党内高层斗争的凶险和残酷，让他对共产党和老领导毛泽东有了深刻的反思。

文革结束、平反复出后，1979 年李锐跟随中国能源考察团出访巴西和美国，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 BBC 中文表示，父亲看到美国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超级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美国普通老百姓富足的生活意识到，“共产党完全错了”。

李锐在日记中写到，在美国他第一次去了超级市场，看到超市里“应有尽有，方便之至”。“这次出访，应当讲，对于我们自己一贯自诩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脑子里是没有了；不单是水电，而是从整个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来讲，人家的资本主义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李锐在他的口述回忆书中说。

1989 年的“六四事件”让他对共产党更加失望。李锐对女儿说，这个党没有味道了，这个国家没有味道了，你能走就带着女儿走吧。

但是“六四”之后，李锐仍然留在党内，同时孜孜不倦地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接受媒体采访，呼吁民主宪政。李南央曾开玩笑地问父亲，你是不是舍不得你的车、你的房、你的医疗待遇？

李锐回答女儿，不是。“他认为不退党，留在党内说话更有分量，”李南央说。

其实李锐的思想早在延安时就起了变化。最初投奔共产党是为了救亡，为了民主，但是延安的实际情况，包括在抢救运动中被严刑逼供等经历，并不符合他的预期。不过，在生命的后半段，李锐回忆起

入党，仍认为自己当年做了正确的选择。

“我们看到国民党不抗战，看到国民党不民主，才加入共产党，”李南央转述父亲的话，“我们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有责任。”

在李南央看来，父亲对共产党能够有那样的反思已经很不容易，但仍期待他能对自己作为共产党的一员曾经犯过的“左”的错误有所反思。因为她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他在土改和“三反五反”时都曾有过“左”的作为。

李锐晚年曾多次说过，“人生在世，任何人都要受这四种限制：时代、知识、思想能力、个人品德。”李南央认为，父亲也不例外，不是一个完人。

“我父亲的不容易在于他在那个体制内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为此一生倍受苦难和挫折而至死不移；父亲的缺憾也是因为他身在那个体制内，所以有着很深的‘党文化’的烙印，”李南央说。

受毛重用与三次受难

李锐出生于 1917 年，他的父亲曾追随孙中山，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少年李锐在湖南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加上受到左翼书刊的耳濡目染，逐渐向共产党靠近。进入武汉大学就读后，他频繁参加和组织学生运动，并在 1937 年正式入党。

从参加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先后涉足新闻和水电工作。1958 年，因为极力反对建设三峡，李锐走入了毛泽东的视线。那年年初的南宁会议，李锐与三峡赞成派水利学者林一山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了一场“御前辩论”，陈述三峡工程上马的利弊，还各写了一篇文章呈交。

在李锐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搁置了三峡工程，自己未足半小时的发言和文章还让他获得了毛的赏识和重用。散会之前，毛对李锐说：“你文章写得好，你当我的秘书。”

对于党内的其他人来说，被毛钦点大概是“中了状元”一般的好

事，但李锐却并不想接手这份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说，好友、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早就跟他讲过，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怕毛“不好伺候”。

南宁会议后，李锐的仕途走向新高点，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打击和挫折才刚刚开始。1959年庐山会议，李锐对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质疑。他批评“以钢为纲”的口号，指运动中钢的指标超出客观实际。会议后期，李锐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送往北大荒劳改。

李锐在北大荒几乎被饿死。他在书中回忆，1961年粮食困难时，没有菜，只能将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子。饿得没办法，在地里捡到一点土豆和野菜也马上生着吃了。

厄运延续到了文革期间。1967年，李锐向中央专案组的调查人员揭发陈伯达，被抓进秦城监狱，关入单人牢房。从1959年到1979年，人生中宝贵的20年时光，他几乎完全荒废。

其实早在1943年，李锐就在延安经历过“抢救运动”，那是他的第一次“受难”。当时，李锐的武大同学魏泽被逼供时承认自己是特务，供出李锐，说李是他的上级。李锐被关入延安保卫处“监狱”一年多。受刑逼供是常事，比如不让睡觉，眼睛都不准眨。

为历史作证

也许是由于乐观的天性和不俗的毅力，李锐在三次受难之后仍然活了下来，政治生命也没有终止。文革结束平反后，他被任命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负责清理省部级班子，选拔后备干部“第三梯队”。

退休后，李锐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对中共党史的记述。作为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和历次运动的见证者，他先后完成了《庐山会议实录》和共19大卷、耗时12年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他还曾担任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的编委与顾问，这本杂志被认为代表党内自由主义势力，多次刊登涉及中共历史敏感事件的文章。

“他最大的贡献，是为20世纪的中国作证。若无他的一系列作证文字，绝大多数的国人会更加迷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对BBC中文表示。

在历史学者们的眼中，李锐撰写的一些回顾党内重大事件的书籍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如《庐山会议实录》和《大跃进亲历记》。作为庐山会议的亲历者，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详尽记录了这次党内重要会议的全过程，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党内领导的发言记录，是海内外研究庐山会议的权威史料。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对 BBC 中文说，《庐山会议实录》一书，有连官方档案里都缺失的中共常委会议记录，“没有任何一个庐山会议的当事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做出了像他这样系统的，又有大量文献支撑、也有自己记忆支撑的作品。”

回忆过往、书写历史，无非是为了能让今天的中国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史为鉴。

施滨海说，李锐一直以来的希望就是共产党选择民主走向宪政，这样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代价会少一点，不会造成天下大乱，“就像台湾那样，他对蒋经国是很赞赏的”。

而最近几年，李锐看到文革回潮的迹象，再加上八十年代形成的共识，如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等被破坏，他越来越不乐观，开始觉得靠党来完成转型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那中国的宪政呢？施滨海说，“他几次表示过，他是看不到了”。

台湾 中央广播电台

時間：2019年2月16日 22:02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黃絹

曾批習近平文化水平低劣 堅持良心 留下敢言典範

編按：日本中央大學副教授及川淳子是研究李銳的重要學者，她從 2000 年開始對李銳先生進行訪談研究，歷時近 19 年，其間並完成博士論文《現代中國的言論空間與政治文化——以李銳為中心人物的‘改革派老幹部網絡’的形成與改變》；有人說，「李銳生活在大陸，而研究李銳卻在海外。」由於中國對言論、出版嚴加管控，李銳先生的重要著作包括《廬山會議實錄》、《李銳反「左」文選》等，在中國無法出版、銷售。湖南曾有人計劃舉辦「李銳思想學術研討會」，也被禁止。李老今天過世，本台特地專訪及川淳子教授，介紹李銳先生的思想與主要貢獻。

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先生，今天(16日)上午在北京去世，享年 101 歲。日本中央大學副教授及川淳子在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李銳先生是「中共體制內的良心」、「中國不同聲音的代表」，李銳與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為政治改革多次公開建言，仍具有一定歷史意義。

李銳於中共建政後，做過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由於在廬山會議上支持彭德懷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因此撤銷公職並開除黨籍，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文革結束獲得平反，1982 年後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等職。李銳晚年積極著述，先後完成《廬山會議實錄》和《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中央卷），他並擔任《炎黃春秋》雜誌的編委與顧問，提倡民主憲政，反對個人崇拜，被視為中共黨內改革派代表人物。

「依老賣老」為時代發出聲音

李銳從中共十五大到十八大持續公開發文，主張言論自由，反對個人崇拜，他建議先在黨內推動民主，然後再推動全中國的民主憲政。及川淳子教授認為，在民主國家，人民的意見可以透過媒體或議會表達，但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李銳以身為毛澤東前秘書黨內元老的身份，發出不同的聲音，是一種政治藝術。」李銳曾經用「依老賣

老」來形容自己的做法，因為尚未退休的年輕幹部很難發出與黨不同的意見。

至於在體制外，及川教授說，像李銳這種有良心的人，就會讓「有些人對中共的看法還是會抱著一定的希望」。

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多年來李銳等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元老發言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即便如此，及川淳子教授認為，「說不說」和「能不能起到作用」仍然必須分開看待；比方劉曉波先生等人所推動的「零八憲章」，是當局完全無法接受的，但是「李老這樣的黨內老幹部發言，在一定程度上中共高層是會關注的，雖然他們不會有任何回應。」李銳告訴及川淳子，他每次都會透過特殊管道轉達他的建言。

李銳的建言有什麼作用呢？李銳會特意談 1987 年十三大趙紫陽如何提出黨內改革，其實很多內容也是鄧小平的主張（鄧小平的 818 講話），但是，現在很多人把十三大黨內曾經討論的政治改革忘掉了，所以，「李老特別強調我們其實中國國內也有過非常認真談改革的歷史」，它並不是向歐美學習的所謂西方價值；及川教授認為，由於李銳，讓很多年輕人想起 80 年代中國曾經有過一段改革歷史，因此「他的貢獻還是很大的」。

政治形勢嚴峻 改革派元老影響力式微

但是隨著老人逐漸凋零，原來發言的平台《炎黃春秋》遭到整改，現在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的發言力量已經越來越來越微弱。

而民間知識份子的想法也在改變，以前他們認為老先生們敢說話可能會起到一點作用，但是隨著近年來政治形勢日益嚴峻，他們已經不再抱有期待，及川教授說，「也許老先生們的言論著作對於研究歷史還有一點作用，但是，對於現實已經毫無影響了。」

中國憲政學者張博樹曾經表示，中國的改革需要合力，包括體制內，體制外以及民間組織需要一起努力；但是現在的政治高壓已經讓體制外的民間人士非常失望，他們不再討論如何與體制內合力，及川教授認為，「這幾年的變化對於中國民間社會的負面影響非常嚴重。」

堅持良知 做人先於當黨員

李銳一生敢言敢為，在及川淳子眼中是一個「知行合一」的人。去年李銳在醫院病床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提到，他曾經提拔習近平到廈門市擔任副市長的往事，並且批評習近平搞終身制，又說，「習近平的文化水平很低劣，只有小學程度」。據報導，在中共十九大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經邀請一批百歲老人與會，其中包括李銳，但他以「腳痛」為由拒絕了。

李銳住在美國的女兒李南央今天發文說，李銳從去年 3 月 30 日起住院，在能夠坐起身的日子中堅持練習寫字，多次寫下同樣的內容，指出任何人在世時都要受 4 種限制，包括時代、知識、思想能力和個人品德；其中前 3 種限制是恩格斯說的，最後一種「個人品德」是他加上去的。這 4 種限制，李銳也無法擺脫，「因為人的世界裡，沒有神。」及川淳子認為，這段話顯然是指向習近平，反對個人崇拜。

回顧過往，及川教授說，每每談到有朋友被抓，或是言論再度緊縮等令人憂心的現象時，李銳先生最後總會有一句話，「中國的事情非常複雜，不要著急，慢慢來！」及川淳子忍不住笑，「我跟他認識的時候他已經 80 多歲了，然後這十幾年每次他就跟我說，不要著急慢慢來，我就覺得您年紀這麼大了，還能說不要著急嗎？我真的覺得這位老先生太厲害了！」

總結將近 19 年與李銳先生的交流，及川教授認為她最大的收穫是學習「如何做人」。李銳常說，「做人與當黨員發生根本矛盾時，我不惜犧牲一切，堅持了前者，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歷史。」儘管彼此歷史文化語言種族不同，她認為，李銳所揭示的做人道理可以超越這些差距，永遠引領著她。

今年 2019 年是五四 100 年、六四 30 年。李銳生前常說「何時憲政大開張！」，及川淳子表示，她將繼續研究，以寫作的方式紀念李銳先生。

美国《世界日报》

2019年2月17日

李锐辞世——李南央：盖党旗是对父亲最大侮辱

记者：周喆

已故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於北京時間 16 日去世，享壽 101 歲。定居舊金山灣區的李銳女兒李南央在網絡發表聲明，引發關注。李南央說，父親是很努力保持自己獨立人格的那樣一個人。

李南央 16 日接受本報採訪

表示，李銳於北京時間 16 日上午 8 時 32 分去世，她幾乎同時就接到親友手機短訊發來的通知。她對於父親去世的消息並不意外，因為 12 日就已經接到醫院發來的病危通知。她說，李銳自去年 4 月住院之後情況就不是很好。去年 10 月她回中國探望時，李銳的情況更不好。「如果是一般老百姓，醫院可能就不會再維持治療。但因為中共有『級別』待遇的規定，所以要維持到最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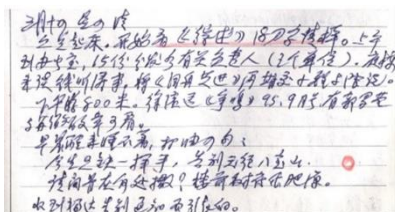
憶及與父親最後一次見面，李南央表示，那是去年 11 月 13 日上午，她在回美國前再次去醫院探視父親。李銳當時已經說不出話來。「我覺得他意識還清醒，知道我們要走了。他就用非常大的力氣說了一句完整的話：『我要說話』，然後拚命地張嘴，卻什麼都說不出來。」

李南央表示，官方安排的李銳追悼會，完全按照中國級別待遇規定的「正部級」規格來處理，「如果出現習近平送的花圈也不意外。」但是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我不知道他們的悼詞怎麼寫，但我父親肯定不會接受這樣的悼詞。」

「我的父親就是一個人。如果在美國，他就是一個講常識真性情很普通的人。」李南央說，「但是在中國，坐到那樣的位置上，要真性情講常識，要講大實話，非常困難。」



對於李銳生前提出「不開追悼會，不蓋黨旗，不進八寶山」，李南央表示，儘管有人指這是「謠言」，但她堅信那確實就是父親的真實意願，絕非謠言。她並在網上發表的聲明中，附上李銳生前親筆書寫的「告別何須八寶山」，以及「黨旗鏟刀、斧頭，就是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以證明父親的心跡。



「尤其是黨旗沾滿了血」，李南央說，去年4月她曾問過父親身後要不要蓋黨旗，李銳想了很久說了一句「紅色是很不好的顏色。」「他對這個黨徹底否認。蓋這個黨旗是對她最大的侮辱。」

談到自己為甚麼決定不參加官方追悼會，李南央表示，自己是家裡唯一真正認同父親理念的人。「我勢單力薄。別人要按規格走，很重視正部級待遇、誰送的花圈以及別人的評價。」她不願在這種時候發生爭執，也為了自身安全，所以不會回去。

李南央於1990年10月離開中國，帶著女兒先到歐洲。1991年6月來到美國定居。先到德州，後來因在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工作，而在灣區安家落戶。

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9年2月16日

一生坎坷 诤言灼谏 毛泽东秘书李锐去世

曾任毛泽东秘书、在反右及文革中皆遭受迫害、六四事件中站在学生一边、晚年大力呼吁实行宪政改革的中共元老人物李锐本周六早晨在北京去世。他还曾举荐年轻的习近平，却在后者权居高位后斥其刚愎自用、文化水平低。

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外界确认了其父亲已经在周六（2月16日）早晨去世，享年101岁又十个月。

出生于1917年的李锐，其父亲曾是追随孙中山的早期同盟会成员。痛恨腐败国民政府的李锐，30年代就读国立武汉大学期间，就已经成为了左翼组织“武汉秘密学联”的负责人，参与过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国共两党一致抗日。1937年，20岁的李锐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李锐从北平、济南、武汉、长沙、重庆辗转，最终在1939年到达延安。

1943年初，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的李锐，在整风运动中遭到诬陷，被捕接受调查。经周恩来亲自干预后，李锐在1944年夏天获得平反出狱。

1952年，李锐脱离新闻宣传以及青年工作，前往水利（更正：水电）部门任职，并于1958年出任水利部（更正：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同年，他因分析指出三峡工程的弊端，获得了毛泽东的赏识，被指定兼职担任毛泽东的工业问题秘书。不过，仅仅1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李锐就因为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锐反党集团”，遭到流放、劳改。文革初期，他又因试图写信揭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而遭拘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

1979年，李锐终获平反，再次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此后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青年干部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等重要党政职务。期间，他撰写《论三峡工程》一书，再次反对建设三峡工程。

在 89 年六四事件中，已经离休的李锐还曾支持失势的赵紫阳，同情请愿学生。此后，在多次中共党代会上，李锐都公开发言要求为六四事件平反，并呼吁启动政改，实现“宪政大开张”。

追求民主

李锐晚年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其中共党史以及毛泽东研究专家的身份。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完成了《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更正：领导和参加编撰）、《大跃进亲历记》等重要著作，还撰写了《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毛泽东的晚年悲剧》等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评论其“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等没能在中国出版的作品，则通过境外出版社发表。

在这些著作中，李锐大声疾呼中国尽快实行宪政改革，也让自己成为了中共体制内的“敏感词”，许多著作被禁止再版。他还曾任党内自由派、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编委及顾问，并多次亲自撰文批判毛泽东、批判中国共产党违背早年的宪政民主承诺。

据李锐女儿李南央在接受 BBC 中文网采访时透露，李锐说早年投奔共产党“正是因为看到国民党不民主、不抗战”，“我们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有责任。”

“权力使人变化”

李锐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好友。李锐曾回忆说，自己 80 年代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青年干部局局长期间，曾前往河北正定去和担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谈话，“那时候组织部想提拔他”。后来习近平在河北仕途遇阻，组织部出面协调将习近平调任去福建厦门担任副市长。

在去年春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已经 101 周岁的李锐则表示，对习近平执掌最高权力以来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水平感到失望。“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他文化程度那么低。他小学程度。”他还曾在《李锐口述往事》中如此评价习近平：“人有了权以后是会变化的。这样的人我接触多了。”

李锐最后一次与习近平见面，是 2005 年前后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

记期间；当时习近平在私人场合宴请李锐夫妇。据李锐向美国之音透露，当时他建议习近平“你现在地位不同了，可以讲一点有意义的话了，应该（向上）讲点意见啦”，而后者则回答说：“你可以打擦边球啊，我哪里敢。”

李锐在美国之音采访中还曾表示，如今的习近平“不可能”会再接受忠告了。

法国《费加罗报》

2019年2月18日

毛泽东前秘书的秘密

作者：Arnaud de La Grange

翻译：王瑜、王康（法国）



从中国革命开拓年代到习近平统治时期，李锐漫长的一生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复杂的历史。他曾是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革命者，后来被提拔为毛泽东的秘书，这位在劳改营和监狱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反叛干部已经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最具有批评性的声音之一。他于周六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 岁。

五年前，我们会见了这个被严密监视的人。李锐是那些失去许多幻想但又不肯放弃的人之一。他仍然相信他的国家，相信人，相信思想和体制的缓和。无论如何，他为此而战。面对审查，他还是在讲话，在写作。他的声音既微弱又强大。他的话语具有某种力量——是历经沧桑的人所发出话语的力量。

难道这是命运的巧合？尽管李锐 1917 年诞生于北京，但他来自毛泽东出生地湖南的一个家庭。他曾在长沙上小学。他曾是同盟会员的父亲的黑白照片悬挂在沙发上方。同盟会作为一个秘密组织，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父亲于 1922 年去世，李锐在 1934 年接过了革命火炬。当时 17 岁的他在武汉大学学习机械。他参加了 1935 年 12 月 9 日的抗日学生运动。“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我意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无法实现任何目标”，他说，“国民党在日本人面前节节败退，我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那时共产党没有在武汉成立组织，我就自己组织了活动来追随共产党人。”

1937 年初，这位年轻人终于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他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当时延安这个陕西省的小镇在 1935 年的长征之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基地。毛泽东在窑洞里指挥着中共军队的行动。这个地方今天是“红色旅游”的圣地。李锐 12 月 31 日抵

达那里。他被分配到党的青年委员会，然后去办报纸，负责撰写《解放日报》的社论。

正是在延安，这位年轻的革命者经历了初始的困惑。他参加了“整风”运动。他说“中共当时在做粗暴的清洗，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我的文化，我并没有认可毛泽东所有的思想……”。他本人就是这种怀疑气氛和清洗的受害者。“我被指控为国民党的特务。1943年至1944年间，我被监禁和折磨了一年半”。他记得美国代表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向他们表达他们对他们社会自由的赞佩，并说要遵循这个榜样”……

1949年，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被派往湖南，担任宣传部长。后来他返回北京，成为副部长，负责新兴的水电工业，攀升到了党的高层。1958年，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关于长江三峡大坝建设的争论日益激烈，毛泽东要求该项目的著名反对者李锐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做了一个论证非常充分的演讲，他赞赏我的坦率”，他告诉我们，“实际上他周围的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更趋于试图奉承他，而不是给他提供信息……”毛泽东把他安排到自己身边，作为他的几位个人秘书之一。

在共产党体系中，跌落比升迁更为突兀。次年，1959年，李锐成为“反右倾”运动的牺牲品。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运动，一个反对灾难、饥荒和谎言的宏大声音向毛泽东发起挑战。发声者就是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李锐支持他，结果被指控与彭德怀密谋反对伟大舵手，然后他们都遭到了清洗……

被开除党籍的李锐被送往中国东北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我几乎被饿死”，他告诉我们。他只是在挚友们的介入下才获救，他们将他转移到饥荒情况不太恶劣的劳改农场。如果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党籍会被提议得到恢复。他说，“我拒绝了，因为我对我所看到的一切是如此反感。”中国共产党曾反对过国民党暴政，但后来忘记理想，作出了和他们同样的事。党有一个口号：“一个不杀！”可是它已经清洗并杀害了数以千计的被指控为叛徒或者特务的干部”……

从劳改营出来后，他被派往偏远地区教书，他仍然拒绝向党派来

看望他的人低头。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离开了他，并揭发他反对毛泽东的私下谈话。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代来临了。1967年，李锐被关进北京北部阴森的秦城监狱，在那里他度过了八年。为了在长期单独囚禁中保持理智，他用监狱诊所拿到的龙胆紫⁴药水在马克思和列宁著作边角空白处写了数以百计的诗词。他于1975年获释，又被送回山区。直到1976年（更正：1979年）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上台，他才得以恢复名誉，恢复中共党籍。1982年，他甚至被任命到党的战略性机构——中央组织部，负责选拔应该得到提升的官员……他还记得，“在我的名单上，有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1984年，他再一次拒绝盲从和政治腐败，被永久地摒除在所有官方职位之外⁵。

他在自1979年开始居住的北京公寓里接待了我们，房间里弥漫着旧书和历史的气味。这在中国是个很罕见的气氛，中国几十年的苦难和贫困很自然地产生了非常物质化的新一代。“这是我生命中最安静的时期，我很幸运找到一位医务工作者⁶（他在1979年再婚。NDLR注），她照料我的健康……”他告诉我们。他开始写作，并且已经出版了十九本书，其中五本是关于毛泽东的专著，大都是是在香港出版发行，因为这些书在中国是被禁止的。李锐在书中反思中国历史，反思他为之献出一生却使他遭受了如此多苦难的党。他把中共放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来看。“毛泽东说，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美的图画。他说的并非完全错误。美国历史短暂，能够建立在科学和创新上。而我们不得不面对专制甚至独裁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李锐谈到了伟大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鲁迅，以及他的“铁屋”。他说，“中国历史像是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面除了奴隶和驯服于皇帝的仆从两类人之外，没有别的。我们的农民群众传统上有一种被领导、被统治的需要。他们只知道仰视。甚至我们的知识分子也与你们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他们愿意服从权力。”

⁴ 法文原文误为碘酒。此处应为龙胆紫，一种紫色外用消炎药水。李锐后来将狱中所写诗词成书出版，名为《龙胆紫集》——译者注。

⁵ 李锐于1984年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译者注。

⁶ 法文原文误为医生。李锐的续弦曾做护士工作——译者注

然而李锐试图打开窗户。1989年，他支持反对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赵紫阳。他告诉我们，“1979年邓小平改革之后，曾有过十年的改善，我们或多或少地遵循了普世价值观。我曾经相信过……然而，天安门事件后，又停滞不前了”。他随后成为自由主义杂志“Yanhuang Chunqiu”（“炎黄春秋”）的编委和顾问⁷。这本有着惊人的自由语气的杂志创办于1991年，并于2016年被封禁。编辑是卸任的中共干部们，被称为“党内的祖父辈”。李锐感到遗憾的是，今天唯一能够举起自由旗帜的中国人已经超过90岁了……

2010年，他与包括《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在内的20余名老党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并谴责言论自由的缺乏。他们写道：“如果共产党不改造自己，如果它不改革，它就会失去活力并自然死亡。”这封信很快就遭到查禁。去年，李锐还曾表态反对修改宪法，因为此次宪法修改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两个任期的限制，从而为习近平的终身任期铺平了道路。

“我曾经处于权力中心，我知道他们的秘密，我知道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它说到底没有过多大变化，至少变化不够……”他遗憾地说。因为他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他的声音显得更为强大。他以该党一名党员的身份死去，尽管该党监禁他，让他挨饿，几乎置他于死地。他只是想让它改革，让它不忘初心。他在告别时告诉我们，“习近平说他对中国有一个‘梦想’，我也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我们能真正实施我们的宪法，以保证我们今天被践踏的权利。”他担心自己的梦想只能停留在梦想……

⁷ 原文直译 “教父们之一” ——译者注。

英国《卫报》

2019年2月18日

毛私人秘书的女儿抵制父亲的葬礼

——李南央说共产党举办的告别仪式违背她父亲李锐的意愿

翻译：李南央

毛泽东个人秘书的女儿正在抵制她父亲的葬礼，她说这个告别仪式将她的父亲定位于革命的高官。

据李南央说，官方将在本周三在八宝山为他的父亲举办遗体告别，将会给他盖上共产党的党旗。而这并不是她的父亲所希望的，他实际上已经对这个党彻底绝望。

李锐于周六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因器官衰竭而辞世。他的离去，标志着怀抱社会主义理想参加共产党，并推进改革的一代人已成为历史。年青的活动家李锐在 1937 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经历了被党提拔、监禁、放逐和平反。

南央对《卫报》说，她第一次跟父亲谈及他的身后之事是在 2008 年，最后的一次是去年的 4 月份父亲 100 岁生日的时候。她说：“我重复了 2008 年同样的问题，进不进八宝山？开不开追悼会？盖不盖党旗？”“父亲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开口清楚地说：‘我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埋在父母的身边。我那么早就离开了家，从来没有照顾过母亲。’”她又问父亲盖不盖党？李锐回答说：“红色是个不好的颜色。现在电视上一天到晚都是红、红、红，让人看了难受。”

南央居住在美国，她说，她不会回去参加那个追悼会以示抗议。

章立凡——生活在北京的一位认识李锐的独立历史学者说，像李锐这样的人“正在成为历史，没有几个活着的了。改革者、自由思想者走向凋零。”

李锐 1917 年出生，老家是南方省份的湖南，年青时代即投身各种

Daughter rejects Chinese state funeral for her father, Mao's personal secretary

Nanyang Li says Communist party ceremony is taking place against wishes of her father, Li Rui

The daughter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secretary is boycotting her father's funeral, which she says is taking place against his wishes in a cemetery reserved for high-ranking revolutionary figures.

运动，领导过对地方军阀的抗议活动。进入大学后，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反对日本占领者的运动，1937年入党，后来去了毛泽东和他的军队的所在地，中国西北部的延安。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李锐被毛钦定为他的个人秘书。但是当他对毛的导致了将近6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农村公社化政策提出批评后，被开除出党。

在文化大革命——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清洗运动中，李锐在监狱中渡过了近九年（更正：八年）的时光。为了保持心智健全和身体的健康，他在单间牢房中跑步和做气功。1978年（更正：1979年）毛去世后，他恢复了党籍，直至去世始终留在了党内。

李锐名“锐”，意思是：锐利，这反映在他的文章中、书里和接受访谈时。李锐主张宪政体制，坚持不懈地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纠正历史上所犯的的错误，包括1989年对学生抗议活动的残酷镇压。

“当做人 and 做党员发生矛盾时，我总是选择做人。”他在2017年接受BBC的采访时如是说。

即使在他的晚年，章立凡说，他仍然是话锋犀利，敏锐地点出对方表述的破绽。

“李锐对于党存在的问题理解得异常透彻，作为党内人士，他了解中共的历史、现状，也预见到它的未来。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里，我觉得他已经放弃了对这个党的任何希望。这大概就是他不为什么不想由官方操办他的后事，不盖党旗，不进八宝山的原因。”章立凡说。

李锐留下的身后之事是复杂的。作为党的老干部，他居住在北京为高级干部建造的大楼里，享受着按级别提供给他的特殊的医疗待遇。即便如此，政府不希望他的死讯成为新闻，他的女儿说，当局封杀了所有纪念他的文章和评论。

南央认为，当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取消了任期限制以后，使他可以一直地掌握最高权力，她的父亲对这个党丧失了最后的希望。去年，在他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也是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赞同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李锐并不止步于对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的批判，他对整个共产党的制度进行了谴责。他在 2005 年接受《卫报》的采访时说：“毛是一个大独裁者，根本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但是毛的问题也是党的制度的问题，只有中国的这种制度才会出现毛。”

李锐在 2006 年一天的日记里用一首诗形容中国共产党：“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

李锐自去年 3 月住院后，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9 月份的一天，南央请一位朋友给他父亲代去一本她为父亲编辑出版的书《敬寄李锐》。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是否理解了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礼物不得而知，嘴里只是重复着一句话：“这个党，怎么办啊！这个党，怎么办啊……”

美联社报导

2019年2月20日【美联社北京讯】

前毛泽东秘书的女儿抵制共产党主办的告别仪式

翻译：李南央

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元老的女儿抵制将在周三为他举办的告别仪式，称这个仪式对曾经为毛泽东工作但是后来成为毛的体制的猛烈抨击者极为不当。



李锐，他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那里埋葬着很多前高官。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说，这个仪式是违背她父亲的意愿的。据她说，她父亲的意愿是：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

李锐于上周六因器官衰竭过世，享年101岁。她的女儿在美国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李锐）对党是彻底地绝望的。他认为中国完全没有言论自由，全面地、制度性地腐败，导致共产党的官员们越来越富有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李南央在一份写给支持者的声明中说：“我相信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对那面盖着党旗下的李锐恸哭长啸。”她说她决定不参加追悼会，是为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父亲的立场。李南央说在中国的一些人告诉她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都送了花圈。“还有什么比这更虚伪？”她说，“太可笑了”。这些领导人表现出好像很尊敬她的父亲，但是他的著作在大陆却是禁书，这些书叙述了共产党内部不堪的历史。李南央说，“他应该被作为一个人去纪念、作为李锐被人们记住，而不是一个什么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多年前李锐就参加了共产党。他非常短时间地担任过毛的个人秘书，但是因为发表了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出党。他在监狱中度过了八年的时光，直到毛去世后才恢复了党籍。

2017年李锐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说，他因为主张宽容天安门广场

学生的抗议活动而被要求检讨，他拒绝了。他说“当做人和当党员发生矛盾时，我选择做人。”

英国《电讯报》

2019年2月22日

李锐，毛泽东的秘书直到体制的勇敢批评者——讣闻

节译：李南央

李锐去世，享年 101 岁。他曾担任过一年半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的秘书，之后失宠。尽管在劳改营和监狱渡过了多年的时光，他仍然将自己定位于体制内的人，晚年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元老地位呼吁民主改革。

.....

英国《经济学人》

2019年3月2日

扎在他们身上的一根刺

翻译：李南央

【李锐讣文】李锐，毛的秘书、中国的一位直言不讳主张自由的人于 2 月 16 日去世，享年 101 岁。

一个开会通知，李锐不想去，但不能不去。1958 年，当毛泽东派去一架专机接他第一次会面时，他 41 岁，此后迅速蹿升，成为水利电力部的副部长，是年青共和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他觉得自己要

The Telegraph

HOME | NEWS | SP

Obituaries

PREMIUM

Obituaries

Li Rui, Mao Tse-tung's personal secretary until he dared to criticise the regime - obituary

Share

By Telegraph Obituaries

22 FEBRUARY 2019 - 6:00AM

Save



Obituary | Li Rui

The Economist | 13 and 20



A thorn in their side

Li Rui, who died on February 16, aged 101...

Li Rui, 101, died on February 16, aged 101. He was a personal secretary to Mao Tse-tung until 1958, when he was dismissed for criticizing the regime. He was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Chinese reform movement and a vocal critic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He spent several years in labor camps and prison for his views.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碰鬼。果不其然，他最后一次努力与毛同行的结果很糟。

1930年代，李锐从家乡湖南起步，经过坚韧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毛的造反根据地。他在革命的报纸《解放日报》撰写社论。“锐”的意思是“锋利”，李锐很快就尝到了实践“锐”另一面的苦头。他当特务投入监狱，被要求进行自我改造。在他离家（参加革命）的时候，他的母亲曾经流着眼泪对他说：“共产党是好，但是会被杀头的。”想不到的是，他是被自己的人踩在了脚下。

毛是统治者，李锐被叫去讨论三峡大坝——一个建立在扬子江上的超大电力工程。他不同意毛建三峡的想法，以工程师的头脑，强烈地反对这一工程，尽管毛在自己的一首诗中想象着在大坝的荫凉——“高峡出平湖”中畅游。奇妙的是，毛竟然喜欢李锐争辩的方式，尽管毛是一个农民，讨厌知识份子，但是对李似乎产生了兴趣，要他来当自己工业方面的秘书。

这个秘书，李锐也就当了一年多。毛是绝对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他必须控制所有人的头脑，他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一位古代残酷的统一天下的军阀。可这个自己新挑选的秘书怎么想怎么说，居然敢于公开批评大跃进——让中国陷入可怕的大饥荒的经济灾难。李锐很快遭到清洗。此后，李锐在监狱和流放于北方（更正：中部）的大山中渡过了人生最宝贵的20年。但是跟这个一根烟接着另一根烟抽的“伟大舵手”短暂的近距离接触，虽然让李锐遭难，但是给了他常人所不具备的洞察力，也因此让他在党内有了足够的地位，当时间允许时，嘲讽那些抱着毛的思想不放的领导人。他说，只要党坚持独裁体制，政府、领导人和意识形态不受任何监控，中国不会出现改革和有真正的进步。

李锐一共写了五本有关毛的书，从毛的出生写到死，成为这些年受到尊重的历史学者。他指出历史的作用就是要面对历史、以史为鉴，但是党拒绝这样做。每个领导人，从所谓比较开放的邓小平算起，都不肯听取他的意见和要求，而他的所有的书里已经把这些意见和要求表达得足够了，没有什么再好写的了，因此当有人要拍他写字的镜头时，李锐非常气愤地让把镜头拿开（没什么好拍的）。李锐有时

候用公开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时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上书。他甚至指责天安门——（共产党）不允许碰的那场屠杀，简单、明确地指出学生们是对的，党的领导错了。作为“自由派元老”，他的信和上书通常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有一次他在跟习近平一起进餐时被习抢白，那时这位未来的领导人还只是浙江省的党的书记——李锐眼中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家伙，跟他的受人尊重的父亲毫无相似之处。他眼看着这个人获得权力后，变成了一个完全的独裁者，反感透顶。

李锐政治诉求的清单并不长：第一是言论的自由，党必须倾听人民的声音；第二，出版的自由。李锐曾经是一个真正的调查型记者，也是一个笔锋犀利的作家；但是他有关毛的著作在大陆被禁，《炎黄春秋》——一份他坚定支持的、揭示官方掩盖的历史真相的杂志被官方抢劫了。他诉求单中最首要的是实现一个宪政民主的体制，党要变成如西欧那样的社会党。而这一主张如此地具有颠覆性，如此地不“中国”，2013年被官方正式、但是秘密地被列为异端邪说。但是对这样一个在单独监禁中度过了九年（更正：八年），日日在牢房内对角跑步、做气功，用紫药水在马克思著作的空白处写了400首诗的人，这种恐吓是没有用的。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永远是一根尖锐的刺。

红颜色

“怎么办啊，这个党，怎么办啊？”在李锐最后的日子里——躺在为党的高官们建造的一流的医院的病床上，这个问题始终缠绕着他。李锐没有离开这个党，即便只是跟这个党玩儿。自他1937年20岁时秘密加入共产党起、从学生时代起，当他因为热切地想将马克思的书送到人民的手中而被国民党抓捕时，这个党就成为他的生命。尽管毛曾经将他开除出党，以党的名义破坏了他的第一次婚姻，几乎至他于死地。但是读红书、戴红领巾，不是他当年作为年青的爱国造反者，参与打倒军阀和赶走日本侵略者时所追求的。1980年代，他在邓小平上台重新复出后，希望党内成员间变得亲如手足，党外形成公正、自由的社会。与此相反，他在一首诗里说，他发现这个党越来越“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他厌倦了红色——像

他厌倦了他的忠诚——而且渐渐地憎恶红色。他说：什么都是红的、红的、红的……

当他的遗体被放入棺槨内时，红色自然会是那面盖在他身上的旗子的颜色，这跟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葬礼一样，是党的高官的特权。当问到是否愿意如此时，他只是说他愿意回到湖南，跟自己的父母葬到一起。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在她年迈时没有照顾过她，他想起了母亲的话，这让他叹息：“共产党是好（但是……）”

他的葬礼的一切程序都是按照党的安排进行的。媒体不允许采访。习先生因为终于摆脱了这根让他讨厌的刺，给李锐送了一个花圈。

六 | 挽联



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

锐气充满乾坤 说论彪炳日月

李锐先生千古

2018年7月9日

2019年2月16日后祭挽

曹谦

金睛锐眼，识破庐山真面目；
紫胆婆心，怀藏宪政好经方。

陈坡

庐山噩梦 宪政为归
悼念人中之英李锐先生

程建学

狱中诗，山上录，拼死书方留不死；
迷能悟，知敢行，先生真未负此生。

邓步峰

有女继精神，此生可慰；
无缘观宪政，至死难休。

郭业大

一生历劫，凭铮骨生辉，唯梦境无来，问带走几多遗憾？
今日成仙，有庐山侠影，彰秦城胆迹，斯可传百卷文章。

胡荣华

历经血雨腥风，每吁党国须行宪；
阅遍龙头凤尾，方知赤子不看书。

郭世佑

戏台上下俱无常，行止有常也，革命果为他人，湘水余波真战士；
朋党异同多闹鬼，辱宠生鬼哉，发声惟合本愿，筠仙支脉最中流。

宫醴粘喉，洞庭雀岂输黄鹤；
苍黎忍泪，敏感词足葬永生。

己亥正月十二申时于申江虹桥机场

附七绝一首

遥望崇文门

两度戊戌改政枯
卧床门外百龄呼
旱埂遍野亦催泪
疏阔壮飞剩董狐

今岁藉犬祈福之农历犬年却是戊戌六君子断头两轮甲子之年，晚清预备立宪与扫荡帝制法定主权在民之辛亥革命亦逾百年之遥，“宪政”一词竟于近年之历史著述与互联网沦为不允使用之敏感词。时下既未废宪，且设“宪法日”，却忌言“宪政”一词，不知何故。忽见百岁老战士李锐先生倚仗互联网之视频技术，自崇文门北京医院试作最后之发声，音容同步，声情并茂，锐如其名，不输平素，广播于神州内外。北京医院亦乃敝人近年常访之诊所，此情此景，百感交集，故记之。

2018年4月某日深夜于镜湖

廖国华

心底万民，笔下千秋，倘天若有情，举世自难湮实录；
生呼二字，殁言三不，问人何免死，如公谁肯秉良知。

刘道玉

一生跌宕历受磨难反极左始终如一
两袖清风著作等身求真理忠心不

马君骅

匡庐诤言，朱云折槛，期颐盎盎赴仙府；
雁塔题声，炎黄后盾，大义铮铮偕寿星。

马育忠（陕西西安）

中华民主失灯塔，宪政自由泣巨蠹。
今晨李锐先生辞世，长安马育忠泣拜。

任小彬

百年浩然正气存天地
一支如椽史笔写春秋

沙达

泪雨洒空，悲风卷地，九州无不祭圣哲；
遗文载史，高德铭心，天国谁能比此公！

沈汇丰

领军离去，山河瞬变，精神照旧煌煌在；
战士尚存，险恶依然，宪政仍须慢慢来。

史宗伟

百年劫波天地几翻覆风流云散
数代喋血宪政犹未成还待来者
李锐老千古

汪廷奎

不昧良知，陷入邪门迷复醒；
长存理想，追求真宪事难成。

吴雁程

仰李仁寿莫呜呼，念君子秉良知，叹春秋几度挫辱；
锥心胡杨犹哀哉，鞭世风留实录，如竹筒长镌晦明。

徐 成

白发丹心为民呼号矢志不渝
百年孤独赤子之心宁为玉碎
李老走好，中国自有后来人

浩然之声响彻九州为民自由哪怕牢狱坐穿
拍案而起震撼大地希冀人权不惧泰山压顶
初衷无悔

悼念百年狂吠第二人李锐先生——马相伯自称是一条为了唤醒民众而狂吠的狗。“我是一条狗……没有把中国叫醒”，马相伯的遗言让多少人泪目！

杨启宇

覆雨翻云，始识伴君如伴虎；
逆鳞忤圣，敢言谋国不谋身。

夏楠

六朝沉浮元老，从延河军，下庐山狱，风节终未改，惟盼社稷公黎庶；
百岁孤愤书生，振董狐笔，伐桀纣行，心愿总难遂，犹恨山河私帝王。
李老千古！



二〇一五年夏楠拜访李锐

杨小凯（野草诗社诗友）

经年呐喊，一生只说实话，疾呼宪政大开张，广陵未绝。
几度沉浮，百岁犹思匡复，重写庐山真面目，正气长存。

张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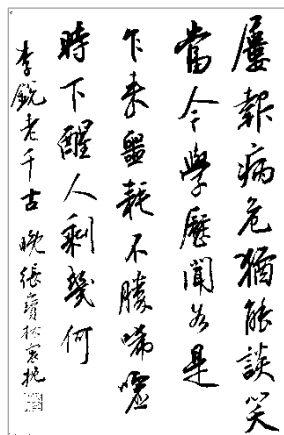
八十二年两头真，无惧迷雾，频责高峡出平湖，更知毛病难改，惜宪政未成，死不瞑目
一百三载终身正，不信救星，实录庐山起乱云，虽说习弊又延，然公义永在，走亦安心
李锐先生千古

张宝林

屡报病危，犹能谈笑，当今学历闻如是；
乍闻噩耗，不胜唏嘘，时下醒人剩几何！
李锐老千古

张遵宏

神州披缟素，泪送太史公。
锐老千古！



张以林

大义逆龙鳞，热泪两行悲国士；
丹心宣宪政，白花一朵吊英魂！

七 | 文章

告别李锐

——中共民主派的谢幕

章立凡



二〇一九年的初春二月，中共党史学界痛失两座重镇，一位是哈佛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者麦克法夸尔（马若德）先生；另一位就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异议者、《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先生。随着李锐的逝世，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代表的中共民主派，已日渐凋零，进入谢幕时段（我认为此文中还是用“民主派”比较切题，下同）。

老成凋谢：民主派后继乏人

李锐先生逝世的次日，有关部门来电话，指责我昨天接受外媒的访问，要求我不出席李锐的追悼会。我说，我是李锐的朋友，他逝世了，为什么不能去悼念？请说出不能去的理由。对方无言以对。

我回想了一下对外媒的发言，大意是：一位中共老干部，敢于公开地表明自己对中共现任领导人的批评，这是前所未有的。接下来要看的就是，领导人会不会给李锐送花圈，或者出席他的遗体告别。观察气量和态度的时候到了。我还提及，李锐说过死后不盖党旗。

李锐虽然在病榻上批评过领导人，但领导人也说过“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追悼逝者，展示“雅量”，此其时也——我这提示亦不为过。既然有关部门给不出缺席的理由，那么我就有理由去追悼。

二月二十日上午，我按预定时间去了八宝山殡仪馆。想去看看有没有关键的花圈，遗体是否覆盖党旗——我要见证历史时刻。

一路上碰到的熟人，都提醒我警察在盘查。离八宝山越近，警察就越多，我偕夫人坦然前行，未受阻拦。

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官民通用的东礼堂举行。中共党内等级森严，李锐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却未安排在高官专用的大礼堂（原第一告别室），也没按惯例悬挂悼念逝者的黑布横幅。

迎面遇上蒋彦永大夫。他是赶在第一拨进去告别的，未被允许拍照。礼堂目前暂停入内，门外的高台上排起了长队。门口立着“谢绝拍照”的牌子，没有发放逝者生平的文字，一些外媒和港媒记者，被便衣精确地清出队伍。排了半小时队进入礼堂，颇感气氛诡异。门内有工作人员收缴吊客自带的鲜花，礼堂内没有奏哀乐。鞠躬后凝视逝者，李锐先生安卧在鲜花中，遗体还是被覆盖了中共党旗。仔细扫视众多花圈，仅看到刘云山、贺国强、田纪云等人的名字。

李锐先生表达过“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的遗愿，但“党是领导一切的”，既然无法占有其灵魂，也只好掌控其躯壳了。所谓“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与李锐先生同辈的朱厚泽、于光远、何方等人，虽在不同程度上被认为是党内异议者，只要逝者还有党籍，遗体都毫无例外地被覆盖党旗。逝者意愿得不到尊重现象，体制内也颇为常见，最著名的先例就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曾亲自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字，表明身后火葬的意愿。如今签字人中唯一还躺在水晶棺里的，就是毛自己。

慰问家属后走出礼堂，有不少熟人在交谈，得知习近平、李克强、朱镕基等也送了花圈，可能是被工作人员遮挡起来了，搞不清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送别者中包括《炎黄春秋》杂志的作者、编辑和读者群，郭道晖、杜光、姚监复等老先生均有出席，还有些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难者，皆垂垂老矣，更多则的是体制内退休者及红二代，与我年龄相仿，鲜见有年轻面孔。据港媒估算，约一千五百人出席了今天的告别。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个群体年龄偏大。

李锐之锐：性格决定命运

李锐先生是我认识的前辈中，性格最为特殊的一位。

第一次见到李锐先生，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在《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联合举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上。李锐谈及自己与耀邦的交往和友谊，也不讳言工作中的分歧（如关于某人的工作安排和三峡工程）以及耀邦的大度，认为“他是我在几十年党内生活

中第二个可以交心的人”。李锐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胡耀邦逝世前两天，摄影师（杜修贤）经秦川安排，到耀邦家为他拍照时，按惯例要他笑一笑，耀邦说“我怎么笑得起来”。其中一张“苦笑”遗照，很快成为胡耀邦追悼大会上的标准像。稍后，我将李锐所述轶闻核对翔实，写进一篇悼文发表。

我们这些与会者的全部发言，《世界经济导报》曾以五个版面发表，导致该报被永久停刊。

本世纪初，我成为《炎黄春秋》杂志的作者之一，与李锐先生和其他前辈作者，不时在一些联谊活动和座谈会中相遇。

李锐口才极好，出口成章，他这一代学运出身的人物，与当下那批脱稿说不了话的官僚，不可同日而语。就我记忆所及，他在一些公开场合，对一些事件、人物的评论，总是直截了当，态度鲜明不留情面。

例如二〇〇四年七月，李锐出席《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的座谈会，他批评一九四九年之后向苏联“一边倒”以及左的影响，导致中国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他说：“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我觉得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李锐先生指名道姓地谈到：八十年代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除了钱正英、张光斗一对老“搭档”，还有两位姓王的前封疆大吏对此最为积极，一是王震，一是王任重。方案上报到陈云那里，陈没有明说反对，批示要求水电部调研。当时李鹏代表水电部，提出水库移民问题难办，算是说了一句明白话。“主上派”又跑去游说邓小平，称工程完工以后，万吨轮船可直达重庆，把邓小平说动了。但工程上马以后，他们就改口说“万吨船队”了。这后半段的发言，在发表时被“和谐”了。

记得我发言时引用的数据不准确，李锐快人快语，当面提出纠正。会后他私下对我提及：“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我与令尊见过面，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聚餐时，我注意到，李锐先生不大掩饰个人好恶。他耳朵有点背，即便坐得远，只要他想听你说话，会用手掌拢起

耳朵听；某人就坐在他身边缠着问话，他却毫无反应。

李锐一生的命运，与他这种锋芒毕露、剖切透辟的个性密不可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他与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就三峡工程当着毛泽东面折廷诤，过后又受命撰文各抒己见。当时毛氏“高峡出平湖”的狂想几成定局，由此被搁置了三十四年。设若这项好大喜功的方案，乘着“大跃进”的东风大干快上，后面的那场“人祸”（大饥荒），为害之烈不知还要翻上几番。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李锐以其口才文笔，推迟了一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灾难，由是获得毛泽东的青睐，成为御用“兼职秘书”；但“伴君如伴虎”，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以批评“大跃进”及议论“斯大林晚年”贾祸，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公职下放改造，“文革”入狱八年，直至一九七九年复出，二十年间遍尝盛衰荣辱，皆因以天下奉一人。

李锐之真：秉笔直书党史秘辛

在我的经历中，亲见二人衰年变法，“破门而出”成为史学家。一位是《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由新闻记者变“旧闻记者”，以翔实的数据和记录，将共和国史上惨烈的大饥荒展现给世人。另一位就是《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先生，他以亲历者的现场实录，首次披露了中共高层围绕“大跃进”的斗争和决策过程，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必读书，同时也是解析大饥荒成因的一把钥匙。《庐山会议实录》与李志绥大夫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从政治层面，一从生活层面，以不同角度立体解读了毛泽东其人，是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李锐先生能够完成这部力作，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除了毛泽东兼职秘书的身份外，他既是庐山会议的亲历者，又被指定做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常委会的现场记录人。

二、复出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离职后又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有搜集查阅资料的便利。

三、八十年代的体制内外政治氛围及党内高层的支持推动。

说到第三点，就不能不重提胡乔木。这位与李锐两度共事的毛泽东“文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持者，一生有其多面性，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九九二年增订版后记中，证实了胡的幕后推手角色及其在资料上提供的支持。这也令我对这位被称为“左王”的人物，有了较为立体的认识。当然，胡乔木支持李锐写书的用意，除了信史存真，还包括总结历教训、维护中共执政地位长远考量。胡乔木懂得“春秋大义”的利害，借机留下自己在庐山上的正面形象，不失为一种精明的投注。反观当下以禁言禁书为能事的文宣主管，若有胡乔木一半的见识和精明，也不至于如此讳疾忌医。

李锐的庐山会议笔记本，曾一度被陈伯达掠走，从另一角度证明当时的中共高层，懂得历史档案的重要性。记得有一次《炎黄春秋》座谈，李锐先生谈及他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任内，亲历的一次销毁周恩来档案事件。当时邓颖超找到杨尚昆，说是恩来有一批档案，必须销毁。杨推说需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你马上请示，我就坐在这里等。杨只好电话请示小平，获准把档案运过来，当场销毁。李锐作为组织部门负责人，被召到现场监督销档。他说自己曾拿起一份卷宗看，是某某某（章注：名字我忘记了）的专档。

我立时想起：曾有纪念文章提到，周恩来临终前与邓颖超有一段对话。周说，我知道很多事，但我不说。邓说，我也知道很多事，我也不说。李锐所述，印证了这一说法。小超（邓颖超）履行了与恩来的约定，将很多见不得光的党史秘密，付之一炬。

理想主义：“两头真”寻觅初心

关于中共一批老干部的“两头真”，我宁可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希望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因为毕竟中间有一段失真了。不幸的是，当下体制内外“两面人”比比皆是，“双重人格”已成社会常态。

以《炎黄春秋》为旗帜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被认为是“两头真”的群体，李锐先生亦为其中翘楚。这批人中多数是在“一二·九”运

动前后加入中共，确曾怀有救国救民和自由民主的理想，且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对日政策感到失望。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知识分子趋向左倾的时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为摆脱困境，大力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吸引了大批学生和知识青年投奔中共，这些人是在“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召唤下加入中共队伍的农民，素质完全不一样。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很多场合大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承诺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美国式的民主国家。那一时期《新华日报》等中共媒体宣传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的文章，相当一部分出自这批知识分子之手。

然而这批人的命运，与历史上加入农民起义队伍的知识分子们雷同。要么成为新王朝的辅佐，要么成为被祭坛上的牺牲。李锐经历延安整风，遭受过政治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打击。中共建政后，李锐作为中共革命干部，参与过建政时期的左倾，写文章宣传过土改。但作为体制内的文化人，他保护了曾国藩故居，发现了重要史料《唐纵日记》；他在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搜集整理毛泽东的史料，并于一九五七年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尽管有参与“造神”的成分，但也成为李锐研究毛泽东的开端。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李锐也会成为“两头真”人物中的一员，中期的迷失在所不免。亲历“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使他看到中共体制的弊端和阴暗面，醒悟得比别人早；近二十年的流放和监禁，更积累了深刻的认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这批“两头真”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党主立宪”，使中共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国家走上宪政之路。不过，这种主张既有早年自由民主的理想，也有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的考量。李锐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任内，主抓“第三梯队”建设，考察推送了两位后来担任总书记的人物。八十年代中期，中共实行干部新老交替，李锐等“一二·九”群体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而大佬仍在掌握实际权力，中国的改革形成“爸爸已经退休，爷爷还在管事”的局面。李锐这段工作的功过是非，只好留待后人评说了。

炎黄春秋：一代人其鸣也哀

一九八九年学潮期间，李锐、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四位中顾委委员联名，“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

“六四”事件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摆。杜导正先生创办了《炎黄春秋》杂志，成为党内民主派的发声平台。李锐作为中坚人物，呼吁民主宪政不遗余力。他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我就不一一详述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权贵利益集团形成，政治氛围日趋保守，言论空间收窄，《炎黄春秋》的老人们在体制内处境日艰，却仍坚守话语权。李锐的书也无法在大陆出版了，他曾抗议道：“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我李锐就没有言论自由。”因海关扣留海外版李锐回忆录引发的维权公案，现已进入第六个年头。

不时有人质疑李锐：为什么不退党？他对女儿李南央的解释是“留在党内说话更有份量”。我记得李锐曾谈到：二〇〇七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七大，九十岁的他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分组讨论时跟李源潮一个组。李锐发了一次言，李源潮过来对他说，从现在起到会期结束你都不要发言了。李锐觉得深受侮辱，真想拂袖而去。考虑到自己留在党内的价值并守住话语权，才强忍着继续与会，直到十七大结束。

2012年中共十八大，列席代表李锐在书面发言中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从党内民主和差额选举做起，实现党政分开；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允许党内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和批评领导人及党的政策；领导人离职后取消特殊待遇，不得干政；他质疑中国模式，重申“宪政大开张”和普世价值，清算苏俄模式，反对一党专政。这恐怕是他在党内会议上最后一次公开发表。十八大闭幕后，炎黄春秋杂志社和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联合在京举办了“改革共识论坛”。李锐与会，介绍了自己在十八大的小组会发言，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主张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何方、高放、杜光、郭道晖、江平、陈光中、资中筠、宋以敏、高锜等前辈也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最后提出一份《改革共识倡议书》，有71位与会

者联署。

此时我对政治改革已不抱希望，在发言中有明确的表达：“我想重新解释三个名词：什么是旧中国？宪政中国出现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什么是旧社会？公民社会出现以前的社会就是旧社会。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应该开放党禁、报禁。”“可能很多人跟我没共识，我也不追求这种共识，因为在座很多老同志的心情我也理解，你们怀着革命理想风风雨雨几十年走过来，走到今天，可以说，你们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但不愿意承认，还希望救党，我相信你们的真诚。”我坦承自己的心情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能救就救，救不了就算了。

此后的剧情发展，一如我所预感，李锐先生和“炎黄春秋”老人们的期盼，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倒退。甚至《炎黄春秋》杂志自身，也在风刀霜剑下被劫夺，被迫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两头真”老人们最难实现的，莫过于超越自己。

“哀莫大于心死”，深刻反思之后，李锐先生真正大彻大悟。被“恩赐”予特邀代表的他，没有出席二〇一八年的中共十九大。其病榻遗言掷地有声，成为这位世纪老人的绝响。

李锐先生逝世后，我曾作小诗二首送别。兹录于此为奠：

一

空将遗蜕裹红旗，心路云泥哪得知。
七十年来一台戏，剧终谁是好男儿？

二

回首尘寰事不空，百年大愿众心同。
中华宪政开张日，俎豆馨香告锐翁。

2019年3月19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忘年交

王申生

李锐老的逝世消息有点像是等来的。自去年的网传到今年二月十六日大限，他的顽强生命奇迹般地绽放了一个世纪后又活到了一百零二岁。一百岁的时候还在坚持游泳。去年病危以后依然思维清晰敏谈己见。凡所敬爱他的人都为他骄傲。但听到他逝去的消息还是禁不住眼泪涌出地大哭了一场。

李锐自青年时就热爱绘画，大学时代还在学校办过个展。每当回忆起我在磨子潭水库旁那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为他写肖像的时候，他那自信当当的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和愉快的有点兴奋的样子依然会浮现。

那场油画写生持续了一天。他非常认真地做模特，也一直在回忆和诉说自己喜爱油画和收藏水墨国画的经历。午饭时他去食堂打来米饭，小菜是自己做的香喷喷的湖南口味，有烟腊肉和辣椒酱，青菜汤里滴几滴菌油（湖南人的最爱）顿时菌香满屋，烟腊可口……

他对我为他作的写生画非常满意和开心。他说自己很有眼力，看过我们班大多数同学的画并夸我是他们中画得最好的。他告诉我如果到国外出差就一定要去博物馆看画和买画册。他能说出列宾和苏里柯夫的不同，并赞同我评价谢洛夫比老师列宾更有才气。老头儿（水库的职工、邻居都叫他李老头儿）当然有资格这么认为，因为他看到的都是油画原作。他说“只有看原作才知道油画的色彩多丰富、多逼真……”

老头儿喜欢被别人佩服有会画画的本事，还豪言自己如果一心坚持从事绘画一定能成个厉害的画家。从他的铅笔素描中可以看到形准的能力，在他画素描速写时他会详细地帮我分析自己的形象特征。他让我看了自己为小女儿么么画的铅笔头像，还得意地告诉我曾多次为水库职工去世的追悼会画放大遗像。那年头山里不可能有照片放大



2018年4月8日王申生从上海赶到北京医院探望病重的李锐

的设备，连上海都还有九宫格放大黑白遗照的画像小店。

“我们做忘年交吧。”经过一天的热烈交流老头儿认了我这个只懂得并热爱着画画的青年作朋友，直到我们的友谊被揭发批判。我临走时称有食堂饭菜券要还他，在工宣队监视下与他道别时说：“那幅肖像画恐怕保不住了”，老头儿顿时急了：“不，不可能让他们拿走！我要用生命来保护它！”

老者与年青人在某方面的情趣投缘并可神聊的越辈友谊可作“忘年交”，李锐老称我们之间谓“忘年交”是绘画意趣的互为感染，也是对艺术的尊重，故而对绘画和收藏的关注是工作之余的浓浓爱好。他复出后在百忙的工作之余经常会拿出本某人画册或举出某画家的作品问：“申生，你对他的作品怎么看？”他总是大直若屈，求真不渝，跟年轻人谈得来，对新事物感兴趣。

有一次，欧洲著名的法国当代艺术家严培明（与我亦师亦友）在北京 798 的尤伦斯艺术空间举办当代艺术展，李锐老满是激情地到了展场，对装置性艺术方式和极大的马达轰鸣声都抱有愉悦的体验……

李锐历经坎坷却始终精神不败，学习不止，满腔热忱……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身形健硕意气昂扬、英容坦真的巍影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19年4月3日于上海

李锐的意义

丁东

一、

2019年2月16日上午8时32分，李锐先生在北京医院因肾脏衰竭与世长辞。他祖籍湖南平江，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京，再过50多天，他就满102周岁了。论寿命，有人比他活得更长；论著述，有人比他更多；论思想，有人比他走得更远；论官位，有人比他更高。但我认为，在一个时期的逝者中，他的历史份量无出其右。纵观他的一生，可称有功于当代，将影响后世。

其一，李锐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代表。他反对三峡工程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当时他任国家水电工程总局局长，是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和指挥者。1954年长江发大水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毛泽东乘兵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谈到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1956年，林一山在《中国水利》发表《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蓄水高度235米。李锐在《水力发电》发表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提出反对意见。当年，毛泽东写诗表达了“高峡出平湖”的意向。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又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大家不敢提出异议，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一架专机把李锐和林一山接到南宁，当天晚上就开会。毛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林一山说，要谈两个小时。毛又问李锐，要谈多长时间，李说：半个小时。林一山先谈。然后李锐说，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发电量一千亿度以上，而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一百九十亿度，即使按当时预测的十五年后全国用电量也不过是二千亿度。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三峡这么大个电站，我说不清楚。根据苏联的经验，全国最大电厂的容量在电网里面最多不能超过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不然就不好调度。一个电厂的投资假如是一万元，消耗掉这些电力的经济项目的投资至少要五万

元。三峡是个超大水电站，什么时候上马，应该由电的需要来决定，不是由防洪的需要来决定。没有三峡照旧可以防洪。长江是条很好的河流，1870年发生千年一遇的洪水，荆江北岸的堤防也并没有被冲破，被冲破的是湖南。自古以来，荆江北岸云梦泽有许多湖泊，是为长江临时分洪用的。明朝宰相张居正将荆江北岸大堤修高，洪水来了冲向南岸，水退后，被淹过的土地都会丰收，而北岸的云梦泽的湖泊则逐步消失了，因此湖北人并不感谢张居正。现在长江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方法防洪。三峡最困难的问题是地质勘察，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李锐的诤言，改变了毛泽东让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打算。

1979年后，三峡工程再度提上议程，李锐还是反对派，他和周培源、孙越崎、黄万里、陆钦侃、侯学煜等科学家从生态、地质、水文、经济、国家安全等多方面论证了三峡工程上马的风险和弊端。1992年，当局决定三峡工程开工后，李锐还多次向国家领导人力谏停工。三峡工程建成后，其负面影响已经逐步显现，更严重的后果还在后头。

其二，李锐是党史、国史的重要见证人和记录者。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同林一山“御前辩论”之后，毛泽东让李锐担任兼职秘书，他曾三度就经济过热向毛泽东写信谏言。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李锐和彭、黄、张、周倾向一致，不但被罢官，而且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劳动，几乎饿死。文革中系狱秦城八年，没有纸笔，只好用棉签蘸紫药水写诗。平反复出后，庐山会议的笔记本失而复得。1980年代，他依据自己的笔记，写成《庐山会议实录》。此书在记述中共高层政治生态方面罕有其匹。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庐山会议实录》是必读之书。胡耀邦说李锐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临终前半月让李锐见证了自己的遗言。赵紫阳也看中了李锐的史识和史德，在一些有争议的重要关节上，也选择李锐作证。李锐还留下了数百万言的日记，生前已经交设在斯坦福大学的美国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永久保存。该所以收藏蒋介石日记闻名中外。

据悉，李锐日记今年便可向全球公众开放。

其三，李锐介入过高层的人事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他担任过陈云的政治秘书。1982年，陈云提议他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担任局长，承担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他直接考察过几任党魁，也推荐过朱厚泽、王元化等到文化要津任职。十三大前，他听到高层有人力荐邓力群出任总书记，上书邓小平力阻，赵紫阳说他立了一大功。

其四，李锐晚年是中共党内公开追求民主宪政的旗帜性人物。他的父亲李积芳是同盟会员，国会议员，是宪政之路上的一位先行者，逝世时李锐才五岁。李锐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是他当时的政治选择。他没想到，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实行的还是训政，不过是换了一个训政的主体。李锐亲历专政的严酷，走出国门看世界，晚年认定民主宪政才是人间正途。在位时，他不认山头认真理，在党内博弈中站到了胡耀邦、赵紫阳一边。1989年胡耀邦逝世，赵紫阳软禁，体制内民主派群龙无首，李锐的作用逐渐突显出来。一些同道因为自然规律凋谢了，李锐就成为中国大陆为民主宪政奋斗时间最长、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代表人物。

李锐和杜润生、于光远、李昌被称为中顾委“四大金刚”。中顾委存在于1982年到1992年，是中共元老院。其成员革命资历很老，学历普遍不高。他们四位都曾就读名牌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因而同情学潮，89年中顾委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几乎革出教门。陈云出面把他们保了下来。反对和平演变夭折后他们重新活跃起来。四人中李锐活得最长，影响更大。

前中顾委委员的身份，让李锐有机会列席中共十五大到十八大，十九大仍被请为“特邀代表”。李锐每次都要向大会书面公开表达政见。十五大是《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十六大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公开发表后都产生很大反响。

李锐和李普、李慎之又被称为“三李”。他们在告别20世纪，走向21世纪之际，为在中国推动自由民主思潮的复苏，起到了领军作用。

李锐与何方、杜导正还被称为“炎黄三老”。《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是一本以当代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性刊物。进入21世纪，有同样追求的其他报刊纷纷凋零，《炎黄春秋》便成为中国大陆政界、学界追求自由民主宪政，推动转型正义的首选纸媒，成为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求真向善，向往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园，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直到2016年7月，《炎黄春秋》一直由杜导正主持。李锐一开始就是撰稿人，后来担任编委，顾问。支持《炎黄春秋》政要宿儒陆续辞世后，李锐与生于1922年的何方，生于1923年的杜导正一度成为《炎黄春秋》仅存的三老。李锐对《炎黄春秋》的作用不仅是发表文章，出谋划策，更重要的是公开站台，为炎黄的生存呼号。2015年，官方派员找李锐谈话，拿出文件要李锐辞去《炎黄春秋》顾问，李锐断然回应说：“这个顾问我当定了。”2016年7月，《炎黄春秋》被夺权，李锐发出抗议。直到十九大召开，他还以特邀代表身份写了一页纸的意见，以《炎黄春秋》事件为例呼吁出版自由。

李锐说自己晚年主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人类进步靠什么？二是主义是怎么回事？三是党是怎么回事？在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精神上已经超越了主义的教条和党派的桎梏：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二、

李锐一生追求公平正义，不只是纸上谈兵，还经常以实际行动扶危助困。这也是他受人爱戴的重要原因。他帮助过的人很多，特别是当他在位时，确实为不少人解决了人生难题。

比如丁玲，她比李锐长13岁，生于1904年，第一个丈夫是胡也频，1931年2月蒙难，左联五烈士之一。第二个丈夫冯达，本来也是中共党员。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在舆论声援下，警方将丁玲软禁在南京。其间她与冯达生一女。这时冯达已背叛中共，丁玲仍心向中共，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前往陕北。丁玲起初受到很高礼遇，后延安出现丁玲被捕自首的说法。1940年，她向毛泽东要求审查这段历史，经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人过问，中央组织部作出了

“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1943年延安审干，中央党校再次审查丁玲。当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已经引起党内军内某些高级干部的反感。对她的历史结论也改变为“丁玲 1933 年 5 月被捕以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期间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的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 36 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这个结论尚未影响丁玲在党内担任要职，在文化上施展才能。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度挨整，历史问题又被再度提出。周扬说：“丁玲在南京被捕后，始终和她那叛徒丈夫同居，而且在敌人面前自首变节。”1979年初，右派改正已成大势。胡耀邦表达了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 1940 年中组部结论的意思。丁玲右派改正了，党籍恢复了，行政七级待遇回来了，但历史问题仍然维持 1956 年中宣部作的“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并由中央机发（1980）30 号文批复。当时周扬是文艺界领导，他的态度是：“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去掉。”丁玲头上还戴着紧箍咒。这时，她向李锐求助。李锐和她是湖南同乡，岳云中学先后校友，延安《解放日报》同事，同在北大荒受难。丁玲住进复兴门外 22 号楼，又和李锐成了邻居。1983 年 8 月，丁玲和丈夫陈明到李锐家登门拜访，述说自己的心病。李锐支持丁玲申诉，但也看到解决问题的难度。一是文艺界的宗派之争。丁玲、周扬之间的积怨，可以远溯到三十年代，要化解非一日之功；二是中组部帅孟奇老大姐对丁玲有看法，她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刑讯逼供，坚贞不屈。相比之下，丁玲受软禁似乎是优待，与冯达生女儿也被视为不守妇道。李锐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让中组部干审局何载、张冀等人重新核实，形成丁玲“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的新结论。由于 1980 年的结论是中央文件，这个新结论也必须经中央决定。李锐深知，需要中央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大事太多，如果等着上会，万一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可能搁置，再想提上议事日程就不知到什么时候了。于是，他把拟定的结论送到每一位中央书记处成员

的手上，一一个别征求意见，直到所有书记处成员都签名同意，这样就完成了中央批准手续。1984年8月1日，中组部发出（1984）9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李锐给丁玲家打电话报告喜讯。电话是陈明接的。陈明赶到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丁玲转达。丁玲听了长出一口大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再比如杨小凯。杨小凯文革中因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8年4月刑满释放，到邵阳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1979年，杨曦光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专业打了零分，考官的批语是“看不懂”。于是他到北京找到父亲的老朋友李锐求助。李锐和李南央讨论此事，李南央说，一个人能够在监狱里自修大学课程，且有了高深的研究成果，一定是个很了不得的人。以“看不懂”为理由打零分太霸道了。李锐于是决定和李南央一起向于光远求助。在于光远帮助下，杨参加考试，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写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跻身中国经济学界前沿。后又在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致庄等人帮助下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

李锐退出官位以后，仍然想以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比如周有光，长李锐11岁。他原来供职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国家语委。周有光作为顶级专家，享受高级干部的医疗待遇。后来机构改革，国家语委并入教育部，周老的医疗待遇中断了。李锐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希望尽快解决周老的医疗待遇问题。后来，刘延东到周有光家登门拜访，补发了医疗证。

又比如蒋彦永，是301医院主任医师。2003年，他以公开揭露非典疫情在北京蔓延的真相而享誉世界，接着又因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而失去人身自由。李锐十分焦虑。于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坦然说明蒋医生的信发出前自己是看过的，并为之代转中央领导，希望自己承担责任，尽快让蒋医生恢复正常生活。李锐上书一周后，蒋彦永医生终于回家。接着李锐又上书中央领导，要求改变赵紫阳的处境，允许他和亲朋好友正常交往。这就起不了作用了。

李锐伸出援手不能如愿的情况，还有施滨海。他在 1980 年代是《世界经济导报》编委，1990 年代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供职。因秘密潜入赵紫阳家采访，记录真相，被官方逮捕。释放后失业，没有生活来源。李锐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救急，又反复向杜导正推荐他到《炎黄春秋》编辑部工作，并派秘书找杂志社恳谈，但直到杂志被接管，也未能落实。李锐虽然没有帮成施滨海，但他的古道热肠还是让施滨海十分感动。

三、

我和李锐老初识于 1995 年。当时湖南学者朱正先生在北京协助李锐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引我和太太邢小群第一次到李锐家中拜望。李锐当时不到 80 岁。

1996 年初，《东方》杂志朱正琳组织“顾准和《顾准文集》”专题，约我一起找李锐组稿。李老出口成章，我记录整理成文，他又作充实，形成《一刻也不能没理论思维》发表。1998 年，我编《顾准寻思录》，收入李老此文，并请李老题写书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有人将李老七次出访的日记编成一书，排版就绪，却在出版社卡了壳。我问《顾准寻思录》的责任编辑唐晓渡可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当即答应，并很快在社内完成了出版程序，推出了《李锐日记》。

2002 年，崔卫平向我提议找李锐做口述历史。于是，我和崔卫平到李老家中开始采访。崔卫平的夫君王绥琛用录像机记录采访过程。后来，崔卫平夫妇退出了这项计划。我用录音机继续采访李老。妻子的妹妹邢晓明帮我把录音转化为文字初稿。我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请李老定稿，我整理的稿子他只改出一篇，就因人客来往中断。2008 年，李南央决定参与整理父亲的口述自传。我告诉她，最大的难题，是请李老本人抽出时间校订文稿。数年前就是在这个环节上搁浅的。李老写了一辈子文章，不愿意草率应对，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认真修改。所好，李南央联系了一家香港杂志，连载这部口述自传。如果李老不能及时改出稿子，连载就要断档。这成为一个推动力，终于让李老在 96 岁那年完成了口述自传的校订。这就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出版后李锐对这本传记十分满意。本文涉及

的李老一生的史实，多数以此传为据。

2003年，李慎之逝世，我和一些朋友编辑了《怀念李慎之》上下集，受到欢迎。2004年，李普邀我去他家，和曾彦修、邵燕祥一起策划，编辑李锐米寿文集。当时，曾老主张成立一个阵容强大的组委会，请认同李锐的部级高官和科学界的院士参加。我建议不事声张，悄悄地约稿。曾老当时不悦，拂袖而去。李普让我按自己的想法进行。我把约到的稿子编成《大哉李锐》一书，时代国际出版社徐跃先生决定投资出版。印出后发现他请的编辑没有尽责，出现很多纰漏。于是和徐跃商量，请邓伍文重新编校，终于在2005年李老米寿之际，印出了精美的《大哉李锐》，李老十分满意。本书的一些史料，取自《大哉李锐》中的回忆文章。

2014年底，我参加了《炎黄春秋》编辑工作。和李老的交往又频繁起来。我先后协助他整理了《九九感怀》、《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百年回首》三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尤其是《九九感怀》发表在他99岁生日的2015年4月，《百年回首》发表在他百岁生日的2016年4月，他感到十分快慰。

本来，李老和家人商量，2016年4月13日在中组部招待所庆贺生日，《炎黄春秋》表示和李老共同承担餐费。生日临近，组织部找李老夫人张玉珍谈话，表示不同意。张玉珍准备家里自己过。4月8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开会，杜导正说，李锐过生日，炎黄要有表示。于是派我和胡竞成、王海印到李老家商谈。我跟李老说，您是《炎黄春秋》顾问。就是请您一起吃个饭，不请外人，不违反规定，李老才接受。4月11日，杂志社在金枝玉叶餐馆开了两桌，李锐夫妇、李南央夫妇、秘书司机和杂志社全体参加。李老送大家自印诗选，生日过得很愉快。

我和李锐老的最后一次交流是2018年8月7日。夫人小群的文章中作了记述，我不再赘述。李锐这一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为民族、为时代立下了不朽之言。

2019年2月23日

和李锐的最后一次交谈

邢小群



2016年12月小群、丁东与李锐

2019年2月16日上午8时32分，李锐老仙逝，享年102岁。收到李南央发来信息，很难过，并不感到意外。

4天以前，宋以敏老师曾到医院看望李老，当时李老已经昏迷。看她转来的李老脸上、身上很多管子的照片，我知道大限已近。

和李老相识已经23年。1996年我结识了湖南学者朱正先生。当时他在北京小住，问我和丁东愿意不愿意拜望李锐？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之前，我已经读过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龙胆紫集》，知道他在政治上、文化上的份量。李锐当时不到80岁。那天，是在他的卧室里交谈。李老说起话来有些气喘，告诉我们，他患有肺气肿。我看到他身后有个一人高的氧气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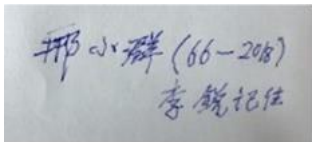
以后，丁东和李锐交往越来越多。先是为《东方》杂志顾准专题向他组稿，后来为《顾准寻思录》请他题写书名，再后来策划编辑米寿文集《大哉李锐》，还为他其他书籍的出版起过一些推手作用。2002年，崔卫平找丁东一起给李老做口述历史。以后崔卫平退出，李南央加入进来，断断续续经历了十年，完成了《李锐口述往事》。丁东参加了《炎黄春秋》编辑工作，又和李老一起走完了这份杂志的最后一程。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来往，使丁东和李老成为忘年交，我也和李老多有交谈。眼看他身体越来越好，神清气爽，不再气喘。他坚持游泳，一直游到100岁，虽然安了心脏起搏器，讲起话来中气十足。

我们和李锐老的最后一次交流是2018年8月7日。此前，李老在医院一度病危，家属曾谢绝朋友探望。入夏以后，李老精神见好，我们便到北京医院看望李锐先生。

当时，李老除了插管鼻饲，其他方面接近正常。思维很清楚，不但可以说话、阅读、写字，还可以下棋。见到我，他问：你叫什么？我忘记了。丁东告诉他：她是邢小群。李老立即笑说：“她很有名，文章很多。”并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的名字，2018年66岁，并写下：“李

锐记住”。我心里暖暖的。

这时，比他年长一岁的武汉大学老同学刘清从隔壁病房坐轮椅过来看望。他介绍：丁东和邢小群是作家，他还对老同学说，人生在世要写几本书。刘老表示：我出过五本书，不如李锐写的书多。李老这话看似随意，其实隐含着他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是人生三不朽。李老讲的就是立言的意义。他这一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也确实为民族、为时代立下了不朽之言。



2018年8月7日李锐写

一年前，李南央曾邀请上百位各界人士，写出对李锐的认识和评价，印成《敬寄李锐》一书，让李老神志清醒时过目。李老在意社会对他的评价。别人身后做的事，李老生前就看到了。这也是世间少有的。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李老走了，我们还要艰难地活下去。

2019年2月17日

李公列传

玄武

西历二〇一九载二月十六，李公崩，寿百零二岁。前数月，反复手书曰：“圆人者四，曰时，曰知，曰思，曰德。党魁不能外。”遗志求宪政开张。其女南央为语音讣告，张于网路，其声哽咽数断。旋即，讣告禁，而天下咸知。余抱病览李公平生事，夜不能寐。拂晓，为李公传。

李公讳锐，愈百岁而目灼灼犹烈火。曾名厚生。湘人，有肝胆。生于北平，是岁环宇纷扰。张勋复辟，辫军入蓟，数月窜离。中国参世界大战于八月，沙俄列宁革命于十月。国士蔡公元培改制于北大，黄公兴国葬于岳麓。

李公父翁，游离东瀛，歃血于同盟会，与宋教仁、黄兴为友。公五岁，父卒，依严母。识字过千，小学跳跃过级而入私立中学，再求学于武大。

公父求救国，党尊国民；公亦求救国，党从共产。西元一九三六载，公创共党武汉临时支部。时有女杰万氏国瑞，悦慕李公。次年，携万氏赴北平觅党部。七月芦桥炮惊，异族入侵，国家将亡。公与万氏分离，女往山东，公赴武汉。此前，公为万氏更名为杨纯。公更名为锐，锐者，谐音万氏之名瑞。二人延用终生。然不得聚矣。

妙女范氏元甄，年方十八。为抗战演剧九队班头，受辖于郭沫若政治部三厅。倾心李公不已。公曰需半载，查找故人杨纯。范氏亦多询之，而无果。

范氏入渝城，为新华日报记者。久之，李公赴渝参南方局青年工作会，与范氏璧合。以周公卧室为洞房，邓颖超睡榻为婚床。叶帅亲为拍照。

西元一九三九载，李范赴圣城。时郎才女貌，风头无两。圣城少妇人，十八男方一女。而范氏列圣城四美。周公记之，长函发于渝城相勉；毛氏记之，为其让路于山道，又窃观其纺线。尝赛论宪政，扮国民党，辨难扮共党者。对手辞穷而退，传为笑谈。

西元一九四三载，圣城忽兴抢救运动，大肆捕人，及于李公，狱中曾五昼夜不得闭眼。此酷法为康生所创，曰人不眠，可供实言。其时康氏骑黑马，携黑犬，着黑礼服，蓄短须，突兀于圣城，其焰正炽。他年，李公得军统戴笠干将唐纵日记，中有句曰：“延安乱。惜无一人在彼！”知当年圣城之误。

李公入狱两载。时曰杨纯获重罪，于新四军中。故人有罪，亦成李公罪状。然查杨纯无辜。刘公少奇呈言：“新四整军，女将之中，杨纯最佳！”于是六载，李公始知故人掌将印于皖北，初适张爱萍将军，离异再适张彦。

李公妻范氏，已通奸于邓力群。邓氏，后称“左王”。时有妻儿，其妻遇二人于床。胡氏乔木亦见之。圣城集会批之，杨尚昆主持。范氏下放边乡为文书。邓氏再往，佯为夫妻一周。

李公脱罪而出，尽知家丑。休范氏，大病半载几死。范氏哀哀，求之不已。兼多人说和。公铁骨慈心，许之。六十载后，公曰：“吾之一生，无事负人，亦无罪错。”其甥在侧，曰：“舅与范氏复和，岂非大罪错！”公默然。

共党执国。公始为高岗主簿，再为陈云主簿，均大吏。为政湘地，曾护曾国藩故居，又憾未护左宗棠故居周全。再以水工佐国，反资历，重人才，曰“不可老狗挡道”。时人惊之。

以三峡事，为党魁毛氏青睐，欲为主簿。前，田家英与公私言：“党魁难伺。难上言。治天下难治左右。”公欲拒而不能，强为之。

上庐山。以诤言故，与彭帅、田家英、周小舟、黄克诚、张闻天俱获罪，公尤甚。开除党籍，流徙于关外。饥饿欲死，乃生食土豆、野菜。其姊寄饼干于湘，赖以保命。遇百姓诉困苦，曰惟念日本子，其时玉米喂牲口。日人不食肥肉，百姓尚可捡食。一老者与李公同劳于野，次日毙，遗言曰：“可食一口粥乎？”

李公友田家英、李富春、刘澜波。知其将死，多方营救，调返京城。其妻范氏逼立休书，遂之。范氏恶，多方告发其夫。田家英致电李公，范氏揭之。刘澜波悯李公，范氏亦揭之。至于夫妻床头对谈，亦书面上告。李公致范氏信函，亦全面上交。后，邓公阅范氏揭发卷

宗两巨册，怒曰：“其恶也如此！”令焚之。

李公又往皖地磨子潭，为教员。数载，以批驳陈伯达故，入秦城监。秦城，毛氏下令建造，原因战犯，后押政治犯，红祸起，囚五百零二人。

秦城营建者锦衣卫副指挥长杨奇清亦囚其中。京兆尹刘仁食不卸铐，终铐死狱中。

李公黥面，望高窗见吊车长臂，知建狱押人未已，而牢中久矣。又单监，昼夜寂寂唯向四壁。昔，王公若飞单监六载始出狱，友赠以怀表，王持之，对视良久，曰：“此为锅盖。”

公知单监易痴。乃以作诗吟句为思。以紫药水为墨，棉签为笔，于《马列文选》空白处志之，存四百余首。又习吐呐之术，兼以慢跑。狱卒暴虐，不乐李公跑步，尝呼止之，令以面相对，忽唾公面。

八载出复返皖地，又三载有余，方得重为冯妇三年。然李公秉性难移，续反三峡，不为容，到点“离休”。即应陈云之邀，组青干局，拔第三梯队。入中央委员。

胡公耀邦失势。大将王震荐左王邓力群为书记。李公上书赵公、邓公，呈邓氏之失。邓氏罢。

范氏求复合。左右切齿，莫不拒之。遂娶老红军遗孀米脂张氏玉珍，曰护士，曰医者，曰政委，近四十载。公笔耕不辍，为《庐山会议实录》，为《龙胆紫集》，为《反左文选》，为《往事杂忆》，为《大跃进亲历记》，为《口述实录》，为《早年毛氏》，凡此种种。又力主《炎黄春秋》，而杂志今日亦禁矣。

将百岁，著文《九九感怀》，述及一生，广布网路。自云爱水，以九九高龄，尚能泳三百米。忆及西元一九四九载，友人黎澍入京，惊曰：“此太平天国乎？”

乃著诗曰：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作主未宽容。

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遗愿不葬八宝山，不覆党旗。曰：“尔等憎吾，吾亦不乐见之。”

玄公曰：“李公一生多劫，而长寿一世纪逾二载。天假以寿，而欲

以难砺之乎？有戚氏本禹著文伐李公。日月自具光华，小人徒取耻笑耳。李公一生谋国，磊落坦荡，能发真言，不忌权贵。可当国士之称。为贵胄，而不夺志。尝曰：‘若党性与人性相悖，吾执人性。’民思变久，斯人去，时岁益晦矣。”

2019年2月18日

李锐有日记

邓伍文

李锐住院了，在医院里度过102岁生日，太让人揪心。

日记呢？无奈搁下了吧；

会中断许久吗？听说开始练习用笔，恢复抄写。入院已七八十天，但愿他的日记不断——有顽强的生命，必铸就传世的文字！

大几十年间，

李锐重日记，清楚于此生“跟当代历史紧紧相连”，他出版过日记片段，足以让人们对中国高层另眼相看；

他上百万字的日记，“敢于讲点真话”，又从不拒绝将日记公之于世。

跨十余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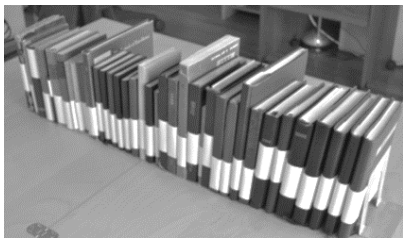
李锐的文字被封杀，披露李锐心声的刊物被剿灭，漫漫长夜，仅存一簇不灭之火，黎明前闪动着——李锐还有日记。

今天，“袖手难为壁上观”——

民族的去向、人类的命运，一派风雨苍黄潜流万股，当代历史曲折延续，操真话的跟踪记录，仅仅相连着呢；

明天，“关怀莫过朝中事”——

撩起往日的国是党非，问炎黄百年几多春秋，探究决策秘程，臧否“我见多了”的人物，平民至达官，妇孺与学者，都会笃定而言：



有李锐日记呀……

个人的日记，会有终止的一天；

无论李锐的日记绝笔于何时，当今的中国，当今的世界，蕴藏着一座宝山——李锐日记！

2018年6月下旬，于南京

习近平与李锐

吕月

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男儿”走了，他就是差两个月满 102 岁高龄的李锐。称李锐是“男儿”，则是对习近平的逆龙鳞。

习近平 2012 年登基，随后仿照邓小平进行了一次南巡，并向深圳的邓小平铜像献花、鞠躬，沿途也整理出一份广东讲话，其中最刺耳的一段话，是对苏共解体的斥责，称几千万苏共党员“无一人是男儿”。随后又在中央党校专讨班发表“两个 30 年互不否定”的讲话，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弹，集中爆发在 2013 年 2 月 27 日《炎黄春秋》举行的新春联谊会上。中年总编辑吴思主持，社长杜导正，顾问李锐、何方、郭道晖、江平、胡德华，还有老作者、老读者胡德平、陆德、资中筠、李洪林、曹思源都针对习的两个讲话提出极为尖锐的批评。据说，会场实况摄像录满一盘就直接送进中南海。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简称九号文件。中央认定的 7 大危险，条条都对着联谊会上的发言，文件要求“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与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中”。该文件的反常识、反文化、反思想，震惊知识界。

2016 年终于发生杂志被抢夺事件。“六四”之后中共党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界共同开辟出来的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就这样失守了。99 岁的李锐在 93 岁的杜导正家里悲愤地说了 8 个字：“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炎黄春秋》创办 25 年遇到的大小危机不下几十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发表田积云纪念赵紫阳的文章，江泽民大怒一定要换人换班子，李锐出面全力斡旋，据说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偌大的办公室变了样，报夹上从来只有一份《人民日报》，忽然地出现了两大罗二尺高的《炎黄春秋》。看来胡锦涛认真看了，因为杂志保住了。

江泽民没有办到的事，习近平却能三拳两脚就办到了。李锐与习近平的关系远远不止一本《炎黄春秋》。李锐在中共党内受到九死一生

的磨难，但是他个人杰出的才干不时还能受到中共最高层的青睐和重用。因为反对修建三峡大壩，1982年初65岁的李锐从水电部离休。随即就被中共二号权势人物陈云调进中组部，成立青干局任局长，即参加中共12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后进入中央委员会，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李锐把习近平选进第三梯队

青干局是负责第三梯队千人的选拔，为各省部直辖市领导班子选择青年干部。权力之大被称为“第二中组部”。江泽民、胡锦涛都经过李锐的筛选，都是李锐向中央写的推荐信。20年之后，老友李普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你看看你选的人！”

1983年10月青干局局长阎淮到河北正定县考察习近平。他称是“三特殊”考察。一、通常考察是地方推荐人选，此次是李锐指名道姓。二、历来考察是长期成绩突出者，而习下派不过一年，刚升为县委书记。三、青干局只考察省级后备的优秀干部，习差好几级，不在省推荐名单里。但是考察结果习近平和栗战书一起进了河北省级第三梯队，也就是进入千人省部级干部后备名单。

1985年习仲勋直接和省委书记高杨打招呼，结果河北省委干部会议上就上演了一幕《高山下的花环》。高杨成了军长，习仲勋成了北京那位神通广大的首长夫人，习近平就成了企图不上火线的高干子弟。很快中组部下了调令调他去厦门。他去向高杨告别，这个倔老头回答：“你是中央管的干部，不用跟我说”。

高杨后来回北京当了中央党校校长，活到100岁去世，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不但不出席遗体告别式，连个花圈也不送。

从中组部二次离休的李锐，进入中顾委，“六四”之后保留了党籍，一直有向中央上书的通道，李源潮任部长时最畅通。习近平上台之后说过：“李锐的东西不要再送这里，我不看。”

去年4月13日，是李锐101岁生日，在病榻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比高杨还厉害。

当前网上有传，习近平对李锐十分宽宥，不在意他说的那些话。

没人相信。据悉李锐临终前，北京医院不惜一切抢救他，乃是最高不愿让他死在中美谈判和两会之前，希望他昏迷中能够度过6月4号。人死不到10个小时，就违背他本人的意愿，安排妥3天之后的官办遗体告别仪式。为什么这么快？通常都是安排在头七，就是想尽快平息李锐的去世引发的舆论爆炸，这更是蠢之又蠢的决定。

李锐在最高层眼中，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永远是个最大的麻烦，但是他对宪政和自由的呼唤，他的春秋实录，他的道德文章，他无人可比的阅历、他的慧眼识伪，他卓越的思想 and 风骨，都是留给最黑暗的中国的不可朽遗产。

2019年2月20日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士

老鬼

本文 13 年前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发表，后被新浪删除。这次重新发表，订正了原文结尾的重大错误（误将山西作家李锐说的一段话安在湖南李锐头上）。



2006 年 4 月老鬼在李锐书房聊天

李锐的儿子跟我是小学同班同学。所以从小学 5 年级就知道李锐，知道他在水电部，还知道他犯了错误。

去年（2005）是他 88 岁大寿，胡绩伟、杜导正、李普等一批新闻界老前辈都去祝贺，我也和几个好友在新华社一个小食堂里与李锐见了面。大家汇聚一堂，衷心祝愿老人健康长寿。

今年他 89 岁，最近，我又去看望了他。

他还是那么清瘦，健康，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眼睛炯炯有神，就是耳朵有些背。我们年龄相差 30 年，他跟我说起话来没有一点点代沟，思想新锐，见解犀利，一针见血，似乎比我还年轻，充满勃勃朝气。听他谈吐，就像听一位三十几岁的文史哲博士在天南地北地侃，徐徐而醉。他能滔滔不绝聊老半天，与他的肉体年龄完全不相称。

李锐身体特别好，从年轻时就爱游泳，到现在还坚持，每周都要去游。走路腰不弯，腿不颤，动作准确，全身协调。他笑着说，老母亲活了 90 岁，自己身体健康，可能拜托了老母亲的遗传。

我想，长年坎坷经历也锻炼了他的筋骨。在秦城监狱期间，他被单身监禁，天天冷水擦身、做气功、慢跑、背诗……结果 8 年牢狱生活，几乎没生过病，原来夏天哮喘的毛病也很少发作，头脑也没退化。不少老干部都这样，原来养尊处优时一身病，文革挨斗挨整，下放劳改，一身病没了或减轻了。

自然而然谈到了我母亲杨沫，谈到了张中行，谈到了他们的分分离离。接着就谈到了亲情和母爱。李锐介绍了女儿李南央，还提到了前妻范元甄。他正视着我，眼睛闪闪发光说：离婚 20 多年后，她还不放过我，写信四处举报我……

说话间，他送给我一套李南央编的《父母昨日书》。这部书汇集了李锐和前妻范元甄在延安时相互来往的信件，大约有 800 封，被人誉为延安整风的一部活历史。

李锐 1939 年来到延安，曾参与创办了一个《轻骑兵》刊物，他表里如一，直抒胸臆，对看不惯的事情就提出批评。比如萧三动不动就爱说：“想当年我在苏联如何如何”，“想当年我与高尔基如何如何”，李锐就写了篇《想当年》的杂文，讽刺了他。李富春读后对他说“李锐啊，你好尖锐！”须知那萧三资格很老，参加过五四运动，曾留法勤工俭学，1922 年就入党，后转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翻译。更厉害的是萧三与毛主席是湖南老乡、小学、中学同学、还一起创建过新民学会——而李锐年轻气盛，居然敢挖苦萧三。

由于说真话得罪人，后遭到诬告，1943 年李锐被当作特务抓了起来。工农干部认为：你大官僚家庭不缺吃，不缺穿，来延安这苦地方干什么？肯定别有用心，肯定有问题。他们不理解知识分子为了信仰，能抛弃个人享受，自觉自愿来苦地方受罪。

不知不觉聊了近 2 个小时，临分别时，李锐老向我感慨：共产党改造了多年，把范元甄改造好了，我却一直没有改造好。

我说：不，不是你没改造好。是因为你本质超优秀，有正义感，人性未灭，所以再改造也没扭曲了你。正如耀邦一样，人本来就好，富有良知，所以同样经过了那么多的运动，还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没改造好是好事，说明你不是驯服工具，不是伪君子。

李锐的父亲去世时，他才 5 岁。从此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参加革命后与母亲失去联系。1949 年长沙解放，李锐回到家中看望了母亲。分离了 12 年，这个母亲没像一般母亲那样与儿子抱头痛哭，而是狠狠抽了他一耳光，痛斥他这些年总不理睬老妈。挨打之后，李锐不怒不恼，竟然跪下来向老母谢罪。

对成份不好的老妈，很多干部别说跪下，连理都不敢理呀！仅仅由此件小事，就可窥见这位老共产党人良心未泯。确实没“改造”好，没跟地主老妈划清界限。

结果后来挨批挨斗的日子里，给地主老妈下跪磕头成了李锐的一条大罪状。

李锐还有许多出格的言论。比如 50 年代，李锐当水电总局局长时就在大会上公开说：老干部要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否则就不要老狗挡道，老老实实让人家知识分子来干——他李锐胆敢把老干部比喻成“老狗”！

平反复出后，他去云南视察。云南省水电局领导向他汇报时说：“我们云南省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他当即打断：“不要说这些套话，讲实质问题。”那局领导愣了一阵又重复道：“我们云南省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李锐老火了，挥挥手说：“停！停！我是副部长，党组成员，你归谁领导我还不知道？还用你告诉我？你要除了这些话不会说别的，就别讲了！”

自己多年挨整受辱之后，李锐依旧个性锐利，反感官场上那些奉迎阿谀上级的客套话，哪怕会让下属很尴尬。他从不溜须别人，也厌恶别人溜须他。

耀邦在台上时，他与耀邦并没有多深交往。可是耀邦下台后，他却赶着去亲近。又是探望，又是切磋修改诗，又是倾心谈话，耀邦去世前 10 天曾与耀邦长谈了 8 个小时之久……

管宣传的胡乔木很左，口碑不好。临终前李锐却到医院看望了他，还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当人们骂这个“左王”的时候，李锐却总说《庐山会议实录》是乔木支持写的，不能对他全盘否定。当然，对胡乔木那套左的言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污，反自由化，李锐是很气愤的。但他重情重义，一直忘不了这位左王的点滴之恩。

我常常暗忖：如果我们党的高级干部里多几个耀邦，多几个李锐，那我们国家就大有希望了。

李锐参加共产党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不是为了找口饭吃，混个好出路，谋个官儿当。因此，当他发现共产党有问题时，敢于正视，敢于批评，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升降。

比如，他受到毛泽东青睐，当上了他的兼职秘书后，红得发紫。可在庐山会议上，他竟一点不珍惜自己得宠的境遇，毅然支持彭德怀

的意见，对大跃进提出批评，触犯了龙颜，失宠又丢官，还被开除党籍，从天上一下摔到地沟里。

比如蒙冤多年平反后，他依旧不随波逐流，敢于提出异议，敢于抗上，不信奉见好就收的实用哲学，不安享彭德怀平反后，自己所获得的巨大荣誉和地位，变老实一点，明哲保身。仍旧继续不断地说真话，发表异端的逆鳞见解，不怵再次失宠。

结果他的书不再给出，哪怕过去出版过的书都不给出。电视里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报纸上也绝不再提他的名字，网上只有攻击他的文章，没有替他说话的文章。

但在老百姓中，在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心目中，李锐的形象不可磨灭。他年龄越老越有斗志。不疲倦地反左，不疲倦地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不疲倦地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是共产党人中最敢说真话的，最不拍马屁的，有知识文化的，勤于思考，富有真知灼见的老干部。

他才是中共的良心，民族的脊梁。

晚年的李锐一点不暗淡寂寞，他越发光辉活跃。98岁时还写诗，抒发志向：

米龄早过寿而康，有幸迎来改革忙。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居然活到望期颐，好举自由民主旗。

不断笔耕千万字，揭开阶级斗争迷。

难免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

何时宪法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一位98岁的耄耋老翁，思想还那么清晰深刻，追求还那么炽热坚定。李锐非普通人，不愧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士。

2019年2月21日

百年风雨天地人 ——送别李锐先生

何清涟



左起：李慎之、李锐、何清涟、朱厚泽（1999年5月）

中共党内老人李锐先生辞世，人来自于大地，归于大地，高寿 101 岁，也算喜丧。但李老辞世之时，正逢墙内专制强化，向极权回归，政治反对者对中共政权的怨恨极为强烈，一场丧仪如何举办成了政治站队：国内宣布由中组部在八宝山主持丧仪，以部级待遇祭奠；而李锐女公子李南央接连发表声明，为保持父亲的人格尊严，拒不参加中组部安排的李锐追悼仪式，并向世人宣示父亲的真实意愿：“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文推特一些极端“革命者”对这位备受尊敬、享有清誉的老人施以各种恶评。这位三次呼吁中共实行宪政的“两头真”老人，身后遭遇如此际遇，也算独一无二。

中国近百年历史棋枰翻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个政治人物的身后评价，基本系于他所服务的政权的命运。但是，我更清楚一点：当人们与政权兴衰的利益淡化之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有一个更永恒的尺度，那就是良知与人性。

投奔延安，是不是李锐那代中国青年人的错？

李锐先生的同时代人，只要有点家国情怀，大都左倾进步。20世纪30年代，左倾在全世界蔚为风潮，不要说民智未开的东方专制国家，就连美国人，也被埃德加·斯诺那部《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深深迷住，对僻处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无穷向往，挥洒了大把同情。

李锐出生于1917年，其父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还在少年时期，李锐就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后受左翼书刊影响，逐渐向共产党靠近。进入武汉大学后，频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并在1937年正式入党，1939年与革命资历比他老的范元甄结婚，之后两人一起前往延安。中共1942年2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大批党内人士被整肃，李锐也未能幸免。

李老年青时的“革命道路”，几乎是当时中国世家、士绅子弟们的典型道路。这话，我曾经问过一些“两头真”的党内人士，例如李普先生，他们都很真诚地回答：当时的情势，几乎所有青年都认为国民党腐败、堕落，只有中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对中共的本质，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

20世纪初从欧洲发散至世界再以苏联为“社会主义堡垒”的时代潮流，就是1910-1930几代中国青年遭逢的“天时”，西方青年更左、更“进步”，我们现在常讲的那句名言就来自西方：如果一个人30岁之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如果30岁之后还是左派，那就是没有头脑。

1949年之后，谁能脱离中共生存于中国？

对李老的苛评有两类：一是李锐为什么不退党？二是李锐出于贪恋党内的医保待遇。这两点都是要求别人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天。

1998年—2001年这段时期，李老每来深圳、广东，必相约见面，因此那段时期与李老至少有过五、六次长谈。据他本人亲口说，对中共的怀疑与认识，其实始于延安时期。在那种政治暗黑时期，这种不能说出口的怀疑，就只能表现为对常识的坚持。我认为这是李老终生坚守良知与人性的根抵。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所谓前三十年，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是各种运动中规模最大者，中国人无不历其劫。李老八十岁时，他的老友、乡贤朱正先生送他一幅寿联：**庐山雾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诗**。观者无不称绝，十四个字写了他一生三件大事：

“水部诗”之谓，指李锐在水电部反对建三峡工程及其终生对此的坚持。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李锐与三峡赞成派水利学者林一山在毛泽东面前进行了一场“御前辩论”，陈述三峡工程利弊，还各写了一篇文章呈交。出乎李锐意料之外的是，毛泽东不但采纳了他的意见搁置了三峡工程，还让他获得了毛的赏识和重用。散会之前，毛对李锐说：“你文章写得好，你当我的秘书。”这就是李锐担任毛泽东兼职工业秘书的由来。其时，毛正主张大修水利，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李锐在此时上书陈说三峡工程之害，是需要冒政治风险的。论及此事时，李老认为毛当时还能听进一点不同意见。1980年代之后，李老一直力反修建三峡工程，这就是“巫山雨”三字所指。

“庐山雾瘴”，是指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李锐此后的遭遇。会议召开之时，毛发动的“大跃进”陷入失败，全国各地发生饥荒，饿死了不少人。毛召开此会，李锐以毛秘书身份随行，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一手遮天、翻云覆雨，将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这一过程。会议期间，田家英、李锐，周小舟这三位毛的秘书在某天傍晚散步时，对毛颇有微词，结果被检举揭发，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一切职务，1960年3月被开除党籍，5月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下放北大荒劳动。1967年11月11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75年5月30日释放。

这段经历成就了李老的两本书：一本是《庐山会议实录》。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将与会者的言行如实记录。这本笔记本当然会成为抄没之物，文革后李老千方百计找回，他根据此笔记本，再加上与会众人的回忆，写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共中央政要的嘴脸都跃然纸上，此书成为研究中共庐山会议的经典。另一本则是《龙胆紫集》。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没有纸笔，李锐只好用棉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他数年来的“铁窗诗作”，写在两本“马列选集”的空白处。1975年5月李锐出狱时，狱中诗词积有四、五百首，这本用紫药水和木棉签作“奇毫怪墨”写成的诗词集，就名之为《龙胆紫集》。

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李锐当时没有办法改变或者离开这块土地，晚年的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与体制告别。原因何在？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亲耳听过中共党内历史学家李新一番痛彻心肺的讲话：“都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骨气，这没有骨气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就算在生活于国民党统治之下，你对当局不满，可以回家种田养活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人的生存都得依靠这个党，工作得靠党安排，房子得靠党分配，从孩子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哪个环节离开党都不行。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敢批评党，就断了生路。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脊梁可言？”

就算经过改革40年，在政府部门工作，仍然是中国人的首选，因为只有公务员群体才有稳定的收入与福利。

1978年直至逝世：进有所为，退有所守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中共自救下产生的一次意在摆脱危机的改革。由于毛的路线被否定，李锐才算有了一次短暂的机会施展其才，八十年代复出后曾经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任青年干部局局长，在这段时间内，李锐的用人思想，比较完整地体现在他的《起用新一代》这本文集中。当时中国还是老人政治，李锐已经清醒意识到中共干部必须大换血，起用新人。他对经历过文革十年、上山下乡或者在工厂基层打熬过又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深造的这代人深抱期望，认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苦难经历，使这代人既了解底层的苦

难，又有变革之志，必将成为中国改革的栋梁之材。因此，他在中组部青干局局长位置上，坚持“任人唯贤”，曾经破格提拔了不少人才，包括平民子弟，也得罪过“太子党”。中共选拔年青干部的“第三梯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不少人例如陈楚三在《一封信和“两头真”——纪念李锐老》、阎淮在《进出中组部》都记述过这段往事。看似简单的“吏部文章”四字，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里包含老大一篇文章，这就是李老的“进有所为”。

李老退休之后，已无在朝身份，仍然坚持批评时政，讲真话，从批评党大于法，呼唤实行宪政，再到批评当朝领导人小学文化水平治国，网上均可查到。他与几位党内老人一道，为《炎黄春秋》背书，直至当朝对他们的身份再也不买帐关掉这家杂志为止——这叫“退有所守”。关于李老及相同状态的“两头真”老人，在1990至2010年代为何还有点说话机会，与他们接触甚多的吴思写过一篇《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其中原因。

随着当今对言论管制的加剧，这批“两头真”老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说明李老当时的真实处境与为人。2000年时，我在国内处境已经非常艰困，李老从别处知道情况后，曾来电询问情况，听后非常气愤地说：“奈不何我们这些老的，就欺负你们这些小的”，建议我去找曾见过几面的任仲夷先生（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请他过问此事。我对他说，任老退休多年，恐怕管不了这事。李老坚持让我去，说“这是他所在的地方，至少应该让他知道这事”。几天之后，我接到广东省政协主席（或副主席，记不大清了）林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受李老托付，他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整我不是广东省的意思，是上面的指令，就算去找任书记，也没有用——其实，李锐这些党内老人，自身也受到国安（当时还没国保）的“关照”，但他们总还是尽量想利用自己那点党内资格，做点事情，希望帮助受政治迫害的后辈学人减轻点压力。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不久后就收到李老寄来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我将其略作编辑，送给《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发表在当年的第四期。那时我已知道，李锐与李慎之两位先生在国内已无发表文

章的空间。其后，收入这篇谈话的《李锐近作》只能由香港出版了。2013年10月，李南央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她帮助其父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更被海关当作禁书扣押。

在李老生前身后，确实有人认为他们对党的批评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招，如党大于法、实行人治，空喊宪政。我觉得这事情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人都有局限，尤其是时代局限，知识局限。二是这些老人面临严苛的政治限制，不可能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公开说出来。在此只谈一件事情：2000年他在广州时约我见面，那次还有王若水先生在场。李老那次特别谈到中国政治有可能会有左的回潮。当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正被大肆宣传，我问他：“有什么动向让您作如此之想？”他告诉我，他不是根据动向，而是根据中共政治的特点，人亡政息，胡锦涛是他当年在青干局考察提拔的干部，思维模式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不比江还受过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这个党啊，我从不担心它会向右，因为根子左，意识形态的根基没动，要它向右很难，但要向左，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后来从胡锦涛时代再到习近平时代的急剧向左，我每每想起李老这番说话，不得不佩服他对中共政治的深切了解及这方面的预见性。

正气长存天地间

李老去世后的这几天，对他的评价五彩纷呈，其中有个定位是准确的：没能与中共彻底决裂的中共党内批评者。李南央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共组织部将宣称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

李老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从来没将他与这个名号联系起来。在与李老的数次长谈之中，没觉得他喜好马克思主义。前辈学人中，精研马克思主义的苏绍智、于光远等先生，与他们谈话，总会不自觉地将马克思的理论愿景与现实相比较。但李老不会，他批评中共与毛泽东，多使用暴君、暴政、秦始皇这类词汇。从李老著作的行文风格与其思想底蕴，我觉得他更有传统士大夫之风，无论在朝还是退休在野，一生秉持良知与人性。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开首句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其中列举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

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这种正气之人，中国从古到今一直都存在，只是越到晚近，越成为“珍稀物种”。这样正气之人，生前际遇与体现人间正气的方式可能不同，但身后都会被国人追忆。因此，我认为，不管李老的追悼会由谁开，他是否被授予“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在天地翻覆之后，历史记住他，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类名号与是否葬于八宝山之类，而是会将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朱厚泽、杜润生等走在前面的人当作中共党内有良知、有人性之人，因为在中共的暗黑统治中，他们都曾用自己的人格，给社会带来一缕阳光。

2019年2月18日

附：李锐日记摘录

1998年5月10日（星期日）晴

……晚上吃自助餐，出来第一次随便用餐也。八点何清涟来漫谈，随后两个湖南人文炼忠（市委宣传部讲师团）、钟铁夫（《女报》杂志）随来，谈到十一点。慎之、厚泽亦先后来。何清涟谈她纪念戊戌文章，人口问题由来已久。她是彻底悲观。共产党的农民战争也是自古“隐形”（陈胜吴广），社会变革造反的延续而已，同科学民主启蒙运动脱节。

2001年7月3日（星期二）多云转晴

……午餐后略休息。两点后，同小妹到协和看望王若水，精神甚好。右腿肿，大概扩散所致。知道《书屋》事与何清涟出走，浩叹形势，扼杀一切。准备写有关党史文，问及《资料》出版，工人党员历届统计。到办公室，给黄孝宗信交小妹带去。《做人》文复印，《耀邦谈话》复印带去。

骨头如故作铜声

薛原

至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李锐的印象——那时，我不知道李锐是谁。记忆中是在 1980 年代初，从《人民日报》的副刊上读到一篇署名李锐的《龙胆紫集序》之类的文章，文中说他的这些诗是他在秦城监狱里用药棉签蘸着紫药水写在《列宁文选》的正文边上……懵懂中记住了李锐这个名字。再后来，就读到了他写的《怀念甘篇》，尤其印象深的就是他写的怀念田家英的文字。对李锐也就有了更多一点的认识。当在书店里遇到他的《庐山会议实录》时，自然就买了一本，回来细细地阅读。

之所以说阅读《庐山会议实录》是细细地阅读，在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锐在写这部《庐山会议实录》时是在青岛海边写的，而我的一个发小同学当时恰巧由所工作的机关指派承担了给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书稿打字——当时机关里还是由打字员在传统打字机上打字。李锐写完一章，就由我的那个发小打字一章。同学后来告诉我，李老的这部书稿，当时他打字后一共印制了十多部，按照李老的要求交给李老带回北京交上去送审……同学因为是依照李锐的手稿打字，所以留下的印象深刻。当此书公开出版后，我在细细地阅读，我的这位同学也在细细地阅读，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出版的书稿和当时他打字的初稿有许多删节，删节最多的就是李锐记录的当时在庐山上的毛说的话，譬如许多毛当时骂的脏话在正式的书稿里已经不见了，这让这位打字员印象深刻，说起来了还是感慨不已：李锐记得太详细了，毛如何骂彭德怀，彭如何回应，李锐都一句一句记录下来……也正是从这部书，我才真正对李锐有了认识。

确切说，阅读李锐，走入他的人生，还是读了他的日记之后。距今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在 2008 年 11 月，我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几乎是连续夜读，读完了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李锐日记》。在当时的日记里，我记录到：

今天终于读完了三卷本的《李锐日记》，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的，

尤其是几个周末的夜晚，都是读到凌晨，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三卷李锐日记，由李老的女儿李南央整理编辑，并在美国的溪流出版社今年出版。用李南央在书前“编者的几句话”中说，李锐的日记文笔简洁生动，常常是寥寥数笔就将她带入了他所记述的年代和环境，如身临其境。此话不虚，这也是我翻读日记时的感受，这些日记除史料价值外，也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日记第一卷是1946—1955年的，第二卷是1960—1965，第三卷是1966—1979。完整呈现了李锐从30岁到60多岁的人生记录，中间所缺的是庐山会议前后的一段和后来文革时在秦城监狱的一段。但若参照《庐山会议实录》等李锐的著作，当不难想象李锐这些日记空白的生活。

这三卷日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保留了日记的真实，李南央在编者话中也说明了她的整理原则，就是完整的保留日记的真实性，她所加的就是必要的注释，因为涉及的人物太多，而李锐的日记中许多涉及的人物往往是代称或拼音，譬如“公”指毛泽东、“老板”指陈云、“黄”指黄克诚、“田儿”指田家英，等等。李锐年青时在东北曾做过高岗、陈云的秘书，在湖南又做过黄克诚得力的部下，后来又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而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又让他有了另一种人生，这些在他的日记中都有真实的记录，他晚年的反省和回忆，在他的日记中都能看到其来有自，尤其他对三峡建设的反对，更是他性格的坚持，性格即命运，在他的日记中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作为日记，这三卷日记最有价值的特点就在于真实，而编者也没有为亲人讳而动手“清理”。譬如李锐在与夫人异地相处、从北大荒回京离婚单身，还有后来在流放地独身生活时的“自慰”行为的记载，在日记中都完整地保留着（用“隐语”或英文）。这也体现了编者的史家态度。

在日记的前边，有一段李锐的话：有了丰富、可信的史料，才有科学的历史研究，才能如实地揭示前人为什么遭受挫折，为什么能够前进，从而使今人和后人有所借鉴、有所趋避。

读他的日记，当能走进李锐何以成为李锐的世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对李锐日记还有许多的深刻印象，例如，在李

锐日记里有一个细节：1950年代李锐做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时，有一次晚上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去中南海毛要召见他。李锐到了中南海进入毛的房间，正巧工作人员端上给毛的夜宵，毛示意李锐坐下一起吃，李锐一看端上来的是自己没吃过的红烧熊掌，便跟着一起吃了。回去后便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这一则记录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李锐的日记所缺失的秦城监狱的那些岁月，其实也可以从他的《龙胆紫集》里得到文字上的记录补充。

从1967年11月到1975年5月，李锐被关在京郊的秦城监狱，为使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正常，脑力不衰，李锐除了每天坚持在斗室中慢跑外，开始学做旧体诗，并逐渐养成了兴趣。最初几年，他从报纸上刊载的一些新闻或人物（新人新事）为题，即兴口占，随作随忘，只有极少数能记下来。

1972年底，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后，提审李锐的人为他从北京的旧寓存书处找来二十几本书，“鲋鱼涸辙忽天雨”，用李锐的话说，有了书，在监狱里的日子就好过了，他吟咏的范围亦随之扩大。

1973年底，有一天放风时，李锐跑步跌倒，手碰破了，护士给了他一小瓶龙胆紫（也就是紫药水）和几根药棉签。李锐灵机一动，发觉可作，这成了他的“奇墨怪笔”。于是，他靠墙坐在矮床上，面对哨兵的监视孔，越发规矩地捧着书本读书，偷偷地将这“一箩筐酸果子”——几百首他自己写的旧体诗录在两卷集的《列宁文选》上的空白处……

李锐的这种行为无疑冒犯了监狱的规定，1974年底和1975年初两次被哨兵发现，《列宁文选》和另一本《剩余价值学说史》先后被没收去了，但李锐对此很泰然：再重的处罚不过是继续关下去吧。

将近八年的单监生活，李锐熬了过来，正是这些旧体诗让他保持了精神正常和脑力不衰。其实这些诗词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是讴歌革命；二是回忆平生。身陷囹圄的李锐在监狱里偷偷地写诗词讴歌革命，这在今天看来，颇有荒诞的意味，但在李锐，却是一种真诚的表白。至于他在诗词里回顾平生，在他自己是想到了他的儿女，希望将来他们有缘见到他的这些诗词，从而知道他们的父亲并非“牛鬼蛇

神”。

这本《龙胆紫集》于198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诗集的初版后记里，李锐说，由于工作关系，今后他很难再冒充风雅，“余生可望不吟闲”。在这里，李锐显然乐观了，没过几年，他就又有了大把时间可以“吟闲”了。1994年9月李锐在《龙胆紫集》新版序言里，对此回顾说：这个集子完全是特殊时、地的产物……尽以为将“无闲以吟”，可是，十余年来，这种狱中积习，已难除却，不论忙闲，吟哦未废，又得近二百首，内容多怀旧、悼念、记游、随感。这些即兴之作，记录了他的真实的心声。

2004年4月，李锐又写了这本诗集的“三版序言”。此版本来列入“当代诗词八大家”专辑，按年龄李锐的这本列在钱仲联、启功之后，但另外七位的诗集都出版了，唯余下李锐的这一本未能面世，此时，李锐已经成了“敏感作家”。

晚年的李锐仍始终如一地反对建三峡大坝。1950年代他因反对上马建设三峡大坝而成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也才有了之后的一系列的人生遭遇，但到晚年对“高峡出平湖”的质疑反对态度仍始终不易。在当年蒙“上召”，李锐自然也是意气风发，这在他写于1950年代末的旧体诗里可证，譬如：“生涯岂可料，一召上青云。南海榻边问，东湖夜话亲。山风来雨聚，飞瀑忽雷奔。每念交心语，冥顽似负恩。”再如：“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欲问关心何等事，九州万物概无余。”也正是从当年的“一召上青天”，再到庐山之劫，再到秦城之难，再到重新出山……从盛年到晚年的李锐才有了自己独特的“吟诗”历程。

其实，李锐的诗也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记录了历史的风云，譬如：他1959年夏在庐山上写的诗。庐山会议对李锐来说，是他的人生命运转折点，他上山时，显然想不到下山时会风云突变被打入另册，在庐山上他一共写了九首诗，恰好记录了他在山上经历和见证的全过程。在第一首里，他记录了上山之初开“神仙会”的情景：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涉世随吟古今句，高谈且饮云雾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写第四首诗时还是兴致勃勃：“登楼再度群言堂，尚在闲谈新乐章；都觉畅怀言已尽，茅台赐饮落飙狂。”到了1959年7月23日夜裡写第六首诗时，心境已完全不同：“山中夏夜鬼缠身，号角鸣金再不闻。心事满腔何处诉，已无缘再让交心。”又过去一周到了本月底和下月初，李锐写了在庐山上的第八首诗，所记录的就是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两次批彭德怀的斗争会：

山雨已来风撼楼，重温旧事溯源流：
轻看游击藐边界，急欲兴师下省州。
延水岸边无舸槽，太行脊上有山头。
春秋三十匆匆过，风雨来时不一舟。

最后一首也就是第九首则是事后的总结：

山居却不识山容，好句禅机事后通。
两眼限于崖障内，一身常在云雾中。
晚霞正爱仙人洞，聚雨旋迷无老峰。
岭上风云常易变，岂能不测怨天公。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就是为他在庐山上写的这一组旧体诗做的解读和注释。

若把李锐的诗和日记做一个对比，也更能理解李锐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心路历程和屈辱人生。例如有一首写于1961年11月30日的《法院归来》：“无期自况几时休？二十三年今到头；合则两伤分则美，平安难共岂烦忧？”而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则如此写道：“法院来人，分开谈了一上午，我只说明决绝情况无可挽回……”还有打油诗二首，其第二首是：“世事当今正反闻，亲人最后变仇人。为避边寒返都日，一台压轴办离婚。”

翻看那一时期李锐的日记，正是李锐刚从北大荒流放归来，却遭遇妻子提出离婚，在1961年11月20日日记里，李锐写到他回来后，妻子只是冷冷一句回来了，李锐也是一句回来了，再无多说一句话。

“用冷水擦了身，吃了安眠药，久久不能入睡。大概是54还是55年搬到这栋楼来的。纯粹的生活情景最易在这样的时候袭入，感情很复杂，不愿控制，轻轻哭了一顿。多久以来未有之事。已经非常习惯控制这种冲动了。”再看李锐1961年11月22日的日记，李锐记录早饭后妻子到他房间催办手续，两人同乘公共汽车至中级法院。“从1939年12月13日正式同居至今，二十二年走向法院！”从法院出来，李锐自己一人往王府井买书……

从离婚那天一直到1961年12月23日的日记，李锐的情绪才从阅读中渐渐解脱出来：在日记里他记录说他读完了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评价其“真如矿石中炼出的纯金”，感叹“贝多芬私生活极端不幸，几次失恋，终身不娶，常常一文不名”，并总结自己“这一个月闲居，读书，可能使自己今后去向渐明：养养笔墨，做出有益的小事。要学会真正的观察，深思和绝对的控制，但还要保留独见……”

李锐在秦城监狱里曾作过一首五十自寿诗：

依然一个旧魂灵，风雨虽曾几度经。
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
偏怜白面书生气，也觉朱门烙印黥。
五十知非犹未晚，骨头如故作铜声。

最后一句“骨头如故作铜声”可以看做李锐的夫子自道和文人底气，也写出了他漫长一生始终如一的个性风骨。

2019年4月16日

锐老的光辉

碧琼子

我的中学生活，是在南方那个堪称文革重灾区的省份度过的。文革的魔掌，彻底粉碎了一个重点中学的优等生关于理想和人生的玫瑰色梦幻，一脚把我踹进了准贱民的的泥泞。更可怕的是，对思想罪深入骨髓的恐惧，戕害了我的心智。我错误而坚决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彻底避开那个叫做“政治”的东西，甚至极力扼杀自己的思考，害怕因思考“越轨”沾祸。

但是，人终归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渴望思考是人的本能。当年那些满怀热情和理想的如花的年轻生命，他们的鲜血始终无法在我的心头冷却，日日夜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的被自我扼杀的思考顽强地试图突围。为什么？那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1999年的春节，我在三亚。那里的红花，椰风，海浪，也无法使我变得愉悦和轻松。那天，当我又是满脑子“为什么”地闲逛着的时候，踱进了路边一间小小的书店。我的目光在书架上扫动，一本《李锐反“左”文选》赫然映入眼帘。封面上，精神矍铄的李锐先生，嘴角含笑，睿智的目光注视着远方……啊，李锐先生的著作！此前，我零零星星地听说过李锐先生，但没有完整地读过他的著作，如今幸获至宝。

在这本著作中，锐老以自己独特的角度和深度，对共产党的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大跃进，庐山会议，特别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其事实进行了实事求是的陈述，其从理论根源上溯本求源，进行了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尤其，锐老在其中展示出的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学贯通中西的宏阔视野，秉笔直书的浩然正气，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使人深深地感动，给人深刻的启发、巨大的力量和鼓舞。

读罢，我感到自己沐浴在一片明丽的阳光中。

那是锐老的阳光。

我开始从无比沉重的压抑和苦闷中走出，开始找到认识问题，探

索真理的方向，开始寻找自己新的人生方向和人生价值。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锐老思想光辉的照耀下，锐老人格光辉的感召下，我开始了对文革真相的追寻，对文革、也对自我文革经历的反思。

锐老不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党史学家，也是伟大的革命实践家。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他大无畏地选择站在推动历史前进方向的一边，站在人民一边。前面说过，南方那个省的文革，经历时间长，带来的灾难骇人听闻。在了解情况后，1981年至198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宋任穷同志的直接领导和过问下，中央派出工作组，处理那里的文革遗留问题（史称“处遗”）。除处遗，对遭受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该省人民，是一次意义堪舆解放黑奴相比肩的伟大举措。李锐先生即为处遗小组的领导和参与者之一。

为此，锐老受到那里的文革既得利益获得者，顽固坚持文革路线、反对改革开放的那股最黑暗的势力的恶毒攻击以致诬陷。

他岿然不为所动。

出于对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了解，锐老对历史前进的曲折艰巨，人民与顽固坚持文革路线、开历史倒车的黑暗势力的斗争的艰苦复杂，其长期性，艰巨性，洞若观火。在处遗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二十年后的2015年6月30日，九十九岁高龄的锐老，目光如炬，高瞻远瞩地指出：“广西的文革延续十多年，造反派、三种人以及杀人凶手，长期把持、控制广西的局势……他们已形成体系，形成气候，不是经过一年、二年的整顿，或三年、四年的治理，这些人就洗手不干的……比如，纠正、平反冤假错案，为被杀害的人昭雪与善后工作，清理、惩治三种人、杀人凶手等等事项与问题就极不彻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等等在广西受到抵制……有人对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进行反扑、清算……联名向中央和有关部门诬告工作组负责人及其工作组成员。1983、84年全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期间，一些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和被凶手杀害的人的家属子女，曾检举、揭发一些人的问题与罪行，一些被检举、揭发的人30年来对检举、揭发者进行打击报复，寻衅滋事，时有发生，

气焰嚣张。当前广西这种形式势不可低估。”

这既是先知者的无比睿智的警觉，又是对后来者洪钟大吕的警示，是所有文革反思者，研究者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筚路蓝缕中不断汲取的思想力量的泉源。

锐老是我们苦难民族的瑰宝。他的存在，是民族的大幸，国家的大幸，人民的大幸，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

仁者多寿。我们欣喜地看到，锐老已幸福地度过101岁大寿。百年人瑞的老人，尚精神矍铄，思路敏捷，病房之中，犹作烈士暮年之鸣。

云南的民间文革著名研究者周孜仁先生说的好：未来不管发生什么，只要他们的书还在，光辉的思想还在，坚定的信念还在，伟大的人格还在，我们的国家总是有希望的。

2018年7月26日

李锐老先生去世了

李工真

今天，李锐老先生去世了，享年 102 岁。

李锐老先生是武汉大学的杰出校友，我曾在 1983 年武大校庆七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中见过他老人家。李老曾于 1934 年秋至 1937 年春在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读书，但未毕业便投身革命到延安去了。

他先后作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 20 多年里一直挨整。文革中甚至还坐过八年秦城监狱，1979 年才平反回到北京。在胡耀邦任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

李老是湖南人，他的父亲便是孙中山当年组织的老同盟会的会员，也曾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议会的议员。李老在改革开放后复出以来，一直在党内以胸怀坦荡、敢于直言而著称，是党内著名的改革派人物，深受知识界敬重。他的去世标志着中国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并不认识李锐老先生的女儿李南央，想必是一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同辈人。但李南央却在她 2010 年 3 月 4 日写的一篇关于他父亲的老司机《难忘乐伯伯》的文中提到了我……

2019 年 2 月 16 日

附录：《难忘乐伯伯》最后一节

有一年，《今日名流》上登过一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一位李工真先生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只有在传统道德完全死光的时候才能发生。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代新人’干出来的。”想想乐伯伯，这话说得是太对了，要是那时的人都如乐伯伯一样，是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

李锐病逝，频揩老眼不分明

祝新华

2月16日上午8点32分，原中顾委委员李锐在北京病逝，终年102岁。

刘少奇1945年说过一句沉痛的话：“死去的同志中，很多经过党内斗争的考验。”过来人听得出这句话的分量。在解放前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解放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磨难中，以破坏性实验的方式，频频考验共产党人的良知和坚韧。

李锐的一生，大起大伏，1937年入党，从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的秘书，到“文革”中秦城监狱的八年囚徒，再到改革开放年代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亲历了党内的坎坷和奋起。

李锐与党的新闻宣传事业有诸多交集。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解放初，一度做过新湖南日报社社长；最关键的是1982—1984年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期间，给处在思想解放第一线的《人民日报》诸多支持。“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旗帜鲜明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全党全国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鼓吹包产到户和城市改革，得到党内外的热烈认同，也遭遇了巨大的体制内压力。例如，有老同志警告社领导“不要东倒西歪”；还有老同志干脆在电话中呵斥“到底有几个脑袋？”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胡绩伟、秦川、李庄、王若水、何匡等编辑部团队，忠诚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为拨乱反正冲锋陷阵。《人民日报》成为继中央党校之外坚持最久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得益于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层的关怀鼓励，也离不开耿飏、迟浩田、李锐等中央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的支持体谅。

特别是本报记者孟晓云1984年在《文汇月刊》发表调查报告《胡杨泪》，反映一位知识分子钱宗仁几十年的悲惨遭遇，得到李锐的郑重推荐，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李锐的文章《请读〈胡杨泪〉》，向全党组织系统郑重呼吁尊重知识，爱护知识分子。

在钱宗仁遗体告别仪式上，李锐与朋友们商量，把钱宗仁生前写

的文章、诗词、书信整理成册，编成《胡杨泪尽》一书。李锐亲自作序：“我们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年代，人们经受的创伤够多了，不知浪费、埋没和摧残了多少人才，今后再也不能做扼杀人才的蠢事了！爱贤惜才，求才若渴，选贤任能，唯才是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好传统；当今之世，更应该大大发扬这种传统，使之成为全社会的风气。人才与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才源源涌现，如活水长流，各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城市经济改革才有保证。我们要抓紧发掘人才，培养人才，爱惜并保护人才，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我们民族才能腾飞。”

这是老共产党人对历史苦难的大彻大悟，对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片的赤子之心。

刘少奇平反后，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从秦川到李锐，一大批经过党内斗争考验的老同志不惜以个人的仕途荣辱为代价，不依不饶地揭露和纠正极左路线的错误。他们的真诚和努力，像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顶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仁者寿。己亥年新春，又一个孤寂的灵魂离我们而去了。1984年《人民日报》发表过聂绀弩题李锐《怀念十篇》卷首诗：

多文为富更多情，
心上英雄纸上兵。
是泪是花还是血？
频揩老眼不分明。

2019年2月16日

领悟前辈的结论

李欲晓

南央：你好！

我是李欲晓。好多年没见了。

李锐伯伯终于走完了他艰难而辉煌的一生。尽管一年来不断传出他病危的消息，且他已年逾百岁，听到这个噩耗，我依然泪流满面。李锐伯伯是爸爸最好的朋友，那些年，无论私事国事，我父亲第一个求助求教的就是李锐伯伯。如今，他走了，那一代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些年我很少去看望李锐伯伯，因为路远，而且觉得总有很多相干不相干的人去采访探望他，我就别添乱了。后来他病重住院，我更觉得前去探望无益于老人家的康复。去年你征集悼念文章，我没写。也许是有点自卑，别人或者和他老人家共过事，在他领导下工作过，或者采访过他，在他指点下成就过大事业，而我和他的接触几乎都是聚会，家长里短，上不了台面。但心里一直很内疚，总觉得该做什么，说点什么。

今天看到了你的声明，你不回来了，你有你的考虑，我尊重并且理解。我会去送别他老人家，以此表达我敬佩他的人格，景仰他的学识，赞同他的理念，期待宪政大开张。我知道这对于他毫无意义，但是对我有意义，对我们有意义。一个人是表达心声，众多的人则是体现民意。

你的文章我都看了，包括写我父亲的。你写得非常好，那些对话的场景，每个人的神态，栩栩如生。坦率地说，我的几个亲人看了文章不大高兴，有的甚至很生气。这是由于最后一句话。我问他们：这话像我父亲说的吗？他们都回答像，说父亲肯定说过，他们也听到过。我说，南央的文章没有造谣，没有诬蔑，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你们害怕，因为恐惧，因为深深的恐惧。说话的人已经不在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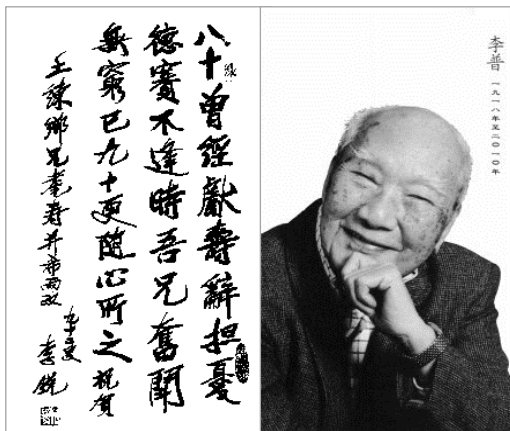
左起：黎一青、李欲晓、黎安泰、李尔柔（李锐生前最好的朋友黎澍、李普和李慎之的女儿们送别李锐当日）

了，这句话也不是我们传出去的，居然还这么恐惧，这个制度不亡，难道不是天理不容！

感谢你替我们说出了父亲的肺腑之言。

在父亲的晚年，特别是母亲去世以后，我陪同父亲参加过许多聚会，听到过老一辈对这个党，这个制度的讨论，遗憾的是我没有记录谈话保留资料的习惯，具体怎么说的现在无法复述。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一个小型聚会，李锐伯伯问朱厚泽：“如果让你当总书记，你怎么办？”朱厚泽用浓重的贵州口音说：“无盖（无解）。”李锐伯伯还是不死心，继续追问：“假如一定要你当呢？”朱厚泽依然回答：“无盖（无解）。”两人相视一笑。

在这次聚会前几年，我拜访前总书记，谈到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我问：“那以后怎么办呢？”前总书记回答：“没治了。”



大概是看出我没想到他竟用河南口音说出这句北京话，他用手指在空中写着“治”字：“就是北京人说的‘没治了’，没有办法了。”他们都看透了，这个党错过了改革时机，再也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和机制。我想，领悟前辈奋斗一生得出的结论，也许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这两天网上重新传播你写你父母的文章，我也再次读了，非常佩服。对人对己，你都尽量客观真实，文字表达准确，记录了那些年代那些故事，真心赞赏你。你们夫妇抢救出并整理了你父亲的日记文稿，功德无量。

望你保重身体。

祝好！

欲晓

2019年2月16日

名字写于流水，事业化为心碑

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已退休）



左起：陈琼之、王东成、窦英才、陈生洛、李锐、姬金铎、雷永生、陆玉林、邹纪孟、展江

昨天，有朋友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看着这张照片，我眼睛潮湿了，心里想了很多，很多……

这是 2002 年 10 月 17 日李锐先生来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访问交流之后，与全体老师的合影。

东方文化研究所是我们学院里一个微不足道的教师社团。但是，它竟然受到“有关方面”的特别“器重”，被“加封”为“裴多菲俱乐部”。

我们早就想邀请李锐先生来学校给师生开一次讲座。但是，一方面考虑到先生已经 85 岁高龄，恐怕身体吃不消；更重要的是，根本不可能获得有“关方面”的“恩准”。于是，只好诚邀先生来东方文化研究所与我们几个教师座谈。陈琼芝、窦英才夫妇与李锐先生是老朋友，由他们夫妇与先生联系，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因此，就有了李锐先生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之行，就有了这张拍摄于当年学院图书馆门前

的合影。

如今，照片上的人，都已退休了。我已年届 70；展江老师、陈生洛老师也已 60 多岁；姬金铎老师 77 岁；邹纪孟老师 82 岁；雷永生老师、窦英才老师都已 83 岁了。

照片上的两个人走了：李锐先生前几天（2019 年 2 月 16 日）走了，享年 102 岁；陈琼芝老师早在 2005 年 6 月 26 日就走了，享年 66 岁，还不足 70 岁！

昨天，我没有参加李锐先生的告别仪式。这些天，为了活下去，我和妻子正跑医院，“披星戴月”地乘公交车和地铁奔波于城乡之间（我已租住乡间）。另外，我早已有了“前车之鉴”，别说我不去，就是我去，也未必能进得了“八宝山”：那年，为参加一位“总书记”的告别仪式，我被“有关方面”在学院门口劫持，押送到至今也不知道的地方“暂拘”一整天，家里的房门钥匙孔竟然被注满了速干胶；那年，为参加朋友陈子明的告别仪式，也被“有关方面”拦截在学院门口，不准走出学校。“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至今也百思不得其解：“有关方面”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样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合法公民”？我“受宠若惊”得都快“神经”了！

我不是研究李锐先生的专家（李锐先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个案），也不是中共党史专家；因此，对李锐先生的“是耶非耶，功耶过耶”，不敢多言多语。但是，有两点我敢坚定而明确地说：第一，李锐先生对中国人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于某些历史真相的揭示和对于某些专制罪恶的揭露！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能做到这一点，就难能可贵了，他的人生就有了光彩和馨香！第二，研究和评价李锐先生，必须考虑到十八、十九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与大叙事：从法国塞纳河、俄国涅瓦河流出来的、与英美保守主义大异其趣的、盛行于全世界的法国（欧陆）激进主义（所谓法国大革命以及连绵不断的革命）和俄国现代专制主义（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疏远英美保守主义，亲近法俄激进主义、现代专制主义，连鲁迅先生等等一大批精英都“概莫能外”。近代

中国的所有苦难、罪恶、悲剧，都与此有很大的关连。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所谓“两头真”们的悲剧和意义，也才能深刻理解“胡适”们的价值及其局限。

看着这张照片，我心里想得最多、也最想与朋友交流的是陈琼芝老师与李锐先生之间发生过的一个警醒而隽永的故事。

陈琼芝老师与李锐先生是湖南老乡，都是九死一生的“苦难学者”朱正先生（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鲁迅全集》的主编）的挚友。因此，陈、李二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陈琼芝老师，1983年就被评为副教授，她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是《鲁迅全集》的编委之一，负责注释了全集中的两卷。她长年躬耕于讲台，有极佳的教声。她长年静守在书斋，撰有很好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她的许多论文在第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她的巴金研究的专著曾两次再版，巴金研究的论文曾在《新华文摘》的要目上全文转载。

李锐先生复出后曾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并兼任青年干部局局长。由于他对陈琼芝老师的德性与才能完全了解，所以，他曾多次诚恳地动员、劝说陈琼芝老师赴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但是，淡薄世俗名利的陈琼芝老师，由于爱恋教书育人的讲台，由于喜欢著书立说的书斋，硬是没有“听命”，硬是坚辞不就。如此，李锐先生也只好连声叹息：“作罢，作罢！”

仅在我知道的中国历史的文人中，我最敬佩的人，是一生不染仕途、一生跋涉于山水之间的徐侠客。“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有几个中国文人不想做官？就连那自命清高的“翩然一只云中鹤”，也还不是“飞来飞去宰相衙”？就连那迫不得已“身在江湖”的“退隐者”，也还不是“心存魏阙”，总想着有朝一日走通“终南捷径”？

多少年来，每每想起陈琼芝老师与李锐先生的这段往事，我就会想起“徐侠客”们，就会感到有缕缕清风在心头吹拂，有浩然之气沛然于胸！仿佛自己的心也干净了许多。他们的这段在许多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故事，永远装在我心里了，在我心中的绵绵青山中耸起了一座永远令我感奋的心碑。对于我，这心碑，是一座长鸣的警钟，那悠

远的钟声在晨晖夕雨中回响，使我在燃烧的荆棘里坚毅地跟随在先驱者的身后，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奔迦南。

要获得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大可不必太在意才华和名利。人生在世，得有信仰做脚前的灯，得有德性做立身之本。诚如斯，那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流水上吧，丢进清风里吧，而自己最“呕心沥血”的“立德、立功、立言”，也必将化为一座永不颓圮的心碑，悄然挺立于巍巍的青山之间和永恒的苍穹之下。

照片上如今仍然健在的师友，身在乡野的我，总在想念你们，祝福你们；已经回归永恒家园的陈琼芝老师和李锐先生，你们活在我心里，让我跟在你们的后面，踏着你们的足迹，在头顶永恒星光的照耀和指引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走过一片片“麦田”，走向天边的黎明……

2019年2月21日

记于京北香堂村荷斋

附：李锐日记摘录

2002年10月17日（星期四）阴、夜雨

四点醒来，五点起床。作上午讲话的准备，看杜光长文的前部分（以前只读了后部分），并找出可能涉及的资料。八点多陈琼芝来，她曾住院一年多，乳腺癌，两次头发脱光，现又长出，已基本控制，在服中药。九点到青年政治学院，应东方研究所之邀，到三十来人。所中只有8人，观点多一致。

我讲了一个半小时多，问题交谈又半多小时。主题是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前者只能产生于西欧，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最终还是以人为本。列宁主义——斯大林走入异途，国家控制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只有生产力、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才能产生社会主义。西方发达国家已有不少社会主义因素。谈东方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毛晚年是极左与专制的结合，阶级斗争（斯大林）加秦始皇也。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要“与时俱进”。谈了许多具体事例，也讲自己经历，对毛的认识过程。毛的发展过程，去世前读三赋，心境悲凉，但怕文革翻案，决不自责。等等。午宴时又交谈甚多。看来听众是满意的。谈了王若水和杜光的理论观点。谈及三峡。还谈

毛、蒋对比，谈改良主义与胡适等。历史要宜粗（全面宏观）又宜细（个案、细节）。谈周恩来，1936年洛川会议尚能同毛拍桌争论。谈罗章龙、项英，还待历史评定。谈陈独秀晚年。自己经历，挨饿是世界最难堪之事。谈赵，“亚洲英雄”。将《耀邦谈话》相赠，“自认写得好”（引起大笑），请广为传播（还自称不会电脑，不够知识分子。）

李锐和中国的希望

王德禄

2019年2月16日早上，李锐先生在北京病逝，我在中午时才知道这个消息。在我结识的众多老前辈中，李锐先生是最支持我事业的一位，几乎不为别人写文章的他，却为我写了一篇。他的离世，让我不由得又一次回忆起与他相交的往事。

一、初识李锐

说起来我与李锐先生挺有缘分。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上马的决定，中国各报刊均不准报道反对三峡的声音。当时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工作，经范岱年老师介绍采访了李锐。这个时候采访他，主要就是想听听当年三峡工程的反对者有什么新的看法。1992年5月，我两次到李锐家拜访。当时李锐思考得较深，对每个问题都滔滔不绝发表看法。1992年第4期《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是《三峡工程定案后答记者问》。后来这篇报道被李锐收在他的文集第6卷本中的“论三峡工程”中。

二、李锐对我的支持

1993年，我下海创办了长城所，为的是以“经济独立”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从属地位。李锐也曾多次在文章中论述过“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缺乏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地位”。也许正是价值观的高度吻合使得他一直很支持我的事业。

2011年5月6日，时隔9年以后，我再次来到李锐家拜访，同行的还有范岱年老师和程宏。当时李锐已经94岁了，除了听力稍有下降外，身体状况很好，双目炯炯有神，思维反应敏捷，谈话滔滔不绝，声音底气十足，完全不像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这次拜访他的时间约1个半小时，整个过程几乎都是他在讲。他总是习惯地用“这件事情我给你讲个故事”这样的语式，讲党史、讲各种风云人物、讲三峡工程，甚至讲最新的奇闻轶事。我也把我2007—2010年的博客集送给李

锐，没想到的是，他后来真的看了我的博客集，并给了我很多鼓励和鞭策，对其中关于科技创新、中关村、硅谷等几个主题表示了很大兴趣。李锐多次托人带话，让我去看他，他要说说对我工作的看法。

2012年元月2日上午，我又和范岱年、武文生，程宏去看望李锐先生。李锐告诉我，他年前到中科院离退休协会，作了一场关于中国未来的报告，他在会上表扬了我，并说“中国的希望在中关村”。他看了我的博客集，对中关村创新创业的新经济模式十分赞赏，更对中关村的全球化、中关村与硅谷建立的人脉链接十分欣赏。他还与我们谈了社会、科技、国家、历史。谈起这些话题来，兴致很高，滔滔不绝，从九点半一直谈到十二点。他的很多观点都十分有意思。李锐看到我们的民间智库发展壮大很高兴，说让我等一下，他回到房间就写下了“民间智库”几个字送给我。

当天李锐还说要为我写一篇介绍文章，我诚惶诚恐，叫他不要写。但是他坚持要给我写，并讨论了文章的主要内容，还让姚监复协助。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发表于2013年8期《炎黄春秋》，题目为《从一家民间智库说开去》。记得我到他家时，他十分生气，说《炎黄春秋》删掉了文中很多内容。后来这篇文章在他100岁时出版的文集《李锐时期集》中全文刊登了。



2013年10月李锐来长城所访问，站立者左起：范岱年、林京耀、郭全胜、王德禄、刘志光、赵慕兰、程宏（于洋摄）

三、李锐与中国的希望

2013年2月12日，阴历正月初三，我与范岱年、刘志光和程宏一起去看李锐。在李锐家整整谈了一上午，谈到科学与民主、辛亥革命、中国近现代历史。在谈话过程中，李锐一再表扬我，说我对中关村的研究、对硅谷的研究、对新经济的研究对中国的未来很有价值。

2013年10月10日上午，李锐亲自来到了长城所，同来的还有范岱年、林京耀、郭全胜。我和刘志光等接待了李锐一行，陈文丰向李锐

介绍了长城所的情况。李锐听了介绍，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说：“中国梦在你们这个地方。”他对一些新概念，比如瞪羚、社交化，都非常有兴趣，尽管已经是 96 岁高龄，思维却依然敏捷，总是能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现在和未来。他认为长城所的研究不仅对中国，对世界也很有价值。李锐也讲了一些他的经历和研究。会谈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中午，大家仍然意犹未尽。

四、送别李锐

2018 年春节期间，我、范岱年老师、刘志光和程宏再次到李锐家拜访，他送了我一本《李锐期颐集》，这本书是李锐 90 岁以后所写文章的合集。这次，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并且不久后就住院了。

2019 年正月初四，我和范老师约定一起去医院看李锐。李锐的夫人张玉珍说，李锐感冒了，过两天能去看望的时候再通知我们。谁知 2 月 16 日早上 8 点半，李锐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时他住院已经快 1 年了，虽然说对这样的结果应该算是早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非常伤心。17 日下午，我来到李锐家的灵堂吊唁，他的老伴张玉珍因身体不适，没有出来接待吊唁者，也没有见到李锐的子女，我心里感觉多少有些凄凉。

2 月 20 日上午，李锐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仪式原定上午 9 点开始，我和范岱年、刘志光、程宏 8 点一刻就到了，却发现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送别李锐先生的人之多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们在寒风中排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去，但能够送这位敬爱的老人最后一程，我觉得很值得。

我为李锐先生写了一篇悼词：

吊唁李锐先生

李锐走了！中国“两头真”反思的时代结束了。改革开放结束了吗？古往今来，时代、知识、思考和道德四大要素对人类的限制是亘古不变的。这是李锐留给我们的珍贵遗言。

2019 年 2 月 20 日

送李锐老人

赵健民

我很少对某一个政治人物持续地关注。但是有一个人是例外，他是李锐，是我五十多年前三线工厂的同事和一直的好朋友李南央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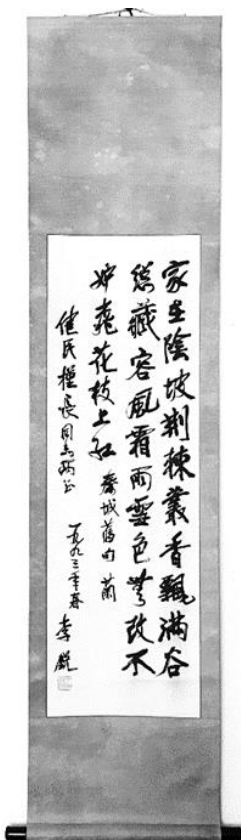
我自己、或者跟丈夫槿长一起回北京探亲，南央有时会托我们去探望她的父亲。同老人不多的几次接触，让我觉得跟这位老人心贴得很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见到李锐，那是一九九三年的春天，我是和一位朋友一起去的。老人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话语中满满的都是对异国他乡女儿的惦念。他跟我们高兴地聊了半天，我觉得他就是我朋友的老爸，而不是那位过去远远敬仰的李锐。末了出乎我的意料，他突然说：“我写一幅字送给你吧。”顿了一下又说：“你不知道去哪里裱，先放在我这儿，我找人裱好，你过几天再来取吧。”老人顽皮一笑：“等我死了，这个字会值钱的呵！”

家在阴坡荆棘丛，香飘满谷总藏容；
风霜雨雪色无改，不妒桃花枝上红。

这是李锐以自己的境界寄语鼓励我们。我非常感动。

后来的几次探望，李锐还送给我和槿长、我父亲几本他的著作。在将书交到我们的手里之前，他总是先认真地问我的名字、槿长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怎么写，然后一笔一划地在书的扉页写上他的题签。

李锐是一位刚直不阿的硬汉，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家、史学家、才子……但是最让我感



动的还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父亲所显现出的儿女情长。他在秦城监狱中用棉签蘸着紫药水在书的边边角角写下的那些后来编成《龙胆紫集》出版的诗词中，下面的这些诗句，让我读时潸然泪下：

一念么娃就动情，几回含泪伴行吟；
明朝娇女十三岁，梦里依然抱着亲。
何为翻出阿女信，最怕伤心骨肉情。
我儿长个甚模样？是读高中或下乡？
女颜多变梦中身，一瞥匆匆又七春。
料是模糊难认父，街头邂逅两行人。

上面最后的两行诗竟成讖语，李锐念之最切的小女么么至今未与父亲谋面。作为外人的我无从知晓个中的原委，但我深深地痛恨造成父女“邂逅两行人”的那个背景。

前不久，李锐曾经病危，南央打破中国的传统方式，在父亲尚在人世时向大家“约字”，以慰藉病重的父亲。二十多年来，南央笔耕不辍，和丈夫巴悌忠整理出《父亲昨日书》、《李锐日记》（1）（2）（3），《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 1975-1979 家信集》、《李锐口述往事》……数百万字的珍贵史料。因为南央的那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她没少受到谩骂和非议，但是她都无所谓，只是继续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在我看来会是枯燥、乏味、繁琐的故纸整理，在南央和悌忠的眼里却充满了生命和历史的价值。这大概是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毅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整理编辑这些史料，一本本地完成出版的原因吧。感叹很多同代人都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南央两口子还在为了李锐的追求，也是他们自己的追求：中国的“宪政开张”而一刻不懈怠地努力。

李锐的一生是如此精彩，她的女儿和女婿又帮助他将自己的信件、日记、笔记……整理了出来，为今天的和今后的历史学者们研究中国之用。李锐实在可以微笑着、骄傲地离开这个世界。

2018年8月20日

两个对历史负责任的人

黎一青

两年前有一次去看望锐老，他建议我写一篇“两位对历史负责任的人”。一直未敢动笔，锐老住院使我不敢贸然等待，斗胆执笔就算是完成锐老布置给我的“作业”吧……

父亲黎澍与李锐老同是湖南人，他们相识于1938年7月。父亲祖籍醴陵，锐老祖籍平江，父亲年长锐老五岁。

1938年1月25日，由唐文燮、邓克生二位先生出资，《观察日报》在湖南长沙创刊，父亲任主笔，当时该报辟有“观察台”、“青年阵地”、“阅读生活”、“社会服务”、“经济讲座”、“战时文艺”等栏目。由于报纸紧扣时政形势，在保卫湖南、争取民主自由、征兵民训、难民与伤兵、敌伪汉奸活动等主题，在动员和发动全民抗战、揭露妥协投降方面十分有利，很快就成为湖南新闻界的一面旗帜，并于同年5月被中共湖南省委确定为省委机关报。

报社聚集了许多热血青年，如谭丕谟、萧敏颂、聂鸿钧、任作民、于刚、李锐、李仲融等。那时李锐被派到中共湖南省委筹建青年委员会，住在《观察日报》，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彼此间很谈得来，从此成为好友。后来李锐被博古调到延安青委，而父亲一直在白区从事新闻工作，两人分开后再见面已经是1952年了。

1949年进城后，我家住进中南海，父亲和田家英、李锐时有小聚，三人可谓挚友，锐老在“黎澍十年祭”一文中如是描述：“50年代，我们也偶有相聚，当然总是上下古今，臧否人物。其中还有个关系人，有时碰到一起，即田家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刚到北京时，住在演乐胡同。约田家英到家来就是同黎澍一起来的。”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可以说些掏心窝的话。可是太平的日子没过上几年，运动就一个接着一个。1959年李锐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受彭德怀事件的牵连被开除党籍，发配劳改离开北京。田家英也于1966年文革初期在无形的政治压力下自缢。三个好友只有父亲一个人虽在反右时被边缘化，文革中挨批斗，但总还算正常地活在人世间。锐老在文革中从劳

改地被押解到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八年，出狱后又重新回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劳改的生活，直至 1979 年才获得自由身，监禁与苦难放逐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

父亲早锐老两年“解放”，重返工作岗位，但并不一帆风顺，期间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后文革运动不断，常常被列为批评和排挤的对象。实际上长久以来，思想理论界一贯是在政治气候稍有宽松，就必然会迎来一波从上至下“反对”、“批判”的高压轰鸣。尽管如此，这些处于开明弱勢的守望者们，心中依然坚守着当初参加中共时所抱有的为国家和民族争取自由、民主、宪政的信念，继续发声与呐喊，足见他们从本质上追求的并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怀着为中国社会争取自由民主的崇高理想而加入其中，无论形势如何变换，他们心中的信念不会改变，更不会随波逐流，这是真正有风骨的、不忘初心的一代人。那时经常听父亲谈到锐老其人，隐约了解到一些锐老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1984 年底，我家从建外灵通观搬到木樨地 24 楼，与锐老临楼而居，从此二老往来更加频繁亲密。

父亲是历史学家，以他职业的眼光和角度，认为对庐山会议的报导一直是官方的，世人了解到的只是单边高压的一面，而锐老作为整个事件受牵连的当事人，应该有发声的权利，并且也有责任和义务把他的亲历如实地写出来，为后人留下一手史料。睿智的锐老几经周折，终于找回了当年被抄走的记录会议事件的笔记本，为著写《庐山会议实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父亲的鼓励下勤奋的锐老终于在 1987 年完成了初稿，记得我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摆放着厚厚的一沓《庐山会议实录》原稿时，真实地感受到了父亲当时那无比酣畅的心情。那时没有电脑，在厚厚的大宽边稿纸上，我真真切切地看到锐老那一笔工整、清晰的字迹。我曾在空余时翻阅过书稿，感到这是一部很有份量的纪实，并令人震撼的著作。虽然我的职业仅仅是个普通的护士，但是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对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清污等政治事件的评判与关注，在同行中也属另类了。当时妈妈对我说，书稿的事不可到外面讲，我内心明镜似地认真地点着头，表示非

常理解书稿的重要和情势的复杂，知道父亲一定是这本著作的第一个读者，同时也是第一个意见的参与者。

1988年《庐山会议实录》初版正式出版发行，同年底父亲去世，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到底在离世前欣慰地见到了这本书的问世。记得89六四风波时，锐老因同情学生引来有关部门不满，情势变化莫测，一天晚上妈妈接到锐老家的电话：为防止意外发生，希望把手头的《庐山会议实录》转移到家里，依稀记得妈妈放下电话时对我说，“你去楼下接一下李叔叔的书，我退休了，就是个家庭妇女，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当时觉得形势难以预测，有了丝丝紧迫感，看到妈妈那无比坚定的目光，就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下楼迎着李叔叔的司机满起，从他手里接过了满满一提兜大约有二十来本书，拿回家和妈妈一起把书放进了壁橱，上面盖上了衣物之类加以掩藏。当然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待局势稳定下来后，又把书原数奉还给了锐老。

应该说这本书十分抢手，直到2000年我有幸得到了一本锐老亲笔签名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增订三版（1998年）后记上写着：

《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于1994年公开出版发行后，出版社告知，已发现的盗印版有五种，共印八次，期间早已脱售。这次增订……总计增补约45000字。

本书1988年初版，10年过去了，共补充修订3次，力求使这次会议的全部情况得到更完整的反映。

从1988年到今天，这本反映庐山会议真实情况的书已经问世整整30年了。40年前父亲以历史学家的职业眼光建议锐老写此书，锐老不顾同是老干部的二姐的反对，顶着政治劈雷的风险，勇敢执笔成书，二老真不愧是两位对历史负责任的人。

父亲早已作古，锐老还在，虽然已是102岁耄耋老者，但是他仍然关心着国事，关心着何时宪政大开张。今天，锐老的思维依然敏捷清晰，实在是令人欣慰和赞叹。衷心地祝愿德高望重的锐老能够尽可能地安享余生，替他的已故老友们多看看这世界的变迁。

2018年仲秋

我认识的李锐叔叔

黎安泰



1989年10月一青（左一）和安泰（右一）在北京医院同李锐、女儿南央及外孙女巴筱忙合影

最初听到李锐这个名字，是在1979年初的一天。那天父亲（黎澍）看上去很兴奋，安排保姆做了以肉类为主的丰富饭菜，因为有个叫李锐的老朋友要来。父亲说他刚从流放地回来，受了不少苦，还是个美食家，炒菜是否用铁锅炒的都能吃出来。接着父亲就说道：这个人专门坐共产党的监狱，从延安整风开始，至今大概坐了十年。我问：那他是共产党么？父亲说：当然是了。

记得当年住在中宣部工字楼时，楼下王文学的夫人因在国民党监狱中备受折磨，身体状况很差。所以我们住在楼上的小孩如果在家里蹦跳和大声喧哗，就会立即遭到大人们的呵斥，怕影响了楼下王夫人的休息。王奶奶在我们心里就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坚强革命者，这个形

象约束着我们在家里的行为。

但是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就长期关押过自己人，那是平生第一次听说，并且前后还坐了近十年牢！李锐这个名字就这样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很渴望见到他。

每次父亲的客人来，都是先到他那间书房兼办公室兼卧室里聊天谈话，吃饭的时间到了，才会到隔壁我们这个单元来。吃饭的时间终于到了，李锐出现了。看上去，他比父亲英俊许多。高高的个子，亮亮眼睛里透着敏锐的目光，配上端正的五官，很帅气。他目不旁视，只注意谈话的内容和饭菜。他吃饭很斯文，没有受了长时间苦的人对美食的那种渴望，更没评论菜是用什么锅炒出来的（有点令人失望）。席间谈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这就是对李锐叔叔的第一印象。

文革末期，父亲的经历很奇特，自己尚未被解放，仍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居然就从“梁校”（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手里接管了《历史研究》。粉碎四人帮后，听闻李叔叔已从秦城出来回到安徽磨子潭，他马上联系，出谋划策，并将李叔叔改写旧稿上增加的《思想方法》一节发表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

父亲是历史学家，记录历史的真实和对历史资料本能的敏感驱使他在第一时间邀请李叔叔写庐山会议回忆录，但李叔叔被关进秦城时那个记录庐山会议的黑皮笔记本等资料都被收走了。于是父亲提示李叔叔向秦城“专办”讨回笔记本和所有材料。经过他不懈的努力，那个“黑皮笔记本”终于从陈伯达专案档案中找到，又回到李叔叔手中。于是《庐山会议实录》有了坚实的可靠的史料。这本《实录》也成为研究毛泽东、研究共产党、研究共和国的重要文献。

父亲和李叔叔初次相识是在1938年父亲办《观察日报》报的报馆里，那时报馆里经常聚集许多进步青年，李叔叔是其中之一。听他们谈话说，那时李锐叔叔住在报社一楼，边上就是排字工人在工作。他们真是老朋友了。

解放后，父亲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和田家英同一个支部，从中南海搬出来后，又同住在万寿路，同一个大院，同一座楼里。往来

频繁，谈话投机，没有世故，都很率真，他们和李叔叔之间聊天可谓政治无禁区无话不谈，李叔叔回忆：我们……上下古今，臧否人物。听母亲说，那时他们晚上偶出中南海北门，在西安门一带的小餐馆前的摊位上一坐，各自从兜里掏出一瓶白酒，相互交换，你喝我的，我喝你的，顶多叫上一小碟花生，聊到酒喝完为止。一次聊到 M 时，田家英伸出一只手掌很快反转成手背。这个情节反映了田家英对 M 的了解之深，父亲和李叔都记得非常清楚。

李叔叔的十年监狱第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因一同学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诬告李叔叔是他的“上级”被牵连入狱。第二次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旧罪（庐山会议的反党集团）加新罪（说陈伯达是坏人）再次被捕入狱。共八年零三个多月，加上流放北大荒 850 农场和安徽磨子潭劳改的时间，一生中风华正茂的二十年就在监狱和劳改中过去了。

不少人因为长期关押而失语，有人因此精神失常，比如许立群；有的人身体经不住监狱里的折磨而病逝……而李锐叔叔可贵的就是精神不垮。身在秦城监狱的方寸之地，却“气功长跑天天练”、“方丈穿梭日十里”地锻炼身体，做大脑体操，还用紫药水在书边写了四百多首诗，出狱后印成《龙胆紫集》。他成功地熬过了与世隔绝七年多的监狱生活。如果不是心怀坦荡和具有坚定的意志，是做不到的。他真了不起！

我们与他在一起时几次被他问道：你们觉得什么最折磨人、最让人受不了？我们回答什么的都有：挨整、打成右派、被朋友出卖、患绝症、受酷刑……李叔叔说：都不是。然后瞪大眼睛说：是饿！长期的饥饿，饿得见到什么都想吃！那才是最难受的！

《李锐其人》中摘录的李叔叔日记记载：“……下午在野地里捡到小绿瓜一个吃了，亦如野人也！……目前多吃野菜。大小豆叶均可吃。”“一天跟犁杖捡土豆，甚累。觉得抬不动腿，全身发软。上午吃生土豆一枚，下午又捡拾小绿瓜一个。晚喝完稀饭后，胃痛发作。”“整日捡土豆。中午野菜窝头，菜益多，喝开水，颇顶不住。无可奈

何……”“……捡一天土豆……吃了几个生玉米，刚摘下来者可食……今天的窝瓜叶……我仍吃来可口。”间接体会到：饿，是最让人难受、最折磨人的。这一点又在王晓琳《顾准》的“商城日记”里得到验证。无论你多么有教养，多么有学问……饥饿，长期饥饿这个感觉，触到一个正常的青壮年的机体本能时，都是最最让人难熬的。

他在北大荒改造时，用日记记录了在那种情况下的劳动、被监督，找野菜瓜秧草根果腹度日的情况。在与饥饿的挣扎中，活下去都是很艰难的，居然管教和劳动还在继续！很难想象我们的管教机构对自己人的这种苛严。许多劳改的“右派”没有渡过饥饿这关，浮肿、寒冷、生病，最后死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叔叔既便因饥饿挣扎在生死边缘，他仍然关心水电建设并发出无奈的感叹：“报上许久没有新安江、刘家峡、三门峡的消息，醉心事业！而今却每日重复简单劳动！”

琬姐（李叔叔的姐姐）省吃俭用地寄来食品，是雪中送炭，是救命包裹，支撑他顽强地活着。后来田家英等关心他的人向李富春求援，将他调到八五零农场场部，情况才有一点好转。亲友们的关心，帮助李叔叔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这些经历足以说明李叔叔与常人的不同。他是一个坦荡豁达又有着坚强信念的特殊材料铸成的人。

父亲有首诗称赞他：

浊世佳公子，于今七十翁。
曾经波浪阔，不怕火炉红。
诗传龙胆紫，文章太史公。
所望加餐饭，越老越英雄。

四人帮粉碎后，李叔叔迎来了人生的再次辉煌，不管在水电部还是中组部，都兢兢业业地工作，并有建树。特别将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选拔年轻干部，视为己任。他继续笔耕不辍，先后成书《龙胆紫集》、《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窑洞杂记》、《论水利发电与河流规划》、《怀念十篇》、《论三峡工程》、《起用一代新人》、《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晚年的悲剧》等二、三十

本著作。

101岁的李叔叔又创造了奇迹，在两个半月经历了三次高烧，现在又重新坐起来谈天说地，写写画画。他明亮的眼睛看上去还是那么纯真和敏锐，我们由衷的高兴，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

李叔叔的父亲李积芳在早稻田大学与宋教仁为同庚同窗好友，结识了黄兴、秋瑾等革命党人，是最早一批同盟会员。他“痛恶浮华，直而不数”，对过度之誉，漠然待之，甚至示以怒容。李叔叔继承乃父的品格步其后尘抛弃优越的生活，在大学里就自发成立支部，并加入了共产党，走进了革命队伍。几十年中虽然屡经党内运动的磨难，但始终从人民和国家利益出发，向党中央提各种建议，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今年召开的十九大。他悼念田家英的诗中有句：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关心祖国的命运，早已成为李叔叔责无旁贷的义务。他是名副其实的一名斗士，不忘初心：为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他毕生奋斗。

2018年9月

您是青松，永不老！

唐仲远

四月到了，又到了李叔您的生日时间，以往只要在中国，我都会尽量来京参加您的生日庆宴，或者在那几天来家祝寿。但今年得知您重病入院，虽然我那时已经到了北京，但南央告诉我，不要来医院探望，我非常理解这是很正确很重要的措施，也叮嘱她尽量阻止亲友探望。我只有默默祈祷老天保佑李叔，让他挺过这关。

我想老天爷是真爱护这国宝级别的共产党老人，您真挺过来了！六月份去北京医院看望您时，我抱着一束鲜花走进病房，又看到那熟悉不过的慈祥笑容，听到您亲切的带着乡音的话语，我内心真地很激动。您开始有点恍惚，谈话过程中也感觉到您的记忆确实减退了，例如下不记得我妈妈的名字了，对我父亲唐麟的名字也感到费劲，可说道“旭之”，您又立即恢复了记忆。对于一个满了一百零一岁的重病初愈的老人，这就很不容易了！

您常告诉他人，我的父母是您三八年在湖南省委工作时的老同事，我母亲曾做过您的假妻子，这次您又说到这话题。我知道，这些年您一直把他们记在心里的。

那时中共湖南省委因为长沙文夕大火转移到邵阳这个中部偏西的小城，我父亲时任邵阳工委书记，便承担了为同时迁来的省委机关和中共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找落脚点的任务。很快他就找到了两处大宅院，省委机关就安置在他的婶婶平时不住的一个大院里。当时的省委领导班子有书记高文华，几个部长也都是中共老人如帅孟奇，郭光州。李叔当时是组织部干事，我母亲唐荣前是机关的机要员，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因为我母亲与李家二姑娘李英华是小学、中学同学，后来又与李家大女儿李琬华同事，所以李叔与我母亲两人本来就很熟悉，高文华就让她和李叔对外假扮“夫妻”。李叔经常笑说，本来高是希望促成他二人的，但那时李锐心中早有范元甄。后来我父亲便追求我母亲，她们两人于三九年结婚，证婚人是帅孟奇大姐。

由于上述关系，我母亲在世时经常去李琬华阿姨家走动，李叔的二姐李英华文革时被迫害，从沈阳回到老家平江，每次到长沙来就住在我家，因为大姐家有老母亲和四个孩子，住处太紧。由此我早就知道李家有个在外落难的人，母亲跟李琬华、李英华两位阿姨聊天时常说道“明弟”如何如何了。后来妈妈告诉我这是她们的弟弟，在北京工作，五九年也因为庐山会议事件被打倒，至今未平反。我父母也是五九年那个事件的受害人，但他们在六二年好歹得到平反，我那时还真不懂，为何单单这个老干部没有得到平反。

我父亲文革初期便被迫害致死，我母亲熬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在我父亲的平反昭雪会议上心脏病发作，也撒手而去，让在场的一千多人悲痛难忍。就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家里来了一位高个子老人，一位眉清目秀的跟我同龄的青年女人，还有我本来很熟悉的李英华阿姨的女儿王小毛，她介绍说这就是她舅舅李锐和表姐李南央，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认识了李叔和南央，并从此改变了命运。

因为李叔，我来到了北京，您介绍我到了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我才有了投身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大时代浪潮的机会。那一次您介绍了两个青年从湖南到北京，都是您当年在湖南的好友的儿女，一个是不才我，一个是才子杨小凯。如果没有您那次的提拔，杨小凯就没有在北京社科院那段进修机会，而那正是奠定了他后来走上经济学高坡的大本营！

我到了北京，后来又出国学习工作，本世纪初落脚上海，但经常回北京，每次回去，别人可以不去看望，但您这里我是必来的。我每次去，您都会问问国际国内情况，也跟我聊聊您那里有什么新书，包括来看您的人送给您的各类书籍，您午休时就让我看书。我知道您把我当自己孩子看待的，希望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您每次出了新书，都会认真地给我赠书并题字，称我为小友仲远，或小友小毛，这都是我无比珍贵的收藏。我也常去炎黄春秋杂志社，买您的书送人。我六十岁那年，您哈哈地笑，“唐小毛也六十啦！”并叮嘱我，既然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放下营生，做点承前启后的事了！

就是在您的鼓励提醒下，我在 2012 年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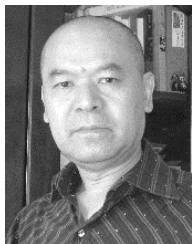
“三观文化传播”，三观二字意为“观天（历史），观地（大自然）和观人（人文）”。做这公司不为谋利挣钱，倒是贴了不少钱，这些年做公益，做社会文化活动，自得其乐，想想总算没有辜负您的指引和鼓励吧。

李叔，您心里最惦记中国的前途，您一定会看到美好的明天！有首老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简直就是为您写的，您就是那棵永远不老的青松！下次来，我唱给您听！

2018年7月27日
于拉脱维亚里加

李锐老签名赠书

赵倚平



我最早购买李锐先生的著作，是 1997 年 9 月在庐山。所购之书就是他那本有名的《庐山会议实录》。我在书上记下“时值庐山会议三十八年之际”。这本书是一个增订本，由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 月出版。其初版是在 1988 年底，为内部控制发行。但出版以后，立即风靡一时，很多人都想从各种途径得而读之。

此书出版的缘由是 1980 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李锐曾有一个关于庐山会议的长篇发言。当时，主持起草《决议》、而且也是庐山会议亲历者的胡乔木看到后，即写信建议李锐：“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事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确实，当时已有几本关于庐山会议的书在广泛流传，但其中的史实，或简略，或失真。于是，李锐按照胡乔木的建议，根据自己的记录和有关原始资料，历经数载，写出了《实录》的初版。在赠给胡乔木时，胡表示再版应该公开发行。

后来，李锐又找到了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更详尽的记录等，对初版进行了修订，使这本书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的庐山会议的实录，还原了历史真相，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 1995 年 1 月出版。才使我们这些后生，知道在那个时代，在中国最高层，在风景秀丽的庐山上，究竟发生一件怎么样的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产生如此深远巨大影响的事件。当时，我是去庐山参加深圳市企业报刊协会年会的。会议结束回到深圳，我即一字不落的通读了全书，并作了许多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眉批、感言，书末我用红笔记的是：“1997 年 10 月 25 日读毕。”

我之知道李锐老，最早是从关于三峡问题的讨论，进而了解到他传奇般的经历，于是便关注他的著述，喜欢读他的论著。我敬仰他对

真理的探求，他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刚正不阿的品格，以及他高屋建瓴的文章。后来又在报刊上看到他写的旧体诗，着实让我眼前一亮。于是到处搜求他的《龙胆紫集》，但遍寻不到（初版的《龙胆紫集》的封面和扉页，就很让我喜欢），一直非常遗憾。后来，2001年2月12日，不知去宝安办什么事（一直很少去宝安），竟然在宝安书城见到了岳麓书社出版的《李锐诗词本事》，急忙购来。在书上还记了一句：“购得此书心甚喜。”

李老前期的旧体诗最多的是写在狱中的。1967年，他被送入秦城监狱，单间关押，除了一张木板床和很薄的一床被褥以外，没有任何物件，甚至连枕头都没有。很多人在这种残酷恶劣的环境下，不光垮掉了身体，而且失语、痴呆、精神分裂，李锐为了防止自己也陷入这种状况，就每天在单间里跑步、练气功，旱泳，洗冷水澡，做“大脑体操”——背古诗，后来又自己作旧体诗，还“空书”——用手在空中练习书法。他的《龙胆紫集》就是在后期可以看书了，一次在房内跑步不慎碰破手后，用护士给他的紫药水和棉签，避开哨兵的监视，偷偷写在“马列选集”的空白处的。所以他的诗，是用生命来写的，没有矫情，没有虚意，没有伪饰，有的只是真情，加上他的文采，非常不同俗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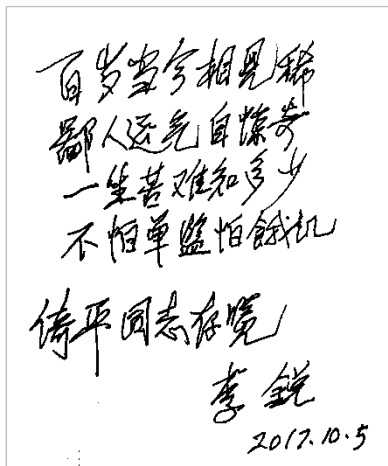
李老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亲身经历了延安的“抢救运动”和“庐山会议”，使他对党的历史上“左”的倾向造成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对“左”的思想有极高的警惕，他非常赞同邓小平说的：“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写了非常多关于反“左”的雄文——我之所以说是雄文，因为它观点鲜明，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逻辑性和坚实的论据，不容置疑，且行文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一如他的性格，而且文采斐然。所以当年看到李老的《李锐反“左”文选》，我也赶快收入囊中。

我其实很早就有李老的地址，也一直想让他老人家在他的著作上签上大名。但我生性羞涩，每当有这个念头，就想，老人家那么大年

纪，精力有限，我寄去书好办，求他签名似也不难，但签了名，他要给你寄回，岂不是很麻烦，要跑邮局，要填单等等。于是又打消这个念头。这样反反复复，十几年间不知起意几多次，又灭念多少次。直到今年夏天有一天，又路过深圳碧波小学门口，校名这几个字正是李老题写的，我突然意识到，以李老的级别，身边总有秘书或勤务人员的，不至于要他老人家亲自做寄书这样的小事。于是我鼓起勇气，铺纸濡墨，提笔写了一封信给李老。因地址是十多年前就拿到的，也没电话，所以不知李老是否搬家，能收到否，就没有寄书，而是先写一信，投石问路。我没敢奢望李老回信，在信中告诉他我的邮箱，希望如果收到信给我从网上一个回音，我知道能够寄到，就把书寄去请他签名。

信写去好久没有消息。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中音，他开门见山地说你给李锐写过一封信吧？我说是啊。正待问他，他开始自我介绍说，他是李老的一个忘年交，叫韩磊，家在北京，现在深圳工作。他前一阵回家，去看望李老，见我的信正摆在案头，一看还是深圳的来信。李老说他年纪大了，也忘了是否回过信息，就托韩磊回来跟我联系。所以他打了这个电话。我听了十分高兴，问知韩先生在宝安那边的一个央企上班，就把书送了过去，并和韩先生见了一面。得知韩先生和李老非常亲近，几乎每月都去看望一下李老，见闻和记录了不少李老的事迹，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发表。我便托韩兄带去上述的三本书，国庆回去请李老签名。心想何以为谢？便送给李老我的新书《五味字》和我用朱砂抄的一幅小楷《心经》。韩兄国庆后回来，除了带回原来的三本书之外，还带来一本李老送我的他去年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李锐期颐集》，这本书收集了他 90 岁以后写的文章（不知为何不在大陆出版而去了香港）。在这本书和《李锐反“左”文选》上，李老用健笔写下“倚平同志存览”和“赵倚平同志存览”。而在《李锐诗词本事》的扉页上，李老题了他一首新诗：“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惊奇。一生苦难知多少，不怕单监怕饥饿。倚平同志存览，李锐，2017.10.5”而在《庐

山会议实录》这本书的环衬上，则是由鲍彤先生题写了一首他送给李老的诗：“春秋实录记蛇龙，索隐钩沉仰我公。画出庐山真面目，当时正在此山中。——国老李公百岁寿诞，鲍彤丙申”鲍彤先生还注到：“第一句话是写李老文集中有五本写毛泽东的（毛属蛇）”。韩兄告诉我，当时正好鲍先生也在李老家里，他去年送李老的这首诗，用毛笔



写就，就裱挂在李老的客厅。李老题完那几本书后，看着这本《实录》，对鲍先生说，你那首诗正好是写这件事的，你把它抄到这本书上。鲍先生就照李老说的做了。李老，101岁了，思维还是如此敏捷清晰！真是了不起！

还让我高兴的是，李老拿着我写给他的信和心经，给鲍彤先生夸我说：你看人家这小楷写的！然后问鲍先生：我对佛学没有研究，这心经是什么意思？鲍先生表示他也没有研

究。李老就问韩磊，韩兄说他也不太清楚，但送给您，就是祈福的意思吧！

2017年11月29日

补记：

得到李老签名之后不久，我上孔夫子旧书网，搜到竟有李老的《龙胆紫集》。赶快买下。当时从封面照片看，书的品相不错，但待买回，书里前几页已有破损，用浆糊或透明胶带粘贴。该书是1981年第二版。虽有遗憾，但了此心愿，心中甚喜。于是又托韩磊带回北京请李老签名。李老用毛笔签下：“倚平同志存览。李锐2017.12.16”。

2018年1月10日特记

再补记：

这篇文章写好后，有幸竟得李锐老寓目。2018年国庆假期，韩磊兄回北京，我知道他一定会去看望病中的李老，就提前把这篇文章发给他，嘱他说：你如去看李老，就把它用大字打印出来，带给李老。他如有精力和兴趣，就给老人家看一下，如果没有，就算了。韩磊兄告诉我，6日下午带着儿子去医院看望李老，把文章带给他看。李老躺在病床上，第一张是自己拿着看，但手抖，无力，后来他在床边拿着请老人看。老人看得很慢，大约十多分钟才看完。并且两次竖起左手大拇指，说：“谢谢他！”。

2018年10月10日补记

祝福李锐老！

王炯华

2018年7月，102岁的李锐老在北京医院病危的消息令我很是不安！但不久，其令爱终于传来大好消息：“我爸情况继续在好转，已经能够坐轮椅在走廊里转悠了。”获悉这第一手信息，我无任欣慰，大难不死的锐老必定大有后福，凭着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意志力，他定能健康活过周有光老先生，定能亲眼目睹他茶寿祈愿的实现！

作为武汉大学的晚辈校友和湖南大同乡后学，我得到过锐老两次实实在在的关怀。一次是1990年李达百年诞辰，我和李达家乡冷水滩宣传文化部门领导造访木樨地李府，幸得锐老题词：“五四运动先驱一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同志诞辰百周年”。一次是20年后2010年，我函请锐老为拙著《朱九思评传》赐序。本来，朱九老考虑锐老年事已高和身体欠适，嘱我代拟草稿；但是他却丢弃草稿而亲历亲撰，看着他一笔一划3000多字的手稿，我感动莫名！我在“后记”说：“耄耋锐老，是与朱九老三聚、共事的国立武汉大学老同学、老朋友。他虽然在武大高九老两届，年纪却小九老一岁，身体也远不如九老康健。他不顾身体不适，亲自为本书撰序，既是对朱九老的深情的寄托，也是对后学作者的奖掖。”

作为年龄悬殊的同时代人，因为社会世事的某种共同感受，我还更多地受到他论著的影响和人格的鼓舞，这就一时难以尽言了！

衷心祝福李锐老先生茶寿不老！

2019年1月20日

附：李锐日记摘录

1990年6月25日（星期一）晴转雨

下午零陵冷水滩市副书记等四人来，今年10月2日，李达诞辰百年，地方要纪念题词。讲了几句话，都录相。题词：五四运动先驱，一生传播马克

思主义。讲话强调，大跃进与文革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2009年7月23日（星期四）晴

翻看《博古和毛》等史料书。给怀化王炯华电话（他写朱九思传，寄来序言稿），应允序言稍修改后即寄出（玉珍接过他的电话，发了牢骚话也）。

我与李锐一次聊天谈话

江汉

由于我母亲苏毅是李锐老的忠实粉丝，2005年1月中旬我在广州家里，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李锐老，当年他88岁，我55岁。那时他从北京来拜访几位广州老朋友，就安排在我妈妈家里一起见面。由于客人多，我与李锐老没有更多交流，只是觉得他话锋敏锐，平易近人，特别是没有官架子。

2007年7月中旬，我路过北京，萌发了登门拜访他的念头，我提前打电话联络，他爽快地答应，请我第二天来家里见面。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了木樨地22号楼，找到了他家。我刚坐下，李锐老就从里屋出来了。记得天气热，他随意穿着一件文化衫，家里没有冷气机，开着风扇，一起吃着西瓜。我没有拖延时间，立刻说起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向他请教。关于造成中国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在哪里？

我原来在中国学习过西医，由于出国定居多年了，从人类族群上对比了中西方的社会差别，感到似乎在人的素质上产生了很多差距。我自认为这是因为数千年历史过程里，人类各个族群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形成的恶果。在长期互相争斗两方或者几方族群里，它们各自的精英层都会遭到严重伤亡，甚至民族被毁灭。这些反复争夺，及其经常伴随而来的瘟疫灾荒，结果造成世界四大古文明被灭亡了三个，中华民族和文明也多次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历经过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满清之后无华夏”，虽然仍可涅槃重生，却也元气大伤，精英精华，损失殆尽，后世繁衍，面目全非……

因此我认为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不仅仅在于50年前，而且在于500年，5000年的历史过程中。此类因素对于中华民族素质的破坏性长期影响，中国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由此而来……

当我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看法，李锐老摇着扇子，认真地说起了他的意见，大意是动植物界的品种，有选择与淘汰，物竞天择。但也

会有逆选择，逆淘汰。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你说的现象，就是社会的逆淘汰，逆选择……

他的几句话，画龙点睛，醍醐灌顶，让我顿时找到了解释问题的关键词。他还提醒我，你虽然看到了民族素质固然是关键因素，但是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国家体制等综合因素，都是在综合影响着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

当时他已经是 90 岁高龄了，思维敏锐，头脑清晰，善于分析，一击即中。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

我与他还天南海北聊了一阵子，不敢耽误老人家太多的时间，便离开了他家……

此次我与李锐老的聊天谈话，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了，我依然记忆犹新，时时刻刻怀念着他。

仅以此短文追悼李锐老的苦难辉煌一生！

2019 年 3 月 10 日
于多伦多

李锐走完风雨坎坷人生路“两头真”成不熄星火

范建

这是一位被民间喻为“两头真”的老人，许多人骂他，也有许多人爱他。一个生命的三分之二都在争议声中度过的老人，2月16日终于走完他102年的风雨坎坷人生路。

他是人们熟悉的李锐老。他的特殊经历使他拥有非常难得的宝贵财富。他做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这些耀眼的光环并没有使他沉浸在吹牛拍马的五光十色中，相反，却折射出一个有气节的人的铮铮铁骨。

他是位不计个人得失、刚正不阿、担当有为的老党员。1958年，中央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的南宁会议上，他慷慨直陈兴建三峡的各种问题，力主不上工程。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从而当上领袖的兼职秘书，并改变和推迟了最高领导有关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时间。

然而，正是这些责任和担当的建言直谏，使他一生命运多舛。从50年代开始，他就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达20年之久。文革中又坐过八年的秦城监狱。遭遇撤职、亲人反目、离婚等一系列厄运。从人生的高峰一下跌入苦难的深渊。

他20岁加入中共，怀揣鞠躬尽瘁之心，共产主义事业曾是他年青时的信仰，抛弃个人得失一心为民，此为头真。到了80年代后期，他又怀揣痛心坚陈时弊而义无反顾。此为另一头真。

他“不守规矩”吗？不！他搞组织工作，按着“四化”标准科学选人，以此温暖一大堆有才有德而又受伤人的心。他不拉帮结派搞自己的小圈子，当夫人埋怨他时，他义正辞严：“要是那么做，还叫什么共产党员。”干水电就是讲科学，而不是建三峡为青史留名，树碑立传，这就是他心中的规矩，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向来主张要有自己的思想，不人云亦云，在许多场合他说出的

真话似乎有“出格”之嫌，即使有着 20 年的牢狱之灾，依然如魏征一般直谏。他以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真正的主人是人民。为此他决不随大流，胡吹海吹，唯上是举。而是高高昂起知识分子的头颅，挺起大写人的风骨。他不按常理出牌，不循规蹈矩，与“潮流”逆袭而动，和流行思维满拧，因此不讨好、不得志，不招待见。

文革期间他坐了 8 年秦城监狱，丝毫没有悲观厌世，相反是苦中作乐。读马列、用紫药水写了 400 多首诗，像“平生文字难成狱，自我批评总过头。”“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

1963 年和 1975 年，李锐曾两次被发配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改。那时，与他一个系统的我的母亲，经历了对他的“问题”甄别调查后，深深佩服他在逆境下的坚持和担当。即使那样的环境，他仍然敢于“犯上”直言。几年前，在一位老报人 90 大寿的祝寿会上我见到李锐老，问起他的磨子潭“犯上”。他笑道：事实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不说？他在人生最好的 20 年，度过坐牢和流放的痛苦生活，一般人早已死过几回。然而，他对生活总是怀有热望和信心。他淡淡道：“把个人放进历史中去想，就是那么回事。”

他和许多持不同政见的老人不同的是，他胆大、超脱、智慧、有力。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分析研究党的教训，并引以为鉴。不蹈覆辙。他著书立说，撇开个人恩怨，写庐山会议实录有独到见解，写毛泽东晚年实事求是，写大跃进不遮不盖，写三峡工程敢揭真相，追求宪政和真理可见傲骨和雄风……

如今，李锐老走了。但他的求真品格，却成了不熄的星火，在中国的有识之士中接力、点燃。

2019 年 2 月 17 日

阅正，他让我抄在他的笔记本上。诗曰：

《胡杨泪序》含泪， 读细品《实录》震撼大。
 追求民主一楷模， 反对极权“五不怕”。
 浩然正气感天地， 铁骨忠心为中华。
 力争宪政大开张， 祝您健康饮白茶！

与李老交谈颇有共同语言，受益匪浅。交谈中得知，我与长辈兼良师李老还真有不少共同之处：李老与我都属蛇，他比我大 24 岁，都对研究毛有兴趣，都喜欢游泳等等。临走前，李老还特意送我一本《龙胆紫集》，一本《世纪之交留言》。

2011 年初，我和老伴到加拿大蒙特利尔与女儿、儿子团聚，远离故土，我常给李老家打电话，也给李老发过祝寿信。2017 年回国住了几个月，期间专程到北京看望李老、辛子陵等师友。7 月 1 日、7 月 5 日，我两次去拜访李老，交谈甚欢，还用我的 iPad 拍了几张照片。7 月 1 日那天我把自己在加拿大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复印的小册子送请李老阅正，他即翻阅，此时一位老先生、曾任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的崔敏也来看望李老，李老问我这本还有吗？若有，请送给崔先生一本。我当即拿出一本签名后送给了崔教授。

这两次见李老，他一共送我三本厚书：《李锐期颐集》、《李锐口述往事》以及三卷本的书法集，我随后带到了加拿大存览，还让知心朋友也读读，收益多多。

孰料 2 月 16 日得知李锐老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得诗一首《悼念李锐老前辈》：

三次拜访李锐老， 交谈赠书受益多。
 李老一生垂青史， 峥嵘岁月历折磨。
 追求“宪政大开张”， 立言立功树楷模。
 后人传承前辈志， 宪政民主兴中国！

2019 年 2 月 17 日晚于蒙城

李锐先生之辩解

陈宝成

李锐先生西行，物议两造，或显或隐，泾渭分明。知人论事，当如黄梨洲先生所持之论：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关于先生，或称其是“党内权力斗争失败者”，此实与“成王败寇”之专制史观暗通款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吏部侍郎得以善终，焉能视为败寇？此无视先生暮年逆境中求真、求实、求独立、求自由之理想价值也。况历朝历代不乏志士仁人虽九死而犹未悔，方铸就煌煌中华之精魄，“小朝廷何足道哉？大丈夫无所谓了！”

或称其“享受体制给予之高官厚禄，承担统战知识分子之特殊使命”，此实乃小市民之狭隘与阴谋论之腹黑也。红朝乃世人无法回避之现实，芸芸众生思想各异，纵然庙堂之上亦难定于一尊，“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求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更应是权贵阶层中之理想主义者之社会责任，盖因“权力大，责任亦大”，何必以体制、身份划线，而拒其于门外？

呜呼哀哉，吾悲大星之陨，复悲先生不盖党旗、不入八宝山、不举行告别仪式之遗愿恐难实现。而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忧国忧民、家国天下之理想，则必大道其光也！

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睡几人醒？

寥寥数语，遥祭先贤。

于己亥新正十三日晨，时月明星稀也

八 | 外国友人送字

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大使的信（翻译：李南央）

泰瑞·布兰斯泰

亲爱的李南央：

我想向你和你的家人表达我对你父亲去世的最深切的哀悼！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李锐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很多不同的作用。但是我知道，对于你，他首先、最主要的是你的父亲。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对你失去了父亲深表遗憾！

真诚的，

泰瑞·布兰斯泰

2019年3月26日

Dear Li Nan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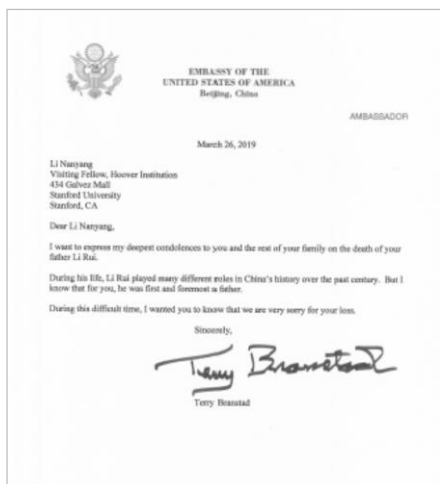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 condolences to you and the rest of your family on the death of your father Li Rui.

During his life, Li Rui played many different roles in China's history over the past century. But I know that for you, he was first and foremost a father.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I wanted you to know that we are very sorry for your loss.

Sincerely,

Terry Branstad



你父亲的一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故事（翻译：李南央）

毕成

（李锐百岁生日时为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转送生日贺卡的信使）

亲爱的南央：

读到了你父亲的消息，非常的难过。我一直以为你父亲的一生代表了中国 20 世纪的故事——乐观和悲剧，倔强和不屈不挠。

李锐现在去了一个好地方，多么地希望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去到她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好地方。

在这困难的时刻，愿你和你的家人一切都好！

2019 年 2 月 1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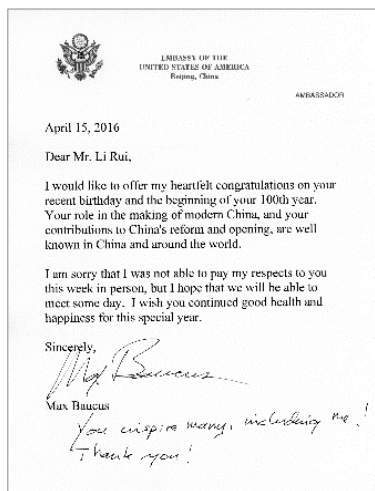
Dear Nanyang,

I was very sad to read the news about your father. I have always thought your father's life represented the story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the optimism and the tragedy, the defiance, and the perseverance.

Li Rui is now in a better place, and hope his passing is a sign that China will someday soon move on to a better place in its long history.

All the best to you and your family at this difficult time.

Christopher



李锐，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翻译：李南央）

卡罗尔·肯迪



亲爱的南央：

请接受我对你英勇的父亲的过世的诚挚哀悼。你的父亲为了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个世界是绝不会忘记的。

作为一个女性，我能够理解不参加亲爱的父亲的葬礼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我相信你的父亲一定会为你充满勇气的这个决定感到骄傲。保持坚强，南央，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事，我相信你的父亲一定会为你充满勇气的这个决定感到骄傲。保持坚强，南央，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真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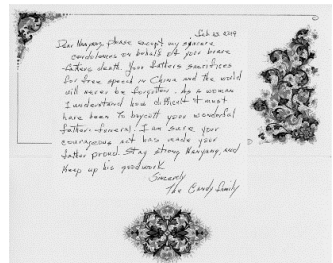
肯迪一家

2019年2月23日

Mr. Li Rui, what a brave man !

Dear Nanyang, please except my sincere condolences on behalf of your brave father's death. Your fathers sacrifices for free speech in China and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s a woman I understand how difficult it must have been to boycott your wonderful father's funeral. I am sure your courageous act has made your father proud . Stay strong Nanyang, and keep up his good work.

Sincerely
The Candy family



实现宪政开张（翻译：李南央）

黑川真一（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機構名誉教授）

亲爱的南央，

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忙着写自己的文章，没有看新闻。今天翻看了亚洲新闻报，读到了2月17日和21日的两则消息：第一个消息，得知你伟大的父亲去世了；第二个消息，知道你强烈地反对中国政府所安排的你父亲的丧事。请接受我和夫人宁子的诚挚的哀悼。一直以来，我们对你父亲的勇气和在体制内为中国宪政开张而做的事情充满了敬意。

谨致问候！

黑川真一

2019年2月23日

Dear Nanyang,

In this week I have been tied up with writing articles and did not check Newspapers. Today I checked Asahi News Paper and have found two news dated February 17 and 21: the first informed that your great father had passed away and the second that you were strongly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y of your father's funeral.

Please allow us (Yasuko and Shin-ichi) to offer our sincere condolences. We have respected your father for his brave and subtle activities to realize 憲政大開帳 In China.

Sincerely yours
Shin-ichi Kurokawa

2013年10月黑川夫妇与南央夫妇在旧金山

九 | 字

范明强

将毕生精力献给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位高级工程师的心声

赤子报国，屡经磨难，初心不改，生命不止，奋斗不息，传奇人生，光彩照人。

2018年7月22日

郭冬成

向伟大的老前辈李锐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伟大的老前辈李锐，致以崇高的敬意！你纯洁赤诚的品德，你自由主义的理想，你百折不挠的意志，你乐观深邃的智慧，都是我们的好榜样。你老一生，做人做事做文，样样精彩夺目。你老健在人间，已然永垂不朽。欣喜你已经长命百岁，更盼你老继续健康。更盼你老与我们这些六七十岁，八九十岁的年轻人一道，亲手埋葬万恶的中共暴政。到时候，你老坐在轮椅上，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推着你，簇拥着你，与你一道，欢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敬献 2018年7月26日

刘嘉波

后继有人，望李老安息



南央大姐好！

惊闻李锐老仙逝，十分悲痛！深切哀悼并望节哀顺变。李锐老是君侧良心、国中栋梁、宪政领英。他的弃世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巨大损失！

2019年2月16日

徐跃

李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锐先生于昨日上午八时余在病榻上安然逝去。作为中国当代社会最受大众敬仰的标志性人物，我们深切怀念。他的秉笔直书、良心说话、呼唤宪政的精神早已深植于中国人民心中，看得到处处萌芽、生长，亦有成材成林，已经不可能泯灭。

李锐先生的成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空前，能举出来相类的不多。他一生中曾遭受那样极端的磨难，但他却因此更积极地起而推动社会的进步，站到改革开放最前列，从政治上、记录上、社会活动上诸方面，遵从良知真心的指引，在当代中国留下浓烈灿烂的一笔，遗福后世万千！并且“仁者寿”，102个风云年头，又是一笔傲人辉煌的记录！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锐先生的追念活将由组织操办，会有不少要求和限制，许多人将不能去送李老最后一程，难以尽到中国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不让去、不能去、不屑去，没有关系，李锐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家中祭、心中念，默默的思念默默的爱，注入行动中，砥砺前行，去迎接中国社会正常化的那一天。春光春风里，十里长设香案，告慰李老。

2019年2月19日

严家祺

李锐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李锐长寿百岁，品德高尚，他的宪政理想，指引中国前进。

2019年2月16日

张曙光（北京师范大学）

愿李锐老精神不死，浩然之气长存！

在过去的历史环境中造就的象李老这样为真理而活着，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奋斗终身的人，可能愈来愈少了；而文化的庸俗和集权体制的捆绑，可能让愈来愈多的人，成为钱理群先生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认为，只要开放不变，只要人们能够在生活中得到更多的自由，只要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方面还能够与现代文明的元素结合，中国人就不会在人格和道德上全面地退步，他们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也会提升公共意识，增长文明素养，推动中国进步。那样，中国就有希望。

2019年2月16日

郑仲兵

痛悼李锐老师

三天连降大雪之后，李锐老辞别了这个混沌的世界。这雪象征着他高洁纯粹的百年人生。

他是我崇敬的老师，知心的忘年交。几十年来，他对我的教诲和关爱，是我至死不能忘却的。

自庐山会议之后，他一直寄希望并致力于通过共产党来改变共产党，以求踏入当代世界文明大道，以求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然而，他看到的仍是文明与民主的缺失。这是他终身的遗憾。

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肉体的折磨，精神的苦难。但从未停止过思考、探索和奋斗。他的思想一直在进步和升华。他给世人留下那么多的智慧，那么多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那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是弥足珍贵的遗产。

世人敬仰李锐，世人热爱李锐。他的英名将永远彪炳史册。

2019年2月16日

石楼

致南央

南央：

健民告诉我你父亲去世了。昨天我妈妈和我通话时，她还特别问到李锐的情况。算起来那时是北京时间上午 9 点 30 分，你父亲去世后一小时。

共产党是一个吞噬个性、人性、和独立思想的怪兽。李锐这个共产党员却拒绝把自己全部上交，不放弃独立思考。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之深刻，在中共党内无人能比。

记得几次李锐给我的惊讶。在大约二十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李锐说，“共产党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约十年前的一次访谈中，他说，“共产党是没有人情，没有人道，没有人性，没有人味儿。”原话可能有出入，但是意思不会错。我当时震惊这个老党员对党的总结这么尖锐准确，从而一直记在心中。在另一个有关三峡大坝的访谈的末尾，李锐先生说：“我要拯救我的灵魂。”灵魂没有集体的，只有个人的。李锐的话让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和共产党的集体主义的决裂。

在共产党中，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对自己的党有反思的也许不少，但是思考共产党的本质的不多，对党的认识到了李锐先生的程度的则更少；而有那种深度的认识、身处国内、却敢直言己见的恐怕就数李锐先生了。

见过你父亲几次。在我的印象中，你父亲是一个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和蔼慈祥的老头儿。世上又少了一个好人。如果真有灵魂和天堂的话，他的灵魂应该去了那里。

望节哀。多保重。

2019年2月16日

宋霖

南央：

惊闻噩耗，深感悲悼。令尊大人崇高品德卓越建树懿言嘉行永载史册永垂不朽！请节哀顺变。

2019年2月16日

岳建一

南央兄好！

惊悉李老辞世，深痛不已之际，哀讯遍传，同怀者们相互转发各类文字，可谓铺天盖地，追思会亦此起彼伏，足见世道人心。李老虽去犹在，尤以高贵灵魂的伟岸，垂范我们，直至未来。值此巨大不幸时刻，请您节哀，并代无数亲朋至友，长道珍重！

建一敬上

2019年月16日

张丁泣上（人大家书博物馆）

南央老师礼鉴：

惊悉李锐老不幸逝世，深表悲痛。

李老生前十分关心家书事业，热情支持我们从事家书收集与研究。特别是5年前，他不辞辛劳亲临我馆视察指导并题词：“家书是一种最真实的历史文化”，让我们倍感荣幸，深受激励。我也有幸两次前往府上拜访，当面聆听李老的家书故事和真知灼见，受益匪浅。李老一生求真求实的精神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甚望您节哀珍重，愿李老一路走好！

2019年2月17日



赵诚

南央：

李老去世我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他老人家走完了自己艰难的一生，为这片土地的自由宪政他尽力了。我深切缅怀和诚挚悼念他老人家。我看到他把一千多万字捐到胡佛所。我真佩服他老人家的英明！

2019年2月16日

百家出版社致意

南央女士：您好！

尊敬的李锐老先生病逝，深感难过！

李老先生逾百岁高寿，但恶讯传来仍感惋惜及沉痛，为国家失去建国精英，你失去挚爱父亲感惋惜，为李锐老忧国忧民“宪政大开张”心愿未了溘然长逝感遗憾！

我们在此谨向李锐老先生致敬，遥祝李锐老一路走好，我们将永远怀念他，衷心感谢他长期在争鸣杂志用笔杆子为中国的民主宪政鼓与呼！

希望南央女士及家人节哀，继续支持你为“海关案”讨回公道！

2019年2月19日

杨志洪（美国）

李老高瞻遠矚，一貫真知灼見。從舊營壘裏殺出來，不畏強權，不貪權位，針砭時勢，一針見血。唯有心底無私，站在人民立場上才能做到。站在人民立場上，就立於不敗之地，名垂青史，千古不朽，可以媲美趙公。

2018年7月4日

十 | 诗

丁柏生（92 庚仰望友）

敬致李锐老

投身革命心贴民，庐山会议闪真金。
彭黄张周遭诬陷，肝胆相照田家英。
耀邦平冤公力助，执掌组织尽良心。
无辜右派一风吹，千家万户幸回春。
晚年力挺《炎黄》志，深知政风难言真。

2018年8月13日于安徽

池堂春草

李锐先生千古

李锐老驾鹤西归

政界楷模，	哲人其萎，
国士无双；	梁柱摧焉；
先生之风，	追思无尽，
山高水长！	飞雪满天！

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是分裂最大的一个群体，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一代人过去了，不会再有了。

邓世广

遥祭

未负平生雨一簑，沧桑往事任消磨。
杞忧非我独嫌少，铁骨如公宁讳多。
地府罔收诬我状，天堂合唱迓公歌。
批鳞笔是春秋笔，刚正人间敬不阿。

冯青堂

挽李公锐

春风还作朔风吟，扑面尘生感不禁。
漫道秦城真绝境，恰凭龙胆写初心。
层层揭露庐山面，渐渐游离梅树林。
惜是百龄人去后，广陵无复到鸣琴。

蒯高毅（长沙网友）

哭李老先生

余子湖湘老毅郎，九樽酹地哭贤良。
开张宪政终身梦，坚守人心永世芳。
万古长吟龙胆紫，一书实录雨苍黄*。
三聆教诲纶音在，楚魄回乡泪水狂。

注：“雨”通“语”，为诗律对仗之故。

管谨武

送李老

石破真令天下惊，频揩泪眼未分明。
云泥业已春秋判，谷莠依然左右争。
长夜难明知短路，奇观不废是长城。
百年犹自忧千岁，千岁无忧新岁生。

胡鸿

闻李锐老逝世感作

不悲李锐亡，但悲宪政死。
谁持药棉签，更蘸龙胆紫！

外一首：悼李锐老

举世如公能几人，一身铁骨太嶙峋。
百年人物吾推举，熊汉章同李侯森。

霍亚新

锐气长存·悼李锐真人

痛逝国魂几人悲？英年冤狱老大回。
力陈三峡拒筑坝，敢议庐山抗圣威。
百岁求真谱青史，万言解惑铸丰碑。
李翁不泯锐气在，且看周期轮下灰*。

*周期：千年不变的皇朝更替；轮下：历史车轮下的灰尘。

金道华

哀李锐老

长吁宪政大开张，傲骨清风志似钢。
八载秦城心炼狱，数笺龙胆笔投枪。
悲悯黎庶啼鹃血，哀挽仙翁断雁肠。
刺恶嫉邪真国土，昊天一掬泪胡杨。

洗尽铅华志未磨，丹心无力挽天河。
寒风牯岭还真面，冷月秦城谱浩歌。
莘莘神州迷雾厚，沉沉庭宇黯云多。
常怀普世忧天下，未竟由衷逐逝波。

苏俊

蘸他龙胆紫题诗，大道从来杂险夷。
敢步禹王为后进，难逃秦刦却先知。
曾经庐阜云生处，亲见神坛日死时。
毕竟河山谁是主？寥天鹤去不胜思。

老桂祭锐老

西归国士陨，紫气未东来。
赤县封冰雪，寒梅坚韧开。
春风知国运，千里暂徘徊。
君待无声处，神州动地雷！

王中陵

读李南央《李锐走了》有感

尊严一线斗秦嬴，盗火庐山举异旌。
盲逐领军成过去，自由呐喊敢纵横。
个人崇拜皆邪教，宪政开张是使令。
仆继无忧伽利略，扫平故垒向前行！

向明月

风云激荡哭李锐

初春不复哭苍茫，独对诗书日月光。
同是潇湘洞庭雨，百年魂魄问家乡。
春来又听杜鹃词，昔日佻儿鬓有丝。
回首百年修炼史，花开花落自由之。
湘水苍苍向寂寥，曾经世纪伟人潮。
天堂若忆庐山事，可有心情再聚焦？

张琳璋

爱国者李锐追悼会

遗嘱先生不盖旗，声言主义所非期。
山前八宝云偷渡，馆里三仪伏夜鷗。
霾压梅开花暗语，柳飞春汛泛明池。
红尘紫陌桃千树，海运无须问报时。

赵哲

拈花回顾·追李锐先生

瀛台几进安邦策，几度忧君恨匡庐。
时岂贞观愁净土，幸非比干感身孥。
任公奋揭新民语，长素未羞六品奴。
一顾百年拈花笑，旧邦新命此新途。

挽李锐老

车天启

春滞梅凋天大悲，霾浓寒重泪双垂。
年年今日人长忆，继往开来知是谁？

贺兰吹雪

驾鹤成行终向西，长安曙色尚凄迷。
孤臣殿上犯鳞后，诸子槛中摇尾时。
毕竟泥污生菡萏，居然滑浊出清溪。
晚年果决修遗嘱，送殡无须盖党旗。

李仲兰

天河明灭几残星，噩耗传来怎忍听。
昏眼迷途终获罪，病躯对榻说初醒。
秦难远去愁犹在，旗未开张目难瞑。
问有天堂知己少，高山仰止刻碑铭。

刘海

百年磨砺铁未消，无怨阳谋入狱牢。
能脱酱缸自清洗，敢荷新戟战恶饕。

刘琼

北望京师泪雨弹，江风阵阵递春寒。
一生志气传千古，多少诗篇怒旧奸。
此去泉台犹未惧，为愁民计不曾欢。
于今谁共天雷候，雁塔钟声到外滩。

浦江边上望长安，百岁常忧改革难。
雁塔留声题病榻，庐山飞瀑忆清欢。
因存锐意峥嵘月，未老诗心正气刊。
沼狱笔耕龙胆紫，几时神鬼各消残。

南浦

先生驾鹤已西去，留下愿景言谆谆。
宪政何日大开张，美酒一杯遥奠君。
天下苦秦诚久矣，一若大旱望云霓。
口罩镣铐卸除尽，云帆沧海千万里。

支持李南央女士的严正立场，深切悼念李锐老人。

昊江

鹤飞人去莫言悲，盼盼春归每每迟。
故国何堪霾雾重，长途不尽马牛疲。
撷花一朵难为祭，咽泪双行未与随。
却待神州天气朗，依依更诉别来思。

车兆基

悼李锐老

伟哉国土思锋锐，呼唤开张铁脊椎。
缘两头真人得寿，初心不忘德无亏。

陈达志

纵横天下论今古，晚节忠魂再奏琴。
帘外雨声知世憾，窗前梅影诉春吟。
先人求索犹艰困。我辈登临尚热枕。
家国依然仁义在，老来悔怨是良心。

陈少平

数十年间国步艰，刀山火海未曾看。
晚来痛定思饕餮，也使英雄龙胆寒。
入乎羿毂岂能完？多少才人九死间。
却讶共工真大勇，平生数触不周山。
胡杨有泪荐轩辕，史笔无声策九阍。
萎矣哲人桑海尽，馀情留与忆开元。

陈世群

声望垂天下，神州仰一旌。
匡庐传实录，龙胆出秦城。
独秉良知在，尤期宪政成。
怀公高世躅，四海泪同倾。

高雷

霹雳晴空知驾鹤，灵台寸断悼精英。
放言江峡龙颜动，补漏匡庐实录惊。
百姓心中碑有字，凌烟阁上节无名。
坚持宪政赤诚见，天国何曾不泪倾？

高知贤

讣报忽闻其奈情，昊天漠漠悼耆英。
一心常抱鲲鹏志，百载历经风雨程。
仙逝今朝料怀梦，前驱昔日忆扬旌。
遗编醒世煌煌在，史笔果然如大名。

何雨淮

观世音心长寂寂，弥陀佛肚失悠悠。
少年意气消寒汐，龙胆紫篇藏事由。
天殄僻邪终有报，邦兴坎坷莫回头。
回头仍是陈年景，有泪如倾夜色髹。
永驻芳华人瑞心，蒺藜深处可长吟。
逆鳞不弃北荒草，沥胆铮言皇史箴。
锦瑟多弦弦柱直，金銮寡德德声侵。
立兮跪矣吾难晓，但晓肉鱼曾列砧。

胡三贴

鯁骨人间余未多，闻公弃此旧山河。
淋漓紫墨书龙胆，能奈秦庭鹿马何。

胡晓明

庐山飞瀑九天惊，三峡停波百尺情。
最是中华殇国士，千山杜宇唤春声。
丝尽春蠶蜡泪干，卞和司马肉身残。
如何豪杰心中事，尽作苍烟梦里看。
双眼放光声似钟，殷殷问我海上风。
当年临别题签在，龙胆紫书鹃血红。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东西颇不同。
已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跳出此山中。

曾拜望老人于北京木樨地获赠龙胆紫集一册今忽忽三十年矣。

嵇发根

雨声诉说痛哀情，一代智人乘鹤行。
真气庐山龙甲逆，文章铁笔宪旗擎。
一生胆识凭天地，百岁心思仍纵横。
此去仙班听政改，人间邪恶要澄清。

冷阳春

忽闻噩耗泪难收，疑是乘鸾汗漫游。
曾恤黎元遭左祸，甘为砥柱立中流。
投荒饥馑险成鬼，繫狱孤单苦作囚。
宪政高呼音尚袅，英名懿德馥千秋。
刑天奉赠获青眸，旋即千金解困忧。
两地神交凭韵律，百年笔述续春秋。
堪称当代奇男子，不作中枢软骨头。
遗著长传千万字，光芒万丈睥环球。

李刚

高吟寒夜里，冰雪一枝梅。
长叹风惊骨，为谁犹自开。

李润勉

庐山实录风雨狂，龙胆血凝何苍茫。
曾为天朝良心吏，终成党国反叛郎。
两头求真真不见，一心为民民犹盲。
神州脊梁今安在？吾辈求索路正长。

外一首·叹李锐老囍身后事

不盖党旗不进山，不做鬼神不成仙。
生为苍生说人话，死亦不见马祖先。
组织告别演闹剧，网管封杀露真颜。
此身愿肥花下土，留得英名在人间。

林垦

敏事敢言思锋锐，国之栋梁铁脊椎。
遭际无损岁百寿，子曰此谓天生德。

刘强

一生磊落百年呼，誓为苍生作董狐。
泣血锥心龙胆紫*，英雄歌罢再击壶。

*龙胆紫：先生狱中以龙胆紫药水写旧体诗词 400 余首，后结集成书，名《龙胆紫集》。今日先生驾鹤西去，仅以此诗祭奠先生在天之灵！

刘星明

长空巨星坠，志士起悲声。
百岁存真史，五分出实情。
赤诚朝日丽，磊落夜灯明。
夙志行当见，尧天雨转晴。

马育忠

人间别后可无虑？天上居时当有知。
却恨人情天不顾，唯将文字寄哀思。

牟广丰

千人送别无名氏，简历生平不可知。
自古人心有杆秤，杜鹃啼血绽花枝！

今日上午八宝山东大厅
2019.2.20 北京

无词无乐亦无花，寂静悲伤泪似麻。
仰止高山魂魄在，伴随屈贾赴长沙。

2019.2.21 北京

欧铁辉

寒雨连绵似泪垂，老天合与我同悲。
国中共几人堪吊，史上元多事可疑。
介直易招奸与构，清贫哪得凤来仪。
公今撒手朝西去，忍剩苍黔哭大旗。

欧阳国金

谩言君侧位优崇，忽似轻尘扫厉风。
狂圉偷书龙胆紫，神州争献鼠肝红。
嬗更几代谁科罪，奠定一尊纷尽忠。
盛世垂垂持异调，朝堂早不许公同。

沈秀东

云天墨墨悼斯人，国士朝中唯此身。
高峡廷争持道义，匡庐舌战触龙鳞。
囚牢深陷曾无悔，宪政难成空耗神。
戚戚长为天下计，平生事迹待谁陈。

唐冬戈

大雄终不起，赤县也生尘。
已惯人间雪，谁疑陇上春。
何言惊梦久，此去捷书频。
天国无鞭叱，鲜花作比邻。

王康

斯人一去天下空，独留九千万红冢。
涛涛浊水湮苍莽，陷溺十四亿懵瞳。
曾履虎穴近龙潭，还临狼烟远蛇洞。
张狂赤焰今又起，宁有后觉继锐翁？

李锐先生撒手尘寰，正值中华再临十字路口。百年人生，揭虎皮剥龙鳞，反独裁吁宪政，皓首志道不渝。真君子大丈夫，其形已没，其神常留霄壤。

2019年2月16日 华盛顿郊野结庐

王明全（四川自贡）

士林戴白共追亡，驾鹤西归举国殇。
民主谁期迎僭主，广场孰敢作屠场！
有心济世纾民怨，不意伴君为虎伤。
百岁向天留一问，何时宪政大开张？

王云生

庐山获罪陷囚牢，八年秦城志未消。
一生追求开宪政，两头求真写离骚。
当代太史李锐老，欲唤人间归正道。
戊戌虽逝己亥到，宪政大同在今朝。

晨接李南央由美利坚发来李锐老仙逝之讣告，感慨万千，特急就一诗以示哀悼。己亥正月初十二于滇黔道上

汪廷奎

修库长江敢谏争，庐山会上陷儒坑。
秦城囚禁诗龙胆，部长抡才享令名。
宪政开张晚年愿，人权是主毕生情。
春明我亦亲聆教，痛失寿星当世英。

杨子怡

千古埋轮孰与同，批鳞敢蔑大王风。
泉台此去犹存锐，再死何妨谏祖龙。
敢是泉台也慕公，先生剑化太匆匆。
人间弊事依然在，更有哓哓跟屁虫。
世尘斥厉意纵横，龙胆诗心一灭行。
人世纷纷奸宄在，先生挂剑若为情。
难销锐气任秦城，风骨初心天下鸣。
曲散广陵成绝响，人间哪个再吱声。

徐中秋

谁记初心自了然，何须日暮噪秋蝉。
先生去后庐山在，长与儿孙仰俊贤。

袁培根

内讼纷纭罹难多，铁窗壮志却经磨。
坑灰齐颈神犹在，一片丹心国老皤。

袁文庆

哀矣沉明月，雄哉不老天。
文章同寿考，宪政有诗篇。
云黑多风雨，春寒种杜鹃。
流光星陨后，回看一峰巅。

张红果

惯说人间纷代谢，讷闻屈指辄相辞。
百年曲折虫沙迹，九转沉潜龙胆诗。
孰谶中流堪后死，难为大梦许先知。
功名尘土余椽骨，遥向匡庐悼未迟。

张庆辉

毫耄其谁作壮行，奋将宪政大旗擎。
匡庐廓雾雾终散，高峡出湖湖已平。
棺盖毕生憎帝业，骨敲抵死是铜声。
秦灰复爇公今去，遥向神京酹一觥。

张维引

追悼会上见群情，后继南央妥善应。
手稿保存胡佛永，历史真假自分明。

郑轰轰

老去犹呼宪正新，强撑病骨斥嬴秦。
谀词不必空文藻，大写铮铮一个人。

众人

曾经明珠暗投，幡然珥弃浊流。
仗义为民鼓呼，宪政民主自由。

廖国华 有弔

再难彤管吐丹衷，事到安危话未穷。
实录名山犹被禁，廷争巨坝总无功。
十年劫历阳谋里，两字开张苦盼中。
白首归神亦何恨，遍传大响趁天风。

沈汇丰

和廖国华《有弔》元玉

一生报国竭丹衷，心血流来不尽穷。
恶蠹之人欣摆谱，殃民也者爱评功。
真才实学走廊里，假语荒唐大殿中。
敢揭毒蛇魔底细，吾侪载载仰英风。

外一首：哀李锐恩公

惊闻噩耗望长空，忆昔皇都仰睿容。
百载无知尊鬼列，千秋有幸识恩公。
赠书题字珍函里，解析夸词圣殿中。
敬寄南央欣早见，平民争颂最高崇。

杨新跃

鸦啼已息更谁听，龙死潜知尚有灵。
百里匡庐多暗雾，十年劫社剩余腥。
批鳞虽属孤臣泪，逆语粗呈民主形。
至此良心俱断绝，一天风雨正冥冥。

丁建国

人世百年终委离，但哀芳政预难知。
小民谁欲还金印，大盗焉能降血旗。
浊浪滔天惟是泪，素幡匝地竟何悲。
风中静立吞声哭，为惧斑斓老虎皮。

外四首：送李锐老

人寿得期颐，命终何所思。
我知钢铁汉，心碎在丹墀。
有忧自千岁，一生凭鼓吹。
黄尘问袞袞，应否耻无为。
义旗称二李，难得两头真。
今聚云天上，殷殷瞰后人。

注：李锐与李慎之并称二李，乃体制内旗帜。

泪眼望西天，人间失大贤。
哀歌此相送，承志有双肩。

杨启宇

匡庐烟雨总迷离，帝意从来不可知。
忍使九州沦饿殍，依然三面挺红旗。
廷争折槛人何在，劫尽推枰事可悲。
白首吁天谈宪政，痴心真与虎谋皮。

向喜英

讽诵启宇兄《哀李锐》亦复哀之

喋喋危言叹黍离，其心良苦复谁知？
窃钩寒士镌金印，擅柄奸人舞血旗。
谬说频喧公有恨，真情罔顾我徒悲。
麻姑反手搔难愜，冷眼颓波等蒜皮。

胡静怡

李老仙游赋水龙吟一阕

红羊呼啸而来，世间几个英雄汉？苍茫大地，乱云飞渡，惊涛拍岸。冠盖昏昏，黎黔噩噩，鼠奔狐窜。听声声万岁，直冲云表，争右袒，同心干！

雪里梅花怒绽。历冰霜，老而弥健。撕开黑幕，升腾地火，批鳞折槛。言语虽封，文章纵禁，精光愈灿！向遥天，捧出芜词一串，为先生赞。

朱刚

鹧鸪天·痛悼李老

投笔当年热血丹，从戎尔后仕途艰。铁窗铸就《龙胆紫》，石火烧成《李直言》。

明哲去，甚惊寒，遥追先马策长鞭。心红宪政须无我，眼白专裁不共天！

李老的仙逝使我们又失去一位（原本就不多的）力推宪政民主的前辈，不胜悲痛！

填词一首，悼念李老。

王晓林

2019年2月16日“葬礼”

他的遗体上
盖着镰刀、斧头交叉的
血红的大纛
门楣上没有横幅
门柱上没有挽联
连死者的名字也没有
灵堂上摆放的花圈来自
至高的主席、至高的总理、至高的部长
退休的前纪委书记
和退休的前前总理——
唯一一只令人动容并遐想的花圈
最显赫的花圈前没规矩地站一大汉
宽大的身体遮盖着最显赫的挽幛
没有生平介绍
没有讣告
没有致悼词的人
也就没有悼词
已死之人
让活人结舌
让“组织”失语
出了格的李锐
出了格的葬礼
2019年2月20日的“红色基因”传承地
乱了章法
没了规矩
显然出了格



王庆彦

蝶恋花·怀李锐先生

败绿残红回大地，春意春情都被春抛弃。花辞枝头枝辞树，终是阳间留不住。

口碑已成无字书，积恶成习箴语立极处。懿德高寿君千古，光耀东风西风路。

2019年2月

南央：

李锐先生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杰出的共产党人的脊梁。该词的实际创作日期是看到网络上确认令尊逝世的第二天。当时有一个（似乎是叫张庆国的人主持的）微信群，（记得还使用了你本人的现场照片和小视频）在令尊卧床插管，但是仍是可以正常思考与讲话时组织实施了一个征求歌颂（或者预悼）李锐先生生平之诗词联书法作品的活动。那个期间我为其提供了表达自己敬佩景仰赞评李先生的六个或者七厥辞章……

追悼缅怀李先生本来就是我的初衷和全部心愿，所以当然同意你本人将其收入你的《敬祭》合集之中。署名可以使用本名王庆彦，或者使用网名三一。

对于我来说，南央先生是英雄李锐的忠实捍卫者，不可或缺的介绍作者。你把其日记保存到美国的行为是对全人类中的一个重大数量的学者，思想者，和相关百年的普罗大众的贡献。

本人简介：

王庆彦，号三一，北京人，退休高工。主要从事中国汽车道路运输管理战略的技术经济分析专业研究。几十年来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专业论文专著之外，亦创作若干具有现代气息的宋词作品，同时在网上开设了词的写作研讨讲座。

增订版代后记

李锐绝唱

李南央

在党的钳制下讲常识

父亲李锐离世已经十多天了，官方举办的追悼会也已经如期举行。李锐是2018年3月30日住进北京医院的，我在自己为父亲发出的讣告中说，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反复书写的是同样的内容：人生在世都要受时代、知识、思想能力和个人品德的四种限制，前三种是恩格斯说的，最后一种是他加上去的。

其实，每一个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还有一种摆脱不掉的东西，那就是党的钳制。这种钳制所采用的手段的卑劣，绝对不止于造访的“卧底”客人。

父亲说过的绝大多数话，写过的绝大多数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在民主国家都是常识。有那么多人敬重李锐、爱戴李锐，是因为他在党的钳制下讲述常识。这需要勇气，更需要突破深入他近旁的钳制的智慧。

中组部按照共产党的丧事制度，以“正部级待遇”在八宝山举办了李锐的遗体告别，在他身上盖上了红色的党旗。根据我跟父亲的交流和对他的理解，这完全违背了父亲的真实意愿。

实际情况也根本不是正部级待遇。那天，参加了遗体告别的朋友告诉我，追悼会才进行了半小时，不明身份的人就拦住了队尾，掐断了进入大厅的告别队伍。而经审查获批准，可以在厅内告别李锐的亲属们被“请”进休息室，在前来告别的最高首长——中组部部长陈希到达之前，不得进入停放李锐遗体的大厅。大厅门梁上没有条幅，不允许拍照。亲属中的一位拍到了一张大厅的照片，立即被不明身份的人追逼，强迫交出手机进行了删除，不允许李锐的后人留下一张他的仪容像以为纪念。

感谢纽约时报中文网同意摘录发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守在病床

边写下的日记。相信读者会从这些白描里了解李锐最后的时光和背后的那些事儿。

（注：此文于2月27日和2月28日分两次在纽约时报中文网连载。这篇附文增补了纽时文网发表时删去的一些内容。）

2018年4月3日

下午二时左右，飞机提前落地在北京。过关、乘机场摆渡车到行李大厅找到所乘航班的转盘，我们的箱子正从吐口滚落下来。

出关口排着长蛇般的队伍，每个入境旅客的每件行李都要经过扫描机的检查。我的大行李箱底铺着满满一层的《争鸣》，那是杂志社托我转给大陆作者的，内中有刊了父亲为杂志创刊四十周年所写贺词的2017年10月号。

我提起从扫描机传送带上稳稳送出的箱子，放在行李推车上向海关出口走去。一个小伙子从屏幕后追了出来，脸上挂着友善的微笑：

“阿姨，您箱子里是不是有好多书？”

我说：“是啊。”

小伙子问：“都是什么书啊？”

我说：“杂志。”

小伙子转身跑回去了，用后背身跟我说“Bye-bye!”

走出海关，心中祈祷：但愿这是个好兆头，父亲尚无大碍。

三天前的3月31日，我和丈夫巴悌忠正在美国东海岸的女儿家，是为了小外孙女的四岁生日从西海岸飞过去的。半夜连接住在父亲楼上朋友的长途电话、朋友居住在美国的哥哥的手机短信、悌忠弟弟的来电、表弟女儿的电邮，转达了同一个信息：“3月30日你爸住院，情况不好。”

我们原计划是4月8日回国为父亲过生日。急忙唤醒已经入睡的女儿，告诉她我们必须立即改签机票，明天一早飞旧金山，然后回大陆。

4月1日一大早，女儿一家送我们到机场，飞机正点，傍晚十分到家。匆匆收拾了行李，确认机票……忙完了已是午夜。第二天飞机提前从旧金山机场起飞，北京机场海关小伙子温馨“迎接”，紧绷的神经

终于松弛了下来。

我们从首都机场打的直接到了北京医院。正在西门排队办理探视手续，父亲的车开到了门口，司机满起（也是继母的女婿）招呼我们上车，不用办了。门口的警卫看到车前风挡玻璃内的“通行证”，打开铁栅栏，满起又用他的乘电梯卡将我们送上了八楼。找到 815A，穿过会客间进入病房。继母张玉珍坐在靠着阳台玻璃隔屏一面的沙发椅上，二表哥力丰的妻子进进也在，老头子在昏睡。

向张阿姨询问情况，她说：3月27日早上八点半了，你爸还没有起床。强把他叫醒吃早饭，坐在客厅沙发里一会儿又睡了。3月30日逼着他来医院看病，就被留住院了。一直不好，总是昏睡。

说话间，我发现父亲艰难地动了一下，像是要翻身，眼睛也微微地眨了一下。我急忙俯下身去在他耳边唤了一声：“爸爸。”父亲张开眼，很茫然地看着我，又闭上，右眼角滚出一颗大大的泪珠。

他开始说胡话：“一步，一步；两步、两步；三步，我走了第四步就明朗了，但是对方不理解，我走了第四步，就明确了，但对方不能理解……”反反复复，约三十分钟，之后渐渐地苏醒了，认出我，清楚地发问：“哦，小妹呵。你回来了。这次呆多长时间呵？”

我附在他耳边说：“二十多天。”

父亲笑了：“好，好。”随即又问：“这次呆多长时间呵？”我担心他是有点糊涂了。

我说：“很长，一时不会走，你放心。”

父亲点点头。我将悌忠让到床边，老头子立即认出了：“悌忠呵！”又看到立在床尾的进进，问：“力丰也来了？”

从进进联系到力丰，看来脑子没问题，我稍稍松了口气。

父亲又开始喃喃地念叨着什么，约十五分钟后沉睡过去。

我们和进进一起离开医院。进进在瑞典的老年护理院工作，她说：“舅舅的情况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还算稳定，会慢慢好转的。”

2018年4月4日

一早，乘满起的车到了医院。非探视时间，只能利用他的“通行证”进入那座高干住院大楼。走进病房，只见父亲双眼明亮地躺在床

上，头微微地侧向门口。见我进来了，让小余（在父亲家做了十几年的保姆）把床摇起来。

我刚刚在床边的椅子上坐定，老头儿便开口了：“你跟我说说，外界这次对习近平如何看呵？全票通过不是笑话嘛。”显然指的是刚刚通过的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两届的宪法修正草案。“普金当选 76%赞成票，2/3 得票率，这还像点话嘛。”又说：“你们那个总统家伙乱来，一塌糊涂。”跟昨天真是判若两人——还是我熟悉的父亲呵！

我笑着回答他：“可是很多人喜欢川普。”

父亲“哦”了一声。

10点40分左右，组织部秘书长、老干局正副局长连同司机一行四人，带一篮水果来看望。我唤醒了父亲，秘书薛京告诉他：“部里来人看你了。”

父亲看清了来人，满脸堆笑地伸出手一一相握、致谢。秘书长、正局长坐下来，副局长，司机退到外间恭候。我和薛京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局长立即紧张地从坐椅上立起：“薛秘书，大姐，咱们说好，就在这儿照，不外传，一定不能外传！”又加上手势重复说：“一定不能外传，一定！”

我觉得有些搞笑，但也不想难为他：“你放心吧。我答应你，说话算话。”他这才又坐回去，继续“代表组织问候李老”。

组织部的人走了，父亲仍然很精神，让我坐过去聊天。说他给老家平江县写了一首关于彭德怀的诗。我说：“看到了，网上有”。就从手机上找到一位在胡佛研究所工作的朋友发给我的照片，送到他眼前：“这是网上传的你的字的照片。”老头儿一下子高兴了。我又在手机上翻出网上传的他的十九大书面发言，他兴奋了：“网这个玩意儿厉害呀，手机厉害呀！现在是网络时代，拦不住了！”

午睡过后，张阿姨的女儿小玲、女婿满起，儿子胜利来了。两点半，护士进来招呼我们去会议室开会。大家走在去会议室的路上，胜利说：“我听说插管后可以活好几年，好好的，没事儿。”我说：“那是植物人，不是真正意义的人。对我爸不是‘好好的，没事儿’。”

会议室里，组织部上午来过的那位老干局副局长、两名干部还有

秘书薛京已经到了，他们坐在会议桌靠门一侧的左边，把正中间的位置留给老太太，小玲、胜利依次挨着老太太的右边坐下，空给我哥一个位置，然后是我和满起。

一位副主任医生，一位神经科医生，一位内科医生随后进来在桌子的另一侧坐下。副主任先谈，没有客套，直奔主题：李老这次入院是因肺部感染，心脏也出现问题，经药物控制，目前情况已经稳定。但连日大便均带血，可以肯定有癌症，但是没有必要确诊，因为确诊后也无法进行任何治疗，而且这不会是李老的致命病症，最后威胁生命的会是心肺衰竭。鉴于李老的年龄和心脏、肺部的情况，随时会出现突变。今天请你们来谈的目的，是希望家属对是否做心脏体外复苏和切喉管上呼吸机抢救作出决定。因为这些属于非治疗手段，做、还是不做，医院不能决定，要由家属决定。这个会本来早该开的，因为说要等美国的女儿回来，拖到今天。现在大家都在，明天开始清明放假，今天需要有个决定。

老头子有癌症，这让张阿姨很意外：“怎么好好的，得了癌症呢？怎么会呢……”没有人打断。

但是我看医生们有些不耐烦了，只好先开口：“我表个态吧。李锐是有尊严的人，有尊严地活；走，也要有尊严地走。一切不属于治疗的抢救手段都不上。”

正在这时，我哥进来了。我简短地向他说了医院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和我刚表示了的态度，他立即说：“我看得多了。不抢救。”

张阿姨有些不高兴：“你看什么多了？”

哥哥怔楞了一下，说：“我妈妈最后住院时，我看到其他病房的很多老人插着管，就那么躺着。应该让爸爸有尊严地走。”

我转向对面的医生们：“我们这一边孩子的态度很明确了，但是老太太的意见是第一位的，要以她的为准。”

张阿姨说：“得给我几天的时间想想，我现在脑子乱了、糊涂了，做不了决定。”

副主任温和、但是非常坚定地说：“对不起，这个决定必须今天做。明天就开始清明假期，病房只有值班医生。李老万一出现情况，

医生需要根据家属的意见进行处理。”又说：“我们还有别的事情，不能等了，我们先走，你们家属自己商量吧。”

老干局副局长和两个干部也站起身来，对秘书薛京说：“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我有点着急了：“这个意见书上得有单位的签字呵，你们走了，今天不就签不成了吗？医院等着决定呢。”

副局长说：“家属不做决定，我们怎么签呢？”

我说：“你们就签：同意家属意见。”

副局长拿起笔立即签了。

张阿姨还在自语着：“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得了癌症。我受不了……”

进来了一位医生，冲着众人说：“对不起，下面我们还要用这个会议室开另一个会。要不，您们到病房继续商量？”

小玲扶起老太太，大家一起回到病房。父亲依旧睡着，张阿姨颓丧地跌坐在沙发内喋喋自语：“癌症，怎么会是癌症……”。渐渐逼近



看终刊《争鸣》上自己写的贺词

下班时间，我无可奈何地对胜利说：

“跟你妈妈说说清楚吧，五点之前怎么也得有个决定。”老太太终于在两份表上签了字：不做体外心脏复苏，不做切管上呼吸机。我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父亲可以不受罪了。

2018年4月5日

下午一点半到医院，父亲一直在昏睡。我拧了一个毛巾替他擦脸，老头子有了感觉，睁开眼冲我笑了一下，又闭上。过了很久，老头子醒了，朝我比划着：“拿来、拿来。”见我不明白他要什么，着急了，提高声音焦躁地说：“你那个东西，你带来的那个东西……”我试探着将昨天上午放在床头柜上的终刊《争鸣》拿给他，翻到有他的贺词的那一页，老头子安静了下来。

父亲是这样写的：

今年10月是香港《争鸣》杂志创刊40周年，这是一件非常不易

之事。虽然邓小平当年向香港人民做过“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

生活在大陆保持了独立思想的人，去年丧失了最后一块可以发出声音的阵地——《炎黄春秋》。我今年已经 101 岁了，该说的话早就说够了，该写的意见也早就写了，不过头脑还是难平静，因为宪政何时大开张呢？（这是我晚年写的一本书的书名）我还在思考，还要不断地从比我年轻的人的文章中汲取营养，活到老、学到老。因此衷心地祝愿《争鸣》越办越好，继续为用自己头脑思考的人们提供一块交流和争鸣的阵地。

父亲题写贺词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一期竟成了《争鸣》的谢幕篇。创刊于 1977 年 11 月的香港杂志《争鸣》在 2017 年 10 月停刊。老头子就那么攥着、看着自己的贺词，久久不放，也不知看明白没有。

半天，父亲举起右手冲我比划，嘴里“呜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看他的手势，我猜大概是要喷雾剂，便递到他的手中换下了《争鸣》。他将小小的喷雾器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就是握不正。我把住他的手，将喷口对好，帮着按了几下，老头儿点点头，闭上嘴深吸气。须臾，又索要，我又帮他喷了一次。还要，我没有再给。父亲用手在空中划拉、划拉……最后放弃了，渐渐入睡。

张阿姨陪住的床是放在用落地玻璃与病房隔开的大阳台内的，这时午睡起来，见我坐在老头子的床边，就在另一边坐下，问我：“你爸跟你说过回平江的事吗？”

我明白，她这是在跟我谈父亲后事的安排了。便说：“说过不开追悼会、不盖党旗、不进八宝山，回平江”

张阿姨说：“你爸跟我说过‘你不回平江，我也不回，我们一起回。’可是回平江是个大事儿，自己办不了，要组织出面。那个地方也不好，路不好走，人也到不了。”

我没有再说什么。

2018 年 4 月 6 日

下午两点钟左右到医院。病房里的电视开着，音量很大。我惊喜

地发现父亲睁眼躺在床上，精神甚好。听到声响，偏过头来。见是我，就说：“胡德华一会儿来，我要坐起来。”我把床摇起来，老头儿闭目养神。

德华和夫人三点过后到了，老头子高兴地跟他们握手，底气十足地说：“我难受的事儿，国家这么多年搞成这个样子，三件事要弄清楚（老头子晚年见人就说：要搞清楚历史是怎么回事、党是个什么玩意儿、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中国就是没有民主、科学，后来又出了个主义，一个共产党，怎么办呵？五四本来出现转机，又出了马克思、共产党、毛泽东，只有中国才能产生。”

德华应和着：“只能专制才能出共产党。”

老头子说：“中国改朝换代靠农民战争，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他（毛泽东）第一篇原稿我看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外国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大官统统是反革命。出现了习近平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要把他搞清楚。就是没文化？毛就是没文化，数学打零分。习文化很低。我很伤心，他爸爸多好，痛心得很，搞出这么个儿子。”

德华说：“习仲勋除了在（斗争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说‘你们这是逼宫’，他还说过：‘你们批判胡耀邦的那些事情，也有我一份’。”

老头子叹气：“仲勋和耀邦是我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我简直想不通，后来才知道没文化。你们有责任搞清楚。你爸爸多好，我每年去深圳都去看他。”

父亲去深圳看的是习仲勋，把他说成德华的爸爸，显然是累了，有些理不清了。就跟德华说：“不聊了吧，让老头子休息。”

父亲指着我问德华：“我这个女儿怎么样？”

德华说：“我们早就认识。”

父亲说：“她硬是把她那个妈妈写出来了。”父亲非常看重我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篇文章，他一直跟我说：应该把你那个妈妈写出来，太典型了。但是他没想到我真地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反对的人认为违反了中国的传统道德。

德华说：“李叔叔，您休息吧，我们再来看您。”

老头子点点头，随即疲倦地闭上眼睛。

2018年4月7日

下午，约一点十分到医院。小玲正在外间穿衣服准备回家，跟我说：“老头子一上午不肯睡觉，说昨天胡德华和李南央来了，今天李南央还要来，我要等她。”

走进病房，老头子醒着，见我进来，向阳台方向看去，老太太在午睡，招招手，示意我坐近些，压低声音问：“上次美国大使要来看我，她说是你搞的。是吗？”

2011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离任前想以私人身份拜访李锐，大使馆的朋友请我帮助询问父亲是否愿意见。父亲非常高兴，同意了。还说见了洪博培他要请他向美国总统转达意见：美国过去对中国一直非常友好，用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大学，还帮助中国创办了协和医学院同湘雅医学院，抗战中又帮助中国。而现在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战争不解决问题，用自己优秀的文化影响对方才是最好的方式。张阿姨当着我的面也表示了同意。但是我走后，让秘书薛京向组织部汇报此事。部里回话，说洪博培要见李锐需通过外交部申请。我对父亲说：洪博培是卸任大使，作为一名普通美国人拜访你李锐——一个中国公民，要求他向中国政府请求批准，他不会做这种自取其辱的事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自觉地让孙子辈管着，自取其辱呢？（“现在是孙子管爷爷”是父亲常挂在嘴边对“当今”表示不满的话。）

我乐了：“我哪有那个本事，能认识大使？”

老头子冲阳台抬下巴：“她认为是你搞的名堂，你跟她解释一下。”

我说：“没用，她不会相信我的，不解释了。”

父亲没再说什么，开始聊习近平没文化，又回忆2006年在浙江请他吃饭的事儿，我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我那天跟习近平说，你现在可以打擦边球。习近平说，你可以，我哪里敢呵。”

又说：“玉珍说习近平那天没讲那样的话。不对嘛，习讲了、绝对讲了，我也绝对地讲了那个话，我已经写在书里了（按：指《李锐口

述往事》)。”又聊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还说：你在美国有个任务，就是要把中国的问题搞清楚。

我见他脑子很清楚，精神也不错，张阿姨又不在近旁，就贴在他的耳边一字一顿地问：“大家都很关心：你要不要开追悼会？要不要盖党旗？要不要进八宝山？”

父亲问：“哦，就是说我去世了……”

我说：“对。”

老头子望着天花板，半天、半天，足足有半分多钟才开口，倒着从最后一个问题回答我：“问题是平江人会怎么样。玉珍很可能会愿意，我们两个人火葬后回平江，放在父母亲那里（墓地）一起。”

我问：“你自己也愿意吗？”

父亲说：“那样对我父亲也好，我父亲是好人，另外玉珍愿意。留在北京有什么意思呵！放在哪里？它给你放在哪里？你说吧，有人愿意吗？那就留在我现在住的房子里，那倒是可以。再不呢，平江了，那是我愿意的，我自己也愿意。平江是个旅游区，特别是彭德怀也在那里。”

对我“要不要进八宝山”的问题，父亲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是明确说出了“（回）平江那是我愿意的”，算是有了答案，便转到第二个问题，问：“盖不盖党旗啊？”

父亲还是绕着说：“共产党没有科学知识啊，也（体现）在这里：这个红颜色是破坏眼睛的，你知道吧？绿颜色是保护眼睛的。共产党一革命就是红旗，到现在还是喜欢红颜色。那个电视台搞活动，都是红颜色多，唉！所以这个人类的发展啊，这个二十世纪呀，是一个特殊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搞了，垮了；中国，搞了，还没有垮，但是它 xxx（作者按：隐去国骂），死那么多人，中国共产党的可怕是饿死人呵！杨继绳的父亲是饿死的。杨继绳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两厚本书你看了没有？毛泽东这个人呐，我认为是天下最坏的人之一，能够那样死人，于心何忍？！太可怕了。”

老头子顺着毛泽东这个题目一直说下去了：“他自己的生活会那么好，我不是在他家里吃过一餐饭，就是有熊掌嘛。他在延安的生活也

是最好的，在延安吃什么呢？两样东西：小鸡、泥鳅。长征，就是白天抬着他睡觉，晚上起来做事情。唉呀！这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周恩来那是对他是最讨厌的了……”

在外面阳台上午睡的张阿姨这时起了身，老头子敏感地察觉到：“噢，她起来了。”立即住了嘴。那天以后，我再没有找到机会问父亲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开追悼会”？

张阿姨走进病房，父亲说：“美国大使来看我，不是小妹搞的。”老太太装作没有听见。

我说：“爸爸，聊了半天，累了，你睡一会儿吧。”

怎么办啊？这个党！

日前父亲李锐“正部级待遇”的葬礼，没有悼词、没有生平介绍、没有挽联、没有哀乐……就连前来告别的人们手捧的鲜花都被拦在了大厅之外。人们愤怒地说，那是一个“无声无字”的追悼会。

我是多么地为父亲骄傲。中共在李锐生前惧怕他的声音，在他死后惧怕他的遗容。一个人能够把那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党吓到如此的地步，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开怀大笑。

父亲在他 101 岁生日的那天，在医院的病床上发出了自己的“绝唱”。他虽然最终没能彻底摆脱共产党对他的钳制，但是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可以笑别人生。

2018 年 4 月 8 日

下午一点到医院。父亲的精神不如昨日，似睡非睡。看到我来，很高兴，说今天是 9 号，可以出院了。我说：“今天是 8 号”，他说：“不是，是 9 号。”我给他看手机上显示的日期。老头子叹了口气：“哦，才 8 号，还是出不了院。”又问：“我这次到底因为什么住在这里？”

我说：“你得了感冒，引起肺部感染。慢慢恢复，稳定后，再出院。别着急。”

父亲又说：“上午德华来过。”

我说：“德华是前天下午来的。”

父亲想了想：“哦，是前天下午。”

我说：“我明天去紫阳家鞠躬，你有什么话？我带过去。”

父亲立即说：“耀邦、紫阳救了这个党，救了这个国家。紫阳在经济上比耀邦强。”

我说：“紫阳和夫人的骨灰还放在家里，安葬不了。”

父亲说：“这是岂有此理的事情。”接着跟我谈起他第一次是怎样见到紫阳的老伴儿的，时空有些混乱；又提起阎淮的新书（《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还是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我问张阿姨：“薛京还没来？”

她说：“来，可能一会儿来。他每天都要向组织部汇报老头儿的情况。”

这时父亲在磨子潭的患难朋友、画家王申生到了北京站，他是特地从上海赶过来看老头子的，手机短信问我如何进住院大楼。大约三点钟，申生进到病房，老头子一眼认出来，说：“王沪宁，我们是患难之交！”

我用写字板上“王申生”递到父亲的眼前。他笑了：“申生、申生。王沪宁是那个家伙。”“申生你多少年没来了啊。”款款地回忆起自己在磨子潭流放地跟申生相识、相交的过程，清晰、准确。

我见老头子不停地说，很激动，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打住的意思。怕他太累，便对申生说：“就到这儿吧。”申生说：“好。”

父亲伸出手来跟他握别，对我说：“你要请他吃饭。”

我说：“当然了，你放心。”

我送申生出来，在走廊上说好晚上在国宏宾馆再见，请他吃饭。

2018年4月9日

下午约两点半在22号楼院门外上了满起的车，我问他：“老太太今天上午回家洗澡了吗？”因为张阿姨昨天说自从老头儿住院她就一直陪着，没有泡澡，身上不舒服。满起告诉我老太太昨天半夜吐的东西带血，今天上午去复兴医院看病，医生让住院检查了。现在北京医院只有小余陪着。

走进病房，父亲睡着，小余告诉了我老太太的病情。父亲一会儿醒了，看到我，说：“你跟我谈谈你跟他们开会的情况。”

我笑了，知道他是在问我这几天跟朋友们聚会大家都聊了些什么，想听听外边的消息。我告诉他上午去了赵紫阳家，见到紫阳的儿女……刚说了个开头，老头子就睡着了。

2018年4月10日

8点40分到医院，老头略睁眼，知道我来了，随即睡去。九点多翻身，又睡。手痒，用冷水敷手，方止住抓痒。

董医生来查房，我问情况，她告诉我利尿的药明天结束，排尿增加关闭尿管，每两小时放一次，恢复膀胱弹性。我问她老头子为什么总睡，她说再观察两天看看，目前各项指标正常。

小余午睡，我陪父亲。1点11分闹了一下：“小妹！解绳子！”（因为怕父亲拔管子，医生让把他的手捆在床栏杆上）我没有答话，又叫：“叫服务员来！”眼色很凶。我还是沉默着。须臾，又睡着了。3点40分左右，薛京领父亲的日本朋友及川淳子和晏乐斌进来，晏乐斌还带了文章让老头子看。

我嗔怪薛京：“你怎么净当滥好人，不是不让人来看嘛？”

及川一直鞠躬、道歉。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大概感觉到动静，老头子睁了睁眼，似乎认出及川，但也只点点头，没有说话。

我说：“你们还是走吧。”

父亲向及川和晏乐斌挥挥手，立即了睡过去

2018年4月11日

父亲一直昏睡，直到下午1点48分醒来，看见我在床边，问：“你哪天回美国啊？”

我说：“20号。”

又问：“你住在哪儿啊？在哪儿吃饭啊？”

我告诉他还是住在国宏宾馆，宾馆里有餐厅，下楼就是，不用出门，很方便的。

老头儿释然地点点头。又问：“大妹他们（按：我大姑的孩子）来

了住哪儿啊？什么时候去家里？”

我说：“他们不去家里，晚上我请他们在国宏吃饭。”

老头子转过头看着满起：“我明天下午出院。”

小余告诉我：“老头子是有东西要给你。”

果然，父亲说：“我要回家，我有东西，重要的东西要拿给你。”

我说：“你告诉满起在哪儿，让他取了交给我就成了。”

老头子摇头：“别人不知道，我自己拿给你。”

（父亲到底想给我什么，已经无法知晓。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日记原件和其他的文字原件都已经在这些年里陆陆续续地交给了我，由我按照他的意愿捐献给美国胡佛档案馆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得不到的就得不到了。也许哪一天会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字摊上。）

一会儿进来一群医生查房，老头子高声说：“我女儿从美国回来，给我订好了三桌饭，我要出院！出去过生日！”

我确实是早就在国宏宾馆预订了三桌生日宴，准备在4月13日那天跟去年一样，请他的尚健在的不多的几位老哥们和夫人，以及几位老秘书、组织部的老部下和从各地特意进京的晚辈们为他祝寿。父亲看来是真盼着，要实实在在地过101岁的生日。

医生们走了，父亲跟我闲聊，说：“我这个人运气很好，一个老伴照顾生活，一个女儿让我历史留名。”又说：“你把你在美国的职业写下来，明天组织部会来人看我，我要讲给他们听。”“你明天早晨一定来，部里要来人看我。”

我答应他说：“哎，来，一定来。”

父亲盯着我看，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在美国，在女人中算一般、还是漂亮的？”

真是怪事，怎么会想出这么个问题？我逗他：“算漂亮的。”

父亲像小孩子一样地笑了，很灿烂，冲我撇撇嘴，似乎是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018年4月12日

早晨八点一刻去医院。

九点，接到从长沙来的大表姐的短信，他们已经入住旅店，她和

毛弟下午到医院。在电话中说好：晚上我在国宏宾馆请他们吃饭，这是父亲一再嘱咐的。

九点半，秘书薛京和组织部老干局的几位干部先到，将带来的大花篮和礼品放在病房门口。留下一人守在那里，其余的人走了，我猜是去恭候常务副部长姜信治大驾。

这一时刻，继母张玉珍自4月4日老干局的人来探望后就一直在念叨、等待：“你爸这样的级别，光是老干局的人来探望是不对的。应该是部长来，至少是常务副部长来。”“他们来了，我要跟医院提条件，要给我们用最好的药。上次你爸屁股上长了一个疖子，怎么都不好，后来用了好药，两千多块钱一贴呢。几天就好了。”

可是，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终于要来了，她却住院，见不到了。

不一会儿，守在外面的那个人走到会客室和病房的隔门处小声对薛京说：“来了，来了！”薛京急忙起身跑出去。却久久不见动静。一会儿，听得门外又是一阵：“来了，来了。”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走到阳台上，向医院西门那边看过去。只见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和一群穿着黑夹克的人在那里扎着堆儿，薛京也在其中，都翘首往门外的大街上张望着。我进到屋里告诉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的父亲：“还没来。”父亲在护士查看输液时就醒了，这时让我把床摇起来，闭目等待。

终于，走廊那边响起了蹙蹙的脚步声，然后是更大的一片嘈杂，一群白衣、黑衣人簇拥着一位身材中等、略显消瘦，也是身穿黑色夹克的人出现在病房入口处，我知道这就是现任组织部姜常务副部长了，本能地在心里将他跟过去这一位置上的李锐作了比较，不免当了一次九斤老太太。

老干局副局长和看起来是司机和普通干部的一些人，谦卑地止步于外间会客室，几位医生则留在走廊里，只有薛京、两三位白衣人和老干局局长陪着姜副部长进到病房。薛京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那是常务副部长姜信治，旁边的是北京医院院长。”

闭目养神中的父亲这时睁开了眼睛，目光扫过这一群人，透出我熟悉的、李锐特有的鹰一般的锐利。姜部长走过去跟老头子握手，老

老头子满脸是笑，示意他坐下。老干局长从我和薛京身边走过，小声叮嘱：“不要照相，不要录像！”然后坐到姜部长旁边，上身前倾着，屁股只一半贴在椅子上。

老头子开口了：“谢谢你们来看我。我明天就102岁了。”随即话锋一转，开始朗声地“大放厥词”。从曾国藩教儿谈起，重复他对家中来客讲过上百遍的故事：抗战时一位美国飞行员的飞机被打下来，迫降在曾国藩家不远处，曾家七个人在，个个都会讲英语。我们搞了些什么？一建国，就学苏联，取消英语。

我不意外——父亲心里明镜似的啊，张玉珍政委⁸不在，他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姜部长的表情却是意外的，他大概对李锐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我真是佩服他的定力，能够将开始的笑容一直凝固在脸上。

老干局局长却有些坐不住了，几次打断老头子，试图转变话题：“姜部长来看您，是给您拜寿的。”

老头子向他一摆手，那意思是：“你别插嘴！”依旧是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现在那个人的像还挂在天安门上面，对习近平也搞个人崇拜，像什么话！”

这话一出，我都替姜部长捏把汗了：再听下去若有人汇报给习老大，可不大好解释清楚了。

姜部长确实坐不住了，站起身，伸出手给老头子：“您说了半天，累了。您休息、休息。我们告辞了。”老头子就势抓住他的手：“你别走，我还没有说完。”

老干局局长连忙上前解围，用自己的手强换下姜部长的手握住老

⁸ 2006年父亲在一家饭店接受德国之声和香港、日本等媒体的联合采访，其时谈到“胡锦涛是戴红领巾中长大的”，因而招致组织部办公厅上门谈话。父亲与来人发生了激烈争执，老伴儿张玉珍出面圆场，向来人保证：今后看住家中的电话，看住李锐，再不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沈跃跃任组织部副部长在李锐生日来家探望时，特意送了张玉珍一条高级丝巾，表扬她政委当得好。2005年父亲米寿时，曾作“赠老伴玉珍”一诗，原句：“二十六春如一天，医生护士保安员”；后改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头子：“部长忙，还有事，还有会。”然后松开，几乎是逃也一般，踩着姜部长的脚后跟离开病房。院长和医生也跟在后面向外走去。

父亲从病床上抬起上身，冲着这些人的背影大声嚷着：“你们不爱听我也要说，你们把我看成坏人好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说……”

我是在场的唯一一家属，想着应该代表父亲送送客，便也到了走廊，以为看到的会是一群离去的身影。没想到院长和姜部长还有主持父亲治疗的几位医生站定在那里，正在等我。不禁暗自称奇。

见我出来，好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姜部长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看看，你们家属有什么要求，对医院有什么意见？”

我对张阿姨真是有些佩服了，还真有这么个仪程：部长当着院长的面问家属有什么要求。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没要求，什么要求也没有。”“医生好、护士好，都好、非常好。没有任何意见。跟老百姓的条件没法比，我要是再提什么要求就太不像话了！”

看来，姜部长对我的这个回答也是没有准备，愣了一下，说：“噢，那好，那好。”

院长脸上带着诧异，但是释然地重复着：“没要求，跟老百姓比……”

中午我和小余、薛京在外屋吃饭，饭后进到内间，发现将父亲两只手绑在床栏杆上的绳子都被解开了，老头子双眼明亮地看着天花板。我们仨异口同声地发问：“你怎么搞开的？”老头儿眼中闪出童趣的星星：“这还不容易，我做给你们看。”

父亲的心情真好啊！

下午大妹、毛弟和力康、力丰来了，宋晓梦随后也来了，说是从火车站直接来的。我说：你身上有多少病菌，呆会儿可千万别跟老头子靠得太近。我们在外屋悄悄说话。老头子醒了，众人进到病房，父亲兴奋地同大家聊天，跟前几天判若两人。

2018年4月13日（李锐101岁生日）

一早，满起送我和悌忠去医院。老头子在看电视，非常精神。见我们进来就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让出院，你订的饭怎么办啊？”

我说：“今天晚上我请大妹他们吃饭，然后请朋友们吃饭。你和

你老哥们的那桌，给你留着，等你出院了再吃。”

父亲高兴了：“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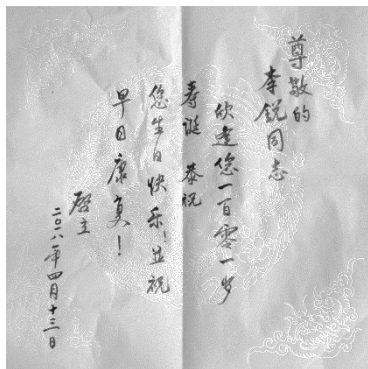
又问悌忠：“你爸爸、妈妈都好吧。多大岁数了？”

悌忠回答了，又说：“我爸爸、妈妈问您好，给您拜寿。”

悌忠坐到十点钟走了，他要提前回美国。北京的污染令他耳鼻过敏、中耳发炎，在北大医院看门诊，医生错开了抗生素，浑身起满了疹子，整整 24 小时没有排尿了。在美国当医生的女儿怕他肾出毛病，让他赶紧回旧金山看“真医生”。临出门，他交给小余装着钱的一个信封，小余不要，悌忠硬塞给她。父亲看着悌忠走出去的背影：“好女婿，好女婿。”一会儿又睡了。

十一点多，原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老秘书和现任秘书来了，送来胡启立在大红纸上亲笔写的生日贺词。老头子非常高兴，让我把贺词放在阳台玻璃隔屏下的台子上他可以到的位置。

四点左右李慎之的女儿尔柔、黄万里的女儿肖路和美国之音记者叶兵及一位青年摄影师带着花篮和一幅镶在长镜框里的诗走进病房。我不认识叶兵，但是因为看节目，对他的脸是熟悉的。肖路大约一个小时前跟我联络过，说是他们的庆生会刚刚散了，带着花篮正在来医



胡启立让秘书带给李锐的生日贺词

院给老头子拜寿的路上。我说：老头子没吃上寿宴有点失落，见到你们会高兴的，来吧。可是参加他们聚会的美国之音记者也跟着一起来了却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还进来了，真不知如何办的探视手续。

我让肖路和尔柔把花篮放在病房门口，诗的镜框靠在对着老头子床的位置上，让他能看见。

看着这些不认识或者一时认不出的来人，老头子的表情像是在问：“你们都是谁啊？”

我向他解释：“胡德华、陆德、阎淮、牟广丰、尔柔和肖路一些人刚给你过完庆生会，现在带着花儿来看你了。”

父亲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双手作揖：“谢谢！谢谢！”

叶兵走到床边自我介绍：“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我观察着老头子的表情，如果他不高兴，我就客气地请叶兵离开。

老头子的眼睛一下亮了：“噢，美国记者！”我知道父亲进入了跟昨天上午相同的境况，清醒而亢奋——张玉珍政委不在，要“放肆”一搏了。

我在心里大呼：“苍天有眼啊！给了李锐绝唱的机会！！”

父亲开口了：“我已经进 102 岁了。101 岁满了嘛，吃 102 岁的饭了。”头绪清晰。

叶兵说：“您对美国之音提一个希望吧。”

老头子想了一下，脸上露出顽皮的笑意：“美国之音播过我一些随便讲的厉害文字（话），有一次是习（近平）上台不久，我与一个老朋友的女儿一起闲聊，她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她说现在网上有这样的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听说传到美国去了，美国把它公开了。”

（笑）

“你知道吧？我有一本书，叫做《李锐口述往事》，最后一章就是写我接触过的高层人物。从毛泽东开始，最后一直到习近平……我那个时候也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你们知道吧，他小学程度……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看不起他，因为他是仲勋的儿子。仲勋你们知道咯，那是了不起的，我和仲勋又是好朋友……现在（摇头），他很难讲，现在到底会怎么样。”

叶兵问：“您对他有没有什么忠告？”

父亲摇摇头、又摇摇头：“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嘞……这个人现在他能接受？不可能，不可能。”

“中国这个国家啊，没有办法。它是一个什么文化传统呢……中国这个国家本来五四已经解决了缺乏什么？就是人权同科学。五四运动已经解决了，结果又来了一个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所以到中国来就很容易被接受。”

“毛泽东这个人讨厌知识分子，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原文我看过，他怎么讲呢？……第一留学生，第二大学教授，第三大官，统统是反革命；第二、中学教员、中等官僚，半反革命；小学教员……”

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医生走到床边，俯下身：“李老，咱们不说了，休息了。”

父亲还想继续：“胡适之是第一反革命，那个时候……”

医生的态度变得十分坚决：“咱们休息、休息吧。该吃饭了（鼻饲）了。”

父亲无可奈何地停住了。向众人抱歉地摆摆手，告别。

医生说：“这里人太多了，李老今天太累了，你们最好都走吧。”

我跟众人一起离开了医院。

2018年4月14日

一早到医院，父亲一直昏睡。小余说昨天大家走了以后，老头子开始犯糊涂，折腾了很久才睡着。

下午一点一刻老头儿醒来，将我唤到身边，说：“你把你这次回来每天来的人，来的人都说了些什么记下来。还有你在外边跟人开会（老头子把聚会说成了开会），大家说的话都记下来。”

我说：“嗯，明白你的意思，我会的。”

父亲又说：“没想到胡启立也对我这样关心。我这个人还是喜欢被人吹捧的。”随即闭上眼睡过去了。

2018年4月15日离京去长沙公干，4月18日凌晨两点半回到国宏宾馆。

2018年4月18日

九点四十五分到北京医院西门，盛禹九和儿子捧了一大束鲜花已等在那里。满起让他们上了车，跟我们一起进了住院大楼。

护士正在里间给老头子换药，我们在外间会客室等候。盛禹九拿出一本《李锐期颐集》，说杜光九十岁生日，想请老头子在扉页题写几个字，将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杜光。

我说：“我爸不可能题词了，写字也困难。要不您自己拟上几句，

在扉页上写好，我唸给老头子听。他若听明白了，同意，让他在下面写个落款。您看这样行不？”

盛禹九说：“好，就这么着吧。”在扉页上写下了：“贺杜光同志寿诞。欣逢鲐背，尚望期颐”。

护士出来告诉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们走进内间病房，老头子起初认不出盛禹九，过了一会儿想起来：“噢，盛禹九。”开始跟他叙旧，条理清楚，叙述顺畅。

盛禹九拿出了那本《李锐期颐集》。我在父亲耳边一字一顿地解释，又在写字板上划，费了好大的劲儿，老头子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好、好，我签字。”

我把笔放进父亲的手里，替他拿好书，老头子握笔的手一直在抖，笔尖终于落在纸上写了“李锐”二字，十分工整，然后写落款日期，中文同阿拉伯数字混杂一起。我伤感地想：这大概是他为人签的最后一本书了。

盛禹九父子走后，小余告诉我，我去长沙以后，她就自做主张拆开捆老头子手的绳子，老头子的情绪好多了。

我告诉父亲：他的 2017 年、2018 年日记本我让满起拿给我了。老头子立刻急了：“你不能拿走，我还要写日记呢！”

我情知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安慰他说：“我拿回去扫描了再给你带回来，你病好了再继续写。”

他这才平静下来：“好，好。”

又说：“我还有好多东西要给你，让满起拿给你。”“哦，他不知道放在哪儿！”又开始焦躁起来。

我赶紧说：“没关系，拿不到就拿不到了，你别惦记着。你的日记本都在我这里了，已经很好了。其他的你就不要想了。”

2018 年 4 月 19 日

早八点四十去医院。满起在车里递给我两夹子资料，说是老头子要他复印给我的。我打开看了，是一些网上的文章，收下了。我知道是他的那些能够翻墙的朋友从网上给他弄到的，但是他不至于以为我在美国看不到吧。

进病房，父亲在睡觉。大约中午十分完全清醒了，问我：“满起拿资料给你了吗？”

我说：“满起复印了，给我了，你放心。”我有意地强调了“复印”二字。

父亲说：“我要回家，我还有好多资料给你。”

我还是不知道父亲到底想给我些什么，但是不是满起拿给我的那些网上资料的复印件可以肯定了。但我怕他着急、伤心，就安慰他说：“没关系，我还会回来的，下次我回来，你出院了，再给我。”

老头子问：“你什么时候还回来啊？”

我说：“就回来，就回来。”

中午我让小余午睡，我守床，老头子一直痰咳不断。

三点钟董医生来查床，老头子醒了，用手指着我：“我的女儿，六十八岁了，在斯坦佛大学。”

董医生说：“知道、知道。”老头子咧开嘴笑了，像个小孩儿。

快五点时，离开病房，站在病房门口默默地看着躺在床上昏睡的父亲：爸爸，请原谅我不能守在您的床边。我自己去年七月查出患有血癌，每月需验血调整化疗药物计量。我会挺住，把您的历史资料整理、注释完，您也要挺住，我们下次再见。

在地铁上，我用手机短信向朋友们作了这次回国的最后一次有关父亲病情的通报：

南央4月19日4:00pm报：我明天将返回美国，这是在北京最后一次通报大家老头子病况：体温和血压正常，心脏监测已经取消。鼻饲、导尿、静脉注射埋管仍保留，需24小时输氧。昨天和今天都作了短时间脱氧试验，血含氧量很快降到90。昨天和今天两次试图让老头子下床在椅子上坐一会儿，他自觉无力，不愿意尝试。

从现在情况看，难以出院，医院监护，如不出意外可保证老头子稳定相当一段时间。但每日睡眠时间明显增加，清醒对谈时间也在逐渐缩短。昨夜十一点一位朋友给我手机电话，一定要到医院探望，我坚持不可，仍要来。我没有应允。希望大家替老人着想，不要到医院来了。

如有意外情况医生会及时通知我，我会从美国告知各位。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衷心感谢这 20 天大家的理解和对老头子的挂念。

2018 年 5 月-10 月

5 月 21 日我群发出“约字”短函，6 月 10 日截稿，共收到 101 人，12.5 万字的“送字”。6 月 11 日制版，12 日成书《敬寄李锐》，立即开车送到 6 月 13 日回大陆的一位朋友家。6 月 14 日朋友发来电邮：顺利入境，书已由所托之人当晚取走。6 月 19 日，得到所托朋友的致歉电邮：书没有送到李锐手中。

7 月 21 日上午，一位来美旅游回国的朋友成功地将第二本自印《敬寄李锐》亲自送到他手中。小余告诉我，老头子拿着书说：“了不起！真厉害！”

能让父亲在生前看到有这么多的人认同他的理念，赞赏他、敬重他，这应该是所有送字人对他最真诚的探望，带给他最深切的慰藉了。我从心底感谢所有送字的作者，让这本书代我陪伴在父亲的床边。

9 月 24 日中秋节，朋友的两个妹妹带着 8 月在香港正式出版的《敬寄李锐》样书到医院探望父亲，小妹妹随后发来电邮：“老头子看起来身体状况还不错，每天上呼吸机也就最多两次，早和晚，平时就是鼻子吸氧，只是脑子反应有点慢，可能跟听力相关。书拿到后不撒手，一页页地翻看。”而她的姐姐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却是：“老头子已经很糊涂了，听不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反复地说：‘怎么办啊？这个党！’”

9 月 17 日，小余生病住进北京医院普通病房，9 月 26 日出院，27 日返回家乡平江休养。此期间，请了一位护工护理父亲。

2018 年 10 月 26 日

10 月 24 日我们离旧金山，25 日到京。10 月 26 日一早去医院，被拦在西门，不让探视。小余下来接我们也无济于事。从探视室内间出来一人，对外间拒绝给我们办探视手续的女士说：“没来得及告诉你，保卫处杨伟（音）有交代，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女儿可以允许探视。”但

是外间的女士坚持：“让进也得下午三点后探视时间进，815A家属有嘱咐。”我说：“我也是家属，不是外人。你将心比心，你若从国外回来探视父亲，怎么能够只允许你探视时间看望，而不能像护工一样全天呆在病房照顾？”悌忠上前帮着问：“哪位家属？有什么交代，怎么说的？”那位女士有些恼怒了：“我不说了，我已经说多了。”

无可奈何，悌忠只好离去。我自己绕到医院的门诊区，曲里拐弯，设法进了高干住院楼。我在外间换衣服，听到小余在里间病房对老头子说：“你看看，谁来了？”

进到病房，看到父亲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冲我艰难地笑了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顺畅而清晰。

我说：“昨天下午……”他的眼睛已经合上了。

大夫来查房，告诉我发现有尿道感染，今天发烧到 38.2℃，已经上了冰毯。

表姐大妹从长沙乘火车八点到北京，中午时分满起带着她和二妹进来。我试着在父亲耳边唤了几声，他睁开眼睛，茫然地看了看，又闭上了。午饭时间，小余去打饭，父亲似乎有了意识，眼睛微微睁开，我们姊妹立在床边，摘下口罩，我依次指着：“大妹、二妹”，又指指自己：“小妹”，老头儿喉头滚出：“三……”，似乎明白了，但是什么话也说不出。

小余告诉我，她 10 月 19 日从平江回到北京，下火车后直接来了医院换下护工。老头子看到她，立即认出来了，双手竖起大拇指给张阿姨看，表示高兴，但是说不出话。小余说，老头子情况与她住院时已经大不相同，下了一个大坎儿。护工说一直发烧，不能下床活动，她到的那天刚停抗生素。10 月 22 日又开始发烧，现在又恢复输液了。

2018 年 10 月 27 日

一早，我和悌忠坐满起车到医院。老头子看到我们，似乎认出，笑了。

十点左右，小余见老头子醒了，问他看不看报。老头子点点头。我们将床摇起，把吃饭的小桌推到他面前，拿给他看《敬寄李锐》。我一页页翻过去，唸着人名，指着照片，告诉他是谁写给他的什么话。

他的手剧烈地抖动着，但是将书攥得死死的，眼睛盯着书页，听懂没听懂，猜不出来。持续了五分钟，坐不住了，我们将床放下，就一直睡过去了。

2018年10月28日

早八点，我自己绕道医院门诊部进到高干病房楼。

老头子依然发烧，安静地躺着，没有睁眼。

2018年10月29日

早九点，坐满起车到医院。小余说老头儿昨晚发烧到 39°C。但人很安静，没有烦躁的表现。我走到床边轻轻呼唤：“爸爸。”唤了几次，有了反应，轻轻地哭泣，但是没有睁眼。出现大量血尿。紧急唤来护士查看，说可能是冲洗导尿管时碰到了膀胱壁，过一会儿应该能够止住。

董医生来，解释十月份以后为什么不再给我电邮告知病情，说是高干楼进行了保密教育，首长的病情属于机密信息，昨天刚刚考完两张保密试卷。我问：“那以后如果父亲病危，医院也不通知我吗？”董医生说：“不通知您。”“阿姨（小余）跟您有联系，她会告诉您的。”

我无语……

2018年10月30日

看望悌忠病中的父母，没有去医院。二老同躺在家中并排放置的两张单人床上，请了阿姨小杨照顾，悌忠弟弟也基本整日守护家中。心中感叹：高官、百姓，两重天啊！

2018年10月31日

一早，绕道门诊部进入病房。

九点左右，小芹、小玲搀扶张阿姨进到病房，满起也来了。10:30分，医院召集家属和单位开会，通报李锐病情。院方有于主任，董、李两位医生，组织部来了四人。李医生主讲，说李老目前出现了 DIC（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判断是静脉埋管感染造成，情况凶险。医院当会尽力，但是如此高龄，没有把握。

2018年11月1日

早八点一刻，仍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于主任和李、董二位医生来查房。我说如此高龄，这样凶险的病情，你们还能够维持，为什么不写论文呢？于主任说：“写出来外国人无法理解，百岁的老人为什么要上这些手段维持？”

护士来作吸痰，老头子连反抗、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只艰难地说了一句：“不要了……”

晚上在国宏正跟几位朋友一起吃饭，突接小余电话：“小妹姐，老头子不好，你快点来！”我和悌忠急忙打的赶到医院，一路小跑成功地从门诊部绕进高干住院楼，值班的恰恰是呼吸科主治医生，告知我们病情：突然缺氧，已经上了无创呼吸机。再次向我们确认不进行创伤性抢救。一个小时后，满起开车带老太太和胜利到了，张阿姨留在病房过夜。

2018年11月2日

早坐满起车，他接老太太，顺便将我带入住院楼。

张阿姨离去后，我走到父亲床边在耳边轻唤：“爸爸。”他竟然张开了眼睛，笑了一——一种孩童般的、纯净的笑。直到我走，再没有醒。除吸雾、吸痰外，全天戴无创呼吸机面罩。

2018年11月3日

一早还是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十点过，摘去呼吸机面罩换上强力送氧鼻管，做吸雾。父亲大睁着双眼，直直地看着我，“呵、呵……”要跟我说什么，但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吸雾、吸痰后又戴上面罩，睡去。

2018年11月4日

进入病房如昨。吸雾、吸痰后，老头子清醒了，竟然含混地说出了一句我能听懂的话：“你在哪里吃饭？”小余开顽笑说：“女儿来了，你就不理我了。”老头子向她撇撇眼，甩了一下手，很有力气的样子。我们都高兴：老头子还不糊涂，还有劲儿！

2018年11月5日

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父亲一直昏睡。于主任、李医生来查房，告诉我：尚平稳，指标有好转。明天会输血。

2018年11月6日

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父亲醒来一次，我摘下口罩，似乎认出我，笑了一下，还是那种小孩子的笑。

护士来输血。方主任、李、董医生来查房，告诉我：情况还平稳，但所有指标都在边缘状况。

2018年11月7日

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父亲情况稍有好转，呼吸机屏幕显示自主呼吸次数增加。摇起床一次，给他翻看了《敬寄李锐》。神情专注，随着我翻页、解释，盯着书看，但是无法确定是否看懂了。

护士来作吸痰。做完后，父亲清晰地说了一句：“绝对不干了。”
一直沉睡。

2018年11月8日

一早仍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父亲今天退烧了。医生来查房，告诉我 DIC 纠正过来了，但是肺功能太差了，自主呼吸已经很难，今后不可能脱离呼吸机了。

十点做吸雾，摘下呼吸机面罩换上强力送氧，父亲说了几次话，但是太含混了，我和小余都没能听懂。猜着拿给他看《敬寄李锐》，翻了几页，还是不知道是否看懂。

做完吸痰，睡去。没上呼吸机，只用强力送氧，希望老头子能睡得舒服些。

2018年11月9日

一早进病房如昨。

父亲又发低烧。小余说：给老头子擦个身吧，体温能降下来。果然，擦身之后体温正常了。

医生查房走后，父亲醒了，清楚地认出了我，拼尽全力对我说：“我还要，我还有，我还……”嘴巴一闭一张，费力地喘着，再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我看着心酸，附在他耳边说：“我还要待几天呢，不走，你别着急，以后慢慢说。”老头子合上了眼睛。后又几次睁开，几次认出了床边的我，几次笑了——小孩子那样的、快乐的笑。

十点摘下呼吸机罩，换强力吸氧至十一点四十五分，复上呼吸机。

2018年11月10日

进入病房如昨。

父亲今天情况不好。李医生值班查房，说汪东兴最后一天到晚讲阶级斗争，那可能是他一辈子印象最深的事儿。用下巴点了点老头子：“这个老头子不错，说的是普通人的话。”又叹息说：“脑子可千万别坏了，那就太可惜了。”

父亲只醒过来一次，认出我，像小孩儿一样笑了。

2018年11月11日

进入病房如昨。

父亲一直在睡。又输血。

2018年11月12日

进入病房如昨。

一直睡着。10:40 吸完痰后醒过来，看着小余，清楚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又转过脸来看着我，我摘下口罩，问：“我是谁？”

父亲说：“伟大的女儿。”

我和小余都哈哈地笑了。

父亲又问：“吃过晚饭？”

我说：“我要走了。”

父亲很清楚地问：“你回哪里？”

我说：“回美国了。”

父亲说：“你吃饭……”然后拼尽全力：“哎……哎……”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一直不放，喉头含混地发出：“什么时候还回来？”——这是小余猜出的意思。

我说：“明天还会来的。”老头子点点头，闭上眼睛。

2018年11月13日

进入病房如昨。

老头儿一直昏睡，十一点多才醒来，情绪显得很烦躁。

2018年11月14日

一早，满起来国宏接我和悌忠，张阿姨已经坐在车里。我们一起到了医院。老头子一直在睡。张阿姨将她买好的寿衣、鞋袜、帽子一一拿给我看。我应着，说：“老头子平时最喜欢的衣服就好。”

李医生来查房，知道我要走了，说：“老头子这次从凶险的边缘拉回来了，但是上下波动很不稳定，随时都会有变化，是否能熬过这个冬天，我们真是说不好。”

十一点多，老头子醒了，认出悌忠，拼尽全力、清清楚楚地说出：“我要讲话……”，然后拼命地张嘴、使劲地张，合上再张，但是除了喘气，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我俯下身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额头：“不说了、不说了。我们都知道……”父亲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我们在隔门处向老头儿摆手告别，老头子伸出双手抖着，小余说：“他让老太太跟你们握手。”我们赶紧走回去，张阿姨跟我们握手，老头子看着点点头，闭上了眼睛。还是小余懂老头子啊。小余跟父亲同是平江人，在父亲家已经做了十几年，有她照顾老头子，我心里踏实。

下午两点退了国宏的房间，五点廿分飞离北京。

结束语

回到美国后，国内的一位朋友在电子邮件中向我发问：“你知道李老这样维持一天的费用吗？”

我回复她：“我不觉得我爸每天花多少钱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这种

花费是建立在级别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个人意愿之上的。”

父亲当年加入共产党，是以为这个党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躺在病床上已经什么也做不了的他，只能哀叹：“怎么办啊？这个党！”

但是去年在医院与父亲相处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带给我最多的是他的笑——变得犹如孩童般快乐和纯真的笑。

父亲在回忆三峡论证过程的文章中说：“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苍天有眼，在李锐一百零一岁的时候，给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美国之音的记者走进了他的病房，那一天张玉珍政委恰恰不在身旁，让他留下了绝唱：“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一哲土方 丁东 丁建国 丁柏生 万润南 严家祺 于善浦 云南炎黄春秋读者 云卷云舒
任小彬 众人 何清涟 何雨淮 冯崇义 冯青堂 冷阳春 刘嘉波 刘小磊 刘强 刘星明
刘海 刘琼 刘道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78 级部分同学 华伟范 南浦 卢明明 及川淳子
史宗伟 向喜英 向明月 吕月 吴思 吴萍 吴雁程 周七月 周孜仁 周实 周成启 唐仲远
唐冬戈 唐怡 夏楠 大众一员 宋霖 尹曙生 岳建一 崔武年 嵇发根 布兰斯泰 廖国华
张丁 张以林 张光渝 张博庭 张宝林 张庆辉 张曙光 张楠 张欣生 张琳璋 张红果
张维引 张遵宏 张钰 徐中秋 徐成 徐跃 戴晴 吴江 曲乙家 曹谦 月明风清 朱健国
朱刚 朱晓 朱正 李乾 李仲兰 李冰封 李刚 李包罗 李大同 李工真 李欲晓 李润勉 李玉
李良玉 李连斌 李飞飞 杜厚勤 杜鹏飞 杨启宇 杨子怡 杨小凯 杨志洪 杨新跃 杨继绳
林垦 林梅梅 林海 林蕴晖 梁国雄 欧铁辉 欧阳国金 武宜三 毕成 毛新华 江汉 池堂春草
汪廷奎 汪葆明 沈汇丰 沈秀冬 沙达 凌铭 滕叙究 牟广丰 玄武 王东成 王中陵 王云生
王作高 王克斌 王庆彦 王庭恺 王康 王强山 王德禄 王承鹤 王昌民 王明全 王晓林 王普
王智仁 王毅 王炯华 王申生 瑟瑟发抖的人 百家出版社 皮公亮 盛禹九 石楼 碧琼子 祁雪
祝华新 程建学 程真 程绍国 章立凡 管谨武 罗京生 老桂 老鬼 黄肖路 肯迪 胡三贴
胡平 胡显中 胡晓明 胡荣华 胡静怡 胡鸿 苏俊 范建 范明强 荐志刚 董国和 蒙宪 蒯高毅
蔡文彬 蔡霞 薛原 薛开震 袁培根 袁文庆 许强 许有为 许绍吉 谢小玲 贺兰吹雪 赵亚山
赵倚平 赵健民 赵哲 赵诚 越峰 车兆基 车天启 邓世广 邓伍文 邓步峰 邢小群 邵晟东 邹平
郑仲兵 郑轰轰 郭世佑 郭于华 郭冬成 郭业大 郭振乾 郭绍华 金家兄妹 金常政 金道华
钟叔河 钱振选 阎 淮 陆茂竹 陈世群 陈四益 陈国阶 陈坡 陈宝成 陈少平 陈巧巧 陈建源
陈忠介 陈昕舟 陈楚三 陈祖堃 陈达志 陈长久 霍亚新 韦弦佩 韦石 韩三洲 韩磊 韩钢
顾晓渔 马君骅 马昌海 马杰 马育忠 高知贤 高雷 黄一龙 黄学章 黎一青 黎安泰 黑川真一

谨以此电子版衷心感谢每一位送字的朋友

李南央 编辑 制版
二〇二四年二月十六日